

# 目录

第一章 .....	5
共和主义与经济学 .....	5
第一节 .....	6
共和主义与经济学 .....	6
经济分析离开政治分析必然荒唐.....	13
第二节 .....	18
共和主义与美国 .....	18
——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18
共和国中人的平等 .....	24
共和国中的德性、德行与共同的善.....	27
共和国中权力的制衡——斯巴达的政制发明.....	32
共和国中的阶级斗争 .....	38
第三节 .....	44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共和主义.....	44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综合.....	51
第四节 .....	56
从私有产权到法治、自由.....	56
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自由和法治 .....	63
不要再提市场、民营企业 and 企业家创新精神 .....	66
私有化是中国学术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71

私有产权的前提是持枪权与民兵制度.....	76
附录 1.1.....	81
附录 1.2.1.....	83
附录 1.2.2.....	85
附录 1.2.3.....	86
附录 1.2.4.....	91
附录 1.2.5.....	95
附录 1.3.1.....	96
附录 1.3.2.....	97
附录 1.3.3.....	98
附录 1.3.4.....	99
附录 1.4.1.....	100
附录 1.4.2.....	101
第二章.....	103
东方全能治理体系.....	103
第一节.....	104
全能治理体系与治水国家.....	104
治水国家.....	110
第二节.....	118
儒家、法家、道家的奴才主义、刑治主义与愚民主义.....	118
打倒孔家店.....	124
法家统治下的停滞社会.....	130

官魂、匪魂、奴魂 .....	137
第三节 .....	144
秦汉与罗马 .....	144
罗马 .....	157
秦汉与罗马的比较 .....	162
第四节 .....	167
一统天下 .....	167
国际关系 .....	176
第五节 .....	182
危险的同行者 .....	182
普京与俄乌战争 .....	189
附录 2.1 .....	200
附录 2.2 .....	203
附录 2.3 .....	205
附录 2.4 .....	208
第三章 .....	212
马列中国 .....	212
第一节 .....	213
论经济奇迹与中国苦力 .....	213
中国苦力 .....	219
社会保障制度 .....	227
第二节 .....	237

论中国的反腐败与官员晋升.....	237
论晋升锦标赛 .....	251
第三节 .....	256
论中国的抗疫 .....	256
第四节 .....	271
我不能沉默 .....	271
武大学派 .....	277
附录 3.1.....	287
附录 3.2.....	290
附录 3.3.....	292
第四章 .....	294
当代经济学 .....	294
第一节 .....	295
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	295
第二节 .....	313
重论财政分权定理与重商主义.....	313
重商主义 .....	316
第三节 .....	325
给中国经济学青年的回信.....	325
第二封 .....	333
第三封 .....	339
附录 4.1.....	343

# 第一章

## 共和主义与经济学

# 第一节

## 共和主义与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某种意义上是猪的经济学。它最大的错误是把消费或收入（GDP）看成是效用的决定因素。假定一个公民只有物资消费（甚至是很高的物资消费），而没有私有产权、自由言论、自由媒体、平等……此公民一定是一头猪。

兰格<sup>1</sup>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福利所用的效用函数就是猪的效用：活着，然后看谁的物资消费最好。兰格不知道其它更重要的因素才让猪成为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啊）。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都没有引进自由、产权和法治。英美宪政国家有自由、法治和产权，而苏联和东欧公有制国家没有自由、法治和产权。这才是兰格公有制经济均衡不可能实现私有制经济均衡的关键。米塞斯和哈耶克<sup>2</sup>都没有搞对啊！其实兰格自己回波兰就证明他是一头“猪”，芝加哥大学的斯蒂格勒就是如此看待兰格的悲剧命运的。而米塞斯和哈耶克在驳斥兰格的过程中也没有看到我说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完全不了解。天大的遗憾。而兰格是数理

---

<sup>1</sup> 兰格：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立者之一，最为人所知的是创立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试错法”获得均衡的价格，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使这能成功，这也仍停留在物资消费上。——如果未经说明全书的注释均为作者的学生所加，后面不再赘述。另外，正文中所有英文和部分文言文的翻译也都是我添加的，微博和朋友圈原文并无这些译文。附录的英文我没有翻译，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sup>2</sup> 米塞斯和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当年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大师傅）。连科斯和诺斯<sup>3</sup>的经济学也都只是些表面分析。

当代经济学只关注物资消费的效用是错误的、片面的，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学最根本的是产权、法治、自由、平等与共和宪政。考虑到这些因素，兰格的问题就变得很容易了。人和动物的效用函数都是定义在各种各样的消费(c)和各种各样的自由权利(z):  $u(c, z, Z)$ 。c是消费向量、z是自由权利向量、Z是自由权利资本的积累。比如，效用函数可以定义为：

$U$ (物资消费量、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平等或民主、三权分立宪政、人的权利如持枪……)。

于是，在前专制独裁的苏联：一般人的效用函数  $U$ (物资消费很差、私有产权=0 或负数、法治=0 或负数、自由=0 或负数、民主=0、三权分立宪政=0、人的权利如持枪权=0……)，苏联人和东德人当然逃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公民： $U$ (物资消费向量、有私有产权、有法治、有自由、有民主、有三权分立宪政、有人的权利如持枪权……)。现在再让兰格去比较苏联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福利吧。同样的，用我的模型就很容易比较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福利，尽管中国人均 GDP 只是美国人的七分之一。不过，我不能保证中国统计数字是不是真的……有人说中国的财富总量，有个联合国统计数据是 130 万亿美元，早就超过美国 90 万亿美元总量了。那是因为联合国也没有按照我的财富总量计算，联合国的财富没有包含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教育、人力资本、产权、法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总体财富（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治、人的权利、体育、教育、电影、歌星…）超过美国，全世界会持有人民币的。请看我的论文：美元化和最优通货膨胀。<sup>4</sup>

生产函数当然如此：

$F$ (物资投入向量、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平等或民主、三权分立宪政、人的权利如持枪……)。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或动物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离不开资本和自由： $(dk/dt) = f(k, z, Z) - g(z) - c$ 。f(k, z, Z)是用资本和自由来进行生产活动，g(z)是获得各种自由的成本函数。

我们以往都注意到经济学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里都必须有持枪权和法治了吗？否则消费者和生产者怎么保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和财产权利？斯巴达、雅典、罗马共和国、瑞士、美国全民皆兵的意义理解了吗？否则，消费者的消费

<sup>3</sup> 科斯和诺斯：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

<sup>4</sup> Zou, Heng-Fu, 1993. "Dollarization and inflation in a two-country optimization mod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Elsevier, vol. 12(2), pages 209-220.

品和生产者的生产产品根本不可能在自己手里。懂吗？这是我们的经济学的出发点。

同时，我是第一个发明创造了自由权利的数学模型吗？有可能，因为我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人这么做过。理论上，我们把  $Z$  看成自由资本的总量指数： $(dZ/dt) = h(z, w)$ 。  $w$  可以看成政府限制人民自由的强力。  $Z$  是自由（群己权界）资本的向量。我们每天消费的  $z$  是  $Z$  形成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消费的所有自由慢慢形成自由的资本。例如，消费者在每一时点上都从消费品、自由（自由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研究……）上得到效用，花在自由上的开支形成自由资本： $\max u(c, \text{liberty consumption}, \text{liberty capital})$  注意：在这个模型里，私有产权也特别重要。否则，政府可以剥夺公民的收入，每个公民持有武器也极端重要，因为政府或其他公民可以抢走私有财产，甚至强迫某些公民成为奴隶。

自由资本的积累同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是一个道理。这是共和经济学最基本的动态方程，它比 Solow 的物资资本积累方程还重要。私人武器的积累、私人媒体出版力量的积累、私人言论自由的积累……都是自由资本的积累。这些也都是产权和法治的积累。数学上，这些积累过程特别容易把握。1995 年我就发表了自由资本积累模型，只需要改变一下 notations（符号）。资本主义经济学模型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资本主义历史、政治、法治……的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

历史上自由资本的形成需要悠久而高昂的代价：《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 年 6 月 15 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1199—1216 在位）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全文共 63 条，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限制王权。《人身保护法》：1679 年 5 月 26 日查理二世签署批准。这是英国自由权力积累的第二个阶段性立法。《权利法案》：1689 年 10 月 23 日威廉三世接受了国会提出的该法案，全文 13 条，约 800 字。其内容的核心是限制王权，确立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同时，第 5 条规定了请愿权；第 8、9 条规定了议员的权利和自由；第 10 条规定了免受酷刑的权利等公民权利。这是英国自由权利积累的第三个阶段性成就。《王位继承法》：1700 年制定，1701 年颁布，旨在通过规定王位继承问题，保证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控制王权。接下来，自由资本积累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是美国 1776 年的《独立宣言》。《1787 年宪法》是美国 1787 年制定并于 1789 年批准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这是自由（群己权界）资本积累最伟大的成就。法国《人



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颁布）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

特别需要指出，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后一条，即第十七条才宣布：“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法国大革命到今天，法国人追求的平等都是尽量消灭私有制。法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其专制主义和卢梭的极权主义国有制。

在真正的共和国里，公民效用极大化和利润极大化才能成为现实。在中国，效用极大化和利润极大化就必须由党来决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sup>5</sup>，我们怎么能搞个人效用极大化和利润极大化呢？大错特错。中国社会科学都用法家思想为基础来研究，现在中国是法家最发达的时候。那些用个人效用极大化和企业利润极大化的私人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等于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市场的一般均衡更由党决定。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的根本是党性，懂吗？我们中国经济学人懂这点中国最大的政治吗？中国经济模型一定要有共产党领导一切：共产党的作用必须放在中国经济模型的首位。那些发表金融数学和数理经济学论文的中国公民不要乱玩一般均衡模型和对策论模型：你们模型里是否有党决定一切、领导一切？不要用数学技巧掩盖自己的无知。看到我们国内中国人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来研究中国股市和中国进出口贸易，我都笑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可能有银行挤兑，大家都让人民站在最前面取钱；十四亿人都是国家第一。中国也不可能有金融危机，因为我们都维持国家稳定。这些人还把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牛头不对马嘴，胡拉乱扯。欧美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经济学模型不能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经济。

我们国内人学一辈子经济学都不知道 free market economy（自由市场经济）和 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的差别。我们说的市场经济和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国内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啊，猪（pigs）啊。中国根本没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常识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国内人天天读马列主义，他们时刻考试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有几个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sup>6</sup>我看中国就没有一个人真读懂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昭告天下：“共产

---

<sup>5</sup>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该词是2019年3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习近平主席在回答菲科提出的问题时谈到，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sup>6</sup>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由陈云独自享有，他还另外独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称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叶剑英、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徐向前等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李富春和张闻天；胡耀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清理干净。中国是公有制，不是私有制，那些想在中国搞私有制的人快点滚去美国。中国其实不需要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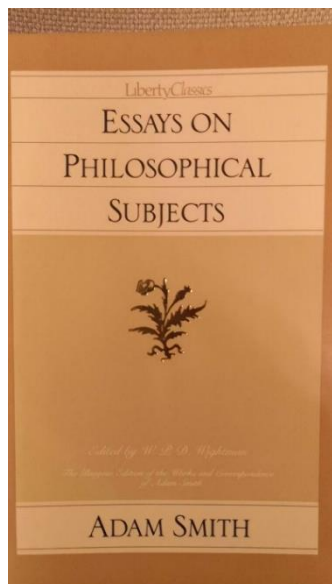
为了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大家一定要全面学习历史、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习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学表面上看上去是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体现。不懂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学。首先，大家一定要精读洛克的《政府论》。第二，大家要好好学习英国宪法、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特别是美国宪法后面的《人权法案》）。第三，大家要认真阅读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严复把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了不起！群己权界一下子就体现了法治、私有产权、个人权利、三权分立等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以，著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一般用自由来概括英美宪政，他们努力避免民主（多数人统治）这个混乱不堪的词汇。法国人托克维尔把美国叫做《美国的民主》，哈耶克批判他乱用民主。欧美政治家喜欢简短地用民主来称呼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群己权界（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群己权界（自由）必须有私有产权和法治。

同时，为了认识中国的制度，我们必须认真地、同时地学习《中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因为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没有看懂以上这些重要文献之前，我们谈都不要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

现在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模型里看不出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差别、看不出法治和商鞅法制的差别、看不出自由和奴役的差别。如果你们读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sup>7</sup>就更清楚我在说什么了——只有在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这几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后，效用函数才开始仅仅定义在物资消费量上。这是把人变成了猪的过程，只有猪才只需要物资。<sup>8</sup>这也是 Hansen-Sargent 开始把经济学-金融学工程化的死路。经济学金融学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私有自由市场和宪政基础之上，中国哪里有这些？Bewley, 萨金特、Lars Hansen、Maskin, Larry Epstein ……这些人 naïve（天真）啊：他们以为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就是美国的私有自由市场，天天研究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

<sup>7</sup> 可以参考罗伯特·海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家》对包括圣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经济思想的追述。

<sup>8</sup> 是否让我们想起来历史上最著名的仅由物资需求建立起的城邦：柏拉图的健康城邦（格劳孔称其为猪的城邦）。在这种城邦中没有政府，更没有法治、自由、平等的概念。现代经济学也一样，政治制度的作用被忽略了，根本没有法治、自由、平等这样的要素。



看看经济学堕落到今天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我们怎么对得起亚当·斯密的天文学、伦理学、哲学、法学、人类学和财富学？人类文明进步了？当代经济学的核心应该是公民的权利。私有产权、自由、法治、平等和宪政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制度，它们也是当代经济学私有自由市场竞争和最优资源配置的核心和基石。而我的共和经济学明确地把这些权利写在数学模型里，我的共和经济学真正关心自由给人民带来的效用。

无论是私有产权、自由、法治还是平等和宪政，他们都与一个伟大的观念“共和主义”有关。“共和”这个名字中国人并不陌生，斯巴达共和国、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里最大的特征和享受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多么难以实现的啊！现在你们知道了，很多国家都叫共和国，但它们本质上根本不是共和国。我们实际上对共和理论一无所知。我们还不学政治哲学、宪法学和历史。怎么办？

“共和主义”的概念来源于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思想家，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李维、西塞罗、塔西佗、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civic humanists）如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等人对共和主义的贡献也尤其杰出。十七世纪的英国共和主义思想家如哈林顿、弥尔顿和锡德尼（Sidney）更进一步让共和主义思想在英国和北美大众化。之后“共和主义”的影响一步步地扩大，它为十八世纪的革命性激变铺平了道路。消灭国王并代之以选举政府早就成了西方普遍的共识，共和主义在英国和北美呼唤全新的道德体系。共和主义提供了构建社会的新途径，它从思想和实践上瓦解了君主制的依附关系，它同时给出了新型的社会关系。

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凯恩斯《通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自天启，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不同观念的对决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归结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共和制在此时对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

家长制、庇护制等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巨大挑战。孟德斯鸠在 1748 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里歌颂英国的虚君共和制：英国“可以被称为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他在暗示法国的集权君主制可以从英国虚君制政体里借鉴很多东西，法国应该变得更加共和化。

共和观念（产权、法治、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宪政）下的希腊城邦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是人类最大的自由帝国扩张。共和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决定了美国革命和美国之后的一切共和革命，这就是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基础最重要的证明。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今天，文明的冲突其实是共和主义和非共和主义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sup>9</sup>必须如此重估。其实 1840 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已经是中国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和西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华民国体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共和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更突出了西方马列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与共和主义（人民）。共和主义观念（产权、法治、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宪政）在国际霸权的地位已经远超军事力量、资本力量和科学技术。这次欧美联合起来对付俄罗斯让我们看到俄罗斯东正教沙皇文化和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冲突。另外一个主线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

在今天，观念和意识形态早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俄罗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美国内部为什么充满了阶级斗争但仍能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美国为什么接纳如此多的拉美移民还能继续保持扩张？为什么在美国如此多的人支持持枪？法治，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如此歌颂大一统？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关注点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上转移到共和经济学上。

共和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耶路撒冷文明、希腊文明、罗马共和国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共和国文明、日内瓦共和国文明、尼德兰共和国文明、英国文明和美利坚共和国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学科，包括了我四十年来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大问题：大国兴衰、权力意志、军事冲突、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集权与分权、收入分配与腐败……我的资本主义精神模型、军事力量积累模型、重商主义模型、熊彼得创新企业

---

<sup>9</sup> 美国政治学家，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 21 世纪核心的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家模型、自由资本积累模型……都是共和经济学的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只是共和经济学里面的一些技术性的特例而已。

共和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共和主义政治哲学<sup>10</sup>研究。制度研究只是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一部分。不懂政治哲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经济学。共和理论和实践的入门基本经典：柏拉图的《共和国》（此书翻译成《理想国》是愚蠢至极，柏拉图写的是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我们最好翻译成《政治制度 Political Regimes》或拉丁文的《共和国 Republic》，中国人翻译书乱来。），《政治家》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宪法》；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罗马史》；哈林顿的《大洋国》；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武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和《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sup>11</sup>不懂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哲学思想，我们的经济学等于空谈。

我创立的共和经济学同时也以古典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作为基础。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都是自由主义，而我是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三派统一在一个框架里，在我的自由资本和经济增长数学模型里，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丝毫矛盾<sup>12</sup>，这些我后面都会谈。目前大家可以看我模型化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重商主义、军事冲突的论文<sup>13</sup>，我一直在把各种意识形态纳入当代经济学模型里。

学政治哲学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四十五年来读书、思考、写论文后创立我自己的共和经济学是我脱胎换骨的过程。我因为有了我自己的共和经济学，回到了十六岁！我们读这些政治哲学著作时也不要忘记把他们的思想写成数学模型，否则这是浪费时间，我们要同时模型化他们的思想。我们一起好好读希腊、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我们不要忘了锻炼身体，让我们共同模型化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和宪法制度。

## 经济分析离开政治分析必然荒唐

一百多年来我们出国留学的人基本上没有学到西方自由共和的理论和实践。胡适和鲁迅没有学到，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太多错误，因为他不懂西方哲学、西方政治学、西方宪法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社会学……我原谅他的无知。

<sup>10</sup>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如果人民把获得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产生了。政治哲学旨在了解政治事物的本质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

<sup>11</sup> 更多的共和主义文献见附录 1.1。

<sup>12</sup>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尝试处理以罗马共和国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与英格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矛盾。他最终没能调和这种矛盾，而决定支持代表自由主义的英格兰，在他看来贸易与财政取代了德性。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sup>13</sup> 见邹恒甫《宏观、财政、金融、增长》三卷本

杨振宁和丘成桐都不懂财产、自由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华罗庚和钱学森更没有学到。钱钟书读书水平太差，因为他不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所以他写的东西毫无思想。还有王国维、吴宓……他们在国外留学都没有看到这点。吴宓和陈寅恪的保守主义维持儒家的三纲六纪（君权神圣和等级神圣），否定基督新教人人上帝面前平等。他们可笑至极，因为有上帝，人才在上帝或造物主面前一律平等，没有上帝，我们必然在地上建立被崇拜的帝王。李政道本能地拒绝洗脑，了不起！

陈寅恪<sup>14</sup>在国外留学那么多年也没有学到西方自由共和文明。我举一个例子：陈寅恪把王国维死守三纲六纪而投水自杀歌颂为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接下来把陈端生和柳如是反抗三纲六纪也歌颂为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企图在华夏复兴赵宋儒家、阻挡耶教、否定马列教……他让我哭笑不得。陈寅恪的自由是中国传统的自由自在 licentiousness “由于自己（自由）和在于自己（自在）”，这跟希腊罗马共和文明里的“自由”没有丝毫关系。崇拜德意志帝国强权的历史学家兰克<sup>15</sup>对陈寅恪先生有些影响。同时，陈寅恪先生完全没有领会仇视权力的布克哈特和阿克顿勋爵<sup>16</sup>的思想，悲哀。陈寅恪、钱钟书看了《国富论》和《资本论》，他们连产权、法治、自由这些概念都不知道啊。

我所认识的在美国得了经济学博士的中国人也基本上没有看到这点。张五常他连罗马共和国和第二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给经济学做解释？林毅夫、李稻葵、钱颖一、张维迎、姚洋、温铁军<sup>17</sup>……他们玩视频瞎侃。我们要读希腊罗马以来的经典著作，学好数学。现代经济学、政治哲学、宪法学需要我们建立数学理论模型，天天瞎侃有什么用？但是我绝对不赞成数理经济学模型里没有法治、自由、产权、宪政等要素的无聊数学游戏。特别是对策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里面的无聊游戏，对策论和激励机制设计应该算应用数学。因为经济学模型没有这些政治体制、法治、自由、宪政等关键因素，党和国家才让我们玩空洞的一般均衡、对策论和统计数据游戏。经济学离开政治要素就没有丝毫价值，因为经济学是最政治的学科。

经济学正越来越成为经济工程学，这是当代经济学的悲剧。除了无聊的职称和基金之外，这种经济工程学没有丝毫价值。中国经济学人不在经济学里引进政治和宪法，怎么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学人根本不知道现在欧美的思想。中国经济学人最可怜、最无知。中国是全能治理体系，而

<sup>14</sup> 陈寅恪：中国上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之一，曾为纪念于昆明湖投水自尽的王国维而写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冠绝一时。

<sup>15</sup> 即利奥波德·冯·兰克，十九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sup>16</sup> 雅各布·布克哈特：最早的艺术和文化历史学家之一，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约翰·阿克顿，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法国大革命讲稿》他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他们两人都是自由主义大师。

<sup>17</sup> 他们均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文我只介绍一些没提到的经济学家。

我们的经济学人以为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中国经济学人根本不懂西方法学、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理工科学生是不是政治（社会）动物。<sup>18</sup>彭实戈<sup>19</sup>就是最无知的金融数学投机取巧混混。这是国际欺骗，现在还有谁搞这种东西？这些人的学生把经济学金融学变成了应用数学和工程技术，他们的论文对中国和美国都毫无实际意义。

钱颖一谈法治等于白痴胡言乱语。钱颖一是学应用数学出身，他哪里懂西方人文社科。钱颖一鼓吹法治和企业创新，没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哪里可能有法治？没有私有产权，哪里有企业家创新？这些人欺骗中国人最让我恶心。钱颖一他们也瞎折腾科尔奈<sup>20</sup>预算软约束（政治手段硬如钢铁）。他侮辱斯文，误人子弟。我很早就批判了科尔奈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国有企业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体，它的预算首先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软吗？民营老板为什么借不到银行的钱？他们的预算约束为什么很硬？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必须依赖（购买）政治权力。国企经济上的软约束来自于国企的政治地位，如果国企总裁的政治地位没有了，他可以被双规、被撤职、被判刑、坐牢、甚至被执行死刑，这些政治惩罚可以比钢铁还硬。国企老总们听着：政治上不听话，经济上搞死你们。哪里有什么预算软约束！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纯粹从经济角度看国企，何等幼稚啊。钱颖一本人都应该否定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国有经济这些年清洗贪官如此之多正好说明：政治中国不存在纯经济的预算软约束。请看我和罗长林的论文<sup>21</sup>。科尔奈没有这样做社会主义经济模型，所以他不能得诺奖啊。我在中国传播的现代经济学假定全国都是私有生产者和私有消费者（二者的结合就是宏观模型里的 representative agent）。现代经济学根本不知道如何模型化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科尔奈的著作也没有摸到公有经济的门。

我们中国经济学人倒退了，天天空谈企业家创新和 GDP，不公开讨论如何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应该定义在消费、产权、法治、自由、生态环境、教育、医疗上。中国人不仅关心自己腰包里最后能拿到多少钱，更关心自由、产权和法治。天天谈 GDP 干什么？怎么不谈私有产权可以（包括法治和自由）比公有经济创造更高的 GDP 呢？林毅夫天天比较中美 GDP。美国的 GDP 在美国人手里，中国的 GDP 主要在国家手里。美国到处用工荒，工资飞涨，就这样 GDP 增长还是负值。中国大批公司倒闭，失业率飞涨，名校

<sup>18</sup> 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想强调人的语言特征使人相比于其他动物具有政治属性。

<sup>19</sup> 彭实戈，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山东大学数学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sup>20</sup> 科尔奈，哈佛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

<sup>21</sup> 罗长林，邹恒甫：《预算软约束问题再讨论》，《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5期。

博士竞争小学教师。这样还是 GDP 正增长，真牛！台湾叛逃军人林毅夫和李稻葵天天吹嘘中国 GDP 增长百分之八。这不是坑死中国人吗？中国人天天活着就是为了 GDP 增长？中国人不睡觉、不吃饭，把一切都积累起来搞 GDP 增长？记得几年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 Niall Ferguson（他在清华大学也混过多年）回答林毅夫：“中国未来几十年每年 GDP 增长率只百分之八？你太谦虚了！中国要多高就有多高，国家统计局说了算。但中国股市赶不上美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治、产权、妇女的权利等众多方面，不要老谈 GDP 和进出口贸易。中国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最底层十亿中国人的价值。中国人不是苦力，也不是奴隶。我们天天谈 GDP 没有意义，如果底层十亿中国人的最低报酬不是每小时二十美元，发展就没有提高穷人的价值。

凯恩斯的 IS-LM 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各国政府为什么继续天天用？因为干预是政府的本能。贸易保护主义本来是正确的，为什么个别国家不坚持？因为个别国家的政治需要自由贸易手段。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经济分析离开政治分析必然荒唐。我在近期才特别体会到经济学者是多么得无知无畏。记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历史记录下来。

邹至庄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福特班、讲初级和中级教材，误人子弟。他们根本没有让学生们理解自由市场经济学里的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分权制衡等最重要的思想。同时，我总是要学生们读懂西方文明史和欧洲历史。邹至庄项目培养了一批不懂西方自由经济学的经济工程师。这些人完全不懂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文明、西方历史，更不懂西方法律。

不过中国经济学被搞成应用统计和应用数学，我也有很大的责任。我当年在武汉大学办数理经济学和数理金融班<sup>22</sup>特别强调西方文明和国学，但我的绝大部分学生只是把经济学当应用数学来学习。万分遗憾，不堪回首。不懂政治哲学、法学和历史，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完全没有意义。目前我们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模型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马列主义的。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深深地爱好武汉大学的哲学、数学和历史课程，我到现在六十岁还没有看到一个中国经济学模型呢！这是我们无知无畏的荒唐教育的结果。

我们国内经济学人都是抄袭国外作业，不会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我期待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学好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宪法学、西方政治学、西方历史之后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武大学派<sup>23</sup>的带头人张培刚、董辅弼、杨小凯和邹恒甫都是产权-法治-自由-宪政人。从 1983 年一直到 2004 年董辅弼先生过

<sup>22</sup> 见《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东方出版社，2013。

<sup>23</sup> 武大学派：指以杨端六、张培刚、董辅弼、杨小凯和邹恒甫五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都与武汉大学有关联，他们都提倡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



世，他和我讨论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一直都是如何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刘道玉<sup>24</sup>老校长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经济学只有武大经济学。武大学派一代胜过一代。全中国没有超过武大学派的。而共和经济学是武大经济学派的最大成就。

我讲的内容比大家学习的经济学（应用工程数学）要过瘾得多吧！为了吸收这几天的知识，我们要看的书太多太多了。先把柏拉图的《共和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罗马史》等书看十遍，否则大家根本不要提问。如果你能找出柏拉图《共和国》里有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全世界没有人不佩服你。大家也要学好历史，如果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不懂古希腊罗马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特别是马基雅维利）和英美历史，我们就不知道经济学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英美两国。人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自 1936 年之后一直在美国。今后也必然如此。

而且我们别忘了看原版书籍，因为没有一个人中国人真正搞懂了西方文明。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看中国人写的西方政治学、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法学、西方社会学和西方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中国人写西方文明史（包括西方哲学史、西方历史、西方法学史、西方经济学史等）总不能克服我们从小到大对西方的先入之见。我在中美两国来回跑了四十年，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你们这些人是经济学里有希望的新一代啊，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发言，因为马基雅维利说了：共和国里，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一起努力！好玩。这是推进中国发展的伟大事业。不过要记住：一定要用数学模型来统一经济学、政治哲学、宪法学和历史。

最后我要给出共和经济学的定义：共和经济学是关于私有产权、法治和自由的学说。有了私有产权、法治和自由，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自然的结果，我更关心的是自由给人民带来的效用。共和经济学是我创立的，大家都可以批判我，但我更希望大家贡献共和经济学的内容。

接下来我开始谈共和经济学的根本大问题了。这不是大家教科书里和 Top 5 里的猪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学课堂都不可能超过我的《邹恒甫共和经济学》，因为我谈的都是我四十年反省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缺陷和错误。

---

<sup>24</sup> 刘道玉：前武汉大学校长，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教育改革家之一。今天非常多的著名学者都曾他的帮助。比如邓晓芒、易中天、杨小凯还有本书的作者邹恒甫。

## 第二节

# 共和主义与美国

## ——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汉密尔顿

没有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理论的理解，我们不会懂得汉密尔顿的这一问题。斯巴达共和国、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都是政治观念设计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马基雅维利和麦迪逊都是把共和国建设看成一种艺术：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国家是一件艺术品，请读完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sup>25</sup>第一篇）。共和国是一件艺术品，所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可以模型化这些国家的政体。其实中国古代也一样，中国古代是秦汉政治、法家刑治主义和儒家奴才主义观念设计出来的，它比共和政体更好模型化，在下一章我们会讨论中国的政体。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访问美国，特朗普在招待会的致辞上谈到古罗马的政治遗产，“罗马共和国的永恒遗产——‘罗马共和国’这两个词多美妙——影

---

<sup>25</sup>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10。

响着世界各国追求公民权、代议制政府和法治的理想。”“美国和意大利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政治遗产而联系在一起，这份遗产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罗马。”<sup>26</sup>

既然如此，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是不是古罗马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在北美人头脑里占统治地位的结果？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是不是由共和主义观念和思想决定的？这是人类四百年来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最重要的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大家看看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引起美国革命和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的。“古典共和主义不是仅仅由少数革命知识分子所掌控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于西方世界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到 18 世纪，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系列完全与君主制兼容的理想及信念的价值体系。在当时，它唤醒了生活在商业社会的人们对德性、德行的关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教养的凝聚剂。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以一种更为友善、更加温和的方式相处——热情、爱和友谊的方式。它的普及还意味着政治上回归平衡宪法，维持某种公正无私的政治领导者以及具有现代文明德性的政治公民。”<sup>27</sup>

从 1636 年（哈佛大学建校）到 1880 年代，美国所有大学的大学生一直有一半时间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圣经和希腊罗马文明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立国。美国国父们都是西方古典学熏陶出来的伟人。美国独立是共和理念在英国和美国以及欧洲普及的必然结果。美利坚共和国实际上是斯巴达共和国、雅典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尼德兰共和国……的继承和发展。在 1760 年代到 1770 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感到他们具有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的德性、德行：质朴、传统、强健、有力。这正对应了罗马共和国的 Brutus, Cassius, Cato, Cicero<sup>28</sup>；而伦敦的一切都代表了衰朽的罗马共和国：“Easy to be bought, if there was but a purchaser.”，Britain was to America = what Caesar was to Rome。（英国之于美国等于凯撒之于罗马）因此，美国独立于腐朽的、暴力的、专横的英国不可避免。1775 年亚当斯宣布反抗英国（这是当年的叛国罪）的革命原则：我们革命的原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李维和西塞罗的原则、西德尼、哈灵顿和洛克的原则——自由和永恒理性的原则。美国国父们把英国专制国王乔治三世看成罗马帝国残暴荒淫皇帝 Caligula and Nero<sup>29</sup>。美国独立战争的革

<sup>26</sup> 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的比较，见附录 1.2.1。

<sup>27</sup> 引自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戈登·伍德，美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他的作品引起了学术界非常大的反响。本书关于共和主义如何构建美利坚共和国的问题上有很多遗漏之处。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他的这两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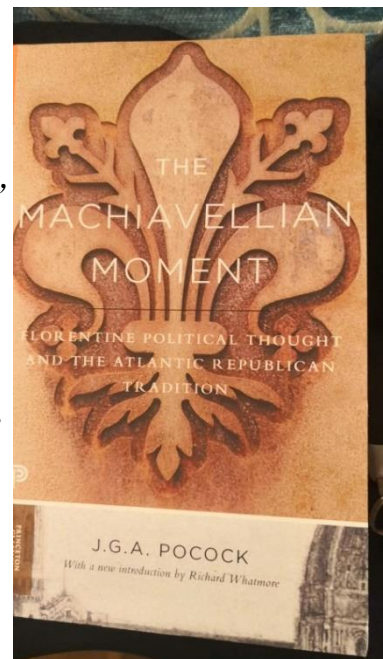
<sup>28</sup> 缔造罗马共和国的四位代表人物。

<sup>29</sup> 卡利古拉和尼禄，罗马帝国第三位和第五位皇帝。

命是遵循希腊罗马传统的革命。美国后来建立的宪政正是亚里斯多德、Livy, Polybius and Machiavelli 反复论述的罗马共和国的混合宪政的修订版。

有些人认为自由主义才是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其实这样想也有一定道理。英国的清教信仰、洛克《政府论》、《大宪章》、《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导致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条款受到了乔治·梅森 1776 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英国的 1689 年《权利法案》和 1215 年《大宪章》在内英国早期政治文献的影响。这是我从事《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发展》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这种想法不完善。像洛克<sup>30</sup>根本就没有谈过宪政如何构建、政府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保持……美利坚共和国是第二罗马共和国啊。

我主张美国革命产生于共和主义<sup>31</sup>，因为共和主义包含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新教主义。美国的立国者们摆脱大英王国不是为了洛克自私自利的“个人自由”，而是为了实现“古典意义上的共和”理想，为了共同的利益。这点很不同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洛克 1679-1681 年已经写好《政府论》了，此书 1689 年才出版。1688-89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只是洛克理论模型的应用。当然，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哈灵顿……他们的共和理论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贡献更大。波考克<sup>32</sup>在《马基雅维利时刻》说：“不存在一个洛克式共和国的蓝图，洛克关心的是政府的起源和终结，而不是它的结构和运作”。引领美国立国的是一种“共和精神”，而且是古典的



“共和精神”，其最初源头在古希腊、古罗马。波考克说，如果要搞清美国立国的政治观念的真正来源，就“必须超越洛克”。波考克和伍德非常一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不过是马基雅维利思想闪光的两个时刻。

所以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和历史是由众多意识形态决定的：自由主义、希腊-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瑞士-尼德兰-英国的共和主义、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徒主义、进步主义、重商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军事主义、保守主义、苏格兰思想、博爱主义（McWilliams<sup>33</sup>）……美国革命是不是可以按照马克思经济利益

<sup>30</sup> 约翰·洛克：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之父，很多人认为他对古典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反映在《独立宣言》中。

<sup>31</sup> 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对共和观念的阐述见附录 1.2.2。

<sup>32</sup> 波考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教育家。他以撰写有关政治和知识分子思想的历史著作而闻名于世，代表作《马基雅维利时刻》。

<sup>33</sup> Carey McWilliams，美国作家，他因他的博爱观念著名，代表作 *The Idea of Fraternity in America*。

和阶级斗争来理解？当然可以。事实上，1920 年代查尔斯·比尔德<sup>34</sup>的美国文明史和美国宪法的分析都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角度来写的（他的书在中国已经早就出版了，因为他符合马克思）。历史根本没有逻辑或规律，我们可以从共和主义、洛克的自由主义、马克思阶级斗争、新教主义（特别是清教徒信仰）……来解释美国革命。中国历史可以按照君王来写，也可以按照农民来写，更可以按照太监来写。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她自己的人生，来写美国现代史。所以美国数学和物理学教材就不能像历史那样去写。国内的美国历史教材是教育部组织统一编写的，我当然理解很多人认为美国白人剥削印第安部落和黑人奴隶。

1776 年发布独立宣言之后，美国十三个独立国家（states）或独立州都开始进行人类第一次进行的最伟大事业——共和国立宪：（1）实现三权分立（英国的首相和部长等行政官员今天还必须是立法的议会议员）；（2）把高于一切法律的宪法用文字写出来（英国到今天也不知道区分违反宪法和违反法律）；（3）建立立宪和修宪的代表大会（elected conventions）；（4）the process of popular ratification（普遍批准的过程）。在文明世界，没有任何一件发明创造比创立美国宪法重要。在基督教国家，耶稣和美国宪法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家伍德的一些观点：“嗯，立宪主义真的是，我认为，现代立宪主义的潮流真的是由美国革命掀起的。当我们想到制定宪法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制定了几十部宪法，它们是书面文件，但却是美国的经验真正使之固定下来。早些时候也有一些书面文件，但一般来说，人们没有以现在的方式来思考宪法，作为一个单一的书面文件。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独特经历。

在 1776 年，独立战争后，每个州都写了自己的宪法，而大约 10 年后的联邦宪法，则是由这些州的宪法衍生出来的。人们写出宪法是因为他们对权力感到恐惧，或者他们想规定政府可以做什么。政府需要有关于它拥有多少权力的准则，所以宪法发挥了这个作用。当你对你的制度心存芥蒂时，你希望事情以白纸黑字写下来，这样你就能确定权力不会侵犯自由。”<sup>35</sup>伍德还是民主党的，我们还要快速读共和党历史学家写的美国历史。宪法是人的权利的结果。宪法从古到今都不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为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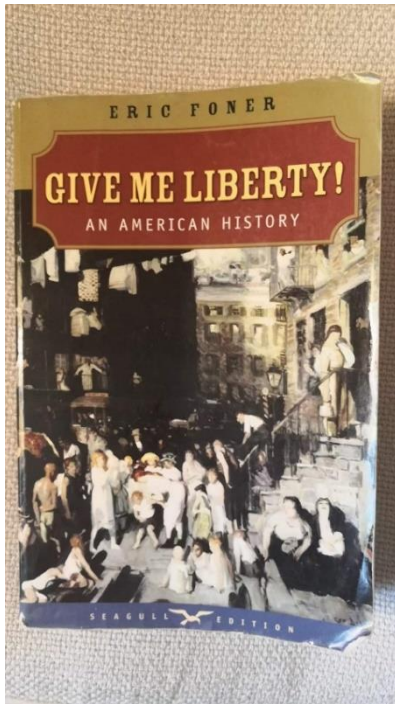
---

<sup>34</sup> 查尔斯·比尔德，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美国历史》、《美国文明的兴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sup>35</sup> 引自《美国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宪政民族的》，基于互联网文摘《Daily Signal》2022 年 5 月 7 号的一个播客改编而成，微信公众号，华尔街俱乐部。

国总统杰斐逊组建了人类第一个政党（民主共和党），因为杰斐逊要反对亚当斯总统和汉密尔顿他们想在美国复兴贵族和王权。

无论怎样，1788年美国宪法批准后，Benjamin Rush<sup>36</sup>激情澎湃：美国成为了 a nation<sup>37</sup>，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欢快。这是知识战胜无知、美德战胜邪



恶、自由战胜奴隶的壮举。约翰·亚当斯<sup>38</sup>当时也说：启蒙运动在美利坚共和国的宪法里达到高峰，自由在美利坚共和国达到顶峰。美国人深信他们是被上帝选中的自由帝国，灯塔之国。托马斯·潘恩赞扬美利坚共和国的自由：旧世界的君王制、贵族制、等级制、庇护制、官僚制……被美利坚共和国的自由世界埋葬。其实自由就是美国历史啊，资中筠<sup>39</sup>都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在美国，自由、清教和财富三位一体。自由才是历史和文明的目的。

美利坚共和国开创了自由、法治、平等、民主、私有产权、人的权利、三权分立的新时代。这让美国首先成为了一个国家（state），而不是一个民族（nation）。谁支持自由、平等、法治、

私有产权、人的权利和三权分立的宪政，谁就是美国人。从1789年开始，美利坚共和国完全摆脱了自己殖民地时期落后于英国的自卑感。美国人一下子意识到自由共和国的观念让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美利坚共和国从此引领世界。美国是一个共和国的观念，让美国人具有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感。十八世纪美国人就喊出了“向西进军”的口号，他们一直要用共和国的观念去改变在美国西边的遥远的亚洲。

美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和最激进的启蒙，因为美国革命跟君王制、贵族制、等级制、家长制、庇护制彻底分道扬镳了。杰斐逊把美国叫做自由帝国。自由帝国这个概念让美国跟所有历史上的专制帝国和未来的专制帝国区别开来。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都是在全世界扩张的“自由帝国”，美利坚共和国制度的存在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制度都是巨大威胁。之后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爱尔兰革命、海地革命、希腊革命、1848年

<sup>36</sup> 本杰明·拉什，《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美国开国元勋。

<sup>37</sup> 这里因为要区分 country, state 和 nation, nation 意为民族国家；country 是一个政治体，可以没有主权；state 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权完整性和独立性。拉什的意思是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sup>38</sup>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之一，重要的开国元勋。

<sup>39</sup> 资中筠[yún]，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欧洲革命、拉美独立革命、1917年俄罗斯2月革命。<sup>40</sup>

Revolution is not produced by misery, but by pressure of a new system on an old one. (革命不是由苦难产生的, 而是由新制度对旧制度施加的压力产生的)。孙中山和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也是率先在代表新制度的香港产生的“我之此等思想(指革命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 暇时则闲步市街, 见其秩序整齐, 建筑宏美, 工作进步不断, 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两次, 两地相较, 情形迥异……我恒默念……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 在一荒岛成此伟绩, 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 乃无一地如香港, 其故安在?” (1923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后问答) “薄遊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瑰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佑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九狄视之。乃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 让地球图, 渐收西学之书, 为讲西学之难矣。” (康有为1879年游览香港的回忆, 摘自<康南海自编年谱>)

但是美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美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贵族等级制和庇护制, 它不必要用新的权力捣毁旧的权力。欧洲革命往往是对旧权力的恨爱交加: 仇恨强大的传统君主制、贵族制、等级制以及教会制必然欢迎巨大的革命权力如罗伯斯庇尔的白色恐怖、拿破仑的独裁、德国“开明君主”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同理, 马克思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专制就呼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当然出现列宁和斯大林。

美国独立是共和国理念在英国和美国以及欧洲普及的必然结果。英国革命期间也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共和制, 其结果是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试图建立共和制, 其结果是出现皇帝拿破仑。美国极其幸运地建立了共和制。

英国1649年把查理一世的头砍了, 接下来是克伦威尔独裁。英国革命一点也不温和, 1642-1651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大战(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or British Civil Wars)死了二十多万人。丘吉尔说, 英国革命跟其他国家革命截然不同: 英国人的最大特点是, 他们即使在叛乱时, 也本能地尊重法律和传统。遗憾的是, 英国在克伦威尔手里实验了共和国的模式, 但克伦威尔成了暴君, 他晚年大权独揽, 以“护国公”的名义实行半独裁体制。——这一蜕变再次验证了圣经以及加尔文神学对人性的洞见: 人是全然败坏、无可救药的罪人。实践证明, 没有国王的共和国制度不适应英国——英国是教会、国会、国王、普通法四者缺一不可, 彼此达成精密的平衡。所以国王又回来了。英国到今天连三权分立都没有做到啊, 这是英国最大的失败。

---

<sup>40</sup> 美国共和主义对欧洲自由主义的影响见附录 1.2.2。

法国实现共和的道路更是多灾多难：1789 年法国紧跟着美国之后追求自由和平等，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92 年 9 月 22 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在 1804 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灭亡。1815 年拿破仑战败之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1815-1830）。1830 年法国第二次革命失败，法国出现七月王朝（1830-1848）。1848 年法国爆发第三次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波拿巴被选为总统。1852 至 1870 年，法国变成了波拿巴三世的第二帝国。1870 年普法战争法国第二帝国失败，波拿巴三世退位。1873-1940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940-1944 年维希法国。1944-1958 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58 年至今，已经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两百多年来欧美、拉美、非洲和亚洲的革命都是美国独立宣言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革命。兰克如此评论美国共和主义对欧洲的影响：“通过放弃英国宪政，建立一个基于个人权利的新共和国，北美人在世界上引入了一种新的力量。当共和思想找到了具体表达时，它的传播速度达到最快。因此，共和主义进入了我们的罗马-日耳曼世界。以往，欧洲普遍认为君主制最符合国家利益。现在，国家的人民应该自我管理的想法传播开来。但是，只有在代议制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之后，这个的全思想部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后来所有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目标……这完全颠倒了一个原则。在那之前，一个靠上帝的恩典统治的国王一直是一切转动的中心。现在出现了一个想法，即权力应该来自底层。这两个原则就像两个对立的极点，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决定了现代世界的进程。在欧洲，它们之间的冲突尚未形成具体形式。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风暴开始了。”

俄罗斯这里，二月革命沙皇退位后七天，美国就承认了新的俄罗斯临时政府，因为俄罗斯临时政府的立国原则跟美利坚共和国的宪法相近。但是，1917 年 10 月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美国是西方最后一个承认苏维埃政府的国家。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是从 1917 年秋天开始的。美国革命是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而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想改变全世界。邓小平也说过，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跟着苏联的那些国家都不行了。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命运交给别人，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富强。

## 共和国中人的平等

平等原则是共和主义思想的核心原则，共和国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美国 1770 年代的革命带动了全世界两百多年来自由和平等的革命。美国和欧洲今天更是在彻底实现种族平等、实现性别平等、消灭等级制……



这种观念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对全世界来说完全是惊天动地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君主制一直是最普遍的政治体制。从罗马帝国到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之前的一千八百年里，君主制下的社会成员是极端不平等的。君主（包括皇帝）是单一的行政首领，君主之下是等级官僚和等级社会。君主还拥有常备军来维持社会等级。罗马共和国里普通人则非常重要。显贵西庇阿家族的一位成员有一天想竞选营造官而拉票。在与选民握手时，他对一位手上长满老茧的农民笑道：“天啊，你是用手走路的吗？”他的话被人无意中听到，平民认为他在嘲笑他们的贫穷和劳动（德性和德行）。他竞选失败了。

共和主义意味着改变形成社会和政治支配的根源，在君主制里，偏爱是擢升的基础，而在美国的十九世纪，生产劳动越来越成为共和主义的标志，贵族阶级的游手好闲等同于君主制。马基雅维利<sup>41</sup>说：在罗马共和国，平民母亲都知道自己的儿子可以当选为首席执行官（总统）。就像约翰·亚当斯激动地指出地那样，在选择统治者的时候，“能力、精神和事业心”将替代财富、地位、家族。后来，在 212 年，罗马帝国本着罗马共和国的精神把所有帝国里的自由人都变成一律平等的公民。罗马帝国只有统治权（imperium），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只是最高统帅（Imperator，军事总领），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罗马人。正是罗马帝国如此包容万象才让十六世纪出现了“国家”的概念。罗马共和制奠定了时代共和文明的基石

孟德斯鸠<sup>42</sup>如此评价共和与专制制度下的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

孟德斯鸠有一部重要的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在这部书中，他考察了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他以罗马为样板，考察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盛衰中所起的作用。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的兴盛在于公民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他指出：“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显然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民，才会感觉自己是主人，才能组成精良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孟德斯鸠说，“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时的卑微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让人特别明显地感觉到”。而罗马后来已成为占据半个世界的大帝国，提起罗马差不多就是提起了世界，但它却腐朽衰亡了。孟德斯鸠以历史事实为例，指出当初拉丁人拒绝向罗马提供军事援助，而罗马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却从自己的城

---

<sup>41</sup> 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现代政治理论之父，他的《论李维罗马史》阐述了共和国如何扩张、兴盛、维持。

<sup>42</sup> 孟德斯鸠：18 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

内一下子聚集起十个军团的兵力，而当罗马成为一个大帝国时，它的防卫却要由花钱雇来的异族人承担。

这一点很发人深省。从历史上看，那些大帝国，像罗马、苏联，看上去是何等的喧嚣威武，但一下子崩溃灭亡，因为国家的强大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与尊严？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文化？并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还是为了一个 dictator（独裁者）或一个 totalitarian party（极权主义政党），有更强大的力量去压迫人民、限制人的自由、禁锢人的思想、封杀人的言论，使本国人民成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这才是帝国兴衰的关键。从历史上看，那种使人成为奴隶的帝国，没有一个不灭亡。孟德斯鸠对这点认识的很清楚，他引用力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向罗马贵族们讲的话：“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一个公民还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

斯宾诺莎<sup>43</sup>最好地阐述了共和国里人人平等的理论。请大家好好读斯宾诺莎在十七世纪中期发表的《神学政治论》。斯宾诺莎的激进和美利坚共和国立国理念的激进是一致的。“政治的目的是自由”斯宾诺莎是最伟大的激进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革命家。

在共和国里，公民的平等和独立是以拥有一些财产为前提的。公民的投票权也如此，早期美国公民投票权是有最低财产限制的，不过这种贵族制和等级制已经在美国和欧洲被取缔了。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ey are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提出生命权利、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没有提到财产权利，因为美国的发展是扩展公民的权利，而不是用财产限制公民的权利。美国社会是公民的联合体，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合伙关系。这就是人人权利平等。拥有财产的多少并不重要，因为共和国里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一定导致社会流动性。在美国，没有财产的人照样可以追求幸福，同时积累财产。美国如此大，现在拉美国家来的非法移民很快就能置地买房。2022 年穿越边境非法来美国的拉美移民就有两百七十六万，更不用说在十八世纪了。记得从 1820-1920 年，有三千万欧洲人自由移民美国。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的政治说明：“富人的成功是穷人给予的礼物。富

---

<sup>43</sup> 斯宾诺莎：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笛卡尔哲学原理》、《伦理学》、《神学政治论》、《知性改进论》。

人必须意识到他们依赖全体人民。”<sup>44</sup>这就是共和国里的富不过三代。

杰斐逊比洛克高明：没有财产的人同样追求幸福和财产权。但是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权。杰斐逊撰写美国独立宣言时的草稿：“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independent.”（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独立）财产是一个人独立的第一元素，我们无能怎样强调私有产权都不过分。后面我还会展开讲私有产权的问题，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没有保守、没有企业家创新精神、没有共和国……

## 共和国中的德性、德行与共同的善

共和国最强调全民的德性、德行和共同体的善。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共和主义的精髓，是共和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被世人遗忘的自希腊罗马以来的传统。

德性（Virtue）和德行（Virtual），柏拉图把四大基本美德划分为：谨慎与智慧；勇气、坚贞和刚毅；克制、斟酌和自我控制；正义和正直。亚里士多德认为谨慎、公正、节制和勇气，四种基本美德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伦理体系的核心。马基雅维利说共和国里最重要的是公民的自由、勇气、Virtual（Vir是拉丁文男人）、高尚情操……我们把这一切都称为德性和德行。

对德性、德行的关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回归。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核心是荣耀（glory），霍布斯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核心修改为权力（power）。权力远比荣耀实际。洛克进一步修改霍布斯的政治核心：人的自我保存首先需要的是食物或财产。洛克的财产论就是《资本主义宣言》（想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洛克的自由经济主义是成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经济（财富）更比荣耀和权力实际。孟德斯鸠后来歌颂以政治自由为原则的英格兰，而不是以德性（荣耀）为原则的罗马共和国。孟德斯鸠认为英格兰人找到了严厉的、共和式罗马共和的替代品：贸易和金融。于是卢梭<sup>45</sup>抗议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他从金融世界（bourgeoisie 的世界）回归到德性的和城邦的世界，回归到公民的世界。康德从笛卡尔和洛克回到柏拉图。黑格尔则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更高生命力（higher vitality）”。这三位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回归起源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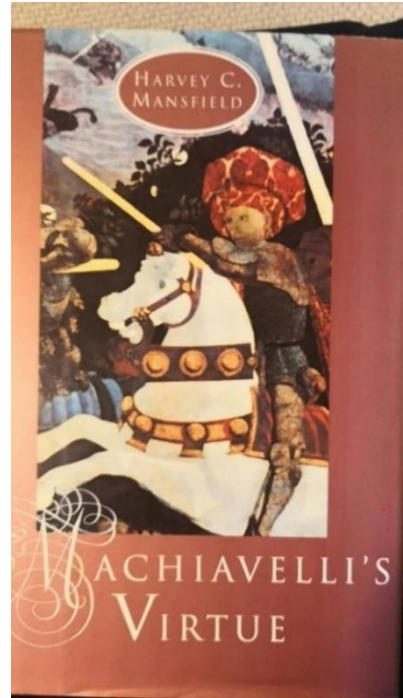
马基雅维利的 Virtue（Virtu）包括了尚武精神（Valor）。Vir 在意大利语里指男人。德性（virtue）和德行（virtual）其实是不可分的，我们把德性和德行的结合也可以叫做功德和成就事业的能力。所以马基雅维利的 Virtue 经常

<sup>44</sup> 引自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玛丽·比尔德为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曾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奖。

<sup>45</sup> 让·雅克·卢梭，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标志着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束。

被翻译为成就事业的能力、效能、功效、Manliness（男性气概）、功德……它自然包括一切优良德性或美德。马基雅维利的 Fortuna 指一切外部因素，可不能只理解为运气（Fortune）。他说得形象：Fortuna 像一个女人，自由共和国的公民必须用 Virtu 征服/驯服 Fortuna。人民的心声就是上帝的心声，因为共同的信念就是机运（fortune）。这是我给马基雅维利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下的定义。

Mansfield 这本书的封面画就体现了罗马共和国的尚武精神。美利坚自由共和国（作为第二罗马共和国）一直保留了尚武精神。大家一定要多读书啊。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博士或教授简直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因为大家都没有读西方政治学、法学、史学、哲学……经典，更不了解中国的经史子集。我无语。大家更要好好读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罗马史》。马基雅维利赞美罗马共和国的德性和德行，他要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价值，而不是仅仅复兴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必须跟他歌颂自由、法治、宗教和宪政共和的《论李维罗马史》一起读。否则，我们不是人。



罗马共和国公民仇视国王的本性就是他们的德性和德行的体现。只要细心观察罗马共和国的人民就知道，他们怀恨国王（Rex or King）这个名称已经五百多年之久。<sup>46</sup>罗马人多次刺杀国王、皇帝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伙们的恶德（evil）成就了罗马人的功德（virtue）。杀死国王、皇帝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伙才能除旧布新。功德依赖于武器暴力。孟德斯鸠说得好：罗马共和国的人民赶走国王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选举两个执政官（任期一年）的制度。这样共和国的领袖年年更换，他们总是在他们一年的任期里成就赫赫功业以便隔几年之后重新当选。他们时时刻刻都雄心勃勃；他们总是要元老院建议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要征服的敌人。罗马共和国领袖的功德和罗马人民的功德紧密相连。这是罗马共和国横跨亚非欧的原因。

共和国的开始一定是杀死君王，特别是独裁暴君。罗马人民于公元前 510 年驱逐残暴的最后一个国王 Tarquinius Superbus<sup>47</sup>，罗马共和国慢慢形成。从

<sup>46</sup> 参见李维《罗马史》，随处可见罗马人对国王的恐惧。比如第二篇第七章，带领罗马人战胜敌人的执政官 Publius Valerius 因为住在山顶而被怀疑觊觎王位，而不得不住到山脚下，这样他就可以住的比罗马人更低。

<sup>47</sup> 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罗马王政时代第七任君主，公元前 535 年登基，公元前 509 年被革命推翻。在他之后罗马的王政时代终结，罗马共和国时代开始。

此以后，在罗马共和国，公民提到国王一词就等于死罪。当凯撒的独裁统治正在形成的过程中，罗马共和国元老院的六十六名元老于公元前 44 年刺杀了凯撒。后来屋大维成了罗马皇帝，他也不敢用国王的头衔。罗马皇帝事实上只是军事首领。英国人在 1649 年砍掉国王查理一世的头颅当然是继承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的德性和德行。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谴责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暴行再次发扬了罗马共和国公民的德性和德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没有罗马共和国公民的德性和德行？这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大课题。

美国建国之初，亚当斯、杰斐逊、奥蒂斯<sup>48</sup>（James Otis）这些真正懂得古典希腊和罗马文献的人尤其关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道德和政治德性、德行（Virtu）<sup>49</sup>是如何彻底腐化的（decayed）。普鲁塔克、李维、西塞罗、萨鲁斯特、塔西佗（Tacitus）记录了罗马共和国的高峰期和衰朽期，他们的著作充分展示了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公民的简朴、单纯、正直、公义、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他们当然也体验了罗马共和国衰败时的贪污腐败、玩世不恭和社会的压抑乃至窒息。怎样让罗马共和国政体永葆青春活力呢？他们明白，在共和国里，德性和德行必须时刻保持和更新。马基雅维利认为 Virtue 至少必须每五年更新一次，否则共和国一定堕落腐败：“更新之道在于引回初始的状态，一切教派、共和国与王国在肇建之初必定有其善因，才能获得声誉与成长的动力。因为那种善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腐败了，除非发生什么事情使它恢复原先的状态，主体必然败亡<sup>50</sup>。”（毛泽东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四百五十多年才说每七、八年来一次文革，包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共和国长久之道是扩张。罗马共和国在不断扩张中保证德性和宗教的更新。美利坚共和国作为第二罗马共和国也时刻扩张，以更新其德性和宗教。我们看看美利坚共和国还能玩多少年吧。记住：斯巴达共和国玩了八百年，罗马共和国玩了五百年。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都是扩张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德性和德行的维持必须扩张。罗马共和国扩张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吗？中国人普遍知道希腊城邦共和国和罗马历史吗？中国人普遍知道中国二十四史吗？欧洲除了希腊城邦共和国历史，剩下的都是罗马历史：神圣罗马帝国在公元 800 年开始，1806 年被拿破仑取缔。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1453 年灭亡，俄罗斯沙皇接着当第三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到今天的普京；美国是第二罗马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扩张的历史大家一定知道。如果一个共和国不扩张，德性和德行就特别容易被腐蚀。扩张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领土

<sup>48</sup> 詹姆士·奥蒂斯：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政治活动家，他系统地描述了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不满。

<sup>49</sup> 想了解更多美利坚共和国的德性、德行请看附录 1.2.3。

<sup>50</sup>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2，第三篇第一章。下文引用的马基雅维利的语言，都是同样出自《论李维罗马史》。

扩张、军事扩张、意识形态扩张、宗教扩张、科技文化扩张……孟德斯鸠早在英国身上就看到了商业代替罗马共和国的战争：英国商业的扩张是罗马战争扩张的新形态。请看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第十五章：德性的美国化：腐败（腐化）、宪法和边境。托马斯·本顿<sup>51</sup>在圣路易斯的听众面前，用手指着正西方宣布：“还有东方呢，还有印度呢。”美国通过商业去启蒙日本和中国，是此后不断出现的预言。

美国私有媒体的海量竞争报道天天暴露美利坚共和国的一切丑恶。这是美国保持共和国德性和德行的巨大力量。“在美国，人人都可以批评总统、政府，批评政党更是不在话下——美国根本就没‘反党’一说；批评总统和政府，也不会被视为‘恶毒攻击’和‘颠覆政权’；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批评政府，甚至把总统当作漫画的题材，拿他们开涮，取笑，也无触犯‘煽动罪’之虞。”<sup>52</sup>党派和媒体的垄断导致政治自由的灭亡，而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我们中国人在国内比美国人还熟悉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枪击案、火灾、水灾、政治丑闻、明星丑闻……这要感谢美国私人媒体为了新闻市场利润死命竞争啊。美国宪法确立的立国原则就是让野心/利益对抗野心/利益。这是秦始皇无法理解的。

美国人天天妄议美国。但万万不要骂黑人和同性恋人。黑人是美国最高贵种族。当过奴隶的黑人家族很快就要得到大量美元的补偿。加州已经开始补偿黑人了。有人问“当年那么多中国人被拐到美国修铁路，怎么没见有补偿呢？”因为中国人几千年被秦始皇没收了武器，而黑人在美国天天玩武器。中国人必须天天玩武器准备打仗。美国黑人士兵打仗在全世界超一流，美国国防部长都是黑人！



**Sunak dampens hope of more help with energy bills**

Prime Minister Rishi Sunak has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be able to provide more help with energy bills, as it is unable to raise more money from the public.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energy industry, but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vide more help with energy bills. H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energy industry, but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vide more help with energy bills.



**Abramovich 'poisoned at talks'**

Russian billionaires blamed after oligarch and two Ukrainians suffered skin and eye problems during Kyiv negotiations. The article reports that a Russian oligarch and two Ukrainians suffered skin and eye problems during negotiations in Kyiv. The article reports that a Russian oligarch and two Ukrainians suffered skin and eye problems during negotiations in Kyiv.

影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在奥斯卡上台打人，受到美国媒体谴责。洛杉矶时报痛批，史密斯一掌让奥斯卡添上污点，不管对黑人运动或黑人在演艺圈的努力都是一大挫败。

史密斯上台掌掴串场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脱序行为，抢走整场典礼的锋头，成为全球焦点‘这个巴掌拍响了全世界’，‘好莱坞顶级明星在电视直播的舞台上对另一名

51 托马斯·哈特·本顿：美国 19 世纪的政治领袖。  
52 引自何路社：《反腐败新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4026.html>。

艺人公然施暴’。史密斯的行为同样让全场陷入一片尴尬，更讽刺的是，史密斯打人之后还上台领奖，在得奖感言大谈爱与关怀，尴尬程度爆表。评论指出，史密斯个人风光一时，却让他所感谢与试图代表的威廉丝姊妹一家人非常没面子。更深一层讲，评论形容，史密斯的行为等同是为保守派势力献上大礼，让那些反对‘黑命关天’（Black Lives Matter）的阵营见猎心喜。”

如果美国政府垄断美国媒体，美国就只有一个声音：共和国立即灭亡。媒体竞争报道总是培养德性和德行。美国宪法绝不让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洗脑。这样，美国政府也不能给美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编写教材。美国教育为什么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材由私人市场竞争决定。每个学校的教材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思考也不一样。统一了教材，哪就没有创新的脑子了。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制定教材。美国宪法课程精彩，中国宪法课程更精彩，因为中国宪法必须跟中国共产党党章一起看。多少华人在美国几十年都不知道美国宪法呢，例如杨振宁、丘成桐他们。丘成桐还整理他父亲的哲学史讲义出版。谁看？可怜。

美国人最大的财产是人力资本，新移民是美利坚共和国不断扩张以及更新德性和德行的有效方式：富有的移民增强美国的物资资本竞争，知识移民增强美国人力资本竞争，非法移民增强美国的低调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竞争。持续移民保证了共和国的扩张，让共和国生生不息。罗马共和国不断吸收外国人为公民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国家。现在欧美发达国家意识到“搞殖民不如搞移民。”其实中国也意识到了，中国现在发展科技也是靠吸收移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还需要引进一些优秀的海龟，他们有中国需要的科技知识（人力资本）。虚假的人力资本如杰弗里·萨克斯也是中国需要的啊，他的宣传是对我们国内粉红说的，美国人怎么会听他的。

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俄罗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共和国的德性和德行。共和经济学里的德性或美德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德性和德行离不开宗教。我又要提到马基雅维利，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阐述了罗马共和国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同样可以被共和国的公民接受的，尽管它们本质上是对立的。罗马共和国的基础是罗马宗教。十八世纪 Gibbon 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这不过是马基雅维利在十六世纪初期的分析而已。马基雅维利认为意大利长期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腐朽的天主教，马基雅维利赞美罗马共和国的德性和德行，他要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价值，而不是仅仅复兴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艺。紧接着马基雅维利，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宗教改革（Reformation or Protestant Reformation）是在 1517 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始，1648 年

（《维斯特法利亚和约》）结束。新教在欧洲成为主流、尼德兰共和国的兴起离不开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英国发展离不开清教，美国当然是新教伦理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最好例子。离开新教或清教，我们根本不能说明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生。这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Robert C. Merton<sup>53</sup>的父亲 Robert King Merton<sup>54</sup>1936 年哈佛博士论文的主题：清教和十七世纪英国科技发展。

中国也缺少共和经济学里的德性、德行、common good and commonwealth（共同的善和共同利益），尤其是如此多的所谓名流学者根本没有德性、德行、common good 的意识，我们还能指望谁？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钱颖一、李稻葵、樊纲……他们本身就是权贵资本啊。我的共和经济学强调德性、德行、common good、and commonwealth（共同的善、共同利益）。共和经济学是从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宗教和社会各方面来研究 commonwealth, common good, and individual good。不要说国内的名流学者看不到，这是芝加哥学派和奥派经济学派也没有注意的。

## 共和国中权力的制衡——斯巴达的政制发明

斯巴达的政治体制（regime）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研究题目<sup>55</sup>，斯巴达共和国为什么同时设立两个国王？为什么有贵族院？为什么有公民大会？因为人性对权力的贪婪必须得到制衡。我们当然可以叫斯巴达寡头政治，但它的两个国王彼此对抗，国王完全在法律之下。国内教科书总说斯巴达专制打败雅典民主，不对呢。斯巴达共和国打败雅典共和国，而微小的底比斯共和国一下子就毁灭了斯巴达共和国，专制的斯巴达如日中天时为什么被小小的底比斯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斯巴达打败雅典后很快就被金钱腐蚀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知道如何真正定义斯巴达内部由（公民）民主制、贵族制、两个国王的君主制组成的混合政体，大家好好欣赏马基雅维利和卢梭把斯巴达叫做共和国。引用潘维<sup>56</sup>的文章作一些补充：“无论右翼的**马基亚维利**，还是左翼的**卢梭**，都赞美斯巴达而非雅典。Lycurgus<sup>57</sup>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共权力体系，其基础是两个最有势力家族之间的妥协以及公民阶层间的妥协。两大家族各出一个可以传子的国王，实行双国王体制。斯巴达的宪法是由分权制衡的制度来保障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西方政治文明的

<sup>53</sup> 罗伯特·默顿：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up>54</sup> 罗伯特·金·默顿：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sup>55</sup> 更多的斯巴达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请见附录 1.2.4。

<sup>56</sup> 引自潘维，《古希腊与民主制度》，<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365.html>。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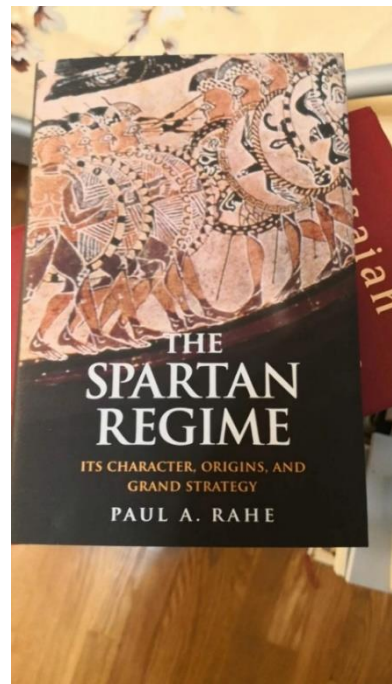
<sup>57</sup> 莱克尔加斯，建立了古代斯巴达大部分制度的立法者。



最伟大成就。卢梭说，按照宪法，斯巴达是有两个国王的，罗马共和国因而也设两个首席执行官。早期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指出，斯巴达设立五个‘埃福波斯’，监察国王和官吏，防止贵族滥权。罗马仿效斯巴达设立两个保民官，可以否决国王和元老院的决议。因为分权制衡，斯巴达的国王会因为违法被审判，从来就没有专制的权力。斯巴达的贵族也没有绝对权力。从斯巴达的长老议会，到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的议会，我们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自从创立宪政，这个国家从未被专制者统治。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宪政历史中，斯巴达的政体稳定，政治廉明。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因，而且使之得以干预其他城邦。近代的思想家卢梭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优秀的。他问到，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政体能亘古长存呢？”

贡斯丹<sup>58</sup> (Benjamin Constant) 的古代自由观帮助我们认识到斯巴达共和国公民拥有最大的自由，雅典公民反而没有斯巴达公民的自由度。希腊各城邦公民和罗马共和国公民二十四小时都在享受政治。这是古典自由最大的特点之一。欧美社会的现代自由却出现部分人对政治生活的冷漠，让多少美国公民逃避自由，这些人不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生活，他们躲起来过着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制度里的消极个人主义和 soft despotism (软专制)。在欧美如今的社会里，每一个公民参与政治才是自由。

托克维尔<sup>59</sup> 同样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危险的：“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其原因是“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托克维尔讨厌一切无限的权威，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我们以后再专门谈现代政治哲学里最伟大的托克维尔。



<sup>58</sup> 贡斯丹，法国小说家和政治作家，《阿道夫》的作者，是现代心理小说的先驱。

<sup>59</sup> 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罗马共和国和美国(美国国父们通晓希腊和罗马历史。杰斐逊和麦迪逊等人阅读了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所以有人说美国宪法欠古罗马一大笔债)就学习了斯巴达共和国的许多政治结构(共和国必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的混合结构)。罗马共和国的两个首席执行官就是学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制度。斯巴达共和国有两个国王,任期一年。这两个国王一般是对立的。国王打仗站在第一排,国王战死理所应该,而且国王经常受到审判。罗马共和国废除国王,提到国王者乃死罪,于是罗马共和国选出来两个首席执行官,让他们互相之间制衡。美国最初的总统和副总统也是互相制衡:得票数第一的是总统,得票数第二名的是副总统。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分别是(最后)两名竞选的胜者和败者,这是特意让总统和副总统互相对立、互相牵制。权力都必须关到笼子里。罗马共和国的两个(对立的)首席执行官,任期一年,到期不能连任。打仗时首席执行官站在第一排。这都是学斯巴达共和国的两个国王。美国邦联时期(希腊城邦为了对付波斯帝国入侵,也曾建立邦联),十三个州(十三个基本上独立的共和国)的州长(governor)都是任期一年。乔治亚州规定州长任期一年后即使连任,也必须平和地先 step down(辞职)。当年麦迪逊没有在美国宪法里用这一条用来规范美国总统,遗憾啊。

当罗马共和国的两个首席执行官(两个国王)意见不一致时,提案交由元老院决定。共和国里两个君主式的 consuls(执政官),贵族阶级的 senate(元老院)和平民的 tribunes(由平民选出的保民官)三者之间互相制衡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马基雅维利说:任何政体和国家都必然衰朽。罗马自由共和国政体衰朽得慢一点是因为它有(1)君主制元素里的两位(互相对抗的、任期一年的)首席执行官(2)贵族制元素里的元老院(3)民主制元素里的公民大会。这三种元素在罗马共和国政体里当然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但还远不如第二罗马共和国美国的三权分立。由此可见美国的国父们全面学习、继承和改进了罗马共和国的政体。

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了一下三权分立的历史:“1690年,洛克在其《政府论下篇》里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每个国家都拥有三种权力,即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权是互相制约的,其中‘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属于民选议会;执行权和对外权‘几乎总是联合在一起的’,可以同时由国王掌握。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分权论。在孟德斯鸠看来,在任何国家体制下,‘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他认定:‘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些犀利深刻的剖析构成了孟德斯鸠分权制衡理论的出发点。而后,孟德斯鸠指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政

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他不仅补上了司法权这一洛克忽略的第三极权力，而且着重论述了三种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理论。他断言：‘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不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sup>60</sup>

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不能命令美国议会议长佩洛西？为什么美国总统不能命令美国最高法院的任何大法官？这就是三权分立：用一种权力制衡另外一种权力：美国议会议长和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反制美国总统呢。中国人理解了没有？美国没有中国的一元化领导。中国人不质疑权力，因为中国人不制衡权力，因为中国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反抗权力。美国人时刻反击权力。麦迪逊<sup>61</sup>解释美国宪法时说 ambition against ambition, money against money, power against power, and faction against faction（野心对抗野心、财富对抗财富、权力对抗权力、党派对抗党派）。三权分立的宪政更是如此。他清楚地知道钱权不能带来产权、法治、自由。钱权只能奴役公民。我们要制衡钱权，让钱权互相竞争。“但是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sup>62</sup>美利坚共和国人民知道如何利用野心对抗野心（例如利用拜登对抗特朗普、或利用特朗普对付拜登）。资本家集团内部也是用野心对抗野心。美国这次选举再次证明了麦迪逊的预言：美利坚共和国的自由可以不断扩张。这也是杰斐逊把美利坚共和国叫做自由帝国（美国领土越来越大的意思）的原因。专制国家是让一种野心消灭其它所有野心。在自由共和国，任何人都只能短暂地赢得人心。丘吉尔如此；罗斯福如此；肯尼迪如此；里根如此；特朗普如此；拜登也如此。自由的人民不会让一个人长期执政。

<sup>60</sup> 《权制衡思想是孟德斯鸠的独创吗？西方分权制衡思想的由来与演变》，百家号，大众文史 0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6961818499552127>。

<sup>61</sup> 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开国元勋，参与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撰写和《美国宪法》的起草。

<sup>62</sup> 引自《联邦党人文集》第 51 篇。

后来安德鲁·杰克逊<sup>63</sup>总统创立了“政党分赃制”：在党派激烈和合法竞争中系统地应用庇护制来酬劳竞选获胜的政党成员的制度。把大批在竞选失败的政党的公职人员从政府的职务上解职，只安排获胜政党的忠实追随者担任这些公职。通过这一制度，获胜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势力网，并且把国家团结在一起。这种庇护制或君主制任命政府官员的办法其实是民主制：现在人人都可以担任任何一项公职。而且各党派轮流执政，这让政府摆脱了任何权贵势力的长期影响。可不要小看了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在共和国里的巨大的激进意义。轮流坐庄制（rotation in office）是平等的，个人被任命或被撤职不会对政府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公职成了现代意义的机构政治，工作由规章制度来限定。同时，轮流坐庄制尽可能地废除了公职人员的终身制。

美国人如何通过引入精英色彩的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大众的权利，简单参考一下：“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就做出了一个很好榜样。制宪会议代表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既保证大众的权利，又恰当地限制大众的影响。他们最后在1787年《美国宪法》中设计了几个主要的制度安排。

一是在美国总统选举规则中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其早期操作是，先由拥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出选举人团，然后由选举人团自行决定给哪位总统候选人投票。制宪会议代表们认为，选举人团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技能要超过整个社会选民的平均水平，所以让他们来决定谁适合担任总统是一种更为稳妥的做法。当然，在美国后来的民主进程中，各州选举人团越来越根据本州选民的多数意见来投票，这样民主因素就得到了加强。

二是设立参议院。宪法规定，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这也是一种政治精英选举政治精英的制度安排。参议院对应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要知道，一个人的任期越长，就越不容易受到一时情绪和情势的左右。

三是设立最高（联邦）法院。当然，最高（联邦）法院作为政治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其政治权力部分来自于宪法的授予，部分来自于其最初数代大法官的努力经营。后来，最高法院获得了制约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力量。主要依靠违宪审查权，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总统、国会或各州的立法与决定违宪，从而使其丧失法律效力。最高法院这种巨大的政治权力也并非来自于民主的因素。”

从古至今，每一个民族都有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理念。一万年以来，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wer（权力制衡）为什么在东方 despotism（专制）国家里硬是没有发明出来？为什么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都没有找到把这一理念贯彻落实的机制（制

---

<sup>63</sup> 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7任总统，美国民主党创建者。

度)？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明出来这一套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孔子知道权力制衡吗？儒学为什么没有给古代中国发明斯巴达共和国成文宪法和罗马共和国不成文宪法？三纲六纪是儒学宪法吗？如果是，三纲六纪怎么制衡权力？儒学如何设计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法？儒学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没有这一套制度，中国古代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理念怎么通过帝王独裁实现？国内有些学者做了一定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而斯巴达共和国、雅典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都实现了分权和公议。

儒家搞修齐治国平天下呢，如果孔子不知道制衡权力，他必须好好学斯巴达 Lycurgus 的权力制衡宪法。黄宗羲<sup>64</sup>的政治思想和设计是儒家的高峰，但是鼓吹人民最伟大的黄宗羲设计出来了什么政治制度？什么都没有。即使黄宗羲设计出来了什么政治制度，今天我们一样在谈“儒家”的人民最伟大。十三经不过 65 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有如此多的精力，搞儒学的中国人能不能先搞懂美国成文宪法？也就是说，搞儒学的中国人能不能按照儒学设计限制权力的制度？请问搞儒学的中国人，孔子、黄宗羲会怎么看如下这篇文章：《中国为何不实行“三权分立”》<sup>65</sup>如果在美国宪法前加一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美国共和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美国还有宪法吗？美国还是 We the People 吗？党章 above 宪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自由、法治、民主、宪政、产权、公民、多党竞选……都还没有呢。五千年只知道吹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却不知道如何 check and balance power。五千年一笑而已。

罗马共和国为什么能学会斯巴达共和国的权力制衡的制度：两个首席执行官，贵族参议院和平民大会彼此对抗。美国的国父们为什么能把斯巴达共和政体和罗马共和政体的制度继承发展？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没有办法制衡权力，需要天天反腐？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后来一直朝集权和分权两个极端发展，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直到今天，华夏文明不能产生任何新思想，因为秦汉大一统只能在酱缸文化里苟且偷生。发明并执行共和政体制衡权力的制度其实跟解决费马大定理一样。假定我们是建立美国最重要的七位国父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假定我们七个人需要设计中国的权力制衡的制度，我们的设计将是怎样？（这其实类似于证明一个数学定理，也类似于设计实现

<sup>64</sup> 黄宗羲，明末清初经学家，普遍认为他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他进行初步了解可见《分权、权威与公议：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渊源与新变》，载于《民主与现代社会》，李强主编。

<sup>65</sup> 《中国为何不实行“三权分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14/c371516-23543690.html>。

一般均衡的最优资源配置的机制)。提醒一下：共和政体的权力制衡可能消失，就像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一样。同样，私有制和完全竞争市场可以变成私有制和不完全竞争市场。

## 共和国中的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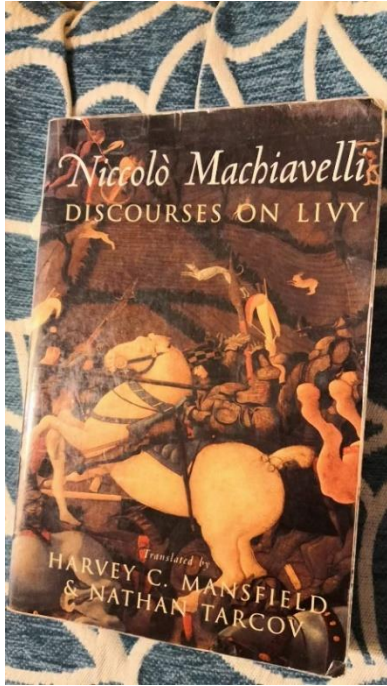
共和经济学强调阶级斗争能健康共和国的政治、法治、道德和经济。马基雅维利在十六世纪初就看到了罗马共和国内部阶级斗争有利于共和国德性、德行的壮大、发展、扩张：“罗马的动乱无弊却有利，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成分，也就是平民和贵族，对自由有利的一切法律都是源自他们之间的冲击；任何一个细心检讨其结局的人都会发现，随着那些动乱而来的放逐或暴力事件，没有一桩不利于公益。”他特别赞扬罗马共和国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平民阶级让贵族阶级保持德性和德行，而贵族阶级激励平民阶级追求卓越而致富。平民阶级为追求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奋斗，而且平民阶级也可以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和元老院的元老。贵族阶级被平民阶级的奋斗逼得他们自己保持节俭、勇立新功。尽管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但这种斗争让罗马共和国朝气蓬勃、不断更新、持续扩张。

连续不断的军事扩张让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都富有起来。(请比较罗马共和国的共同富裕和秦始皇帝国的民穷国富。)第二罗马共和国美国立国一百八十年(1776-1956)内基本上重演了罗马共和国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只是从1960至今，美国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到社会主义和追求全面的平等。这种阶级斗争产生了美国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请看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马基雅维利的阶级斗争理论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为佩服，他们两个都称马基雅维利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请注意，马基雅维利说阶级斗争是对各个阶级都有好处啊，他根本没有看到马克思的阶级剥削。马克思用罗马共和国的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来表述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无产阶级，而且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要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幸亏马基雅维利在马克思之前三百二十多年就过世了，否则，马基雅维利会万分震惊。同时，马基雅维利一定认为马克思错误地使用了罗马共和国的 *proletariat* 一词。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远比马克思的思想全面。<sup>66</sup>

---

<sup>66</sup> 在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中，共和国为每个阶级、每种利益集团都留下了宣泄他们野心的出口，他们之间的斗争促进了法律的完善、教育的进步。见《论李维罗马史》第一篇第四章。



这是马基雅维利歌颂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著作：Discourses on Livy 的《罗马史》。大家不要以为马基雅维利是专制独裁的韩非子啊。培根、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都极其推崇马基雅维利的治国方略，更不用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人。洛克最喜欢收集马基雅维利的书。洛克的治国理政就是马基雅维利的一套。

罗马的伟大来源于冲突而非共识，罗马的力量来源于分裂而非统一。马基雅维利赞扬罗马共和国的内部阶级斗争（阶级冲突）和美国宪法起草人麦迪逊“用野心对抗野心”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罗马和美国建成超级大共和国的理论基础。一切有野心的人都来到美利坚共和国吧！

这样三亿（或十五亿）人的野心互相对抗，从而达到野心的对抗均衡。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力的均势就是几亿野心对抗的结果。我讲的每一段话都可以扩展成一篇文章。这是我的读者的作业。

最近几年来，美国人天天喊美国社会已经被撕裂，美国马上要发生内战。美国从 1960 年代开始内部分裂几乎是家常便饭。美国天天撕裂，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生内战？尤其是新冠肺炎怎么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引起内战？这些天的中期选举为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又是势均力敌？美国为什么从来不要全体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什么美国鼓吹天天鼓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战争冲突不断，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内战，在美国国内，没有一起试图依靠武力来推翻政府的军事行动发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试图来挑战宪政程序和宪法的权威。美国武装力量对于政府的这种绝对服从和忠诚显然与美国宪法军事条款的科学设计有密切关系，而这套精妙的制度设计是在制宪会议等辩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味盲目自大，喜欢盯着西方的不足来宣传，部分媒体这样会误国害民呀！美国流浪汉们不愿意去美国州政府和市政府提供的住所，因为他们喜欢街上的香烟、美酒、毒品、性交……中国人担心美国流浪汉干什么？他们每个人每个月至少有一千美元政府提供的最低补贴。美国黑人已经当了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州长、市长……美国富人一样富不过三代，from 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or from boots to boots。（从衬衫袖子到衬衫袖子，从靴子到靴子）

其实对美利坚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抱怨由来已久。1787年查尔斯·尼斯比特<sup>67</sup>抱怨说：美国革命产生了一个不幸由不和谐原子构成的新世界。这些原子偶尔拥挤成一团，又在一个巨大真空里被抛来抛去。1825年丹尼尔·韦伯斯特<sup>68</sup>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几个世纪里才能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的一生都能经历到。美国立国才二百四十六年，我们先等五百年再看美国会不会崩溃。我们觉得美国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局限于很短的空间和时间。宇宙局部也乱或混沌化，但宇宙整体保持着优雅的秩序。历史局部很乱，大历史却非常优雅：自由、法治、产权和宪政是大历史的根基。（但这绝对不是历史的规律）当罗马帝国横行霸道之际，基督教让帝国变得安宁。中世纪不是黑暗，中世纪是历史发展多样化的时期啊，是人类在小范围内的秩序达到井然有序，而人类的心灵获得基督教化的宁静。在宁静中，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培根、洛克、斯宾诺莎很快搅乱欧洲基督天主教秩序。人的冲动也是人的理性，理性的极致就是冲动，革命是理性和冲动的结晶体。当君主制一统欧洲时，共和国在日内瓦、尼德兰、英国、美国 and 法国相继诞生。当自由民主不可一世时，专制政体和神权政治马上到来。

美国天天批判美国，美国天天反对美国，美国天天揭露美国，美国天天分裂美国……而这一切都是美国发展的原因。这就是美国宪法起草人麦迪逊说的：野心对抗野心。美国的制度就是如此设计的——政治是精致的艺术品。林肯在麦迪逊之后再次阐述美国反对美国的重要性。林肯说：“异见，是一个公民对于国家最崇高的热爱，因为反对是国家纠错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因为内部充满了乔姆斯基、萨克斯、桑德斯<sup>69</sup>……各种各样的反对者而活力四射。这不是美国社会的撕裂，这是美利坚共和国内部自我革命、自我纠错不可缺少的冲天正能量。

新华社的文章：“在‘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中，美国走过2017年，但在重大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在国会争吵，在街头冲突，在媒体激辩，在网上攻讦……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越来越多美国人深陷社会撕裂的漩涡。面对‘美国反对美国’的现实，民众忧心忡忡。他们指出，美国当前的尖锐对立是少见的。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在加剧‘人以群分’的状况，不乏政客通过放大民众分歧捞取好处。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骆思典告诉新华社记者，人们希望能消弭美国社会的深刻分歧，‘但没人真正知道如何以及能否做到’。眺望2018，人们似乎还看不到指向比较清晰的美国共识。政治社会现实告诉人

<sup>67</sup> 查尔斯·尼斯比特：迪金森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

<sup>68</sup> 丹尼尔·韦伯斯特：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

<sup>69</sup> 他们分别是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且都在各自领域有很大的成就。他们同时也十分强烈地批评美国。其中作者的老师杰弗里·萨克斯对美国的批评，以及美国对他的批评可以见附录1.2.5。



们，‘消弭深刻分歧’的答案还在风中‘飘荡’。”<sup>70</sup>这种文章怎么连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都没有。如果美国不反对美国，美国怎么发展进步？科学领域都是自己反对自己才不断发展的，一个民族和国家也是一样。美国当然是靠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反对/竞争才发展。英国也是靠多党互相反对/竞争才发展。好像这种人没有学习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黑人造反就当上美国副总统和纽约市、华盛顿特区、费城、亚特兰大...的市长。当然，现在美国自己越来越不反对自己了，因为美国两党找到了共同的对手：中国。中美冷战让美国内部终于团结了一点。

美国媒体都是私人媒体（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府不能拥有对内媒体），任何美国人都可以死命骂美国。“包括言论在内的‘自由权’，乃是美国公民的法定权力，言论与不言论，都受法律保护——连犯罪嫌疑人都有‘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样的不言论的自由，遑论公民批评的言论自由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公民出身的政客，也具有‘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自由权’不可剥夺的观念，使得他们能够倾听并尊重选民的意见乃至批评——他们有权反对批评意见，但他们必须捍卫批评的权力。他们比常人更清楚，在现代的公民社会，尤其是媒体开放的美国，既然有志于公共事务，就必须正确面对社会的评头品足质疑批评乃至反对，如果没这点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那就甭干。”<sup>71</sup>这是美国宪法特别设计出来让共和国不断扩张的基本原则；用公民的私人野心对抗政府野心。乔姆斯基写了 140 多本书骂美国，他的粉丝遍布 MIT 和全世界，萨克斯还远不够水平。我以前是他的粉丝，这些年他江郎才尽，没有新意了，而克鲁格曼<sup>72</sup>从来没有新观点。政府垄断媒体等于共和国灭亡。他们这些美国人天天骂美国，我们中国人敢不敢骂中国？一个国家的伟大就在于它鼓励它的公民最残酷地批判它的一切。

美利坚共和国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极大地提高了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只占美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黑人产生了美国总统、副总统、州长、市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员和众议员。美国有两个 Presidents 很重要：一个是哈佛大学的 president（校长），另外一个美国的 president（总统）。现在，一个黑人女教授(Claudine Gay)明年七月将当哈佛校长。美国副总统已经是黑人和印度人的女儿。激烈的阶级斗争让美国人保持了共和国的德性和德行。看看美国私人媒体（美国政府拥有国内媒体是违反宪法的）主

<sup>70</sup> 《2017，美国“反对”美国》，新华社，<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7/1225/c1002-29725926.html>。

<sup>71</sup> 引自何路社：《反腐败新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4026.html>。

<sup>72</sup> 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持人有多少黑人：一个白人必须有一个黑人，而黑人只占美国人口的 15%，白人占人口的 48%。华人没有一个。

在美利坚共和国，企业家或创新企业家是相互竞争的群体，阶级斗争让垄断企业家们都时刻面临巨大挑战，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国王和灵魂。张维迎喜欢跪舔国内官商勾结的老板，他用中国传统奴才文化抬高红顶商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根本不存在企业家），让人作呕。权贵资本家和红顶商人不是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中国红顶商人都忘记不了教训苦力们“996 不够，997！”只有在苦力们面前，这些官商勾结的老板们才变成张维迎跪舔的企业家。为什么印度人在美国的老板（政府官员）那样多？为什么华人在美国极少有几个大老板（政府官员）？这种大问题必须从共和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共和国经济学证明了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和谐、阶级斗争推进经济增长、阶级斗争提升德性和德行（美德和美行）。共和国里经济竞争的效率原则同样适用于共和国里众多党派、利益和野心之间的竞争。一个西弗吉利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曼卿就比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厉害得多！政治本来是自由人最高级的享受。尽管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派在互相死斗，他们一致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以色列的几十个党派互相斗争厉害，以色列人一致对付伊斯兰人更厉害。美国内部斗争和冲突是美国生命力旺盛的体现，这就像罗马共和国一样。古代罗马共和国就是如此；古代希腊城邦文明更是如此。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研究者互相斗争的结果；经济竞争的效率原则同样适用于共和国里众多私人媒体的激烈竞争。美国人选总统、选州长、选议员的激情享受不用说，这几天美国人看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内选议长太兴奋了<sup>73</sup>。这不是美国共和党的分裂，这是美国共和党内用野心对付野心。如果麦卡锡进一步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让步，他的议长头衔就快到手了。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员选不出新的 House Speaker（众议院议长），这是共和制的伟大：共和主义就是要让每个利益集团都表达自己。这就是把权力关在共和国公民做好了了的笼子里。没有美国普通民众投票，谁都进不了白宫和议会。

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山抗议<sup>74</sup>是合乎美国宪法的。这是美利坚共和国里野心对抗野心的正常现象。正如美国国会山一位警察所言：“国会山本来就是你们人民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谈到爆发的反封控示威活动。他表示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资产，希望尊重人民权利。美国白宫也在最新声明中强调人民有权和平抗议。

别忘了洛克说我们都有革命的权力。“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命题是洛克革命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革命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民具有反抗甚至推翻违背

<sup>73</sup> 指的是 2023 年美国第 118 届国会众议长的选举，最终麦卡锡当选。

<sup>74</sup> 国会山抗议：2021 年美国国会大厦被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的骚乱事件。

公民意志及损害公共利益的“恶”政府的权利即“革命权”。而在自由与秩序的二元张力下,洛克革命理论体系的宗旨只是捍卫革命的道义权利,洛克通过对革命诸要素的层层规限,来设定革命行为的限度,进而限制和祛除“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攻击特性,由此形成了洛克的独特革命观:革命“正义”。政府创立和革命成为人民共同体运用集体权力的两种方式,只不过根据前者的常规方式,人民成为安全享有财产的臣民,委托政府来行使政治权力;而根据后者的非常方式,人民成为直接运用集体暴力的革命者,成为政治舞台上真正的行动者。

王陶陶<sup>75</sup>说的话部分是对的:“2022 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激进民粹势力在选举中的惨败,恰恰是英美帝国利益的最大战略收益。至此,特朗普主义将逐渐建制化,慢慢由那些文质彬彬、懂得分寸的精英建制派引领,从而失去破坏性,帝国内部崩溃风险从此荡然无存。这一点,对于英美来说才是真正的巨大战略成功,也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大帝国的内部整合成功成为可能,而残虐凶桀之新罗马世界锋锐也将呼之欲出,对于中俄来说,那些暴戾的呓语必须被牢记:无论如何,迦太基,必须灭亡。”

---

<sup>75</sup> 一位网络写手。

### 第三节

##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共和主义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共和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与共和主义一样，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也都来自耶路撒冷（Bible）、希腊城邦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思想。《荷马史诗》是“希腊的圣经”。它就充分展现了自由主义的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进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此而来的，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剥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为什么欧洲人花了一千八百年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基督教带来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大家看看中文版沃格林<sup>76</sup>、施特劳斯、柯克<sup>77</sup>……的大量著作吧。保守主义和 libertarianism（自由意志主义）在美国 1950 年代恢复生命力也离不开 Nock<sup>78</sup>，Knight<sup>79</sup>，Buckley<sup>80</sup>，我们不能只读哈耶克跟米塞斯。

理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互相制衡是我们了解西方文明的关键，这二者

---

<sup>76</sup> 埃里克·沃格林，德裔美国政治学家和跨学科学者，以其对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和对建立人、社会和历史的综合哲学的努力而闻名。代表作《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sup>77</sup> 罗素·柯克，美国政治理论家、保守知识分子、思想史学家，以其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而闻名。他的书追溯了英美传统中保守思想的发展。

<sup>78</sup> 阿尔伯特·诺克，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自由主义作家、教育理论家、二十世纪早期和中叶的社会评论家。诺克与巴克代表作的介绍可见附录 1.3.1。

<sup>79</sup> 弗兰克·奈特，美国经济学家，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

<sup>80</sup> 威廉·巴克，多才多艺的美国编辑、作家和保守主义者，在保守政治中具有重要的知识分子影响力。诺克与巴克代表作的介绍可见附录 1.3.1

的互相制衡也是今天欧美国家的最大特点。我个人认为：自由资本和保守资本的互相制衡是西方文明稳定演化的基础。东方全能治理体系国家完全没有西方政治哲学里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当然也没有共和主义。好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传播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是一种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它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通常被视为由于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负责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采纳。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当时绝大多数较早期的政治学说，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强调个人的自由、理性、正义和宽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总量的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的商品服务的数量。政府的干预经常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让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的个体理性的计算来引导经济生活的调整，即“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我们需要先知道什么是自由，韦氏词典<sup>81</sup>对自由的解释是：

a. the power to do as one pleases (表示自由行动的能力和权力)。  
 b. freedom from physical restraint (意味着身体不受约束的自由)。  
 c. freedom from arbitrary or despotic control (无须受到武断或暴君控制的自由)。

d. the positive enjoyment of various social, political, or economic rights and privileges (意味着享有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和特权的积极乐趣)。

e. the power of choice (表示具有选择权的能力)。

Bible 有二十八处用 liberty. 希腊罗马才给 liberty 定义。阿克顿勋爵、哈耶克、弗里德曼……都是用自由，而不是用民主，来称呼英美宪政。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西方 liberty or freedom 的意识，严复把 liberty 翻译成群己权界（社会和自己的权利边界）翻译对了！他把 Mill 的 On liberty 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是非常了不起的：它说明了自由就是社会和一个个体的权利边界。群己权界承认私有产权、法治和个人的种种权利……自由就是法治、私有产权和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哈耶克：一个人不受其他某人或一些人武断意志的强制，

<sup>81</sup> 《liberty》，韦氏词典，<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liberty>。

常常被看作个人的或人身的自由。罗斯福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是乱用自由一词。

中国古代从来没有 freedom and liberty 这样的词汇，是日本人把 liberty 翻译成自由（由于自己），笑死全世界。华夏古人是把自由定义为由于自己。这是何等荒唐！所以毛泽东写了《批判自由主义》谁写了《批判群己权界主义》？希特勒、斯大林。

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白居易《短歌行》

一任喧阗绕四邻，闲忙皆是自由身。——司空图《南至四首》

兼济直饶同巨楫，自由何似学孤云。——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

寸步东西岂自由，偷生乞死非情愿。——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

如斯标致虽清拙，大丈夫儿合自由。——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

鲁迅和陈寅恪他们都把 liberty 理解为由于自己、在于自己(自由自在)。再说一遍，自由(liberty)是群己权界，不是自由自在，更不是无法无天、放纵不羁。严复花了多大心血才把 liberty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群己权界”，我们最后还是天天马马虎虎地说自由（由于自己）。

再看看以赛亚·伯林<sup>82</sup>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定义，这是当代自由主义中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对应英文可以被认为是“freedom to” and “freedom from”。伯林最初定义消极自由为“不受他人强加的主体约束的自由”。他将积极自由定义为“追求和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不仅仅是机会）；也是自治，而不是依赖他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就是美国宪法里（特别是人权法案里）的人的权利。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包括消极自由的许多部分以及反抗政府和革命（推翻暴政）的权利。很多人不是太懂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里有一点简单解释。我们最好看 Berlin 的著名论文。

为什么德国哲学根本不知道定义自由？为什么伯林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是自由的敌人？人类为什么滥用积极自由，特别是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里？康德和黑格尔被理性烧烤过头了。先说康德的疯狂。康德首先说人都有自由意

<sup>82</sup> 以赛亚·伯林，英国哲学家、思想史家、政治理论家。他以出众的谈资、对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捍卫、对政治极端主义和知识分子狂热的反对，以及平易近人、光彩夺目的关于人和思想的著作而闻名。代表作，《自由的两个概念》。

志，接下来他说人按照道德律立法。但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秦汉帝国……为什么总是按照权力立法？康德用 universalization 来建立道德律：人不能借钱不还。如果康德是正确的，中国和美国还需要破产法吗？康德论人不能说假话更是好玩。假定约翰持枪正在追杀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的儿子快速跑回家躲起来了。当约翰持枪出现在罗伯特面前问他儿子在哪里时，罗伯特必须说真话吗？康德怎么能断定人不是无法无天（lawlessness）？康德讨论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就是否定了人性，他比罗伯斯庇尔疯狂多了。

黑格尔学说的概念来自阿那克萨戈拉。阿那克萨戈拉第一个把 nous（理智）理解为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他认为宇宙原是无数无穷小的种子的混合体，由于奴斯（nous，理智）的作用，使原始的混合体发生旋涡运动，这个运动首先从一小点开始，然后逐步扩大，产生星辰、太阳、月亮、气体等等。这种旋涡运动的结果构成了有秩序的宇宙。在希腊文中，“奴斯”本义为心灵，转义为理性。阿那克萨戈拉以此来表述万物的最后动因。他认为，奴斯和任何个别事物不同，它不和别的事物相混，是独立自在的；奴斯是事物中最稀最纯的，它能认知一切事物；奴斯是运动的源泉，宇宙各种天体都是由奴斯推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东西都是由奴斯安排的。黑格尔把“精神”——即阿那克萨戈拉所理解的 nous（理智）说成是“能动的”思维活动，这个“精神”的思维活动本身就是支配世界的普遍法。“精神”活动就是思维，其行动就是思辨性的“理性认识”引发的行动。“精神”或“理性”或“思维”就成了人类的属性。这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是“自由”（Freiheit）。“自由”也就成了人的自然禀赋。黑格尔把“自由”称为“单个的精神”，“世界历史哲学”要论述的是这个“自由精神”本身如何在世界的历史中实现自身。因此，所谓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性”就是指“自由精神”的普遍性。反过来说，“哲学（热爱智慧）的世界历史”是这个“抽象的普遍东西”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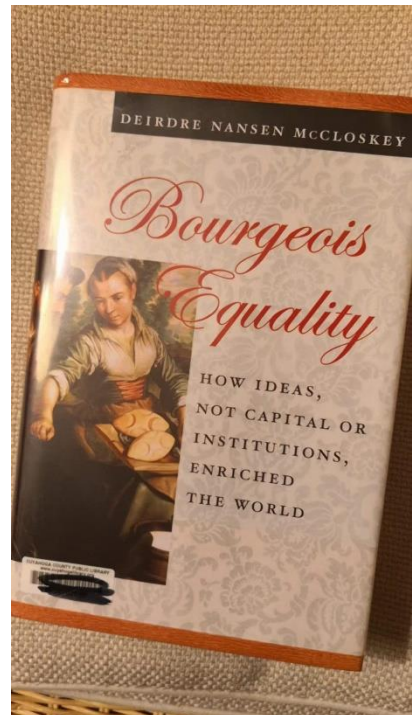
黑格尔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由低向高的发展进程——有如个人的成长有童年、中年和老年。于是，黑格尔提出了闻名遐迩的世界历史三阶段或三种形态的划分：东方世界（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希腊-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世界历史的“童年”，日耳曼国家才到达了世界历史实现其“自在自为的普遍性”的“老年”，罗马帝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美国当然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的精神”。黑格尔怎么能断定德国一定是自由而不是专制？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规律性让马克思走得更离谱。不懂黑格尔，我们怎么读懂马克思《资本论》？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是费希特的自由概念的发展，按照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发展规律（最可笑的规律），德国的自由意志变成了发动世界大

战的自由意志。德国把黑格尔粉碎之时，它把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也一起粉碎了。

德国哲学都是这种疯狂本质，我们不要把德国哲学的自由看成英、美、法的自由了。请看伯林批判自由的背叛者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两篇论文。<sup>83</sup>世界文明自由史忽略非洲和亚洲是正确的。自由文明史是从欧洲到美洲。黑格尔当年想到了俄罗斯可能会有文明。1991 之后，黑格尔这个猜想证明是错误的。黑格尔对美国的期待正确了：美国是人类自由文明的继续。

另一些对自由主义理论做出贡献的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sup>84</sup>，奥地利学派的所有经济学模型完全过时了（我 1980 年代在哈佛跟 Robert Dorfman 学奥地利的资本和增长模型），它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太差劲，但它的自由思想极为可贵。我是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人，我讲奥派太轻松了。Robert Dorfman 给我的经济思想史考试成绩是 A+！不过经济思想史现在已经被美国最好的大学消灭了。奥地利学派最本质的是追求无政府资本主义，芝加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哈耶克也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而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达到了这种境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货币理论和产业周期理论是经济学的玄学，幸亏哈耶克放弃了。弗里德曼就嘲笑这些东西。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看清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充分必要条件。他们两个都有罪恶。我经常举这个例子，1776 年，亚当·斯密在英国出版《国富论》，美国的国父们发布《独立宣言》，瓦特在伯明翰制造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这三件事在同一年发生说明：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科技发明自由紧密相连。弗里德曼应该说：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其实是一回事。哈耶克以为独裁制有时比民主制好，因为独裁者可以让人民有经济自由。哈耶克是错误的：独裁者迟早会通过控制政治达到完全控制经济。强大的政府本身就是越来越少的经济自由。自由带来了人类的一切幸福生活，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其实，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也不是一流学者。我本人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一定导致多重均衡、周期和混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一定产生今天很多欧美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性别的现象，这是洛克古典自由

<sup>83</sup> 关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积极自由的滥用的批判见附录 1.3.2。

<sup>84</sup> 下文的“奥派”指奥地利经济学派，“国奥”指在中国研究、宣传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



主义的必然结果，哈耶克不过是继承了洛克的衣钵。如果看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哈灵顿、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柏克……我们再看米塞斯和哈耶克就不会看到真正的新意了。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哲学根本不提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书如果没有认真读过十遍，那一定愚蠢无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书在这些书面前是儿童读物。

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没有丝毫地位。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教材没有被美国大学采用？为什么美国大学没有几个教授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两个期刊上发表论文？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才特别时髦？为什么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在美国大学里没有正式教职？为什么 John Nef 把哈耶克安排在他联合创立的芝加哥大学的交叉学科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社会思想委员会）当教授？因为一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把奥地利学派远远抛在后面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远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深刻。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国内很有名气，我很理解。我对国内普及奥派经济学是百分之一万地支持，因为在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要扩张自由主义，我更鼓励国内奥派经济学爱好者跟上当代经济学高级理论后去死命发展奥派数理经济学模型。但是目前国内普及奥派经济学的人连康德哲学和斯特劳斯哲学的门都没有入，在国内搞奥派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更是没有扎实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动态宏观理论基础，还在重复一百年来的老调子，根本提不出新颖的理论模型。我很遗憾，他们只能失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经国内人改写就成了垃圾。朱海就和张维迎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建立奥派经济学理论模型，只能用奥派的自由意志思想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搞很多影射。张维迎更是根本没有理解奥地利经济学，他奥派经济学教材里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驳倒。企业家创新带来的毁灭性的失业痛苦可以驳斥一切创新发展。经济学鼓吹市场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家创新，它完全忽视了竞争和创新过程里失败者的痛苦。大家看到过竞争和创新过程里的痛苦模型吗？竞争和创新符合伦理道德吗？我的共和经济学就非常重视模型化竞争和创新过程里失败者的痛苦。Aghion-Howitt（1992）模型里根本没有这一点，他们的机械主义模型没有摸到创新的门。睿智如芝加哥学派创世人之外的 Frank Knight 都没有充分认识竞争和创新过程带来的痛苦和不幸。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是痛苦还是欢乐？企业家创新是否带来了人类的幸福？这些都是质问熊彼特的好问题。杨小凯肺癌过世之前天天骂牛顿和爱因斯坦之流搞出来科学技术进步，最后是污染大气和环境。如果他活着，看到中国今天当世界工厂和苦力有什么感慨。你们可以问问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个巨大的问题，他们不会明白的。樊纲应该了解一下奈特：“科学的基本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客观的前提是

正直，能力，谦逊……为了自由思想的自由交流，绝对不允许任何强迫行为。”自然科学反文明的例子太多了：原子弹、优生学、人的基因改造、污染环境、大气变暖。

大家直接读奥地利学派和它在欧美的发展。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这本大著作最容易入门，米塞斯本人的《人的行动》(Human Action)难懂一些。奥地利经济学最适合不懂数学模型的普通民众。如果要深入了解奥地利经济学的资本、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大家可以看看 Robert Dorfman 1950 年代的专业论文。我虽然批判他们，但他们的书当然也值得欣赏。我欣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封建主义（中国自秦始皇以后就没有封建）……我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是中国第一。这些书只是让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的不同声音，我们欣赏这些书，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些书里的东西就是真理或规律。我们只是不让自己受欺骗。Berlin and Hayek 让我们清醒。Berlin 本人批判历史有规律，批判历史有必然性，他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解也特别精彩。

我当然理解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书在中国全能治理体系里极为畅快。但细心的读书人必须同时读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著作，必须看柏克以来的保守主义学说、希腊罗马以来的共和主义学说和十七世纪以来的欧美自由主义学说。这些方面也万万不要看中国人改写的书和文章。如果大家看马基雅维利、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穆勒、巴师夏……更能过瘾，因为奥派绝大部分思想是来自洛克的自由主义、柏克的保守主义、穆勒的个人主义。

不过如果大家去哈佛、MIT、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读经济学，你们最好不要说喜欢奥派，因为顶尖的几十个大学都被白左控制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基本上被哈佛、MIT、斯坦福毕业的白左控制了。他们都受到罗尔斯<sup>85</sup>的影响。

罗尔斯才是美国自由主义哲学水平的最高峰之一，哈耶克的哲学水平只是美国的一般水平，大家没有把哈耶克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逻辑搞懂，右派哈耶克的哲学水平怎么能跟左派罗尔斯的哲学水平比啊？所以，米塞斯和哈耶克只能被浅薄的经济学业余爱好者们欣赏。在美国，罗尔斯的影响远比马克思大，罗尔斯进步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黑人和穷人五十年来的福利，而洛克自由主义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让美国富人追求了四十年的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现在美国富人也意识到了全球化不利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在美国的生活，他们向美国劳工阶级让步了。政治哲学的力量远超经济学。罗尔斯进步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也是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他的《正义论》的主题，大家一定要认真读一下。罗尔斯认为：共

---

<sup>85</sup> 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和伦理哲学家，以在其主要著作《正义论》(1971)中捍卫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而闻名。他被广泛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同富裕必须让每一个人的智力、财产、地位、容貌（美丽的程度）……完全一致。罗尔斯要美国人分享爱因斯坦的智力和梦露的漂亮呢。中国的稳定离不开共同富裕，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的富人从来没有想到罗尔斯进步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有如此威力，现在他们看到了。

《正义论》是共产主义理论最重大的发展，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这种影响世界的共产主义著作？为什么苏联共产主义者也写不出来？因为这些国家的等级制是反对罗尔斯的平等和自由原则的。

##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综合

我们正走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前沿。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从洛克到密尔再到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让我们开始学习西方政治哲学里的保守主义<sup>86</sup>。我自己是从马克思到洛克、孟德斯鸠、穆勒（密尔）、哈耶克，再从自由主义到柏克他们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但保守主义首先尊崇、强调西方传统<sup>87</sup>（不是中国传统！吴宓和陈寅恪不懂现代文明）、宗教、德性/德行、法治和私有产权……它让人不至于成为自由主义的经济野兽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

最近六年是学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共和主义最好的时期。白左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现在都不高兴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为什么美国自由主义越来越邪门？为什么新的英美保守主义为什么越来越成气候？因为自由主义被白左绑架太久了。<sup>88</sup>经济学也被绑架太久了，亚当斯密有保守主义的《道德情操论》，但自由主义者只谈《国富论》。（现在看来，把 Wealth of Nations 翻译成《国富论》是大错特错，因为 Wealth of Nations 强调民族和人民富有，而中文看不出来，很容易被误解为国家富强。中文无法区分 nation, state, and country，它的确是一种落后语言。）看看白左把自由主义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鬼样子吧。性别自由的、自发的选择一定导致不自由。美国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决定自己的性别了，所有人自由地、自发地改变他们的性别和种族会导致人类生活的灭亡，政府和联邦法院只好出来干预。性别和种族必须取决于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伊斯兰教徒在全球的自由移民选择让比利时和英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基督教已经失去宗教自由：这些基督徒必须服从多数的伊斯兰教徒的选择，欧洲伊斯兰化就是因为欧洲人没有保护好他们自己的族群、宗教、习俗、文化、德性<sup>89</sup>……这些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要素；自由地或自发地对人的

<sup>86</sup> 可以参考《Conservatism》，维基百科，<https://en.m.wikipedia.org/wiki/Conservatism>。

<sup>87</sup> 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可以看这场美国研究基金组织的辩论 <https://tfas.org/event/libertarianism-vs-conservatism-debate/>。

<sup>88</sup> 可以参考《Why Liberalism Failed》，维基百科，[https://en.m.wikipedia.org/wiki/Why\\_Liberalism\\_Failed?](https://en.m.wikipedia.org/wiki/Why_Liberalism_Failed?)。

<sup>89</sup> 关于民族保守主义的介绍见附录 1.3.3。

基因改造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对自由的基因改造说不。美国人的这些特征是后现代性的（postmodern）普遍特征。现在中国发达城市里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马上就进入后现代社会了。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古典资本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 or libertarianism）走到底就是不自由的自发秩序，这是自由的狡猾（cunning of liberty）。不过弗里德曼、哈耶克和米塞斯根本算不上自由主义哲学家，他们太浅薄了，柏克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才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的两极。密尔在《论自由》里攻击最多的是道德（morality）和习俗（custom），密尔颂扬个人主义。哈耶克引用最多的是密尔。人的思想（mind）是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对象。个人主义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经济学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培根、洛克、密尔、杜威、罗尔斯代表的自由主义走到极端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今天：一方面是没有保守意识和共和意识的绝对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是议会和法院保护个人自由（种族、性别、教育……）的全面干预。培根、洛克、密尔、杜威、罗尔斯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导致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张力（tension）：扩张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必然需要相应的扩张的政府干预（demand for expanding government enforcement of individual rights）。大家懂了吗？这是自由主义没有保守意识和共和意识的必然结果。

诺齐克批判洛克的劳动财产论：一个人把西红柿酱倒在太平洋里之后，太平洋归他/她一个人所有。诺齐克只是建立最小政府，他受到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猛烈批判。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哈耶克自发秩序一定会导致失去自由的例子：为了节约劳动成本，假定资本自由地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发地流向不发达的全能治理国家如俄罗斯和北朝鲜。其后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劳动者大量失业。这些失业者自由地、自发地投票就选出来特朗普总统：提高关税、限制资本流动，于是资本流动很快失去自由。这就是保守主义出场的时候了，康德就没有解决自由这个难题。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必然导致白色恐怖和拿破仑的个人专制，马克思的自由一样导致专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最终是一个死胡同。哈耶克的许多政府干预措施被米塞斯骂死，他后来才写了《货币的非国家化》。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样是死胡同。施特劳斯<sup>90</sup>的《自然权利与历史》<sup>91</sup>这本书里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批判也适合康德和白左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他在1950年代已经深刻指出了右派哈耶克和左派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哲学本质上一样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权利优先于善（the priority of right over the good）只能终归结

<sup>90</sup> 列奥·施特劳斯，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古典政治理论诠释者。他的知识范围横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政治哲学，其中包括对柏拉图、迈蒙尼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尼采的研究。施特劳斯主要以哲学史的身份写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重要思想家及其作品的评论，《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就是一个例外。

<sup>91</sup>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为死胡同。“虽然现代自由主义强调追求个人自由是其最高目标，但施特劳斯认为应该对人类德性和德行的问题有更大的兴趣。通过他的作品，施特劳斯不断提出自由与德性、德行如何共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共存的问题。施特劳斯拒绝将就苏格拉底问题的任何简单化或片面的解决方案：对城邦和人来说，什么是好的？”<sup>92</sup>这是左派和右派必然走入歧途的原因，也是我在共和经济学里引入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德性和德行（virtue, good）的原因，保守主义认为善优先于权力。

在欧美，只有保守主义才能抵挡住密尔-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独立的保守主义组织，如宗教教会、公民社会、社区团体、法律体系（特别是法庭的陪审团）、私人媒体、私人俱乐部、私有产权、私人慈善机构等等。这些保守主义组织是对付古典自由主义冲击的巨大力量。这些例子说明：为了防止密尔个人主义和哈耶克自发秩序导致的不自由的结果，保守主义强调的道德、社区、习惯、宗教、家庭、民族、公民组织等等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而共和主义强调的德性(virtue)、德行(Virtual)、善(good、just)、特别是共同体的善(common good)也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是芝加哥学派和奥派经济学都没有注意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和基督新教补充了洛克自由主义的不足之处。没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密尔和哈耶克的右派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必然导致白左罗尔斯自由主义。哈耶克还专门讲他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他荒唐地走向极端。

世界需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综合体，《自由秩序的保守主义基础》<sup>93</sup>是一种非常好的学术尝试。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区根本没有跟上这些政治哲学的前沿，所以美国经济学变得毫无影响力。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忽视政治制度差异，他提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搞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他还在《资本主义与自由》<sup>94</sup>提出没有政治自由也有经济自由；哈耶克也一样如此荒唐过。传统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也忽视政治体制（自由民主和全能治理体制）的差别，他们错得离谱。自由民主国家和全能治理国家不能搞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因为这两种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战争。保守主义与共和主义都看清楚：社会制度差别导致战争。虽然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也有战争，但是我只说了这是个充分条件。于是中美两国制度完全对立，必有一战。

<sup>92</sup> 引自《Leo Strauss》，Art and Popular Culture, [https://www.artandpopularculture.com/Leo\\_Strauss](https://www.artandpopularculture.com/Leo_Strauss)。

<sup>93</sup> *The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AL ORDER*, Daniel J. Mahoney, 2011,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关于综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些研究见附录 1.3.4。

<sup>94</sup> 《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2004。

保守主义经济学和基督新教补充了洛克自由主义的不足之处。所以共和经济学可以综合处理柏克保守主义、洛克自由主义、穆勒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我自己到了六十岁才懂得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个人主义……综合起来做数理模型。共和经济学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综合起来。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必须用柏克等人的保守主义来补充：这是我最近三年建立的共和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里最基本的理论模型。国内普及奥派经济学只能是死路，我的共和经济学才是活路。那些毫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综合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分析白左、民族、产权、自由、法治和宪政，更无法分析今天的战争。美国社会政治哲学里罗尔斯进步自由主义、洛克古典自由主义、柏克保守主义和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的争论都直接体现在个人的效用函数和 group welfare functions（团体效用函数），它们也都改变生产函数。在我们的自由资本和经济增长数学模型里，共和主义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没有丝毫矛盾。

国内很少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学习和批判各种主义。甘阳<sup>95</sup>那套儒家保守主义可以把秦汉儒法全能治理体系再保持几千年。甘阳这种没有参与国际事务经历的书生空谈了半天也没有说明中国到底应该怎样对付欧美的联盟，而他提到的美国大学里的著名学者都是制定美国政府战争决策的老手。李泽厚<sup>96</sup>是 liberalist（自由主义者）吗？他怎么要告别革命？革命不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吗？李泽厚是伪自由主义者，众多伪自由主义者中的一员，是十足的犬儒，李泽厚歌颂秦始皇，还鼓吹三纲六纪奴隶主义的儒家今后很有用，李泽厚歌颂大一统、否定天赋人权。国外有一部分朋友喜欢老子和“无为”，相信罗斯巴德所写的老子是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外国人对老子《道德经》最大的误解。老子是愚民主义全能统治的鼓吹者。余英时看对了老子！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今天西方主体思想里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今天的主体思想是马列主义。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连在一起？赵汀阳鼓吹的华夏天下意识和施展鼓吹的华夏枢纽意识还没有征服新冠病毒。甘阳、李泽厚、赵汀阳……除了掉书袋，全是外行。

现在中国搞经济学的人根本不知道政治哲学、法学、保守主义，天天喊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口号。厉以宁和吴敬琏他们那一代人连洛克和密尔的自由主义都没有认真学习。中国经济学人既不懂西方自由主义，也不懂西方保守主义，更不懂西方共和主义。他们怎么创立经济学？我们国内的人被 brainwashing（洗脑）之后几乎不可能了解任何现代文明。那些学数学出身改行搞经济学的中国人基本上不懂奥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马克思

<sup>95</sup> 甘阳，中国政治思想学者，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

<sup>96</sup> 李泽厚，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主义、新教……他们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经济学的新领域。建立经济学新领域必须把这些主义变成数学模型。同时，统计回归没有丝毫作用。经济学还没有醒过来：数理经济学变成经济工程学（包括金融工程学）已经七十年了。

为什么欧美人最追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主义、上帝主义……？为什么这些主义都被中国人批判和抛弃？这是理解中国和欧美之间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别的基础。我们犯人类基本概念的错误太多太多，例如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效用主义（功利主义）、反对自私自利、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剩下来的都是荒唐可笑的人生。如果把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效用主义（功利主义）、反对自私自利、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都翻译成英文，欧美人完全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么多好东西。当我们中国搞改革开放（也就是实验部分古典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见其失败的结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共产党决定一切，中国怎么改革开放也只能是全能治理体系。<sup>97</sup>因为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了西方自由主义、西方保守主义和西方共和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我们不懂西方自由主义、不懂西方保守主义、不懂西方个人主义、不懂西方共和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全能治理体系。下一章我会专门谈论中国的政治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对全能治理体系的攻击都是致命的。全能治理体系没有任何理由存在。

---

<sup>97</sup> 见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719/c69113-31244742.html>。

## 第四节

# 从私有产权到法治、自由

我强调保守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说明《Bible》（圣经）、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对建立私有产权制度的巨大贡献。在公元前 1500 年的《Bible》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就已经建立，私有产权起源的介绍不提《Bible》、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私有产权制度，怎么得了啊？

神甫可拉在沙漠里领导 revolt against（反抗）摩西<sup>98</sup>，摩西自我辩护说：“我没有夺取他们一头驴，也没有伤害他们一个人。”这就是摩西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生命权利的训导。后来，发现撒母耳的儿子不能胜任他的职务，以色列人要求有 kings（国王），“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要求让撒母耳很不高兴，撒母耳警告他们：kings 可不像我啊！“我拿了谁的牛？我拿了谁的羊？”撒母耳警诫百姓，立一个王会给他们带来极大重担。于是撒母耳将耶和華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事实上，强取豪夺的王，最终会逼得百姓向神哭

---

<sup>98</sup> 《旧约·民数记》16:1-40 描绘了可拉反叛摩西的事件，以及他因为反叛而受到地裂的惩罚。



求，救他们脱离王的暴政。”<sup>99</sup> 我们能看到权力集中的危害，同时这也是先知撒母耳尊崇私有财产权的训导。希伯来人首次将人的权利与王的权力对立起来，对后者进行不留情面的批判与谴责，充分反映出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对王权力固有的压迫本性有着深刻的洞察；这种认识不但在古代近东社会前所未有，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超前。希伯来王国政治所体现的“律法至上”、“君权有限”等观念，作为一种铭刻在《希伯来圣经》中的精神遗产为基督教所继承，在耶稣等人的发挥下正式形成二元权力的区分。

在柏拉图的斯巴达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家庭；共产共妻共小孩；所有年长者都是年幼者的父亲；所有幼弱的婴儿全部被抛弃。生产劳动被视为可耻的，货币经济被取缔，全部生产由国家奴隶分成不同的行业完成。每一个奴隶只允许拥有一种技艺……<sup>100</sup> 斯巴达也是搞共产主义：斯巴达的贵族阶层不容许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所有贵族的妻子必须共享，这样生出来的孩子会更加健康强壮。对于斯巴达的商人阶级，私有财产和家庭是存在的。

有必要细阅亚里士多德关于私有财产正当性的论证，因为它们在整个历史中塑造了关于财产权的辩论。在他的开创性作品《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居于以下四个核心领域，展示了私有产权的优越性，抨击了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它们就是：效率、团结、正义和美德。

1. 效率。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后者助长了疏忽大意的可能性；由于人们共同拥有某些东西，每个人都更轻信其他人在负责局面，而不想由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花自己的钱更谨慎，也没有什么比花别人的钱更随意。亚里士多德持有同一立场，他写道：“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东西；他们不太关心公有的东西。”他断言，对于那些需要独自担起责任的事物，人们才有富有成效地利用它的动力，因为他们将直接从自身努力中受益。反之，公有财产不会产生类似的激励，因为人们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现代财产权的维护者往往驻足于此，但亚里士多德越出分配效率的问题，采用了更多姿多彩的方法。

2. 团结。批评私产制度者倾向于将财产权贬为“原子式的”，声称这个制度的采用，制造出一个“粗犷个人主义者”的社会：人们拒绝彼此合作。亚里士多德强烈抨击这种观点，相反认为私产制度实际上促进了团结，而公有财产则引起了不断的纠纷倾轧。关于公有制的问题，他写道：“总体而言，生活在一起并对一切人类事务共同作主是困难的，且在所有这类事情中，是最最困难的。”

<sup>99</sup> 《旧约·撒母耳记上》8: 4-6,10-18。

<sup>100</sup> 见柏拉图《理想国》第4, 5章。

无论如何，结社并非一件坏事，但人们共同拥有基本资源，就为潜在冲突和广泛倾轧打开了大门：“一个普遍观察到的事实是，拥有公有财产且一起做主的人，与各自拥有财产的人相比，彼此之间冲突得更厉害。”自己拥有自己的东西，我们避免了在自己生活的关键方面要与他人通过妥协达成一致所产生的持续冲突。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每个人，当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范围时，就失去了反目成仇的类似理由。”

3. 正义。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断言，正义之定义是同等的就获得同等回报，不同等的就获得不同等的回报。当这种观点运用于公有财产观念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假如说，人们是不同等的，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拥有同等之物，便由此产生了争执不休……因为人人都同意，分配当中的正义必须根据某些价值；然而每个人对价值所指的都不是同一回事。”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正义就是各自所值与回报一致，因此能力不等的结果，就是回报不等。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私有产权制度的一大好处。在这个制度中，人们可以从自己把握的任何代价中争取回报。他认为在公有制中，如果某些人比其他人的工作更有成效，到头来只得到同等回报，那么肯定会出现问题。这一问题自然会引发愤懑，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拉平了每个人，从而不利于那些努力工作的人。

4. 美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用一个人的财产来帮助朋友是一种义举：“善待和帮助朋友、客人或伙伴是最令人愉快的，可这一切只有在财产是私有时才会发生。”在他看来，慷慨慈善只能存在于维护私产权利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共同拥有一切，那么就没人可以互相帮助。亚里士多德写道：“慷慨大度事关财产占有，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是否慷慨或在行善，除非慈善的事功是利用了这个人自己的财产。”因此，财产公有妨碍了大度、敦厚和慈善的美德。因此，财产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生产方式，也不仅是团结的动力；它也是培养某些美德的重要工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公有财产也可用于贤良目的，但这是误导的。美德必须靠自由也就是不受强迫的行动来培育。在《尼可马尔伦理学》第三部开头部分，亚里士多德说“因为美德关系到人的感情和行动，在自愿的感情和行动上，才赋予了人物以褒贬，而在那些非自愿的感情和行动上，赋予人物的是宽恕，有时甚至是怜悯。”这样，公有财产的强制使个人失去了获得美德的可能性，这事出于它消除了个人选择。

这些思想可不简单。人类后来关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争论都在这四个方面展开。在 Bible 之后三千多年，十七世纪的洛克只是建立了（其实是错误的）劳动财产理论。洛克认为，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指对事物的权利，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

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或践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赋予它们的，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sup>101</sup>“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你的”与“我的”之间，有一道明确的，由法律与习俗规定的界限。所谓“好邻居不如好篱笆”，这条界限越清晰，越能鼓励人们诚实守信。私有财产受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这些都是美国小学六年级必修的课程。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草稿：“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 independent.”（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独立）拥有私有财产是一个人独立的第一元素，我们无论怎样强调私有财产权都不过分。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没有保守、没有共和国。没有私有产权，何谈自由和法治（自由的规律的统治）？从耶路撒冷-希腊-罗马文明来看，私有产权、自由和法治是三位一体。

上一节我们在介绍自由主义时已经介绍了自由的概念，我们接着了解什么是法和法治，以及它们的起源。这些词汇是中国人最难理解的概念，因为中国的“法家”（刑治主义）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几千年。法、法治、产权、自由等概念需要大家很多年通过英文阅读去理解。厉害的人最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我讲课每一句话都是多年来英文阅读的总结，中文阅读只能带来思维混乱。

法（希腊文 nomos，拉丁文 lex，法文 loi，英文 law）本意是人类自由的规律。为了理解 law，我们只需要看一看物理学中的 law(定理)，这些自由的规律同物理学里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发现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人只能发现法，人不能立法，议会当然也不能立法，我们日常所认为的“法律”基本上只是议会通过的政府行政指令。合乎自然的法律（law）是母亲的法律：依据这一自然法，人人平等，生而自由。看看美国独立宣言就懂了，平等和自由的原则经常同出生和繁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母亲眼里，孩子们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法治（rule of law）是自由规律的统治。比如说，美国宪法里的法是自由的规律的统治，英美议会行政指令的统治便不是。不要提法制，法制是中文里才有的刑罚制度，商鞅刑罚的统治（rule by law）是用刑律进行国家治理。

有了这些基本知识，我们来看哈耶克最重要的著作《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此书中文应该翻译成《法、行政指令和自由》，邓正来<sup>102</sup>把此书翻译成《法律、立法和自由》是错误的，因为哈耶克在这本书里专门把 legislation 定义为议会专制制造出来的那些破坏甚至消灭自由规律（law）的行政指令。议会不能立法：议会不能建立自由的规律！翻译成《法、行政指令

<sup>101</sup> 洛克，《政府论》IV，iii，18。

<sup>102</sup> 邓正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和翻译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和自由》更符合哈耶克此书的旨意。欧美议会民主极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欧美国家议会来立法。法是自由的、自然的、抽象的、正义行为的规律。法是被发现的。人类不能立法。一百五十年来，欧美国家议会通过多数人投票（民主）原则胡乱搞起来数不清的政府命令，大家把它们也称为法律。这个过程被称为立法。但是英美议会一百多年来通过的这些政府行政指令都不是法（希腊文 nomos）。这些行政指令（希腊文 thesis）往往是破坏自由、毁灭自由。这是英美议会专制主义的恶果。当英国光荣革命推翻君主专制时，它建立了议会专制。原来欧美人都在忙于控制君权，他们忘记了控制议会的权力。nomos 和 thesis 在希腊文里是对立的。议会的行政指令在欧美社会已经被称为公法（政府行政运作的自由的规律？）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过程啊。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看到古代希腊立法人和罗马立法人的说法。

现在美国开车、喝酒、堕胎、吸毒、色情、航天、失业……都有美国国会或各个州议会建立的法规。这些多如牛毛的立法已经大大破坏了私有产权、法治和自由。人不能立法。人立的所谓法律一定是破坏自由、产权和法治的行政命令。看看中国商鞅变法里的恶法就懂了。美国议会补贴美国农业的行政指令难道成了美国自由的规律？哈耶克在书里批判了几乎所有行政指令（所谓的公法）。<sup>103</sup>所以，西方的 law 在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汇。一切权力都是腐败。一切权力都必须加以限制。哈耶克在第二卷中提出和论证的命题是：时下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只是在上述两种秩序的后一种，即建构的或组织的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里，则毫无意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接着哈耶克在第三卷进一步阐述了一个重要命题：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同一个代议机构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然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步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体制。我们需要极大的耐心去看懂哈耶克的这三卷书。我们还需要把经济学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统一在一起的模型。经济学现在的模型是自欺欺人的游戏，金融学就更不用说了。

跟私有产权制度的起源一样，世界上真正的法治起源也来自古老的犹太教。经（摩西五书<sup>104</sup>）就是犹太人的法律，公元前 1280-前 1220，上帝借以色列的先知和众部族首领摩西颁布十条诫律，与以色列人立约<sup>105</sup>：敬唯一的上帝、孝敬父母、不杀人、不盗窃、不做假证人、不占用他人的财产……这些都是自由

<sup>103</sup> 希望进行初步了解可以看《哈耶克精要：第五讲 立法与法律截然不同》，唐纳德·布德罗，微信公众号，风灵。

<sup>104</sup> 摩西五书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又称为律法书、摩西律法。是犹太教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对应圣经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sup>105</sup> 《旧约·出埃及记》20:2-17。

的规律，都是建立财产权、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此外，耶和华答应以色列人：到时候以色列人将战胜所有敌人，恢复旧日的荣耀。这种历史终结的观念一直存在，而且是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作为历史最终阶段的基础，

公元前 1800 年至前 1011 年，犹太人一直没有君王，因为受到外族人威胁，公元前 1010 年，犹太部落立扫罗为王。犹太君王不是神圣的，只有上帝是万能的，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君王不是犹太人和上帝的中间人，犹太人直接跟上帝交流。犹太君王跟所有犹太人一样被西奈山的约（法律）统治，犹太君王可以被任何一个犹太人起诉。这才是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这其中的区别，犹太人的“法”是与神立的约，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约定，所以国王都不可以随意修改，脱离宗教的色彩后，不难想象它的价值。这比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出现要早得多，而且跟商鞅刑治（刑罚）主义有天壤之别。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 484 年—前 425 年）曾记述一名希腊人对波斯王薛西斯讲：“希腊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这段材料主要表明了古希腊的民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希腊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是一致的<sup>106</sup>。后来犹太教又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因为离开以犹太教为主体的 Old Testament（旧约），New Testament（新约）就莫名其妙、漏洞百出。再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正统宗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堂又成为蛮族君主们的导师，Bible 在统治思想里最具影响力，“人的法律不能与圣律相悖”于是圣律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最后，通过 1517-1648 年的 Reformation（宗教改革），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而新教（Protestantism）本质上是回归犹太教（Judaism）。犹太教和新教都鼓励人勤奋工作和节俭。劳动是人的天职（calling），人的财富积累荣耀上帝。新教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更加巨大：16 世纪的新教领袖直接指出君王与平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英国光荣革命（1688）和洛克的《政府论》（1690）可是在一百多年之后啊。所以在我看来，犹太教、Protestant ethic（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我大胆提出这一巨大的结论，希望大家思考后批判指正，我 1989 年的哈佛博士论文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数学模型。

自由、法治和私有产权是 Old Testament（旧约）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建议希望了解西方文明的人都去读一读 Bible。刘小枫<sup>107</sup>天天翻译斯特劳斯和沃格林的书有什么用？欧美人都还看 Bible，这就够了。中国人共同相信什么？

<sup>106</sup> 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然法的真正确立是古希腊的“斯多葛派”（the Stoicism），经过重要的修正后成为了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见列奥·施特劳斯《论自然法》，载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

<sup>107</sup>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编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哲学书籍。

Nothing（什么都不相信）。三皇五帝不读 Bible 也只能是白痴，更何况孔子和老子。我们中国人不读 Bible，怎么可能理解西方文明？倡导德政和仁政的孔子知道 Kings 和 emperors 权力的本质吗？他当然不知道，因为孔子没有认真看 Bible 里 God 的教导，不过孔子毕竟说了“苛政猛于虎”。虎怎么可能实施德政和仁政？

我想，政治组织的观念了决定生命的意义。以色列人的首要政治概念是契约（covenant），霍布斯、洛克、卢梭和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都来自以色列人的 berith 或 covenant（契约）。犹太人马克思如此审问犹太人：“What is your philosophy? Money.”（“你的哲学是什么？”钱。）我欣赏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首要政治观念是宪政。美国人的首要政治概念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而在德国，宇宙中的自然法是神的逻各斯（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它的火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格是集体心灵的组成部分，不存在个人灵魂的独立本体。这种思想由康德和黑格尔发展到新境界，在苏联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成为共同体学说。为什么英文把黑格尔的德文（Recht）翻译成权利（right），而不翻译成法？为什么中文翻译成法。Philosophy of Right, not Philosophy of Law（权利的哲学而不是法的哲学）因为黑格尔定义“right”（Recht）为世界上存在自由意志，所以权利的哲学一定是自由的哲学。请看黑格尔《权利的哲学》第 29 节<sup>108</sup>。

在 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她们的制度与 Judaism（犹太教）更没有任何关系。全能治理（totalitarianism）是 oriental despotism（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的核心。古代东方历史都是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上的帝国架构。宇宙论更没有给东方帝王任何生命的意义，除了为统治而统治之外，自由规律的统治闻所未闻。巴比伦帝国的汉谟拉比法典（商鞅变法的法典）跟犹太人和上帝的约（法律，自由的规律）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是国王的规定，不是自由的规律。耶路撒冷-希腊-罗马的法跟中国法家的刑治主义也没有丝毫关系，law 是自由的规律，不是秦汉统治的刑律。中文里本来就没有耶路撒冷-希腊-罗马-英美的法（自由的规律），也从来没有 rule of law（法治）。古文里的法：刑也。《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因为君王在 law 之上，中文中的法是国王统治人民的刑罚，而希腊罗马的 law（nomos, lex）是自由的规律和定理。中文更没有产权（property rights），因为一切都是君王的，人都是君王的财产，所以只好用刑律（法）来翻译 law，但是把 law 翻译成商鞅的法真是对法（自由的规律）的最大亵渎。商鞅的刑罚

<sup>108</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

不是自由的规律。商鞅的“法”是消灭自由。汉谟拉比法典和商鞅变法的法典都是君王们制定的统治规则，君王们不受这些法典的统治。因此，巴比伦帝国和秦国没有 rule of law（法治）。再说一遍：法是自由的规律，法治是自由的规律的统治。

## 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自由和法治

法治首先是保护私有财产。<sup>109</sup>罗马法的核心内容就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土地私有是罗马法最重要的部分，罗马共和国早期公民基本上是农民（贵族也是农民），他们基本上拥有自己的土地，尽管部分平民持有的农地比较少。罗马法遵循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罗马法昭示着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正义。”<sup>110</sup>

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法治、自由。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宪法学和经济学的常识。理查德·派普斯<sup>111</sup>就曾分析，俄罗斯从沙皇时代起就没有私有产权，一切都被视为沙皇的财产，贵族和农奴当然也是沙皇的财产。正是这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同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的独特道路（可能在蒙古的影响下），导致了其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并且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专制国家。后来俄罗斯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也是因为共产主义经济里没有私有产权。苏联解体后私有化国有经济的失败也证明了沙皇体制极端难以改变。理查德·派普斯的著作远比米塞斯和哈耶克更有意义。派普斯研究财产和自由的关系的结论很精彩：没有财产权一定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可能还拥有一点财产。财产权是法治的基础。本质上，财产权、法治和自由是三位一体。

与派普斯对俄罗斯的分析一样，中国的制度也必须从秦汉政体来理解，五千年的奴隶们哪里知道私有产权乃法治和自由的基础。派普斯的书《财产和自由》经过中文翻译后，必须改为《财产论》才能发表，因为怕 slaves（奴隶们）醒过来了。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才刺激奴隶造反，这是革命成功最基本的口号。但是革命之后，奴隶们难道不要田地和自由？《国际歌》里推翻奴隶主之后难道是放弃私有产权和自由？自己当家做主首先是自己拥有自己的财产，一无所有怎么当家做主？奴隶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一直是奴隶，还在 whitewash oriental despotism（粉饰东方专制主义）的国有制。

为什么说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法治和自由？我认识的三位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回答。

<sup>109</sup> 一个国家保护私有产权水平的评价标准，见附录 1.4.1。

<sup>110</sup> 引自《罗马的遗产》，理查德·詹金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sup>111</sup> Richard Pipe，哈佛大学博士，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沙俄、俄国革命和苏联。代表作《旧政权下的俄罗斯》、《财产论》。

我的哈佛学弟许成钢<sup>112</sup>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一切制度的起源：“最早产生了法治的国家，在历史上，都是先有了私有制之后，才产生了法治，然后再产生了其他的现代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保护已有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扩大和巩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民法》的绝大多数条款都跟产权有关系。实际上，与家庭和婚姻相关的大部分法律，都是私有财产的衍生物。与私法或民法对应的公法，其核心是宪法。用宪法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益的制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因为拥有私有财产的公民，为了保护他们的产权，而推动出来的制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有产者为维护自己利益，而集体推动所致。之所以私有产权重要，有产者重要，是因为，在私有财产为主的社会里，有产者既有集体保护自己产权的动力，也有集体自我保护的能力。由于征税对私有产权有重大影响。因此，为了充分保护私有产权，人们会推动建立公法，建立规制政府征税和开支规则的法律。要求征税需要在议会上公开辩论，经议员投票通过。而议员则代表民间的私有财产的利益。概要地说，所谓法治的社会，所谓法治，其最基本目的就是保证私有产权不被政府侵犯；就是用分治政府权力的制度，来保证政府无力侵犯私有产权。”<sup>113</sup>

再来看看韦森<sup>114</sup>的回答，韦森总结了哈耶克的私有产权制度对“公正”与“自由”的维护作用的观点：“哈耶克对私有产权制度社会功用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和乃至在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耶克曾指出‘要确保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political authority）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之第二种社会功用的解释是，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显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

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sup>112</sup> 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sup>113</sup> 引自《经济学家访谈 | 许成钢：为什么产权是一切制度的起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726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7269)。

<sup>114</sup>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sup>115</sup>

最后是武大学派邓晓芒<sup>116</sup>的分析，他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过程中提出私有制与个人主义的诞生密切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

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

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sup>117</sup>在这篇文章中邓晓芒没提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天朝的分析事实上就是照抄希腊-罗马对东方专制的分析。

除此之外，私有财产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扩展，人的生命权利、人的自由权利、人的思想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都是私有财产。我举个例子，财产权首先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权。我们现在把自己的知识叫做自己的人力资本，为什么？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权力或财产）。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头脑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财产。我的共和经济学明确地把这些权利写在了数学模型里，我会用经济分析和法律分析方法继续补充邓晓芒的哲学分析。

<sup>115</sup> 引自韦森《私有财产与市场秩序》，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6008.html>。

<sup>116</sup>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并积极介入中西比较和文化批判。

<sup>117</sup> 引自邓晓芒，《西方文化凭什么成为当今的强势文化》，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4028.html>。

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共和经济学的基础，是个人独立理性行为的基础。看完了三位学者的分析，我也请你们证明：当且仅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时，法治和自由才存在。（提示：这是政治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最基本的定理）

## 不要再提市场、民营企业 and 企业家创新精神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一直是如何确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我 1987 年就开始在武汉大学讲美国的高级经济学课程，当然是希望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通过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赶上美国。可惜，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

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个人效用极大化、企业利润极大化、企业家创新精神。事实上，离开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没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内所有著名经济学人，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他们都只谈表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这些经济学的概念都来自于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经济，更没有法治和自由。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强大的私有产权经济，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离开私有产权空谈市场经济是吴敬琏和张维迎他们瞎折腾。

我在中国早就提出要确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也是我三十五年来在中国推广当代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张培刚先生 1985 年就跟我在哈佛私下里提出私有产权和法治是现代化的根本。从我跟董辅初<sup>118</sup>先生多年交往来看，他是除我之外唯一勉强敢于公开提出此观点的。董辅初先生直到 2002 年的时候还不敢公开提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其实 1983 年以来，他和我讨论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一直都是要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董辅初先生的外号是“董所有”，为了纪念董辅初先生，我在这里再次提出把他的这篇文章改为：《私有经济越发达，自由市场经济就越发达》<sup>119</sup>。只有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中国改革开放才有希望。

我骂张维迎比较多，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都不敢提，就不要谈什么奥派了。况且奥派经济学本来就是公开呼吁中国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也是公开要中国搞私有、自由市场经济……于是张维迎在共产主义公有体制下忽悠企业家创新精神……我不仅仅是简单写一句话，

<sup>118</sup> 董辅初，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sup>119</sup> 原文，董辅初，《市场经济越发达，民营经济越发达》，[http://www.ce.cn/ztpd/tszt/caijing/2004/dndfr/syji/200408/05/t20040805\\_1426320.shtml](http://www.ce.cn/ztpd/tszt/caijing/2004/dndfr/syji/200408/05/t20040805_1426320.shtml)。

当我批判张维迎歌颂中国企业家创新时，我实际上在指出张维迎根本不懂得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私有王国）为基础。熊彼特反复说明：企业家是私有资本主义创新者。由于创新者越来越少，资本主义必然进入没有任何创新的社会主义技术官僚体制。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企业家创新。在中国，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存在，怎么会有创新企业家的私人王国和私人 dynasty(王朝)？奥派经济学和熊彼特都没有想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经济里有创新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想到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私有市场经济，不要在共产主义公有制经济里忽悠出来私有产权王国。另外，熊彼特认为创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慢慢消失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为什么美国人不认为创新企业家是美国经济的国王和灵魂？熊彼特为什么挖苦企业家为 *captains of industry*？

我们总说企业家精神是利润极大化是对熊彼特和企业家精神的侮辱。企业家需要一个私人王国、一个王朝、一种为成功而成功的冲动。有利润可以，没有利润照样进行创新。熊彼特如此定义企业家：*the dream to found a private kingdom and a dynasty; the will to conquer, the impulse to fight, to prove oneself superior to others, to succeed for the sake, not of the fruits of success, but of success itself.*（梦想建立一个私人王国和王朝；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为了成功而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而且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他的伦理的至善，赚越来越多的钱，加上严格避免一切自发的生活享受，首先完全没有任何享乐主义，更不用说享乐主义的掺杂。”“它被认为是如此纯粹的目的本身，以致从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的观点来看，它似乎完全是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被赚钱所支配，被获得作为他生活的最终目的。”私有的自由企业家根本不在乎创新是否带来利润，他们是为创新而创新。仔细读熊彼特的著作！国内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读熊彼特的几本关键著作。熊彼特的帝国扩张者根本不是为了物资利益而扩张，帝国扩张者是为扩张而扩张。仔细看熊彼特论帝国主义。我们这篇论文勉强体现了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这篇论文还证明了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和熊彼特的私人王国里的企业家精神是一致的。我们的这篇论文<sup>120</sup>就是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等价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很多人都说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的论文填补这个空白。我们会在今后写出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论文里做出更多努力。

---

<sup>120</sup> Qichun He, Yulei Luo, Jun Nie, Heng-fu Zou, *Money, growth, and welfare in a Schumpeterian model with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ume 47, January 2023, Pages 346-372.

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都消灭了私有资本家阶级。就算现在让私有资本家阶级复活一百年，一百零一年之后我们会怎么对付私有创新企业家和私有资本家阶级？按照 backward induction（逆向归纳法<sup>121</sup>），私有创新企业家知道他们一百零一年会被消灭，他们在复活一百年的时候就不会创新，复活九十九年的时候也不会创新……一直推下去，所以他们今年也不会创新。按照 backward induction，创新企业家的 time horizon（时域）只能是永久的私有产权，哪怕一百年的私有产权也只能出现官商勾结的投机商人老板。权贵资本家和红顶商人<sup>122</sup>不是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所以熊彼特说：创新企业家首先建立一个私有王国，最好是一个私有的 dynasty！哪个私有 dynasty 不想永远存在下去？这种逻辑太简单了。懂了吗？

张维迎不必要跪舔官商勾结的老板。为一个价格双轨制，张维迎和华生<sup>123</sup>都争发明权。何等肮脏可怜！他们两个又没有在中国提搞私有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了不起的？全世界哈哈笑。郑永年<sup>124</sup>和吴晓求<sup>125</sup>也天天瞎侃，这些水货经济学人现在跟风跪舔官商勾结的老板。而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敢发声了。他们怎么还不知道企业家精神离不开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企业家精神。只有建立真正的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我们才有创新企业家。

最需要人文社科的人说真话的时候，大家都说假话、空话、不说话。需要说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吴敬琏大谈市场：“吴敬琏认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二是更具根本性质的体制改革问题，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他强调，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sup>126</sup>吴敬琏这么大年纪还是怕死，他不敢直接提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宪政。其实，市场-价格机制四十多年来一直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用。市场机制可以不是私有产权-法治-自由机制。吴敬琏怎么对得起顾准<sup>127</sup>啊？吴敬琏天天以顾准的心灵知己自居，他没有声音了。他

<sup>121</sup> 所谓逆向归纳法，就是从动态博弈的最后一步往前推，以求解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

<sup>122</sup> 红顶商人，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亦即“官商”。

<sup>123</sup> 华生，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sup>124</sup>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原文：《科创时代中国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中交企协绿色智慧交通分会网站，<http://www.zgitqx.org.cn/lshzjtfh/18348.html>。

<sup>125</sup> 吴晓求，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文：《让企业家有信心 国家发展的活力必将增强》，百度百家号，新京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349969508098260&wfr=spider&for=pc>。

<sup>126</sup> 引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

<sup>127</sup> 顾准，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吴敬琏的老师。

提顾准都是对顾准的侮辱。放屁的虚假：“吴敬琏先生是 70 年来中国经济的见证者、思考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他被人称为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对现实的丑恶现象，能够直言不讳，敢于说真话，敢于代表民意发表意见。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厉以宁比董辅弼差远了。董辅弼天天鼓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机制才是我们需要的。

樊刚学弟到今天还不敢直接说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sup>128</sup>不要再再用民营企业这个名称，让我们用私有企业吧。人怎么如此怕死？樊刚学弟，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老板只能是官员的奴才。懂吗？你不直接说这种真话，你发言有什么意义？！这哪里是学了当代经济学的人啊。张燕生<sup>129</sup>也是一样，我们国内如此讨论民营老板多么荒唐啊。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法治和自由。信心来自于产权、法治和自由！这个发言好：“讨论信心可以被解决这本身就说明民营企业没有自主权。他们的信心可以被解决也可以不被解决。就一个被玩弄的木偶。如果有自主权轮得着他们指手划脚吗？这个主题很好笑。”吴敬琏、张维迎、樊纲……都回避这种根本制度建设问题。全国上下天天这样呼唤民营企业制不担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失业吗？

1999 年这篇白重恩、李稻葵、钱颖一和王一江四人合写的论文是保护中国私有产权，反对政府掠夺的。<sup>130</sup>他们那个时候不在中国。他们回中国后就改变了面孔。这些人都是毫无操守的政治投机分子、两面人，哈佛培养他们真是瞎了眼。美帝国政府还以为吴敬琏、林毅夫、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姚洋、张维迎……和权贵资本家们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美国政府还指望他们在中国搞私有产权和民主。美国政府更以为中国富起来的私有老板搞颜色革命。这些经济学人和官商勾结的老板让美帝国主义失望了。他们把私人老板忽悠出来有什么用？最重要的是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私人老板离开权力就无法剥削。

孙冶方<sup>131</sup>不怕死。不过孙冶方死前还坚持批判现代经济学。哈佛 1927 年毕业的水货博士陈岱孙<sup>132</sup>也是一辈子坚持批判现代经济学。为什么国内还没有否

<sup>128</sup> 樊纲《再说一遍，我们不缺国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缺民企》，百家号，新经济学家，<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078946906696061&wfr=spider&for=pc>。

<sup>129</sup>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今年解决民营企业信心缺失问题至关重要》，百家号，新浪财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718655163297360&wfr=spider&for=pc>。

<sup>130</sup> *Limiting Government Predation Through Anonymous Banking: A Theory with Evidence from China*, Chong-En Bai, David D. Li, Yingyi Qian, Yijiang Wang,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275,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sup>131</sup> 孙冶方，模范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

定我从 1987 年就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和美国怎么没有另外一个我这样的自然科学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学者如此公开地坚持在中国实现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法治、自由、平等（民主）和权力制衡宪政？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钱权色既得利益被剥脱啊。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定中国经济资源配置，而自由市场根本不能决定中国经济资源配置。这些所谓的改革经济学人天天鼓吹市场和民营经济都是自己欺骗自己，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学人。而国内私有产权没有建立是因为邓小平说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共产党决定一切。“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权宜之计。请把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写在中国宪法里后再喊这种口号不迟<sup>133</sup>。看看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宪法就懂了，现在提大力发展私有经济不过是机会主义，这种提法根本上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宪法都是要坚持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它也是消灭经济学。《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国私人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老板们基本上认识这些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供销社、公共食堂、农业集体化……吓得私人老板移民去爱尔兰呢。共产主义（communism）的中文只表达了共有财产，没有表达 community（家庭解体）的意思。不过，共有财产已经把私有老板吓死了。这样跟民营老板谈话只能鼓励他们快点移民国外。

共产主义的等级制是以财产社会所有或公有为基础的。等级制就是权力分配制度：权力决定一切。私有老板没有权力就只能购买权力，否则他们的营业执照都没有。所以，私有老板是权力的奴隶。共产主义里面的私有老板是等级制外的尿壶，但私有老板常常得意忘形地以为他们有自己的产权。一旦私有老板搞定了官员（权力），他们就以为自己拥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官员（权力）也是等级制的奴隶，他们可以被随时随地撤职、判刑、坐牢、砍头。中国商人几千年都活在君主制、庇护制、等级制之下，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里有一个离开权力的私人 business dynasty 吗？没有。范蠡也逃跑去当陶朱公。中国企业的生产函数是：F(物资资本、人力资本、政治权

---

界的最高奖。

<sup>132</sup>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sup>133</sup> 引自《民营经济和民企如何发展壮大，“两个毫不动摇”再定调！》，百度百家号，金台资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6162667290641730&wfr=spider&for=pc>。

力)。民营老板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怎么生产？马云他们这些红顶商人应该知道美国左派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管怎样，经济学的第一原则是私有产权。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学经济学，我们继续研究资本主义私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主义是另外一种理论和实践。永远记住：共产主义不需要经济学。

## 私有化是中国学术和文明发展的基础

董辅弼、邹恒甫和杨小凯在 1983 年就主张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这是武大学派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大贡献。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现在我提出，私有化中国公有制经济才是真正的经济改革开放，并且这一过程将给中国政治改革建立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点，我们无法跟美国私有经济竞争，中国经济也毫无希望超过美国。跟欧美国家的私有经济比较一下，今天的中国私有经济还完全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 economic power, military power, ideolog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 (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意识形态实力和政治实力)。全面建立私有产权制度是中国超过美国的第一条件。国有企业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的混合体，自由竞争和企业创新在国有经济里没有动力。

1990-91 年，杰弗里·萨克斯和世界银行支持波兰用休克疗法<sup>134</sup>私有化国有经济。我后来跟萨克斯他们一起在波兰、匈牙利、捷克、俄罗斯……搞休克疗法，大力提倡私有化国有经济。那些拿俄罗斯私有化失败说事的人怎么不看看波兰的私有化、捷克的私有化、匈牙利的私有化和罗马尼亚的私有化。我参加了东欧多个国家私有化的过程，俄罗斯的特务机构都没有变动呢。1994 年我还公开发表了《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最优动态模型》<sup>135</sup>。我的观点是董辅弼先生的观点一个飞跃：必须 privatize 国有经济体制。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就没有持续的动力。董辅弼老师看到我这篇论文非常兴奋，高度表扬我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可操作模型。Jeffrey Sachs 也没有搞出来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模型啊！我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来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动态模型是变分法在各种条件下的应用。大家不要眼高手低：尤其是求最优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年限（终点时间是内生变量）。我的绝大部分学生根本没有把变分法的各种应用搞懂，更不用说用

<sup>134</sup> “休克疗法 (shock therapy)” 这一医学术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而得名。萨克斯《波兰跳进（资本主义和民主）市场经济》一书的介绍见附录 1.4.2。

<sup>135</sup> Zou, Heng-fu, 1994, *On the dynamics of privatiz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5(2), pages 221-233.

这些方法写自己的论文。有人说“历史早已证明只有私有制国家才可能长期稳定发展，原因有三个，私有才有动力，私有才会尊重，私有才有创新。”你把这三点数学模型化一下，论文可以发表在我主编的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第一个 SSCI 期刊）。

中国国有企业更关心政治权力，它们几乎没有创新动力。为了让私有企业家创新，我们必须把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写进中国宪法。如果一个人真有重大发明和创新，他会把他的创新无偿贡献给公有制经济吗？不可能，因为他可以去美国建立一个私人王国或私人王朝（借用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表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还需要我来讲？除此之外，美国已经声明俄罗斯不是市场经济。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中国是不是私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大问题。我们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私有、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必须在 WTO 保持主动性，国企产品不符合 WTO 的自由贸易规则，还做大做强国企干什么？国家搞企业当然会受到 WTO 指责。我一直说要私有化国企，不要给欧美国家任何借口。

厉以宁和吴敬琏都没有提出 *privatize*（私有化）国有经济，张维迎和钱颖一更不敢提 *privatize* 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这些人提发展民营经济有什么意义？难道民营经济只能搞餐饮、外卖、回收破烂？如果中国不私有化影响国计民生的垄断或寡头国有企业，现在新兴私有企业能在哪些行业发展？1980 年代，中国还有许多种自己的可乐（如人参可乐、天府可乐）都在跟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竞争。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中国只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了？全世界的新冠疫苗和新冠药竞争会不会出现可乐竞争的结果？现在我们不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就不可能让中国经济有新的生机，中国就没有世界上的百年和千年私人名牌产品。因为私人经济一直没有在中国真正重要的行业里发挥作用。更有意义的一点：不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就不能给私人企业的产权保护任何希望，而现在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官商勾结的公有制企业。

中国必须实现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否则，中国太难跟上美国私人企业创新。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搞不过美国，就是因为美国私人企业创新太厉害了，尤其是美国私人军工企业。美国私人军火生产商来自全世界的订单太大，美国自己都开始练钢铁了呢。美国经济根本不可能萧条，因为军火生产就可以带动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后几十年又是世界军备竞赛的年代。遗憾啊，全世界军备竞赛的钱本来可以用来扶贫。苏联就是跟美国搞军备竞赛拖垮了，愿中国不要跟美国搞军备竞赛，太浪费资源。“这一点我同意。今天中国经济风火火的是私人经济。互联网行业、华为、吉利汽车……中国电信、移动挣了



那么多钱，还是不知道干了啥、创造了啥？美国电话公司挣了那么多钱，其贝尔实验室搞出来那么多发明。”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还担心这些天来的美国硅谷银行和其它银行的风险或倒闭<sup>136</sup>。美国是资本主义自由国家，美国银行危机或经济危机本来应该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正常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政府状态。我在美国四十年从来没有感到美国有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而我在中国反而感到中国通货膨胀严重。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波动是美国人最享受的，因为各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较量和对抗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是美国的立国基础。

中国教育也需要私有化。我一开始在武汉大学引进当代高级经济学，接下来就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我 2006 年本来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也办班了。所以我非常明白，教育私有化是中国学术和文明发展的基础。大学教育私有化就更好了，这样复旦、武大、中大立即超过北大和清华，北方的读书种子太少了。中国教育不需要以北大清华为核心，我在中国只是利用北大普及当代高级经济学。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模式总是要搞一个中心，我们的国家也必须是中国（Central Kingdom），这是作茧自缚。中国十四亿人，需要建立二十个哈佛大学。

现在学术会议就是加微信、吃饭、旅游；然后邀请期刊主编、副主编和编辑作报告，聘请他们担任特聘教授和学术顾问；然后每年给他们每个人几万到十几万。没过多久主动邀请的大学学院领导或者关系活络的人就有论文发在相应的期刊上。学术界搞得斯文扫地，乌烟瘴气。教师们搞得像要饭的乞丐。现在国外期刊的主编和副主编也被邀请到中国来了：中外共同建设学术腐败共同体。Dixit 说过（大意）：“学术会议一年最多开两次。你不开会专搞学问，到时候别人会来给你专门开一个会。”现在国内开会更邪门了：各大期刊主编编辑们都来参会，公开搞后门关系腐败。此风太盛，可耻可悲啊！

国内学风最坏的就是搞学霸山头。全国的院士和资深教授一定要在六十岁后全部被停止申请科研经费、停止带学生、停止参加所有评审会……“现在评一个院士，拉票大概 2000 万。”全校动员去帮校长评上院士。流氓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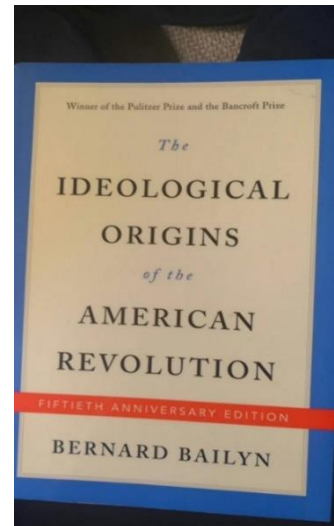
目前中国教育行政化也太厉害，Brainwashing（洗脑）的土地上哪里能像美国产生无数新思想？钱颖一《大学教育》鸡零狗碎有五卷之多，而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英美宪政教育他都没有提及。钱颖一比中国共产党 1946 年的大学教育理念差十万八千里。中国共产党在 1946 年 2 月 6 日《新华日报》社论抨击中国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提出了充满现代意识的主张：

---

<sup>136</sup> 指的是 2023 年 3 月 8 日，美国第 16 大银行硅谷银行宣布破产。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制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

右图是哈佛历史学家论美国革命超级有名的书。在中国，我们用国家发的教科书：那怎么可能看到独立的学术争论呢？美国没有国家编的教科书。《剑桥古代史》现在我们中国人才翻译出版，又落后了四十年。中文哪里能跟上国际学术？大家还是好好学外文吧。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剑桥中国史是我们必备的工具书。我多少年来就有英文版本。有了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我们才能去听其他人胡乱侃历史和《货币战争》。文一的历史是 total bullshit，而国内居然有人还听他讲中国奇迹和欧美历史。



刘道玉老校长说出了教育的根本。“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自由是人生来俱有的，是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个人或集体保持创造性活力的先决条件。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当今教育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教育缺失自由密切相关。总览我国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

首先，以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机器完全不同，造机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需要自由的环境，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天才或是大师，都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赋予他们创造性的各种素质，使他们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性的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其日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我们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任何约束、管制和干预，都只能扼杀创造性，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

李稻葵更是刻意扭曲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像林毅夫对着芝加哥学派胡闹昏闹。美国私立大学才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点更值得中国学习。美国教育部除了联邦补助外什么事都不干。美国是各个州立大学竞争，各个私立大学竞争。中国如此集中管理大学，中国的好大学根本赶不上美国的好大学。世界上有几个著名的高等研究院，普林斯顿小镇里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高等研究院是最有名的。这个高等研究院跟普林斯顿大学是完全独立的，绝大多数人搞不清楚这一点。我们中国最近十年成立了不知道多少高等（高级）研究院，可惜都是养老摸钱侮辱科学的高等（高级）研究院。最好的研究人才必然集中在最好的学术制度体系里：美国。我们国内搞研究的远不如当官的，谁在真正做最好的研究？如果他/她能做出最好的研究，他/她早跑去美国了。

其实除了权力不能私有化。其它一切（特别是财产、企业、学校、医院）都可以私有化。军队都可以私有化（看看俄罗斯雇佣的瓦格纳私人军队）。私有化一切（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Rothbard, *For a New Liberty: Libertarian Manifesto*<sup>137</sup> 此书一直没有中文版，遗憾。第二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 David Friedman 的著名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sup>138</sup> 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他们喊市场经济，他们在中国就不敢喊私有化一切。欧洲的法庭、仲裁、道路、医院、救火队……本来就是私有产物。看了这些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书，大家看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他们的东西就味同嚼蜡。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看中国人写的经济学文章和抄袭的著作。

<sup>137</sup> *For a New Liberty: 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 Murray N. Rothbard and Murray Rothbard,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1.

<sup>138</sup> 国内引入的大卫·弗里德曼的作品只有《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编者并不清楚是哪一本。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非常清楚：一般均衡的最优资源配置通过私有制和完全竞争市场来实现。为什么中国不通过私有制和完全竞争市场来实现一般均衡的最优资源配置？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用低效率的、corrupted（腐败的）公有制来进行非优化的资源配置？

我对中国 private economy（私有经济）没有寄托任何希望。中国的确是牢固的马列（公有制）国家。马列社会拥有国有制经济力量、国有制军事力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力量。来看看布鲁斯·迪克森的观点，他在《Wealth into Power》<sup>139</sup>里否认了经济发展会导致中国政治变革，或者说中国私营企业家正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实际上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合作伙伴，在维持政治现状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共产党将中国资本家纳入政治体系，利用党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利益、个人关系和共同观点创造了一种“裙带共产主义”，与其说中国企业家是变革的潜在推动者，不如说他们可能是支持中共议程的关键力量。

## 私有产权的前提是持枪权与民兵制度

私有产权和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可分割，没有持枪权就没有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公民的持枪权利与公民的财产权（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不可分割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1640-1688年英国革命的根本就是平民通过拥有武器保护私有财产、全面限制王权，最后让英国国王统而不治。私有武器和私有财产（包括生命、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看吴敬琏、张维迎、钱颖一……他们谈市场、产权头头是道。谁保护私有产权？他们都不谈如何保护私有产权。一个人没有私有财产，他怎么活？他没有武器，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警察保护他？警察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政府保护他？政府是谁？“邹恒甫，你胡说！美国也有公民不持有武器，他们一样有私有产权。”恒甫回答：“那是美国持有武器的公民在保护那些不持有武器的公民的财产权啊，我可爱而无知的好朋友。没有全面的私有武器持有权，美国政府利用常备军早把美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收归国有了。秦始皇都知道这样干，美国总统还比秦始皇愚蠢？！”

每个公民持有武器不容易被很多人接受，但人人都认为每个国家必须持有武器。这难道不是一种矛盾心态？罗马共和国公民的私有产权和公民的武器持有权紧密相连。美国公民的私有产权和公民的武器持有权紧密相连。瑞士、以色列、芬兰……都是如此。没有武器持有权就没有私有产权啊。看看美国人的

<sup>139</sup> *Wealth into Power*, Bruce J. Dick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持枪权利是如何得到美国宪法保证的。尽管从美国历史来看，反联邦党人最终败下阵来，但是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的反驳却得到了几乎所有州的响应，他们建议修正宪法，废除或者限制常备军，禁止军队驻扎民房，限制联邦对于州的权力或者保证州的权力，这就促成了《权利法案》的产生。《权利法案》<sup>140</sup>中，涉及军事的主要是第二修正案和第三修正案，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真正立法意图在于通过赋予人民携带武器权，防止常备军危害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也为民兵的军事制衡提供最后一道防线。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二条（Amendment II）：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宪法第三修正案将驻军问题分为“平时”和“战时”两种情况。在平时状态下，无战争发生，军队只是一种防卫的力量，按照宪法的规定，国会不得调用州的民兵，同样，民宅也禁止被占用。即使在战争状态下，通过驻军的方式对民宅的占用也不是随意能进行的，为了防止行政机关领导下的指挥官滥用职权，对民宅的征用必须经过国会的立法授权。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冰岛、丹麦、芬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塞尔维亚、捷克、以色列、哥伦比亚、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南非、摩纳哥、阿根廷、挪威、墨西哥、巴西、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三十多个国家都允许公民持枪。美国宪法保证了美国人的持枪权利，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在家后院里放上核武器？

禁枪当然没有用。加州最近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两个华人开枪杀死十八个华人，在共产主义加州，中国移民杀死七个中国移民，中国国家媒体都不详细报道是华裔。美国共产主义的州禁枪严厉，但是这些州的凶杀死人数量远超过禁枪的红脖子州。另外，统计回归分析根本不能证明是枪多引起犯罪多，还是犯罪多引起枪多。这再次证明统计回归没有丝毫价值。“美国加州（California）洛杉矶县蒙市（即蒙特雷公园，Monterey Park）舞星大舞厅 1 月 21 日厅发生枪击案，10 死 10 伤。72 岁姓名译为陈友勤（Huu Can Tran）的亚裔男子在警方追捕下自轰身亡。他的前妻称，陈男个性不暴力但易怒。案发在 21 日晚上约 10 时，陈男闯进蒙市舞星大舞厅（Star Ballroom Dance Studio）开枪扫射，造成 11 死 9 伤的惨剧。约 17 分钟后，他持枪来到阿尔汉布拉（Alhambra）一间名为 Lai Lai Ballroom & Studio 的舞厅，所幸有人夺去他手上枪枝才没造成伤亡。他之后逃离现场。陈友勤在逃避警方追捕期间，

---

<sup>140</sup> The Bill of Rights（美国），即《权利法案》，又译《人权法案》，指的是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由詹姆斯·麦迪逊起草，1791 年 12 月 15 日，获得通过。

在一辆他用来逃走的白色货车中自戕身亡。”<sup>141</sup> “据警方消息，凶嫌在加州半月湾 (Half Moon Bay) 的山菇农场 (Mountain Mushroom Farm) 和莱斯运土农场 (Rice Trucking-Soil Farm) 连续开枪，造成 7 人死亡，3 人重伤。圣马特奥县 (San Mateo County) 警方称，已有一名嫌犯落网。犯罪嫌疑人，被确认是 67 岁的半月湾居民赵春利 (Zhao Chunli, 音译)，该嫌犯于下午 4 时 40 分左右被拘留。警方说，嫌犯被发现在半月湾变电站停车场的车里。他被顺利拘留，并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件武器。半月湾市议员黛比拉多克说，受害者是中国农场工人。枪击动机正在调查中。没有立即获得更多信息。”加州民主党不让人人持枪上街才如此啊。德克萨斯州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如果在德州，每一个参加舞会的人都有枪，杀人凶手一下子就被其他人杀了。美国的优势是共产主义加州和纽约州（外加其它民主党主导的州）跟资本主义的红脖子州自由竞争，这种现代史是世界景观。加州和纽约州的共产主义先进啊：守法的人都不持枪，他们让不守法的人都持枪，他们自己等死。美国必须让每一个人都二十四小时持枪，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加州和纽约州民主党胡搞。有这一教训后，今后在加州开舞会可以雇佣一个世界一流射击手。我们中国老人在国内喜欢在公园和广场跳舞，闹死人。我在美国四十年，最近几天才知道美国老华人也喜欢聚在一起跳舞。三年来，总是华人被黑人或白人打骂。洛杉矶惊天枪击案中，凶手是华人，这个七十二岁华人一下子改变了华人的风貌。这下子我才知道美籍华人也是敢于杀自己人的。我以前一看中国历史就不舒服，因为中国历史上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能够合法持枪会怎么样，有人说合法持枪确实是一种很高的权利，不过得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道德素质，行为修养达到一定水准才行，如果在中国能够合法持枪的话，估计会很乱。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不知道 rule of law (法治) 啊！美国人做得很好，美国人持有四亿多枝枪（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武器），枪击案是小概率事件。不过黑人作为美国高贵种族还需要很多年练习互相射击和对其它种族射击，看看非洲就可以原谅美国黑人练习射击比赛了。我觉得下面这句话说的很对：中国人要是人人有枪，至少说话办事都会客气点，打官腔的更会收敛点。人与人之间也不会那么戾气。引用一位好友培宏的评价“暴力资源均衡，是维持平等关系的理性前提。一个彪形大汉，相对于一个弱小女子，拥有垄断性优势的暴力资源，他们要保持关系上的平等，只能依赖彪形大汉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善意，如果没有足够的善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欺凌型的。中国女性，数千年来一直处于被男性欺凌剥削的处境中，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这位弱女子有了一把枪，双

<sup>141</sup> 《加州华人舞厅枪击案：“因情感纠纷而非仇恨亚裔”，侨领呼吁关注亚裔老人心理，美国开年日均 1.6 起枪击事件》，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955410819157896&wfr=spider&for=pc>。

方都有了一把枪，咱们好好说话，好好谈。那么，枪是什么呢？枪就是现代文明啊。”

美国人普遍持有武器，这培养了美国人的尚武精神，真是全民皆兵，美国和以色列联手轰平伊朗是几分钟的事。自由民主国家公民人人都持枪，乌克兰每家没有机关枪和冲锋枪？这是多么重要的公民权利啊：如果俄罗斯入侵美国，美国普通家庭合法的枪支武器有四亿多，更不用说多少亿非法的枪支。俄罗斯军队拿美国人怎么办？美国政府当然希望也美国人民不持枪，让人民当奴才。中国人习惯了缴枪不杀，我们中国人七十多年来根本不是铁血民族。在中国，秦始皇把所有人的武器没收，把奴才们的武器都收起来铸造“金”人，中国人就全部失去了自由，秦始皇给所有消灭人民自由的人树立了榜样。中国人当了slaves 两千多年醒不过来。黄俄们怎么不去打乌克兰？打乌克兰就是打美国啊，二十万满族人就是如此奴役亿万汉人，更无一人是男儿。秦始皇收了我们中国人的武器后，我们奴化了，我们这些奴才还骂美国人持有武器。资产阶级专政的美国都有人人持有武器的权利和私有产权。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是十四亿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十四亿人民更应该有人人都持有武器的权利和私有产权。

共和经济学里的军事理论是民兵：全民皆兵。美国宪法《人民权利修正案》第二条：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是斯巴达共和主义、雅典共和主义、罗马共和主义、佛罗伦萨共和主义、日内瓦共和主义和美利坚共和主义的共同点之一。共和国公民自古必须带上自己的武器上战场。民兵是共和国的正常武装。常备军往往是政府镇压人民的工具。

共和国里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我们持有武器保家卫国。在罗马共和国，贵族和平民都是民兵（持有武器），最富有的公民站在罗马军队的最前排。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就提出，要建立共和制度，必须使用民兵，而不能使用不可靠的募兵，古典共和国的定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人人持枪当民兵，不能让国家有常备军，很多人根本没有读马基雅维利。对马基雅维利来说，Savonarola is a prophet without arms（没有武器的先知只能灭亡）。因为马基雅维利崇拜的 Moses, Cyrus, Theseus, and Romulus（摩西，居鲁士，忒修斯和罗穆卢斯<sup>142</sup>）就是如此建立帝国的。当然，后来的罗马共和国、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建立自由、法治、产权的。民兵（产权和持有武器权的结合）是马基雅维利共和国理论的核心。罗马共和国晚期才出现常备军。常备军的私有化（如效忠于苏拉、庞培、恺撒个人的常备军）是罗马共和国灭亡的最重要原因。“马基雅维利列举了许多雇佣兵背叛雇主的例子。这一切都始于神圣罗马

<sup>142</sup> 他们分别是以色列国、波斯帝国、雅典共和国、罗马的建立者。

帝国在意大利失去权力，教皇获得权力。市民拿起武器反抗贵族，教皇也鼓励他们。因为市民和教皇都不知道如何作战，他们雇佣了雇佣兵。不久，雇佣兵就指挥了意大利的每一支军队。这些雇佣军采取的策略使他们逃避艰苦的工作和危险，这导致了意大利的毁灭和耻辱。如果摩西、居鲁士、忒修斯和罗穆卢斯没有武装，他们就不能长久地执行他们的宪法，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在弗拉·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身上的事一样，他的新秩序立即使他破产，群众不再相信他，他没有办法使那些相信他的人坚定，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相信他的人相信他。因此，像这样的人在完成他们的事业时有很大的困难。”

马基雅维利说：保持 Virtu（包括尚武精神）的最好办法是全面皆兵的公民民兵制（*militia*），他强调每个公民持有武器。斯巴达共和国八百年和罗马共和国五百年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公民士兵为自己的自由、生命和财产而战斗。看看斯巴达共和国的公民士兵、雅典共和国的公民士兵和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士兵吧。波斯士兵是国王的奴隶啊，再多也是废物。十五至十六世纪的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第二罗马共和国美国的民兵制一直保留到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才有常备军。（毛泽东当年也搞民兵制，除了巨大的常备军。）此后，美国独立战争依靠民兵取得胜利，使民兵概念和共和政权真正构成一个整体。“公民美德要求人们将公民目标置于个人欲望之上，并自愿为国家而战。因此，服兵役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分割的义务。正如罗阿诺克的约翰·伦道夫所说：“当公民和士兵成为同义词时，你就安全了。”斯科特(1984)指出，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对外国雇佣军的不信任导致了国家公民军队的概念，兵役的定义也从职业选择转变为公民义务。Herrera(2001)解释说，要理解美国内战前的军事特征，对自治的欣赏是必不可少的。服兵役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也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得我年轻的时代人人都是民兵，现在中国更应该全民皆兵。中国公民要好好理解马克思的民兵军事思想。马克思说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因为马基雅维利的民兵思想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巴黎公社全是民兵。中国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全是民兵。

没有全民皆兵，国家就成了霍布斯的利维坦。公民都愿意活在利维坦之下？自我防卫的正当权利都放弃，真是自愿为奴。自愿为奴的奴隶怎么可能建立共和国？你赞成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你又不愿意持枪。谁为你守护财产？政府？哪里有这样的政府？政府的军队和警察是国家铁腕的统治机器。军队和警察为什么镇压人民？因为这是国家的本质。公民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公民就没有产权、自由和法治。军队和警察为什么被国家控制了？因为民兵制被消灭



了。军事力量对个人来说就是保障自由的武器积累，共和经济学已经建立了私人所有的军事力量和私有经济增长的模型。<sup>143</sup>

台湾已经从义务兵转入募兵制，大陆名义上的义务兵，实际上也接近募兵制度。美国是募兵制度结合民兵制度。<sup>144</sup>如果我们是民兵制，公民的武装力量可以一个人持枪斗争，也可以组成团体持枪斗争（结社自由），美国三亿多民兵随时可以上战场。我们中国人想解放台湾久矣。我们要解放台湾的人自己扛枪炮去打台湾，没有人会阻挡。美国民兵制就是如此，根本用不着政府动员。几亿娘炮做题目、搞演出、讲哲学……丘成桐天天谈学数学误导十亿人。美国人哪里天天谈如何学数学？中国年轻人需要学习美国人和乌克兰人打仗，不要关心做题目啊！互相打仗才是人类必定的命运。过去一直打仗；现在一直打仗；今后更是一直打仗。人类是战争共同体！有听丘成桐谈数学的功夫，年轻人不如持枪上战场。再不行，年轻人也可以玩橄榄球、篮球、棒球、足球。

## 附录 1.1

**很多人不知道共和制的意思，还是看看 Paul Rahe 的另外四卷书：**

我知道国内搞历史的专家看书也不多，而且参考文献太少。我们一定要多读书。看看贾瑞雪她们做量化历史的论文，我都笑死了。用统计回归分析历史等于零，因为历史没有逻辑和规律，因为统计回归分析不是因果关系的科学验证。我佩服 Paul Rahe 的学问。Rahe 读 Rae，h 不发音。

Republics Ancient & Modern, Vol. 1: The Ancient Regime in Classical Greece  
August 12, 1994 by Paul A. Rahe

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 Volume II: New Modes and Orders in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August 12, 1994 by Paul A. Rahe

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 Volume III: Inventions of Prudence:  
Constituting the American Regime August 12, 1994 by Paul A. Rahe

Against Throne and Altar: Machiavelli and Political Theory Under the  
English Republic by Paul A. Rahe

<sup>143</sup> Gong, Liutang & Zou, Heng-fu, 2003, *Military spending and stochast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Elsevier, vol. 28(1), pages 153-170.

<sup>144</sup> 引自《大历史聊军制---募兵\义务兵\民兵究竟哪个更好!》，豆瓣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8083784/?i=676639380sRNqP>。

**其他的一些共和主义文献**

- Bailyn, Bernar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  
ISBN 0-674-44301-2
- Bailyn, Bernar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1966)
- Ellis, Joseph J. *American Creation: Triumphs and Tragedi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2007)
- Everdell, William R. *The End of Kings: A History of Republics and Republicans*, (2nd ed. 2000)
- Foner, Eric (1970).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 Hartz, Louis.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1952)
- Kramnick, Isaac.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1990)
- Herrera, Ricardo A. *For Liberty and the Republic: The American Citizen as Soldier, 1775 - 1861*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 J.G.A. Pocock, "Virtue and Commer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1 (1972), pp. 119 - 34.
- Pocock, J.G.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1975)
- Rakove, Jack N.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1997)
- Wood, Gordon S.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ow a Revolution Transformed a Monarchical Society into a Democratic One Unlike Any That Had Ever Existed*. (1992).
- Wood, Gordon S.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1969)。

## 附录 1.2.1

### 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的比较：

ROME VS. THE U. S. HOW MUCH HAS CHANGED?

#### THE ROMAN REPUBLIC

In many ways, the Roman Republic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organized today. There are three clear divisions of power, as you will see below.

#### EXECUTIVE BRANCH

Consuls: Elected by an assembly; ruled as chief executives for one year; controlled the military

#### LEGISLATIVE BRANCH

Senate: Consisted of 300 members; chosen by aristocrats and responsibl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financial policies

Centuriate Assembly: A group of citizen soldiers that were members for life; elected consuls and drafted/passed legislation

Tribal Assembly: Citizens put into groups depending on where they lived; members for life; elected tribunes

#### JUDICIAL BRANCH

Praetors: Eight judges chosen by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to serve for a year; two of the eight supervised civil court and criminal court

#### LEGAL CODE

The Twelve Tables was similar to the Bill of Rights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but it only protected free-born male citizens under the law.

#### CITIZENSHIP

Given to adult man landowners.

#### ONE MAJOR DIFFERENCE

Dictators: Appointed by consuls and elected by the Senate in a time of catastrophe; power lasted for six months

#### THE AMERICAN REPUBLIC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rrowed some of the elements of government from Rome, yet developed and added quite a few innovations. Unlike Rome, checks and balances came from the workings

of three areas of government: a President,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jobs of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military, could appoint ambassadors to conduct foreign policy, and could propose laws to the Legislative Branch; the Legislative Branch is bicameral, including both a Senate, whose members are elected for six year terms, and 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ose members are elected for two year terms. Both houses need to agree on a law before it is sent to the President for signature. Finally, they created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known as the Supreme Court whose job it was to ensure that laws passed by the Legislature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U.S. Constitution.

#### WHICH IS BETTER?

The Roman government, though advanced for its time, was wrought with corruption and instability. The Senate would usually have more power over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dependence among th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which tended to be heavily influenced by dominant political f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butes its power relatively evenly. Because each state has both local and national (federal) representatives, it helps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a way that Roman government did not. The American Republic is a lot more evolved and refined than that of Ancient Rome.

Modern republicanism distinguished from its classical counterpart by its commercial character and jealous distrust of those in power, by its use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and by its employment of a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 owes an immense debt to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England between 1649, when Charles I was executed, and 1660, when Charles II was crowned. Though abortive, this experiment left a legacy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articulated both by its champions, John Milton, Marchamont Nedham, and James Harrington, and by its sometime opponent and ultimate supporter, Thomas Hobbes. This volume examines these four thinkers, situates them with regard to the novel species of republicanism first championed in the early 1500s by Niccolò

Machiavelli, and examines the debt that he and they owed the Epicurean tradition in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crafted by the Arab philosophers Alfarabi, Avicenna, and Averroës.

## 附录 1.2.2

### 美利坚共和国 (American Republic) 对共和观念的阐述:

The values and ideals of republicanism are foundational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hibits granting titles of nobility, republicanism in this context does not refer to a political movement to abolish such a class, as it does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K, Australia, and Netherlands. Instead, it refers to the core values that citizenry in a republic have, or ought to have.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have described these central values as liberty and inalienable individual rights; recogniz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all authority in law; rejecting 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hereditary political power; virtue and faithfulness in the performance of civic duties; and vilification of corruption. These values are based on those of Ancient Greco-Roman, Renaissance, and English models and ideas. Articulat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particularly Thomas Jeffers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Adams), they formed the intellectual basis fo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the Constitution (1787), and the Bill of Rights (1791), as well as the Gettysburg Address (1863).

Politicians and scholars have debated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values with issues like honest government, democracy, individualism, property rights, military service; or their compatibility with slavery,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conomic self-interest, limits on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and national deb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republic is mentioned once, in section four of Article Four, where it is stated: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o every State in this Unio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have

used the term in their name —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 of Thomas Jefferson (1793 - 1824; also known as 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founded in 1854 and named after the Jeffersonian party).

### 兰克论美国共和主义对欧洲自由主义发展的影响：

Leopold von Ranke in 1848 claimed that American republicanism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liberalism:

By abandoning English constitutionalism and creating a new republic based on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the North Americans introduced a new force in the world. Ideas spread most rapidly when they have found adequate concrete expression. Thus republicanism entered our Romanic/Germanic world.... Up to this point, the conviction had prevailed in Europe that monarchy best served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Now the idea spread that the nation should govern itself. But only after a state had actually bee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did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is idea become clear. All later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have this same goal... This was the complete reversal of a principle. Until then, a king who ruled by the grace of God had been the center around which everything turned. Now the idea emerged that power should come from below....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like two opposite poles, and it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that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 world. In Europ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had not yet taken on concrete form; wi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 did.

## 附录 1.2.3

### 美利坚共和与德行/德性 (virtues) 之一：

The colonial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1760s and 1770s closely read history to compare government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of rule. The Revolutionists were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history of liberty in England and we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country party" (which opposed the "court party" that held power). Country party philosophy relied heavily on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of Roman heritage; it celebrated the ideals of duty and virtuous citizenship in a republic. It drew heavily on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and Roman republican examples, and virtue ethics, since Jefferson and others held that the success of a democratic-republic depended on virtuous citizens. The country party shared some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higgism as well as Tory critics in England which roundly denounced the corruption surrounding the "court party" in London centering on the royal court. This approach produced a political ideology Americans called "republicanism",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colonial America by 1775. "Republicanism was the distinctiv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entir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J.G.A. Pocock explained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in America:

The Whig canon and the neo-Harringtonians, John Milton, James Harrington and Sidney, Trenchard, Gordon and Bolingbroke, together with the Greek, Roman, and Renaissance masters of the tradition as far as Montesquieu, formed the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of this culture; and its values and concepts were those with which we have grown familiar: a civic and patriot ideal in which the personality was founded in property, perfected in citizenship but perpetually threatened by corruption; government figuring paradoxically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corruption and operating through such means as patronage, faction, standing armies (opposed to the ideal of the militia); established churches (opposed to the Puritan and deist modes of American relig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a monied interest - though the formulation of this last concept was somewhat hindered by the keen desire for readily available paper credit common in colonies of settlement.

### 美利坚共和与德行/德性 (virtue) 之二:

American republicanism was centered on limiting corruption and greed. Virtue wa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for citizens and representatives. Revolutionaries took a lesson from ancient Rome; they knew it wa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luxury that had destroyed the empire. A virtuous citizen was one who ignored monetary compensation and made a commitment to resist and eradicate corruption. The republic was sacred;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serve the state in a truly representative way, ignoring self-interest and individual will. Republicanism required the service of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own interests for a common good. According to Bernard Bailyn, "The preservation of liberty rested on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to maintain effective checks on wielders of power and hence in the last analysis rested on the vigilance and moral stamina of the people. ... " Virtuous citizens needed to be strong defenders of liberty and challenge the corruption and greed in government. The duty of the virtuous citizen became a foundation fo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ommitment of Patriots to republican values was a key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the key was Patriots' intense fear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the threat it posed to liberty. Bernard Bailyn states, "The fact that the ministerial conspiracy against liberty had risen from corruption wa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colonists." In 1768 to 1773 newspaper exposés such as John Dickinson's series of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1767 - 68) were widely reprinted and spread American disgust with British corruption. The patriot press provided emphasized British corruption, mismanagement, and tyranny. Britain was increasingly portrayed as corrupt and hostile and that of a threat to the very idea of democracy; a threat to the established liberties that colonists enjoyed and to colonial property right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liberty was thought by many to be corruption - not just in London but at home as well. The colonists associated it with luxury and, especially, inherited aristocracy, which they condemned. Historian J.G.A. Pocock argues that Republicanism explain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erms of virtuous Republican resistance to British imperial corruption.

Historian Sarah Purcell studied the sermons preached by the New England patriot clergy in 1774 - 1776. They stirred up a martial spirit justified war against England. The preachers cited New England's Puritan history in defense of freedom, blamed Britain's depravity and corruption for the necessity of armed conflict. The sermons called on soldiers to behave morally and in a "manly" disciplined fashion. The rhetoric not only encouraged heavy enlistment, but helped create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the Patriots needed to fight a civil war. Historian Thomas Kidd argues that during the Revolution active Christians linked their religion to republicanism. He states, "With the onset of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a major conceptual shift convinced Americans across the theological spectrum that God was raising up America for some special purpose."



Kidd further argues that "new blend of Christian and republican ideology led religious traditionalists to embrace wholesale the concept of republican virtue."

Historian Gordon Wood has tied the founding ideas to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Our beliefs in liberty, equality,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well-being of ordinary people came out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So too did our idea that we Americans are a special people with a special destiny to lead the world toward liberty and democracy." Americans were the protectors of liberty, they had a greater obligation and destiny to assert republican virtue. In Discourse of 1759 Jonathan Mayhew states "An absolute submission to our prince, or whether disobedience and resistance may not be justified able in some cases ... to all those who bear the title of rulers in common but only to those who actually perform the duty of rulers by exercising a reasonable and just authority for the good of human society." The notion that British rulers were not virtuous, nor exercising their authority for the "good of human society" prompted the colonial desire to protect and reestablish republican values in government. This need to protect virtue was a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美利坚共和与德行/德性 (virtue) 之三:

Virtue versus commerce (德性和商业)

The open question, as Pocock suggested,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economic interest (grounded in Lockean liberalism) and classical republicanism, troubled Americans. Jefferson and Madison roundly denounced the Federalists for creating a national bank as tending to corruption and monarchism; Alexander Hamilton staunchly defended his program, arguing that national economic strength wa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berty. Jefferson never relented but by 1815 Madison switched and announced in favor of a national bank, which he set up in 1816.

John Adams often pondered the issue of civic virtue. Writing Mercy Otis Warren in 1776, he agreed with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that, "Public Virtue cannot exist without private, and public Virtue is the only Foundation of Republics." Adams insisted, "There must be a positive Passion for the public good, the public Interest, Honor, Power, and Glory, establish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or there can be no Republican Government, nor any real Liberty. And this public Passion must be Superior to all private Passions. Men must be ready, they must pride themselves, and be happy to sacrifice their private Pleasures, Passions, and Interests, nay their private Friendships and dearest connections, when they Stand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Rights of society."

Adams worried that a businessman might have financial interests that conflicted with republican duty; indeed, he was especially suspicious of banks. He decided that history taught that "the Spirit of Commerce ... is incompatible with that purity of Heart, and Greatness of soul which is necessary for a happy Republic." But so much of that spirit of commerce had infected America. In New England, Adams noted, "even the Farmers and Tradesmen are addicted to Commerce." As a result, there was "a great Danger that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would be very factious and turbulent there."

#### 美利坚共和与德行/德性 (virtue) 之四:

尽管前面论述的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影响最大, 洛克的经典自由主义也对美国革命有影响。

A second stream of thought growing in significance was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of John Locke, including his the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Thi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volution as it implied the inborn right of the people to overthrow their leaders should those leaders betray the agreements implicit in the sovereign-follower relationship. Historians find little trace of Jean-Jacques Rousseau's influence in America. [35] In terms of writing state and national constitutions, the Americans used Montesquieu's analysis of the ideally "balanced" British Constitution. But first and last came a commitment to republicanism, as shown by many historians such as Bernard Bailyn and Gordon S. Wood.

For a century, historians have debated how important republicanism was to the Founding Fathers. The interpretation before 1960, following Progressive School historians such as Charles A. Beard, Vernon L. Parrington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 Sr., downplayed rhetoric as superficial and looked for economic motivations. Louis Hartz refined the position in the 1950s, arguing John Lock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because his property-oriented liberalism supported the materialistic goals of American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wo new schools emerged that emphasized the primacy of ideas as motivating forces in history (rather than material self-interest). Bernard Bailyn, Gordon Wood from Harvard formed the "Cambridge School";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St. Louis School" was led by J.G.A. Pocock. They emphasized slightl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publicanism. However, some scholars, especially Isaac Kramnick and the late Joyce Appleby, continue to emphasize Locke, arguing that Americans are fundamentally individualistic and not devoted to civic virtu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republicanism and liberalism remains a topic of strong debate among historian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ly active of the present day.

## 附录 1.2.4

**我个人喜爱的斯巴达共和国的历史（四卷），目前均无翻译：**

The Spartan Regime: Its Character, Origins and Grand Strategy by Paul Anthony Rahe • 2016

The Grand Strategy of Classical Sparta: The Persian Challenge (Yale Library of Military History) - March 28, 2017 by Paul Anthony Rahe

Sparta's First Attic War: The Grand Strategy of Classical Sparta, 478-446 B.C. (Yale Library of Military History) by Paul Anthony Rahe , Aug 6, 2019

Sparta's Second Attic War: The Grand Strategy of Classical Sparta, 446-418 B.C. (Yale Library of Military History) by Paul Anthony Rahe, Aug 4, 2020

**为斯巴达共和国辩护：**

The alt-right and other fanatics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re distorting history. Sparta can teach us how to rethink liberal democracy.

The city of Sparta isn't much to look at these days. A couple small ruins, some olive trees, and down below, the cold waters of the Eurotas River. Nothing half as flashy as the Parthenon.

Like their prized republic, admirers of ancient Sparta don't have nearly the same reputation they used to. It used to be the case that minds as distinguished as Rousseau's or Montesquieu's looked to Sparta for inspiration,

but lately interest in this peculiar, long-lived ancient Greek city is confined to the likes of anarcho-libertarian cranks, neo-fascist thugs, and fitness obsessives.

“The metastasis of Sparta worship in the ‘fake news’ age offers an object lesson in how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a people and a culture, pressing them into the service of hard-line political movements marked by racism, nationalism, and tyranny,” Myke Cole wrote last week in *The New Republic*, lamenting how a society that “ceased to be a real political force more than 2,100 years ago” had “come to hold such a widespread, and increasingly perniciou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re’s plenty to lament here, it’s true. These latter-day laconophiles (lovers of Sparta, that is) tend to exalt the cruellest, grittiest, and most violent aspects of Spartan life. They make virtues of the brutal training regimen forced upon young Spartans, of the city’s merciless repression of its surrounding population, of its anti-intellectual and hyper-martial mores.

It’s also true that we can find in Sparta’s history starker versions of the darker tendencies of our own society: militarism, intolerance of outsiders, indifference toward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At the same time, today’s laconophiles overlook characteristics of Spartan society that many of them would object to, including relative economic equality, cultural egalitarianism, and military restraint.

The Spartans are a strange case: They rejected anything resembling liberal democracy, abandoned commerce, industry, and trade, and by doing so, rose to preeminence in the Greek world and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for seven centuries—far longer than any modern republic.

It’s hard to know for sure, but our ancient sources suggest that the unique set of laws and customs that regulated Spartan behavior at home was the key to their longevity. Lycurgus, the founder of the Spartan regime, is said to have decreed that only iron bars would be accepted as currency. It became so difficult to make or accumulate money, since it had to be carted around in huge wheelbarrows, that citizens gave up on their desire to make a fortune and reconciled themselves to living on a largely materially equal basis to their fellow-citizens.

Lycurgus also had all the citizens eat together at common tables, in an

effort to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luxurious habits and to make sure private relationships, even familial ones, did not undermine the community. Another advantage of eating together was that the Spartans couldn't drink too much—otherwise they'd have trouble finding their way home in the dark.

#### 继续为斯巴达共和国辩护：

Women also played a more conspicuous role in Spartan life than elsewhere in ancient Greece (although that is not saying very much). Spartan women went through the same training as men, and mothers were seen as a mainstay of civic virtue. In Athens,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famous Funeral Oration, the orator Pericles gallingly told Athenian women that the best thing they could do for the city was stay home and out of the public eye.

Sparta preserved its regional dominance more by restraint than by hunger for conquest. Thucydides' s history portrays the Spartans as reluctant to go to war and often more merciful than their more liberal-minded opponents, the Athenians. It's no insignificant fact that when Sparta won the bloody Peloponnesian War, it spared a defeated Athens from the violent reprisals that Athens itself often meted out to cities it defeated.

Plutarch tells us that in Sparta, those who were free—that is, the citizens—were freer than peopl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o our ears that sounds strange. Even the Spartan citizens, who were greatly outnumbered by the enslaved helots and noncitizen residents (the *perioikoi*, or “people who live around here”), had constant duties imposed on them—whether fighting in a war, or training young Spartans, or getting beaten up for stepping out of line. How could they be called free?

Benjamin Constant, a Swiss-French liberal thinker writing at the st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one answer.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freedom: one ancient, one modern. Modern freedom put a premium on rights—that is, assurances that people would not be prevented from associating freely, from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from acquiring property and using it as they wished. It entailed putting limits on politics that would restrain both tyrants and tyrannical majorities.

Ancient liberty, on the other hand, was unabashedly majoritarian. It was not individual but communal. To be free in an ancient sense w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the city on equal terms with others, and have a say in public

debate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results of which would bind everyone. This Spartan kind of freedom was active, not passive. It made no promises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It had no concept of a private sphere of rights—but it was freedom nonetheless.

Constant wanted to argue that this communal form of freedom was simply disagreeable for modern people, who demand different things from their governments, and crave the luxury that only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 capitalist system can provid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e claimed,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misguided effort to force this austere ancient form of communal liberty on a modern people too accustomed to nice things. Drunk on the praise Rousseau had heaped on Sparta, the bloodthirsty revolutionaries went to any length to make the French wear togas—but it was never going to work.

This charge stuck.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Sparta became stigmatized as the favorite city of illiberals, and Athens became the ancient republic par excelle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thinkers like J.S. Mill and George Grote worked to reimagine tumultuous Athens as a forerunner to the placid, liberal Victorian commonwealth. Sparta had its revenge, in a wa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scism and communism found the modern form of individual liberty lacking, and sought to reinject community — albeit in monstrous, immoderate ways that trampled on liberty.

Luckily for us, liberalism won the ensuing conflict. But we ought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Constant di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row Sparta on the dust heap of history. Something in human nature craves more than a sphere of rights, more than promises of nice things and free association. One need neither equate nor endorse the ris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on the left and of nationalism on the right to observe that each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that people crave more than individual liberty, full stop. People want activ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a community, too, and our politics ought to answer to that. While we should beware the Sparta myth, we would also do well to emulate the best that culture had to offer.

斯巴达和英格兰共和国的关系可以参考：<http://t.cn/A6COP1nR>

（记住：克伦威尔时期，英国也实验了没有国王的共和。克伦威尔的 dictatorship 让英国人对没克伦威尔的共和失望了。）

## 附录 1.2.5

我的哈佛老师、美国人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天天批判美国，我们中国人敢天天批评中国？萨克斯天天在美国骂美国，这是美国宪法给萨克斯的权利。我们在中国也只能天天骂美国。他对我帮助特别多：他最赞成我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博士论文，他给世界银行研究部推荐我当研究员，他带我一起把波兰从社会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制度，他和我一起在非洲扶贫……

看看萨克斯是多么卖力地给中国人说话。他是国际主义者，他不像我们中国人都搞民族主义。作为美国人，他为什么天天骂美国？美国人根本没有骂萨克斯为美奸。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马来西亚《星报》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与中国展开良好合作，而不是强迫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做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在抗疫方面，全球金融体系偏爱富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太少。全球对疫情的反应完全不够，主要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未能与中国展开合作，这是很可悲的，因为中国抗击疫情的表现非常出色，世界各国本可以从中国的举措中学到很多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此外，美国的社会文化把个人置于社会公益之上，在自由的名义下，没有人遵守基本规则，这是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之一。美国应该学习一些与中国合作的良好礼仪。”<sup>145</sup>在雅典民主论坛上，萨克斯说到：“相比西方，中俄两国有不同的一套话语叙事体系。这两个国家的叙事体系各自值得借鉴之处，不同的叙事是为了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压根不愿意与中国对话，更不愿同俄罗斯领导人握手示意。美国政客只会对中俄两国指指点点和厉声埋怨。萨克斯表示，如果英美能和中俄坐下来好好谈，是可以达成某些合作的。萨克斯称，美国是一个半民主、白人主导的等级制度下充满种族主义的国家，其使命是维护统治精英的特权，这就是美国创立的初衷。尽管美国比过去确实更多元化了，但今天这个国家还是刚建国时的老样子。一个奴隶制、实行种族灭绝的国家，为了白人文化而杀害美洲原住民。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如今仍然如此。”

大家猜猜萨克斯为什么要如此宣传中国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请看欧美国怎样批判萨克斯，那么多美国人攻击杰弗里-萨克斯的宣传，他只好放弃他的推特账号。他只能吃中国，他不能吃美国。

---

<sup>145</sup> 《<柳叶刀>点名批评美国：中国做得很出色，美国才是可悲的一方》，百家号，南方大观察，[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5683541360076790189&sourceFrom=share](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5683541360076790189&sourceFrom=share)。

Sachs is a peddler of anti-American talking point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e's prai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gued that there is no Uyghur genocide, and blamed NATO for instigat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t's all bad, and it gets worse. A few months ago, Sachs announced that he's "pretty convinced" that the US is to blame for creating COVID. Apparently, the bug emerged from NIH research with Anthony Fauci as the mastermind. According to Sachs, the U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re colluding to bury wh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of the generation. And like Sachs's other controversial opinions, it strongly echoes Chinese propaganda.

Sachs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and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H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his views on economics, COVID-19, and his advocac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up>146</sup>

《Jeffrey Sachs: Propagandist? - The Globalist》One does not need to be a hardliner on China, just a global realist, to see that there is<sup>147</sup>.

## 附录 1.3.1

### 诺克与巴克代表作的介绍：

*Our Enemy, the State* is the best-known book by libertarian author Albert Jay Nock, serving as a fundamental influence for the modern libertarian and American conservatism movements. Initially presented as a series of lectures at Bard College, it was published in 1935, and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reedom, as well as questioning the nature and legitimacy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Nock differentiates between that, which he refers to as "the State" (as described by Franz Oppenheimer in his book *The State*) and "legitimate" government, including governing oneself or consensual delegation of decision-making to leaders one selects.

---

<sup>146</sup> 《Jeffrey Sachs》，维基百科，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Jeffrey\\_Sachs?continueFlag=97da1d8cf844333ce468d7478355837e](https://en.m.wikipedia.org/wiki/Jeffrey_Sachs?continueFlag=97da1d8cf844333ce468d7478355837e)。

<sup>147</sup> 《Jeffrey Sachs: Propagandist? - The Globalist》，全球主义者网站，<https://www.theglobalist.com/jeffrey-sachs-xi-jinping-china-united-states-propaganda/?continueFlag=97da1d8cf844333ce468d7478355837e>。



*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is a 1951 book by William F. Buckley Jr., based on his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s at Yale University. Buckley, then aged 25, criticized Yale for forcing collectivist, Keynesian, and secularist ideology on students, criticizing several professors by name, arguing that they tried to break down students' religious beliefs through their hostility to religion and that Yale was denying its students any sense of individualism by making them embrace the ideas of liberalism. Buckley argued that the Yale charter assigns oversight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ity to the alumni, and that because most alumni of Yale believed in God, Yale was failing to serve its "masters" by teaching course content in a matter inconsistent with alumni beliefs. Buckley eventually became a leading voice in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附录 1.3.2

### 以赛亚·柏林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积极自由的滥用的批判:

Isaiah Berlin notes that historically positive liberty has proven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rhetorical abuse; especially from the 18th century onwards, it has either been paternalistically re-drawn from the third-person, or confl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liberty and thus disguised underlying value-conflicts.

Berlin contende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lato, Aristotle, Jean-Jacques Rousseau, Immanuel Kant, and G. W. F. Hegel, modern political thinkers often conflated positive liberty with rational action, based upon a rational knowledge to which, it is argued, only a certain elite or social group has access. This rationalist conflation was open to political abuses, which encroached on negative liberty, when such interpretations of positive liberty we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sed to defend nationalism, paternalism, social engineering, historic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 control over human destiny. Berlin argued that, following this line of thought, demands for freedom paradoxically could become demands for forms of

collective control and discipline—those deemed necessary for the “self-mastery” or “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classes, democratic communities, and even humanity as a whole. There is thus an elective affinity, for Berlin, between positive liberty, when it is rhetorically conflated with goals imposed from the third-person that the individual is told they “should” rationally desire, an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political totalitarianism, which contrary to value-pluralism, presupposed that values exist in Pythagorean harmony.

### 附录 1.3.3

**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此书还专门批判了把哈耶克自由主义和斯特劳斯保守主义综合起来的企图，从犹太人的角度最能理解 national conservatism：美国要像以色列那样保持美国的清教徒信仰和英语（不能用西班牙语）。

The idea that American conservatism is identical to “classical” liberalism—widely held since the 1960s—is seriously mistaken.

The award-winning political theorist Yoram Hazony argues that the best hope for Western democracy is a return to the empiricist, religious, and nationalist traditions of America and Britain—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s that brought greatness to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and became the model for national freedom for the entire world.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 explains how Anglo-American conservatism became a distinctive alternative to divine-right monarchy, Puritan theocracy, and liberal revolution. After tracing the tradition from the Wars of the Roses to Burke and across the Atlantic to the American Federalists and Lincoln, Hazony describes the rise and fall of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present-day debates between neoconservatives and national conservatives over how to respond to liberalism and the woke left.

Going where no political thinker has gone in decades, Hazony provides a fresh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ervatism. Rejecting the liberalism of Hayek, Strauss, and the “fusionists” of the 1960s, and drawing on decade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he argues that a revival of authentic Anglo-American conservatism is possib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附录 1.3.4

#### 关于综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些研究：

《The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al Order》 takes particular aim at partisans of “pure democracy,” who have transformed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into an unreflective dogma. By reducing liberty to a vague affirmation of equality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Mahoney shows, such partisans undermine those “contents of life” — religion, patriot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family and social life—that enrich human existence and give purpose to human freedom. What we need instead is a conservative-minded liberalism.

Calling on the wisdom of Winston Churchill, Edmund Burke, Alexis de Tocqueville, Aleksandr Solzhenitsyn, Raymond Aron, and other exemplary leaders and thinkers, Mahoney addresses a wide range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liber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e brilliantly analyzes the task of the democratic statesman; the need for prudence, sobriety, and civic courage in confronting the totalitarian enemies of the West; the ties that bind religion and democratic liberty; democracy’s tendency to squander its own inheritance in frenzied efforts to establish a human order that is more and more “democratic”; the follies of the postmodern “culture of repudiation”; the reasons so many intellectuals indulge totalitarianism and terrorism; and much more.

Rejecting the dual temptations of utopianism and despair, Mahoney defends self-government—properly understood—against both democracy’s enemies and its all-too-numerous “immoderate friends.” The Conserv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al Order upholds the rich civilized inheritance that allows human beings to lead free and decent lives together.

## 附录 1.4.1

### 私有产权水平评价标准：

The property rights component is an assessment of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accumulate private property, secured by clear laws that are fully enforced by the state. It measures the degree to which a country's laws protect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its government enforces those laws. It also assesses the likelihood that private property will be expropriated and analyz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existence of corruption within the judiciary, and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to enforce contracts.

100—Private property is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system enforces contract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The justice system punishes those who unlawfully confiscate private property. There is no corruption or expropriation.

90—Private property is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system enforces contracts efficiently. The justice system punishes those who unlawfully confiscate private property. Corruption is nearly nonexistent, and expropriation is highly unlikely.

80—Private property is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system enforces contracts efficiently but with some delays. Corruption is minimal, and expropriation is highly unlikely.

70—Private property is guarante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system is subject to delays and is lax in enforcing contracts. Corruption is possible but rare, and expropriation is unlikely.

60—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s lax and subject to delays. Corruption is possible but rare, and the judiciary may be influenced by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is unlikely.

50—The court system is inefficient and subject to delays. Corruption may be present, and the judiciary may be influenced by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is possible but rare.

40—The court system is highly inefficient, and delays are so long that they deter the use of the court system. Corruption is

present, and the judiciary is influenced by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is possible.

30—Property ownership is weakly protected. The court system is highly inefficient. Corruption is extensive, and the judiciary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other branches of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is possible.

20—Private property is weakly protected. The court system is so inefficient and corrupt that outside settlement and arbitration is the norm. Property rights are difficult to enforce. Judicial corruption is extensive. Expropriation is common.

10—Private property is rarely protected, and almost all property belongs to the state. The country is in such chao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ongoing war) that protection of property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enforce. The judiciary is so corrupt that property is not protected effectively. Expropriation is common.

0—Private property is outlawed, and all property belongs to the state. People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sue others and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courts. Corruption is endemic.

## 附录 1.4.2

**萨克斯《波兰跳进（资本主义和民主）市场经济》一书的介绍：**

In Poland's jump to the Market Economy, Jeffrey Sachs provides an insider's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events and economic strategy behind the country's swift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o economic reform, Sachs points out, have been primarily political in nature, rather than social or even economic. Sachs reviews Poland's striking progres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three years ago, which he helped to design. He discusses the gains - more than half of employment and GDP is now in the private sector, exports to Western Europe have more than doubled,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confidence are returning - as well as the serious problems that remain - high unemployment, a chronic fiscal deficit, the slow pace of privatization of lar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fragility of multiparty coalition governments.

Sachs points out that leadership is crucial to economic reform in a newly democratic setting, as is the West's timely economic assistance. In Poland's case, the Zloty Stabilization Fund and the two-stage debt cancellation have been essential to keeping the reform program on track. Poland's example has had a powerful impact on reforms throughout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has done much to dispel the fear that the citizens themselves, allegedly made lazy by decades of socialism, would reject the competitive rigors of a market economy. Overall, Sachs remains firmly convinced of the potential for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s. in Poland and the rest of the region.

Jeffrey Sachs is Galen L. Ston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an economic advisor to more than a doze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Bolivia, Mongolia, Poland, and Russia.

## 第二章

# 东方全能治理体系

## 第一节

# 全能治理体系与治水国家

不同于自由规律的统治，古代的东方历史都是建立在宇宙论<sup>148</sup>基础上的帝国架构。在东方，基础设施被政府控制，这是帝王全能统治的基石。帝王需要的是人民的服从和奴役。东方帝国、西方帝国和美洲帝国的本质都是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或者全能主义），除了为统治而统治之外，宇宙论没有给东方帝王任何生命的意义。

“各个古代文明都提出自己的终极理想，例如，古埃及人的理想竟是为法老一人的升天而效力，因而将社会剩余转化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壮观而无用的金字塔，无数生命便在烈日之下一代一代地消耗于石块的采掘，运输和堆砌之中。古印度人的理想是追求来世的转胎，消极等待现世的逝去，因而对现世的进步常常漠不关心。中华文明推崇三皇五帝，面向远古，厌恶未来，自然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各个文明中，唯独希腊文明提出的真、善、美的理想。民主的理想，体格和智力平衡发展的理想，科学理性的理想，开放，进取，通过贸易和分工，各得其所的理想，城邦为民众开放和服务，有民众参与管理的理想，至今不但仍能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且为人们所憧憬和向往。”

Totalitarianism 表现为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科举和洗脑）、基础设施控制、社会控制、家族控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核心力

---

<sup>148</sup> 宇宙论是哲学的基本论域之一，cosmology 来自自古希腊的 Kosmos，意为“秩序、好的秩序、有序地安排”。



量……都是 totalitarianism 的意识。自古以来，东方 totalitarian 社会里的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政治生活的快乐。我的本家邹谠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他把 totalitarianism 翻译为全能主义制度，这是中国能接受的翻译。他原来比较有名，现在美国哪里有人记得他。邹谠是邹鲁<sup>149</sup>的儿子，国内也根本不了解邹鲁，邹鲁有远见卓识，同样是教育家，他比蔡元培伟大亿万倍：邹鲁自己创立中山大学，而且邹鲁的思想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另外，邹谠的书已经有中文版<sup>150</sup>，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在中国讲课。邹谠对中国的研究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邹谠和萧公权他们都是希望中国走上欧美共和制度的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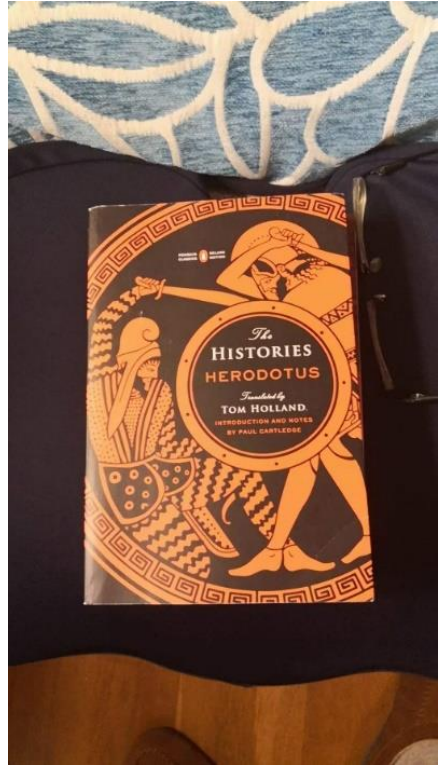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 republic, monarchy, and despotism 三类。Monarchy 是由一个人依据法律统治，而 despots 即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们的个人意志处置一切。其实希腊罗马人都知道这种 totalitarianism 乃东方的根本制度，δεσποτικός despótis 希腊罗马描写东方世界就用 despotism 一词。“从希波战争起，希腊人就开始非常有意识地塑造一个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这个对立不只是一个地理区的对立。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东方就是波斯，西方是希腊世界，东西方的对立是两种文明的对立。波斯大军对希腊的入侵表面上是一种奴役，但是实际上它是双重的奴役，首先如果波斯把整个希腊世界全部征服了，那么每一个城邦都将变成波斯的一个行省；另外，城邦是一个公民的共同体，有法律的统治，或者公民群体的自我统治。一旦统治形态发生改变，城邦中的人也将成为一个近似于奴隶一样的位置。对于希腊人来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主人统治奴隶，而希腊人觉得他们都是自由人。所以对希腊人来说，抗击波斯是在双重的自由意义上的抗争。你会看到这似乎是两种持有完全不同观念的人，或者不同的文明，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希罗多德就给了一段评述，他说，从此雅典人就站起来了，雅典全方位的力量就开始崛起了。十年以后，雅典靠自己的努力打赢了马拉松战役。所以从这些角度都可以看到所谓的自由和奴役，东方和西方，政治和专制，它是在全方位地进行了一个冲突。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之中得到了一个非常集中的展现。”<sup>151</sup>自由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希腊人发现了自由。我们中国人懂不懂弱小的、自由的希腊打败庞大的、专制的波斯帝国给美国独立战争的人民多么大的鼓舞。1776 年追求自由独立的美国就是公元前 490 年的自由希腊，而大英帝国就像波斯帝国啊。美国独立战争几乎是希腊和波斯帝国战争的一次重复：弱小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为自由打败了英帝国暴君乔治三世和他手下的世界霸权。英帝国正好也在美国的东方。

<sup>149</sup> 邹鲁，政治家、教育家和著名学者，中山大学的创办人，国民党元老。

<sup>150</sup>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奠定了其在芝加哥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地位，是研究中美关系的经典之作（实际主要关怀还是中国的转型），晚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中国革命的再阐释》。<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邹谠>。

<sup>151</sup> 引自《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张新刚，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

在我看来《希罗多德：历史》是比较东方专制和西方自由、法治、共和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希罗多德认为之所以雅典人作战英勇，能打败敌国，原因是雅典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每个人都是为自由而战。设想如果当年希腊败给波斯，西方自由文明就完全被东方专制消灭了：全世界将没有自由、法治、产权、宪政、数学、物理、化学、哲学、逻辑学……对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东方专制世界（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华夏帝国）没有文明，只有文盲。为什么？因为这些帝国不存在自由、人权、法律统治、私有产权；因为这些东方帝国的国王都在法律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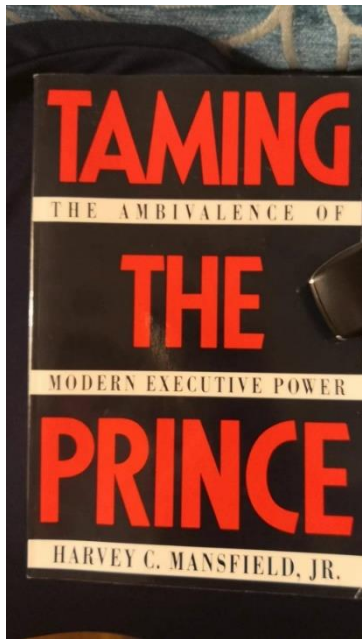
两千五百年来，西方自由文明总能在关键时刻战胜东方专制帝国。在东方专制和西方自由文明的冲突之中，为什么西方自由文明总是胜利？那些认为西方自由文明只是五百年以来才统治世界的观点是最无知的。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和波斯帝国是最伟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希腊自由文明战胜东方波斯专制独裁。波斯专制帝国最强大的时候也没有打败希腊，而希腊之后的马其顿帝国打败了波斯帝国（包括印度和阿富汗）。如果说这是世界文明的第一件最大的幸事，那么 Charles Martel（查理·马特）在公元 732 年带领弗兰克军队打败东方伊斯兰专制的入侵是世界文明的第二大幸事。<sup>152</sup> 否则，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就被穆斯林消灭了。1683 年 9 月 11 日东方奥斯曼伊斯兰专制帝国对维也纳的侵略失败，这是世界文明的第三次最大幸事，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恐怖分子选择 9 月 11 日对纽约和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历史上残暴的蒙古帝国，占领的地方再多，对天下人而言也不过是多了一个个牧场和监狱。苏联当年就算统一全球，世界也肯定是重回古拉格时代。这是他们的历史唯一不变的主旋律。就世界历史而言，每一场关乎国运的大战，尽头都是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坟墓。从前是阿富汗，今天是乌克兰。<sup>153</sup>”

基于亚里斯多德、Livy 和 Polybius，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罗马史》和《君主论》里第一个回答了文明如何战胜野蛮：共和国里必须有君主甚至暴君

<sup>152</sup> 普瓦提埃战役，又称图尔之战，发生在公元 732 年。阿拉伯帝国征服西班牙后，开始对法兰克王国的征服。阿拉伯军队与法兰克军队在普瓦提埃交战，法兰克军队获胜。

<sup>153</sup> 指苏联-阿富汗战争，1979 年 12 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的长达 10 年的战争和 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的元素。这一理论的第一次最伟大的实践就是美国宪法里给总统史无前例的行政（含军事）权力。我们要理解共和国政府如何把自由和力量非常好的结合起来。美国宪法第一次实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和随后的美国宪法给总统权力如此之大，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利坚共和国是建立君主制。“他们想保持共和主义，但他们正在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对许多人来说，这有专制主义和准君主制的味道，因为总统被赋予一宪法第二条对总统的强大程度非常模糊”麦迪逊和他的联邦党人同伴，他们相当精明地自称为“联邦党人”，其实他们应该被称为国家主义者，他们想建立一个可以约束所有政治权力的制度，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左图的书就是介绍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理论。马基雅维利奠定了现代性（modernity）。不懂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理论，我们会问“文明为什么会常常被野蛮打败？”这种错误的问题。国内本科生、博士生和教授都不读我提到的绝大部分书，哪里能提出好问题

经过近四个月的辩论和努力通过的宪法文本，在其序言中设定的宪法的六个目的中有两个与军事有关，即“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其最根本的基础是为了“我们合众国人民”。“人民”这样一个现实而又抽象的政治群体性概念，实现了美国国家性质的转换，即由邦联时期的以“州”为单位的政治建构到以“人民”为直接的权力基础的转换。这样的转换，有利于美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军事力量的存在不再是以各州为基础，受各州的牵制，而是统一联邦的事务。同时，为了实现宪法的军事目的，在最后的宪法文本中，不仅保留了常备军和民兵的存在，而且对与战争有关的军事法律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为联邦政府行使其权力，实现宪法“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的目的提供了保障。但是不受节制的权力必然会损害公民的权利，军事权力的行使亦不例外。如何既能令军事权力的行使有效发挥其坚强国防的功能，又使其不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宪法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横向的军事权力分割和中央、联邦纵向的军事权力分割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军事权力的制衡，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集中和独裁。

欧洲历史上也曾有过全能治理的专制帝国出现。公元前 49 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cross the Rubicon）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这标志着罗马共和国的死亡。从文艺复兴以来，渡过卢比孔河的独裁者太多了：佛

罗伦萨共和国的破坏人 Cesare Borgia、法国大革命动乱出现的拿破仑、1922年罗马“凯旋”的墨索里尼、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后面的希特勒……人类最大的罪人往往都是这些历史上所谓的伟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把他的政权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一切都在国家之内，一切都不在国家之外，一切都不反对国家。”施密特使用了 Totalstaat(字面意思是“完全的国家”)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全能国家的法律基础。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发表的多篇文章中经常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及其同源词。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写道：“西班牙战争和1936-37年间的其他事件改变了天平，此后我知道了自己的立场。自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担心，未来的极权主义政权可能会利用监控和大众媒体方面的技术进步，建立一个永远无法被推翻的永久的、全球性的独裁政权，他写道：“如果你想要一个未来的愿景，想象一下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的脸上。”

亚历山大曾建立强大的专制帝国“亚历山大强大得足以在物资上粉碎旧世界，但要在精神上创立一个新世界，却非亚历山大之力所能及。他征服了世界，但几乎没有触及人的灵魂。”亚历山大主要是没有现代全能洗脑的教育、文化、政治工具。维吉尔歌颂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的专制独裁也已经不被现代人认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最大罪恶就是摧毁了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而代之以五百年的罗马专制独裁帝国。现代文明不认可任何专制独裁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秦汉帝国、罗马帝国、查尔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

柏拉图在《共和国》里一样指出如何治理人心、控制舆论(特别是诗歌、寓言、历史)。波普尔在《开放世界及其敌人》的第一册中认为柏拉图是极权专制的思想来源。后来斯特劳斯和沃格林非常好地批判了波普尔的这种看法，而且他们两个也没有让波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尽管哈耶克死命推荐波普尔。霍布斯在《利维坦》里彻底否定亚里士多德和天主教，他希望英国所有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都用他的《利维坦》来统一人心和统一国王的权力（不能搞三权分立）。Statecraft（治理国家）和 Soulcraft（治理人心）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腐朽的、威权的、全能的天主教的教皇体制也曾经造就了西班牙好战的骑士、游侠式国家文化和集权专制的陆权国家模式——帝王、贵族和天主教徒鄙视商人和商业。看看天主教的腐朽和罪恶，我们就理解宗教改革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事：“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

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饼和酒的质地 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说出基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变化的时刻就来临了。随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神父举起饼。普通信众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这饼，他们只要望一眼被举起的饼，恩典就临到他们了。因此，有更为敬虔的人狂热地从一个教堂赶到另一个教堂，只为多望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这就不足为奇了。”<sup>154</sup>后来的宗教改革彻底改变了它。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认为宗教改革“是一次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运动，是对精神领域内的绝对权力发起的名副其实的反抗”：树立信仰本身为权威，只要虔诚信仰，灵魂即可得救，于是欧洲人（平民和国王）通过阅读《圣经》一律平等地面对上帝；宗教改革还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新教的各个派别互相制衡。它们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给欧洲人带来了信仰的自由。改变了过去通过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的惯例，人人可以同上帝直接对话。马克思在评价路德的宗教改革时说：“他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不是因为他把僧侣（神职人员）变成了俗人，而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

法国有西欧最强大的专制传统，路易十四就曾像天主教教皇那样建立一个短命的专制帝国：“我就是国家！”法国全能政府治理的经济学水平至今世界第一，法国经济学对公民专制（税收专制理论和公共设施专制理论）、对企业专制（规制理论）。不过反过来讲，因为林毅夫和李稻葵不知道玩法国专制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他们的政府经济学还是无知无畏的空话。

实际上，全世界 Totalitarian 帝国本质是一样的，就连墨西哥境内由印第安人建立的阿兹特克帝国（1200-1521 年）也不例外。阿兹特克帝国维系上下左右的力量是权势，谁不听话就叫谁过不去。它表面上强大，它的奴隶们欢迎一群恶霸被另一群恶棍所替代。不要像摩尔根欺骗马克思那样认为印第安人帝国里是原始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啊：他们杀人比希特勒还残酷。阿兹特克人把杀人祭神发展成一种产业。他们有一种信仰：太阳神需要人类血液滋养。如果未进食，他就不能升起。其他神也需要献祭，例如献祭婴儿和孩子，以确保庄

---

<sup>154</sup> 《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里弗斯，上海三联书店，2019。

稼丰收和雨水充足。皇室成员特拉卡莱尔废立过几个皇帝，权倾天下。他把献祭仪式变成纵情杀人的狂欢，持续数日，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往往数千人之多。他们的心被剝出后依然在跳动，他们的尸体被烹饪成精美的食物，供阿兹特克贵族享用。

美洲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人到来之前都是残暴、邪恶暴政。印加帝国是美洲最大帝国。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维持着独裁统治，他的眼线无处不在。总督一词被称为 Tukrikuk，意为“他一览无余”。告密者密布全帝国，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探测各家各户，甚至人家的瓶瓶罐罐。印加文化剥脱了普通民众的创造性、自治和个性。后来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指挥一百八十号人征服了一个人口约六百万的帝国，将从厄瓜多尔穿过安第斯山脉直到波利维亚的大片疆土划归到了西班牙名下。他也是现代秘鲁首都利马的建立者。他因此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十大征服者之一。同成吉思汗、亚历山大、拿破仑齐名。

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都死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的流行病，而不是殖民者的屠杀。国内宣传搞得国内绝大多数 slaves and coolies（奴隶和苦力）心花怒放，可怜。“据估计，美洲的印第安人总人口在 9000 万到 1.14 亿之间。大约 90%的人死于疾病，1900 年是美洲原住民人口记录最低的一年。哥伦布到达后的最初 50 年，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人口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除了蓄意杀戮和战争，大量的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流行的传染病。其中大部分与呼吸道感染有关，包括天花、肺结核、麻疹和流感。”

印第安人残暴，非洲黑人部落更加残暴，而且出卖黑奴的都是黑人部落首领。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了解非洲部落首领和印第安部落首领都是最残暴的帝王。人性的邪恶和帝国（部落）的残暴没有差别。不过黑人和印第安人现在是美国最高贵的种族。高贵的黑人闹出来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丁、黑人市长（纽约、华盛顿、费城、匹兹堡、阿特兰大…）、州长一堆、议员一堆……华人远离政治，因为五千年都是 coolies and slaves。

财产私有是原始社会最普遍的制度，但是财产私有、平等和自由从来没有在美洲原始社会里存在过。东方专制和美洲专制都是帝王控制基础设施，奴隶制是美洲原始帝国的制度，也是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秦汉帝国、蒙古帝国……的制度。

## 治水国家

一万年以来，东方帝国（以埃及为首）一直是在专制里面打圆圈。印度的自由文明要感谢英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文明要感谢美国。波斯专

制帝国几千年因为没有自由、法治、产权和宪政，它毫无文明可言。东方专制帝国都是如此。

当然，秦始皇的专制帝国也毫无文明可言。商朝就跟美洲阿兹特克帝国一样“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sup>155</sup>

我已经提到过，在美国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谱系里，哈耶克和米塞斯中的地位一般。在中国我们重视他们是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看成 totalitarianism（全能主义）。其实，中国是 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这是一种更加恶劣、残酷、悠久的 totalitarianism。这是 Wittfogel<sup>156</sup> 的伟大贡献：阿伦特、哈耶克、波普尔……根本没有找到 totalitarianism 的根本。魏复古的研究远比他们对西方全能治理制度的研究深刻。另外，此书对俄罗斯和蒙古全能制度关系的研究被 Richard Pipes 发展了。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的。Richard Pipes 对俄罗斯极权主义分析也远比阿伦特、哈耶克、波普尔深刻。

Karl Wittfogel 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 totalitarianism 形态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西方从古至今的极权主义政治完全无法与东方的极权主义政治相提并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

‘东方的’专制主义表现了极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 Karl Wittfogel 分析东方 totalitarianism 已经全面论述了东方恐怖和暴力。“魏特夫首先对治水经济（治水社会）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当水源问题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时候，水就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因素。‘如果灌溉耕作取决于有效地管理大量的水源供应，那么水的明显的特性——大量聚集——就在制度上变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了。’这种决定性意义体现在灌溉推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治水社会政治形态。治水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处于缺水的自然环

---

<sup>155</sup> 引自《周灭商之战，要远比想象的惊心动魄》，澎湃新闻，历史心发现，[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5886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358863)。

<sup>156</sup> Karl August Wittfogel（魏特夫或魏复古），德裔美籍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第一次向他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特有的“水力官僚国家”，作为他的学生，魏复古试图发现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对它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

境中的人们必须努力寻求一种社会控制治水的方式。恰如魏特夫指出的‘水源过少或者过多并不一定导致政府对水利的控制，同时政府控制水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实行专制的治国手段。只有在以耗取大量自然资源为生的经济水平之上，只有在远离雨水农业的强大中心之外，只有在没有达到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水平之下，对水源不足的环境有特殊反应的人类才会朝着特殊的治水生活秩序前进。’

魏特夫将治水经济界定为‘一种管理者的和纯属政治性质的经济’。特殊的治水经济，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形态，而是被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乃至被国家政权的控制者直接掌控的‘经济’形式。循此思路，他总结归纳出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他指出治水社会的分工特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事情，‘因为治水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对治水国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治水工作的复杂性要求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有效的分工协作必然进一步要求一体化的计划，而一体化的计划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在这种权力的引导下，由政府管理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其他大型事业（如饮水工程、航运运河、防御建筑、庞大道路、都城宫殿、陵寝寺庙等等）成为国家统治的必须，与治水相关的数学、天文学（占星术）成为改进水利生产和保障治水领袖们最高权力的工具。政治领袖就此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和物资，使他们足以取得不朽的成就。正是治水经济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状态，使治水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自由放任社会有了明显不同的特征。‘治水国家不同于现代极权管理国家之处在于它建立在农业基础上面，只管理着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它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自由放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就其核心形式而论，它是以命令式的（强迫的）劳动手段来实现重要的经济职能的。’

由地理环境制约形成的治水经济，必然促成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结构，那就是国家比社会强大，它是一个真正管理意义上的国家。一切试图夺取社会和政府领导权的非政府力量，诸如亲属团体、宗教团体、军事领袖或财产巨头，都败下阵来。在治水文明中，执政者阻止一切非政府性质的团体在组织上的结合。他们的国家变得‘比社会强大’。使其代表者具有控制臣民的无限制权力的任何组织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

和多中心社会的被控制的国家不同，单一中心的治水社会国家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工具’国家。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的组织者、伟大的档案保管者。他们的管理能力与其对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紧密相关，治水的



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领导有力。治水领导具有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最高权威，能够借助于国家驿站制度将统治意志快速地传达到全国各地，并通过各地次要的控制中心将全国有效地控制起来。作为国家暴力的军队，也成为统治者独断决定和统一指挥的对象，而士兵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由于军队在国家极权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治水社会的军事理论才非常发达。

在治水国家中，统治者绝对不仅仅关注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治水国家的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权力。统治者对于征敛财富表现得非常竭尽全力。这既是治水国家形成普遍而沉重的税收的原因，也是治水国家经常以政治的理由没收官员和商人财产的根由。治水社会虽然可以积累巨大的财富，但治水财产却是软弱的财产，这既是因为治水政权是一种武装的和无所不在的组织力量，它可以在动产的战略地点——城市和不动产的主要地区——农村，占据上风；也是因为做官的和不做官的财产据有者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由于他们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因此他们不足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在许多治水社会中，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也是最高的宗教权威的体现。’再强大的宗教组织到最后也必须依附于政权，才能够在诸宗教的竞争中取得政治优势。

在治水经济与治水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治水社会的专制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形态绝对不像人们主观假设的那样受到制度和道德的限制而表现得仁慈，相反，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权力形式。这种严厉残酷，既是因为‘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们制定、维护并且修改它，它们不是以受到控制的社会代理人的身份、而是以它的主人的身份这样做的。’因此，这个社会里绝对不存在限制权力的宪法，统治国家的君主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独裁者。统治者宁肯在行政效率递减法则的支配下，满足于对社会上某些重要的战略地位部分维持坚强的控制，而不寻求全面地控制社会。这并不是说治水社会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在治水社会中，诸如国家徭役之外的社会成员自由、思想控制的相对松弛、处于从属地位的团体的一定的自主，这些与政治无关的自由，绝对是存在并发挥着社会功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由是相当大的，可是并没有导致完全的自治。充其量它们是建立了一种乞丐式的民主。’而‘治水国家不受乞丐式民主的制约’，它绝对不可能是仁慈的权力，它仅仅按照底线的需要将人们控制在基本秩序的需要状态上面。‘人民的利益为最适合统治者的理性条件作出了牺牲’，‘他们的目的是取得最适宜于统治者而不是宜于人民的管理条件’。因此，治水社会建立起了最适合统治者的消费条件、最适合统治者的司法条件、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它强调专制政权的长远利益，削弱潜在

的反对派，他们眼中仅仅只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真实地说，治水专制主义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sup>157</sup>

很多人一提到 Karl Wittfogel 就说他只看到水利。事实上这些人根本没有看完 Wittfogel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Wittfogel 定义的政府控制水利的社会（东方专制社会）事实上可以修改为政府控制基础设施的社会，而且政府为了控制经济基础设施（水利、铁路、公路、机场、海港、邮局、网络、电力、银行、股市交易…）就必须控制政治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军事基础设施、宗教基础设施。于是我们可以把 Wittfogel 的治水经济看成是所有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 totalitarianism——政府控制所有方面的基础设施。这样重新定义后，蒙古全能统治、俄罗斯全能统治、满清全能统治就好理解了。蒙古统治俄罗斯二百四十多年也是用水利治理的全能制度；俄罗斯沙皇正是从蒙古统治者手里学会了彻底摧毁私有产权；其实伊斯兰全能治理制度也需要用魏复古的方法。

我们不妨制造一个英文词汇 infrastructure - controlled society（基础设施被全面控制的社会）来描述东方 totalitarianism。我估计这比 Wittfogel 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更好一点。有人说可以叫“基控社会（ICS）”，除了有基础设施被控制的含义外，更有社会基层被控制的含义。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英文 Hydraulic 之意太过单薄，汉译为“治水”已经是神来之笔，此概念核心在“治”上，体现出了权力的作用。还有朋友认为全能治理已经是最好的翻译：治水社会确实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需要以控制来组织社会。但控制型社会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了。这里控制的特征是东南西北中全方位，想控制什么控制什么，而不在于是不是控制基础设施，totalitarian society 已经很好的概括。我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魏复古的这本书对研究今天的中国更加重要。我们天天歌颂基础设施建设世界第一。这正是 Karl Wittfogel 在 oriental despotism 书里说的：为什么水利工程建设世界第一？全能统治！注意基础设施不是私有财产，土地也不是，房子更只有使用权。有些经济史学人把奴隶间互相买卖土地看成奴隶拥有土地的私有产权。在全能治理体系里，君王拥有一切，当然拥有奴隶和土地。奴隶们互相买卖土地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君王当然高兴地容许。

杨联陞反驳魏复古的论文太无聊了。<sup>158</sup>魏复古是用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是水利）理解中国专制皇权啊！魏复古是认识中国皇帝专制制度最深刻的，中

<sup>157</sup> 引自《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s://ccrs.cnu.edu.cn/List/H5Details.aspx?tid=2863>。现在链接已经失效。

<sup>158</sup> 杨联陞，哈佛燕京讲座教授，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论文指的是《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载于《国史探微》，杨联陞，新星出版社，2005。

国人分析中国皇帝专制没有任何新见解。杨联陞同样也毫无对中国历史的真正见解，他对 Wittfogel 的批判最为恶劣。当然，他主要是有费正清<sup>159</sup>这样的糊涂虫作为后台。费正清和基辛格<sup>160</sup>都是美化中国、热爱中国，他们和汤因比<sup>161</sup>连秦汉政体的常识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资格攻击魏复古，这就跟吴敬琏和张维迎意淫市场和企业家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能治理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今天的历史正在嘲笑费正清和汤因比。另外，费正清作为糊涂虫必然看不起黄仁宇的贡献。费正清 1989 年 6 月之后才醒过来，他反思自己一辈子糊涂的书<sup>162</sup>在他过世后于 1992 年出版了。我们看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必须保持清醒头脑。

David Landes<sup>163</sup>在二十一世纪才为魏复古平反。“他崇拜新教伦理的捍卫者马克斯·韦伯，以及他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杰出学生 Wittfogel。他说‘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决定一切。’水利理论受到了一代热衷于政治正确的西方汉学家的严厉批评，并迅速捍卫中国所谓的民主承诺。”兰德斯对这些批评的解释是：“几乎所有这些对治水政体的批评都是在讨好一个神秘的政权，一个邀请的给予者。”一代批判魏复古治水专制模式的西方人都是为了讨好 Chinese government，以便得到 China 访问的机会。现在这些人都已经死了或快要死了，新一代西方汉学家都是从 oriental despotism 来研究中国全能治理体系 totalitarianism。看看伟大汉学家埃蒂安·巴拉兹的评价。“如果把极权主义理解为国家及其执行机关和工作人员对社会生活的全部活动的完全控制，那么毫无例外，中国社会是高度极权主义的……没有任何私人的首创精神，没有任何公共生活的表达可以逃脱官方的控制。首先是一大批国家垄断企业，它们构成了主要的消费必需品：盐、铁、茶、酒和对外贸易。教育是垄断的，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实际上，信件是垄断的（我想说的是，新闻界）：任何非官方的、能逃脱审查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希望能进入公众视野。如果没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给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东西——丝绸、茶叶、瓷器、纸张、印刷术等等——毫无疑问，它们会进一步丰富中国，并可能把中国带到现代工业的门槛。是

<sup>159</sup> 费正清，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国际汉学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有“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称。

<sup>160</sup>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1年，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与中方携手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sup>161</sup>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sup>162</sup> 指的是 *China: A New History*, John King Fairbank, 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163</sup> 大卫·兰德斯，柯立芝历史学教授和名誉经济学教授，探讨了文化习俗和历史环境如何在经济学中相互交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国富国穷》。

国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因为它将任何违背或似乎违背其利益的东西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且还因为国家理性无情地植入的习俗。常规、传统和僵化的气氛使任何创新受到怀疑，任何没有事先命令和批准的主动性，都不利于自由精神”<sup>164</sup>

从改革开放以来，吴敬琏、钱颖一、科尔奈他们都没有真正认识到 *oriental despotism* 是中国全能治理的本质。在这种政治-经济-法制（刑罚主义）框架里，没有预算软约束。科尔奈瞎谈预算软约束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全能治理，他在纯粹西方经济学里不可能分析全能治理的政治-经济-法制-历史的一体化。中国已经是 *total power, total state, and totalitarianism* 了，林毅夫、李稻葵他们还继续谈有为政府：What a hell!（见鬼）在 *total state and total power* 之下吴敬琏、张维迎、樊刚、钱颖一……他们侃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根本没有意义。大家看看魏复古的《东方专制主义》吧！现在我们更是 *totalitarianism*，谈什么市场和企业家啊！大家一定要学习林毅夫、李稻葵、文一……歌颂中国五千年最优雅的 *oriental despotism*。Totalitarianism? 中国小菜一碟了。

Brainwashing（洗脑）的土地上哪里能像美国产生无数新思想？所以中国人根本提不出来一丝一毫新 idea。现在周雪光<sup>165</sup>、周黎安<sup>166</sup>、李宏斌<sup>167</sup>他们的威权主义模型都是故意掩饰全能治理制度（*oriental despotism*）。他们的论文跟中国现实和历史毫无关系，周雪光和周黎安他们都回避全能治理体系的根本问题而去搞简单的统计回归游戏。这是中国人求生的鬼办法：假搞学问，绝不直接得罪 Big Brothers 和 Autocrats（独裁者）。赵鼎新<sup>168</sup>也是故意掩饰 *oriental despotism* 的全能治理，他瞎谈儒法 China，不断强调儒法国家的绩效合理性。儒法国家是压榨机器（*extracting machine*）！当然，国人为了掩盖真相，把压榨都故意翻译成汲取。他和吴敬琏、钱颖一、周雪光……这些人一直在跪舔 *totalitarianism*。黄宗智<sup>169</sup>也昏头了。明明是全能治理制度的大问题，他还在分析社会各个阶级的问题。黄宗智想在中国混口饭吃，他只能跪舔。Karl Wittfogel 的 *oriental despotism* 是走近中国历史的唯一途径。不过他们都不如刘小枫、强世功<sup>170</sup>、王绍光<sup>171</sup>他们公开利用施密特<sup>172</sup>的思想为全能政府

<sup>164</sup>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白乐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P22-23。

<sup>165</sup>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sup>166</sup> 周黎安，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sup>167</sup> 李宏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史带经济学讲席教授。

<sup>168</sup>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sup>169</sup> 黄宗智，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近代中国人“穷怕了”的根源是什么？》，黄宗智，万维书刊网，<https://www.eshukan.com/academic/show.aspx?id=92401&cid=26>。

<sup>170</sup> 强世功，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

<sup>171</sup> 王绍光，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辩护。攻击民主没有政治领导力和决断力的纳粹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要希特勒建立一个天主教教皇的两千年专制独裁制度，而希特勒只能自杀。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最好也直接用施密特的全能政府理论，免得遮遮掩掩。阎学通<sup>173</sup>、强世功、王绍光、刘小枫都是施密特的中国门徒。“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律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北京大学学者陈端洪在 2018 年写道“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引用了德国威权主义法学家施密特的理论，证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钱颖一、林毅夫……所有研究中国转轨经济学的人连中国全能制度的门都没有摸到。他们的所有研究都是垃圾废物。中国更不是威权国家。中国人不敢研究全能治理体系。李稻葵、林毅夫……这些奴才全面维护中国全能治理体系。国内如此多崇拜希特勒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是国内长期宣传威权制的结果。在全过程民主的新时代，我希望这些人马上投机研究民主的学问。

大家好好理解人民民主专政，好好理解施密特的领袖理性专政。施密特：“政治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曼斯菲尔德：“政治是愤怒。”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千万不要忘记斗争。”邓小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习近平：“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些人都不懂我的数学模型的伟大。很巧的是英美宪政正好没有政治领导力和决断力，但是英美帝国能从 1688 年以来一直统治世界，其实英帝国从 1588 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就是世界霸主。只要理解我的这一数学模型<sup>174</sup>，那就太好理解了。用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数学模型化 Karl Wittfogel 的思想是我现在做的。我们的共和经济学必须有其反面 (despotism and totalitarianism) 的数理模型。

<sup>172</sup> 卡尔·施密特，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议会民主的危机》是卡尔施密特否定民主的力作。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政治的概念》是卡尔施密特否定民主的另外一部著作，他极力鼓吹纳粹希特勒的决断力。

<sup>173</sup>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sup>174</sup> A Naive Model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Powers, CEMA Working Papers 557, Heng-fu Zou, 2012。

## 第二节

# 儒家、法家、道家的奴才主义、刑治主义 与愚民主义

“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皇帝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

雅斯贝尔斯<sup>175</sup>荒唐地认为，“公元前 800 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 600 至前 300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若干位足以影响后世历史进程的伟大精神导师，并由此催生了世界上几大并列的文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那些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只有犹太教-希腊-罗马才是文明！法家刑治主义、儒家三纲六纪的奴才主义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以及愚民主义的阴暗权术都是全能治理体系的手段和思想。法家-儒家政治的特点就是上一节所讲的全能治理体系的特点：强迫人民接受某种意识形态；集权于单个统治者之手；统治者在法律之上；法律仅仅是惩罚人民的工具；控制几乎所有商业和经济生活；

---

<sup>175</sup>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在 1949 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控制所有社会组织和家庭生活；大规模文字狱；清洗官僚阶级；把人民看成物资财产。

1990 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和郭齐勇<sup>176</sup>、杨逢彬<sup>177</sup>（杨树达的孙子、杨伯峻的侄子）等一起开办中国第一个国学班。儒家的书，我哪本没有看？为皇帝服务的儒家和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儒家一定要分开，我批判的是为皇帝当奴才的儒家。我感谢文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sup>178</sup>运动让我在初中和高中好好学习了儒家和法家。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浒读红楼梦等运动也让我学会了看《史记》和《资治通鉴》。

陈寅恪总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奴隶制），礼教杀人。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酈寄亦待之以鲍叔。”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已经近乎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了。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礼，首先是事君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儒家统治下，中国人怎么可能有平等？邹容<sup>179</sup>：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看看三纲如何杀人！平等被儒家三纲六纪公开杀死了。这当然也是法家的本质，但法家没有儒家虚假的外表。“礼不下庶人”：对人民哪里用得着讲礼啊。

孔丘及其弟子最喜欢把中国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sup>180</sup>欧阳修，你这个蠢货，你不要总把中国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人性邪恶。欧阳修和范仲淹，你们给我听着：明明宋仁宗到宋神宗都是恶毒之小人，你们不分是非，还把她们称为仁君。你们

<sup>176</sup>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sup>177</sup> 杨逢彬，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sup>178</sup> 林彪住处查到一些肯定孔子、孟子的材料。此后，毛泽东在若干场合提出了批孔的问题，以此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

<sup>179</sup> 邹容，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时年 20 岁。下文引自《革命军》。

<sup>180</sup> 出自《朋党论》，欧阳修。

两个是两头猪！你们还有脸说他们是人君，而“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他们哪里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你们真是瞎眼了。你们自以为是，还宣称“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请问孔门弟子：肥猪（君王）是君子还是小人？君王难道不是邪恶的小人？如果你们是君子，你们几千年怎么为邪恶君王皇帝小人们服务呢？后来的所有帝王皇帝领袖都是恶毒之小人，欧阳修和范仲淹你们俩懂吗？醒过来了吗？李白自称君子，他按照孔丘的教导拍大唐猪头皇帝李隆基小人的马屁：“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名堂赋》写就后不久，安史之乱发生，李唐皇帝小人一个比一个混账，直至朱温杀掉所有皇家肥猪。中国文人五千年发哭和笑酒疯，根本不知道如何建立自由-法治-产权-宪政文明。唐诗宋词不是文明，专制独裁帝国里的书法绘画更不是文明。屈原跳洞庭湖，杜甫在洞庭湖上吃腐烂的牛肉。“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sup>181</sup>这样的杜甫不值得同情。……哪里有风骨？古人也是意淫而已。猪还会反抗！猪比极权主义下的人更自由，因为猪可以乱叫、狂叫、欢叫。中国秦制几千年不改变的原因之一：文人们不思考如何改变秦制而用诗词发泄怨愤和淫荡。

#### 哀杜甫(1)<sup>182</sup>

呜呼诗乃穷人物，少陵野老吞声哭！  
 伤脑苍苍浊酒空，饥肠辘辘烂肉无。  
 秋风吹破茅草屋，孤舟漂沉洞庭湖。  
 垂死怜家痛社稷，五陵佳气畜朱胡。

#### 哀杜甫(2)

残贫一家看君山，老病孤舟听洞庭。  
 魂断潇湘念苍生，泪流岳阳祭唐陵。  
 朱门酒肉更饿人，富乡鱼米尤死猩。  
 国碎千尺万丈崖，君埋一米十寸冰。

孔子塑造人、教育人，却把人扭曲的不是人。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子却没死，他的幽灵就是当今无数的伪君子。

儒家的本质也是用笔杠子（洗脑）统治，法家是用刀把子和枪杆子统治，

<sup>181</sup> 《登岳阳楼》，杜甫。

<sup>182</sup> 《哀杜甫》两篇，邹恒甫作。



两者互相补充。科举制度是专制洗脑奴才的最好手段：“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现现在中国所有考试也都是 brainwashing。有人说的很有道理：以前是把这些入用科举圈养起来，现在是用清华北大送到国外。“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如其说，它对于前一目的的达成，过于有限，但对于后一更大目的的成就，就确不算小了：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分立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人士，不是日益薰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基础，但其充分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sup>183</sup>

儒家思想，是暗中消灭你的血性的秘密武器。这导致中国人几千年来被消灭了血性、唯唯诺诺、任人宰割、被称为双脚羊、被各种征服和欺凌。越是有志向奋发读书的人，儒家文化读多了，越是又酸又臭，反而越变成孔乙己那样的废材，自费武功，浑浑噩噩于世。五胡乱华时期中国人被称为两脚羊，元朝和清朝的外族更知道儒法治理下的中国人性：更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创造历史的反而是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流氓，比如刘邦、朱温、朱元璋。这些没有机会被儒家文化毒害的流氓级别的人物，没有被废武功，反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礼记·儒行》：“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真是儒者自欺欺人的把戏，几千年倡导三纲六纪的迂儒哪里知道生命的意义是自由啊。刘邦看到儒生，就一把抓着儒生的帽子拉尿。儒生怎么样？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sup>184</sup>孟子误国误民！浩然之气能杀人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sup>185</sup>张载如此张扬，快点灭他！宋朝士大夫狂言最多，又都不会打战。朱熹狂吼存天理灭人欲，他祸国殃民！赵昞要死，陆秀夫可以去杀敌，何必跟着赵家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养浩然之气”。“士可杀不可辱”……拿下台湾了再吹牛逼，Please!不过单纯从会砍人的角度，王阳明和曾国藩到底算不算儒。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不会砍人的能叫儒家么，儒家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和御是干啥的？！孔子周游列国，

<sup>183</sup> 节选自《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楠，1948。

<sup>184</sup> 《敢问夫子恶乎长》，选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sup>185</sup> 《横渠四句》，张载。

都是带剑出行，从相关记载看，孔子没少遇到各种危险，几次被围，能化险为夷，显然没有少杀人。

儒家伦理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崇拜、权力崇拜或皇帝崇拜（Confucianism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state cult），是一种君权统治的工具。中国历史的本质：皇帝就是江山社稷，江山社稷就是皇帝，一个朝代乃一姓之天下，从宰相到苦民都是皇帝的奴才。几千年只有爱皇帝，哪有爱国？奴才跟着君王皇帝死等于跟着冤大头一起死啊。真是活见鬼。华夏诸子百家的圣人意识跟西方共和文明意识格格不入！圣人之治与共和之治（人民之治）是完全对立的。

先秦诸子时代的圣人、圣王思潮：

《老子》第三：“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愚民的本意暴露无遗：为无为是为了无不治（全能统治）。这跟商鞅和韩非是完全一致的。

《礼记·王制》第五：“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遇到灾荒之年，民众吃饱了，天子才饮食。如果儒这样要求天子，天子一定要杀儒。天子之为天子是天子打江山的结果（权力是拼命得到的）。天子不先吃饱何以坐江山？

《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圣人什么意思呢？

第一，天降圣人<sup>186</sup>，圣人法天<sup>187</sup>，圣人通天<sup>188</sup>，圣人如天<sup>189</sup>。

第二，圣、神相通。<sup>190</sup>

第三，圣人是“气”之精。<sup>191</sup>在传统思想中，“气”为万物之本说有广泛的影响。在“气”说中，圣人同样处于特殊的地位，他不同于一般人和一般物，圣人是由“精气”“和气”“清气”等超常之气凝结而成的。

第四，圣人过“性”。在人性论中，虽有圣人与一般人同“性”之论，但更有超“性”之论。孟子说，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sup>192</sup>荀

<sup>186</sup> 《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sup>187</sup> 《庄子·渔父》。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sup>188</sup> 《郭店楚简·五行》。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

<sup>189</sup> 《传习录》，王阳明。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

<sup>190</sup> 《荀子》。非圣人莫之能王。

<sup>191</sup> 《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sup>192</sup> 《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子认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和奇异之处就在于能“化性起伪”。<sup>193</sup>圣人过性，同一般人不能同日而语，属于超人。

第五，圣人是先觉者，穷尽了一切真理，是认识的终结。

个人崇拜毁灭中国：“从道德上神化统治者是儒家的重要政治思想。其由孔、孟发端中经董仲舒，在程、朱、陆、王那里走到了极端和顶点。它特别强调权力者的道德能动性，统治者要成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树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会获得权威。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在道德完善化了的统治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仅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即‘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其实质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内具圣人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以圣贤施仁政来争取民心，以人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论政者总希望出现圣君、贤相、清官，最为崇尚中国古代德才兼备的圣人尧帝。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强调个人独立、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概念相去甚远，不可能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几千年来‘仁义道德’下的政治现实是暴君、贪官、污吏多不胜数，而圣君、贤相、清官则难得一见。”<sup>194</sup> “‘天子圣明’是长达两千多年帝制时代培育起来的一个深厚观念。这种观念似乎已经被植入人的心理层面，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支配人们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分析地服膺于最高政治权威，相信他们做出的一切安排。特别是直接受制于帝王的那些官僚，当他们面对帝王的时候，不管他是明主还是昏君，不管他做出的决策是让你生还是死，你都得万分虔诚地匍匐在地，称颂其‘天子圣明’，感恩戴德而山呼万岁。天子者帝王也，帝王者人也，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就一定会变得圣明呢？如果说有些开国之君是靠着非凡的才能而有天下，他还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智慧而有某种圣的素质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后代，那些靠世袭而忝列君主之位的所谓天子，也必然地就会有非凡的智慧而圣明呢？他们的圣明是从哪里来的？”<sup>195</sup> “为了实现自己的‘王道’这一最高理想，儒家不仅提倡个人的‘修身’，还要由‘内圣’开出‘外王’，由‘修身’而至‘平天下’，于是君权势必成为儒家道德实践中关键的一环。而当儒家把道德实践的期望寄托于现实的君权时，当君权被儒家的‘德治’期望所伦理化，而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私利独擅’的工具时，接受儒家这种期望的人们也就会对君权心存希望，产生幻想，因而对既存君权

<sup>193</sup> 《荀子·性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sup>194</sup> 引自《“毛泽东迷信”批判》，何路社，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6121.html>。

<sup>195</sup> 《先秦诸子时代的造圣思潮》，李振宏

采取积极的、肯定与合作的态度。所谓‘人能弘道’‘化性起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就反映出儒家对于现实政治的最终希望。一旦从君主身上燃起对“道”的希望和幻想时，作为个体的人也就树起了自己的价值世界，建立了对生命的意义感。这样，一个笃信儒家思想的人就很容易由此确立起他的双重价值世界，即：由对君权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希望、幻想而产生的政治价值世界，以及由对自身人生意义的希望、肯定而产生的人生价值世界，从而能够比较‘随遇而安’地顺从任何君主的统治而不至于彻底幻灭与绝望。”<sup>196</sup>

孔子的德政与仁政也要求君主和官员的神圣化：“‘为政以德’即为政者心要正直、行要正直。‘道之以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政要求君子即当权者自己要德正，当权者德不正，怎么能让民众有所参照走正路呢？统治者行德政，就象北辰安居其所，那么，众星也得以安居其所，而不会越轨。治国安民实际上是治官安民，安民不是治民。为官者守德（礼即法律规章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素质’高了，老百姓自然会仿效，这样，全民的道德素质才能提高。老百姓普遍‘素质’低的原因是为官者普遍素质低。”孔子的道德仁义礼的要求都是针对从政者，只有从政者按照道德仁义礼做好了，老百姓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好。”<sup>197</sup>

孔丘也是消灭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罪人：他乱删、乱改、乱曰，他还发明春秋笔法，让乱臣贼子（更不用说民众）惧怕君王。儒法国家只能让人 asphyxiate and suffocate（窒息）。

我觉得以下的总结不错“孔子既不足以称为哲学家，也不足以称为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孔子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他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欲望强盛，内心复杂固执，种种苛求，这个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十分精致的虚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sup>198</sup>

## 打倒孔家店

第一个提出“打倒孔家店”思想的是易白沙<sup>199</sup>啊。1916年2月12日发行的《青年杂志》第六期，刊登了易白沙的两篇文章，其中就有这篇著名的“反孔檄文”——《孔子平议》（上）。文章里揭露了孔子思想被历代封建帝王尊崇利用的“秘密”，就在于“孔子学说”的四大缺陷：

<sup>196</sup> 《“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张星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sup>197</sup> 《孔子的德政和仁政》，徐济芬，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p=38708>。

<sup>198</sup> 《赵逸之：漫谈哲学兼评陈丹青先生非孔子说》

<sup>199</sup> 易白沙，他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的第一人，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帝王春秋》的编写者和《新青年》的撰稿人。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

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

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易白沙的文章一发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帝王春秋》，易白沙深刻地揭露了历代帝王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这十二个方面的恶行，批判“人治”而非“法治”导致的专制、黑暗、腐朽。

我熟悉的余英时<sup>200</sup>在哈佛本来可以好好学习西方历史和思想，他偏偏研究中国思想史。他后来特别后悔。余英时不学习西方历史和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不懂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吴于廑<sup>201</sup>和周一良<sup>202</sup>语言能力也差，马克垚<sup>203</sup>先生语言能力勉强，钱钟书语言能力可以，但他偏偏不正儿八经学习西方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瞎折腾中西思想比较。国内太高估余英时的学术地位了。余英时和钱穆、杨联陞他们都不能理解中国专制历史。杨联陞批判魏复古水利工程的专制制度浅薄至极。余英时歌颂的儒家士大夫真减少了皇权专制？钱穆和余英时这些人歌颂中国士大夫怎么得了？他们知不知道“再无一人是男儿”？余英时还胡谈中国思想史的四次突破<sup>204</sup>，中国思想史毫无突破。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是他自己都认为最糊涂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余英时把儒家精神看成资本主义精神。笑死人！儒家的本质是极权主义专制统治的三纲六纪。三纲六纪的伦理能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产生吗？不能。我1986-1989年在哈佛写博士论文《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也被儒家伦理骗了。余英时和我在1980年代的分析都是错误的。看了洛克《政府论》就知道儒家伦理和资本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余英时晚年对儒家的认识比较深刻：“儒家重公轻私、重义轻利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都是极端妨碍现代经济发展的。”儒家只能用于个人修身，儒家齐家都是荒唐的，更不用说治国平天下。而且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本人的著作《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本来就是把中国儒家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根据韦伯的观点，儒教和清教是两种相互排斥的理性思想，都试图规定一种基于宗教教条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重视自我控制和克制，并不反对财富的积累。然而，这两种品质所意味着的最终目标，被一个关键的区别所划分。儒家的目标是‘有教养的社会地位’，而清教的目标是创造‘上帝的工具’。信仰的强度和行动的热情在

<sup>200</sup> 余英时，哈佛大学史学博士，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汉学家。

<sup>201</sup> 吴于廑[qín]，世界史学家。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

<sup>202</sup> 周一良，中国历史学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者。

<sup>203</sup> 马克垚，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sup>204</sup> 《余英时 | 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50666074\\_567589](https://www.sohu.com/a/450666074_567589)。

儒教中是罕见的，但在新教中很常见。积极地为财富而工作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因此，韦伯指出，正是这种由各自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所塑造的社会态度和心态的差异，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而在中国的缺失。”“对于官场成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等级或地位。‘上等人’（文人）应该远离对财富的追求（尽管不是对财富本身的追求）。因此，成为一名官员比成为一名商人更受欢迎，并被授予更高的地位阶层。文人不关心财富，尽管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关心自己的地位。”“在中国，令人垂涎的是‘优越’地位，而不是利润。”在韦伯看来，清教徒辛勤工作而积累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这种观念和激情是儒家没有的。以上差别说明近代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在中国出现，而只在欧洲出现了。近代西方是诸国竞争、政教并列、权力分割、地方自治、自由市场、重商主义、海洋贸易、新教伦理、资本主义……

政治和文化意识决定经济，而不是相反。这是韦伯的贡献。中国文化意识（儒家法家道家）决定了中国政治，而中国政治和文化意识决定了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经济是由马列主义意识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定的。不过韦伯没有看到法家和儒家都是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皇帝专有资本主义。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皇帝专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怎么产生？现在赵鼎新的研究也是连门都没有找到，而且他还美化穷凶极恶的儒家。现在中国更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中国七十多年来都是社会主义。

顾准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思考，他全盘否定了忽视制度的加州学派：“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 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后，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 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

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

(3)在具备了所有的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如英国，产业革命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接受方式，可以分为法国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 50 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4)由此可以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 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 1894 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

顾准说得好：“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一个人不能跟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就在新旧之间挣扎，况且余英时受钱穆影响，对儒家有相当的同情和理解，被人视为第二代“新儒家”。

余英时晚年才醒过来，彻底跟中国旧文化切断，并且公开否认自己是“新儒家”。他曾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鸚鵡救火”的故事说：“我当时并不敢奢望可以感动天神来灭火，但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曾经侨居陀山的鸚鵡，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际尽一点心意。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我在香港所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点。”一九二九年，胡适曾把“鸚鵡救火”的故事引用在《人的权利论集》序言中，他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到了一九八八年，他即提出“儒学游魂论”，认为中国不可能通过复兴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礼仪、典章、法律、族规、家法等建制的儒学，已不可能在公共领域实现“治国”和“平天下”，他认为儒家最多只能在个人私生活里有点作用，在私人领域帮助“修身”。“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家思想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者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

求体现的问题。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儒者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但是由于儒者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凭藉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期内是不会散尽的。只要一部分知识分子肯认真致力于儒家的现代诠释，并获得民间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大陆上的民间社会现在也有开始复活的迹象），则在民主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儒家仍能开创新的精神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于儒家的新发展最多只能处于从旁赞助的地位，而不应直接干预。）近年来我对儒家究竟怎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覆思索。我所得到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似乎才可以避开建制而重新发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sup>205</sup>

周一良和吴于廑当年都没有好好读剑桥三史。他们抄袭苏联科学院的阶级斗争世界史，害我特惨。武汉大学本科期间，我跟哈佛毕业的武大吴于廑先生很熟，他坦白承认他不懂世界史。哈佛毕业的周一良更是不懂世界史，他的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国内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历史》简直是美国小孩都嘲笑的教材。国内连中国历史都必须按照《剑桥中国历史》来教。否则一定是误人子弟。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就不用说了。

陈寅恪也曾的确荒唐地坚持儒家“三纲六纪”。他要把中国复兴到赵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sup>206</sup>他曾经希望未来华夏之演化返回三纲六纪（奴隶制）的宋儒，他最害怕耶教在中国颠覆了儒教。（注意：陈寅恪先生不用梁启超臆想出来的中国，而用华夏。）1949年之后，他本人不按照三纲六纪出牌，写著作歌颂陈端生和柳如是两位女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陈端生（孟丽君）女扮男装考上状元，违背三纲六纪，这哪里是西方思想里的 liberty 啊？！哭笑不得。这不过是放纵自己而已，陈寅恪的自由其实是庄周和陶渊明的自由。陈寅恪在儒家三纲六纪的专制里提出自由独立，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离开私有产权、法治、宪政……就不可能用有独立自由。陈寅恪长期游学日本和欧美，但陈寅恪完全不懂产权、法治、自由（群己权界）和宪政；陈寅恪先生对罗马人的看法也太不全面，现在全世界也还是罗马遗产主导的世界，中国人哪里有罗马共和国的法治精神啊。同时他治学没有章法，完全不知道如何写学术论文。他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白呆了，而且他的外文写作太差。除了德文，陈寅恪的英文也不是太好。他对西学其实是完全不通。

<sup>205</sup> 引自《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载于《现代儒学论》，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sup>206</sup> 出自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的序。



陈寅恪留学的时代最是不幸，因为欧美人客气，似乎请梁启超和辜鸿铭<sup>207</sup>开出拯救世界的方案。辜鸿铭还恬不知耻地大胆鼓噪用儒家救欧美（请看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此时，欧洲已经有斯宾格勒<sup>208</sup>胡说八道的《西方的衰落》。让我们欣赏尼采、柏格森、蒙森、弗洛伊德、罗素、波尔、爱因斯坦……其实1900-1940年代乃欧洲文明鼎盛时期，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

陈寅恪的缺陷就是留学欧美的中国人的通病。博学的中国人往往最喜欢极权主义体制。钱穆就是另外一个例子，钱穆怎么把皇帝专制看成了民主制？在哈佛经济系学习的中国人只有许成钢和我理解英美宪政，其他都是无知荒唐的政治混混。不过，在根本问题上士大夫之无耻沉默，是谓国耻。陈寅恪没有沉默，特此表扬他，这一点我之后会谈。另外，陈寅恪预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陈寅恪先生的确预料到了今天。我从1994年以来就这样看。

列文森<sup>209</sup>是一位比较理解中国的学者。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断言，儒教已经失去所有的现实意义，儒学所代表的儒家传统在近代已经死亡，如今儒学只是一种“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已。因为在儒学体系中无法产生现代民主，儒学已随中国的旧时代一起“走入历史”。列文森具体指出：“在本质上儒家是反对多数统治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多数统治具有无人格的、数字上抽象化的味道。但是，如果不是数量上的多数统治，那必定就是权力上的强者统治，而权力的强者统治，并不比无人格的数字上的多数统治更符合儒家的要求。不像那些无脸面的芸芸众生，皇帝仍然具有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成了皇帝的依附者。当一个王朝还能正常运作时，他们便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但这也掩盖统治的真实基础。当儒家虚伪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将道德献给皇帝时，他们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然而正是这一君主需要，并只能由儒家制定的道德，是儒家自主性的标志——说得难听一点，是君主和儒家相互依赖的标志。”<sup>210</sup>列文森的见识远超费正清和其他想得到中国签字的欧美汉学家。看看兰德斯《国富国穷》里一百多年来的欧美汉学家的嘴脸。

黄进兴<sup>211</sup>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虽不是个人宗教，却是国家宗教。黄进兴从明清两个朝代遍布中国的孔庙和孔子的“头衔”“谥号”（外号）深刻说明了孔教的宗教性。孔庙制度是帝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也

<sup>207</sup> 辜鸿铭，中国学者、翻译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

<sup>208</sup> 斯宾格勒，德国哲学家、文学家。

<sup>209</sup> 约瑟夫·列文森，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ather”讲座教授。

<sup>210</sup> 引自《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列文森，邓大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sup>211</sup> 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史华慈和余英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一根主轴。中国各地孔庙的建设是明清皇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的国子监和孔庙充分体现了孔教的宗教性（国家宗教或皇家宗教）。现在中国复兴孔教是一个国家大工程，所以余英时晚年才出来批判儒家。现在我们明白余英时是多么后悔搞儒家学问了吧！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君子言义不言利、不患寡而患不均……几千年中国人的宗教是君主教：崇拜皇帝、天子、君父和圣王四面一体。儒家是中国帝王一个人所有制的宗教：自己自私还不让别人自私。

法家刑治主义、儒家三纲六纪的奴才主义、道家的愚民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全能治理主义都是秦汉政体统治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而今天中国还有奴才鼓吹这些历史垃圾。看赵鼎新这个白痴的《儒法社会》把我笑死：儒教这种没有God的世俗破烂怎么能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竞争？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一直有儒教，它们的人民怎么越来越多地信仰基督教（韩国已经是基督新教国家）？日本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南朝鲜已经是基督新教国家。谁怀念法家的刑治主义、儒家三纲六纪的奴才主义、道家的愚民全能治理的权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让中国惊讶：我们怎么是马列主义文明？我们自己的古老文明（作为政治宗教的儒家）怎么被打倒了？在世界上，法家怎么拿得出手？不过马列与儒家还有一定关系呢“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对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发生了一种接引的作用。首先，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其次，儒家还有一重要价值，就是‘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公’是善，而‘私’是恶，儒家没有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的观念，这又构成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sup>212</sup>看看陈来<sup>213</sup>《仁学本体论》就知道他为什么跪舔儒家。儒家入门小学生杜维明<sup>214</sup>从哈佛到北京大学也具有政治目的。学术？王沪宁<sup>215</sup>亲自出马管儒教。大家看看陈来给党中央讲课，如果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没有《邪恶本体论》来互为补充，那整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就无法理喻了。

## 法家统治下的停滞社会

洪秀全自称天王，他的权威来自基督上帝或天。他全盘否定了几千年皇帝乃天子的理念。尤其好玩的是：洪秀全是所有中国皇帝或天子的王呢。洪秀全把儒家看成寄生虫，而不是有用的走狗。没有曾国藩，洪秀全早推翻了清朝皇

<sup>212</sup> 引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郭齐勇，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3143.html>。

<sup>213</sup>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sup>214</sup> 杜维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sup>215</sup> 王沪宁，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帝，他成了中国的天王。可以想象，洪秀全用基督教代替了儒家。但不可以想象，洪秀全天王抛弃全能治国理政的法家。佛教都能盛行于中国，何况洪秀全天王的基督教。陈寅恪念念不忘的宋朝儒家值几个钱？！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被荀子和董仲舒纳入了三纲六纪之中。这样，三纲六纪完全符合法家全能治国理政的观念。其实，儒家不过是法家的孝顺走狗，而且儒家几千年一直最喜欢当走狗。

法家的法本质上是毫无法律的暴政。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统治者可以随意颁布恶法（政策）；统治者制造单一的全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组建一个领袖控制整个社会的唯一政党；统治者垄断军事武装；统治者垄断警察公安；统治者垄断通讯、媒体和言论；统治者垄断所有社会的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法家不仅让统治者害怕人民，更让人民害怕统治者。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法，刑也。”商鞅之前的李悝著有《法经》，它其实就是《刑经》。《周礼·秋官·大司寇》：“刑乱国用重典。”郑玄注：“‘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中国传统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看清楚了吗？没有法部。所以商鞅变法等于商鞅变刑，商鞅变刑就是依据李悝的《刑经》。“刑”字，本意是“杀”或者“切割”，强调的是“惩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本没有西方人 law 乃自然规则、自然规律的意识。把西方人的 law 翻译成中文法（即刑）或刑法实在是侮辱 law。中国法家为什么最反对法治？1：法治指法律高于一切，特别是高于权力，而法家的法是统治者任意惩罚或奖赏被统治者的工具。2：法治指所有人（包括君王）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法家的统治者从来不受法的约束，统治者总在法家的法之上。3：法治意味着宪法是人的权利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权利的源头。法家却认为统治者是法的源头，即统治者可以制定新法和废除旧法。

在法家理论之下，法是专为人臣守的，君主不须守法。丁学良<sup>216</sup>：“法家的〈法〉实为〈罚〉，即惩罚君主之下的任何人。君主只要持术。君道持术，臣道守法。层层统治，有层层的君臣。对于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只是在道义上，所望者只是多出圣主贤君，君主能够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说革命一件事是合于道德的，却不能说革命一件事是合于法律的。并且革命之后，也只是从一个君主换到另外一个君主，而不是说人民有任何控制之法。迢迢三千载，政治虽有隆污之分，而其传说精神所在，仍然是这一点。”荀子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秦始皇当然同

<sup>216</sup> 丁学良，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意。“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sup>217</sup>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商鞅让君王怎么能不高兴死了啊。

荀子谈性恶而尊君。民众的本性乃恶，而君王是圣人：“非圣人莫之能王。”于是，根据荀子，中国后来的皇帝都是圣王。荀子还大谈圣王的权力不受限制，民众必须乖乖地服从圣王。叶适<sup>218</sup>说荀子谓天子如天帝、如神，这正是秦始皇的思想啊。徐复观<sup>219</sup>说：荀子尊君、重刑罚、重势（势就是权力）等思想飘浮着墨索尼里、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气息。中国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法家早为希特勒的全能统治（totalitarian regime）设计好了蓝图。如下总结不错“法家思想，《荀子》已见端倪，《商君书》继之，《韩非子》集大成。至少在《商》《韩》里，老百姓都不是人，和牲口一个样。牛养肥了是为了犁地，猪养肥了是为了吃肉，人，即使让他吃饱穿暖也是为了战争。”

朱元璋、洪秀全和毛泽东都特别赞成荀子的法家思想，他们也都推崇商鞅和韩非子。商鞅的治国理政方略：郡县制、户籍制、鼓励告密、实现连坐制、重新分配土地、建立职业化军队、压制商业、统一度量衡、强化君权。“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战陷则全家为奴。”刘邦攻陷咸阳后只说六字：“父老苦秦久矣。”

法家治国理政以暴力苛法、严刑峻法：“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

“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sup>220</sup>法家利用“恶政”和“暴政”达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的效果。因此，“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sup>221</sup>

法家治国理政重视“国、民交相胜”中的“弱民”观：即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进国退，民退国进：“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

<sup>217</sup> 史记·《商君列传》

<sup>218</sup> 叶适，南宋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

<sup>219</sup> 徐复观，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sup>220</sup> 《商君书·垦令》；《商君书·去强》；《商君书·画策》；《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饰邪》

<sup>221</sup> 《商君书·说民》；《商君书·去强》

弱；以弱去强者，强。”由此主张政治与法律要作民之所恶，倡民之厌，行苛暴之政，制酷重之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sup>222</sup>法家治国理政必“制民”：“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地。”并且要“以奸民治善民”：“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sup>223</sup>

中国几千年，皇帝一定剥夺所有权贵的财富，因为拥有财富的人一定拥有反对皇帝的权力。商鞅变法就专门剥夺秦国贵族。法家认为富贵商人“挟重资，归偏家”，与国家心存异心的宗法权贵混为一体，成为君主集权国家的离心力量。这种情况，即使尧、舜再世，也难于平治天下。所以，商鞅提出：“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sup>224</sup>于是乎，富商只能等死。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都如此。所以中国几千年没有私有产权。现在，中国也根本不知道私有产权。

商鞅强烈主张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采取刑治举措与农战精神的“壹教”政策。“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因为“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sup>225</sup>所以法家治国严禁妄议：“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sup>226</sup>在商鞅看来，社会上的文人智者辩士说客，犹如“六瞽”，应该坚决制止。“六瞽：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所以，在“国胜民”思想支配下，只有制止“六瞽”即礼乐诗书的传播，民众思想单一、朴实，专制政治及国家控制才将更易实施。“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秦民初有言令（变化了的律令规矩）不便者，有言令（变化了的律令规矩）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更何敢妄议孝公之中央？！看懂了吗？看懂了就要坚持发声。

<sup>222</sup> 《商君书·弱民》

<sup>223</sup> 《商君书·画策》

<sup>224</sup> 《商君书·外内》

<sup>225</sup> 《商君书·赏刑》

<sup>226</sup> 《商君书·弱民》

法家治国还大力奖赏告密和举报：“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sup>227</sup>最近“南航教师言论被学生无端举报陷害”<sup>228</sup>学生举报陷害老师正是商鞅秦国的拿手好戏。两千三百八十多年来，这种毒血一直流在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可耻啊。我们可怜啊。我们为什么如此邪恶？商鞅、李斯和韩非这些垃圾让我们自己坑杀自己已经邪恶滔天，而汉儒们又制造出三纲六纪让我们自己奴役自己。看看宪法的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法家治国理政必须让人人都折腾、必须运动不断、最好必须打仗：“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明君修改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持也。”因此国家必须予以禁止礼、乐、诗、书等于农、战无补之学。“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故其国贫危。”“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sup>229</sup>

法家这种刑治精神使人们对君主、国家、政府的权威、法令产生深重的畏惧感与无可奈何感。法家所谓的法是忽略人的社会性，违背人性的“恶法”。

管仲“利出一孔”即在中国全部实现国有制、彻底消灭私有制。管仲在《管子·国蓄》一书中说：“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韩非教君王把父母、妻女、子孙、兄弟、大臣……都看成死敌：“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sup>230</sup>

“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



<sup>227</sup> 《商君书·更法》

<sup>228</sup> 指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老师被学生举报课堂言论不当、崇洋媚外、不爱国。

<sup>229</sup> 《商君书·农战》

<sup>230</sup> 《韩非子·八经》

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所以，忠实执行君主之令，即是奉法，“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为此，韩非十分看重“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

231

“商鞅和韩非等人在具体的法治举措上主张对民众进行深刻的经济权利、思想权利的剥夺，主张加大国家与基层社会、政府与民众的权力距离，来‘卑民’‘弱民’‘愚民’，让民众始终处于远离权力的卑贱、贫穷、愚昧状态，让国家权力神化为高高在上、使民仰止、不可企及的政治高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使人民卑下屈辱，才能让他们看重爵位；让民众软弱散漫，才能使他们尊重官吏；使人民贫苦无依，才能使他们注重赏赐。而如果让民众富裕起来，使‘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人民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官吏，看不起朝廷赏赐。这就是‘民胜国’、‘民胜政’的原因，这样国家就要贫弱了。因此，以强力制民，以暴政驭民，以厉法贫民，以严刑卑辱民，视民如寇仇，驱民如牲口，就成为法家国家治理理论与政府权能思想的基本要义。这种思想，在商、韩等人的推动下，实际成为秦帝国的一种国家控制和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由于这种思想使国家处于与民众对立的尖锐立场上，由此秦国一开始就以赤裸裸的阶级性、排他性、功利性代替了一种以‘中立’姿态呈现的国家进行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群体性、‘超越性’原则，并且还将这种狭隘的排他性、功利性原则作为其国家治理理念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去。所以，商、韩等人所建立的国家政治价值观，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孤家寡人’型政治体制的价值观体系。”<sup>232</sup>

商鞅和孔丘一样，奴才都是自己折腾死自己。五千年没有一个不是坚定不移地走奴才路线。不过商鞅远不如李稻葵和林毅夫：李稻葵发明政府经济学，林毅夫天天鼓吹政府干预经济学，法家全能治理政府在经济学里的表现就是有为政府。学了一个小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自由、产权和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政府是经济学里的利维坦。周雪光和赵鼎新也都避开中国法家本质来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这些人都是想继续在中国混饭吃，中国法家正好是施密特的法西斯理论。周雪光连中国的全能社会制度都没有搞懂啊。装无知？还是政治投机？我看了他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太差劲了。看看郭迪和许成钢对中国制度的介绍<sup>233</sup>，这比周雪光厉害多了。周雪光搞中国研究，丑死人。在斯坦福研究中国一定是水货，厉害的人都研究美国和欧洲。周雪光不知道中

<sup>231</sup> 《韩非子·问辩》

<sup>232</sup> 李禹阶：《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理念——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的结构缺陷》

<sup>233</sup> *Is Today'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of Yesterda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magazine/china-today-becoming-soviet-union-auguring-economic-failure-by-di-guo-and-chenggang-xu-2022-12>。

国制度的本质，他跟周黎安一样掩饰。陈玉宇就敢于说真话一点。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的理论模型，他们的东西都是废物。社会学跟着经济学后面爬行，厉害的人搞经济学。中国是全能治理体系，中国不是威权主义。这是周雪光和周黎安故意掩饰。他们需要在国内混饭吃。

中国两千七百多年的法家统治使中国人习惯了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家是古老的，法家也是最现代的。法家的发明创造是经验性的、科学的、逻辑的、历史的：国家是统治的机器。法家全面刻画了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家的学说是从上到下革命的社会工程理论和实践。法家是国家官僚体系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法家更是人类行为理论的创立者。全世界的国家治理体系方式都被中国二千七百多年以来的法家发明创造出来了。法家其实就是科学管理理论。一段精彩发言：“几千年来，中国法律本质就是严刑酷法，道德就是三纲六纪。两者皆服务于政治统治。个人需要绝对服从，肉体及精神上的。秦灭六国，汉武尊儒，便消灭了历史中的个人精神。这便是黑格尔说中国不在世界史范围之内的原因。”刘小枫也承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给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迄今没有消除的压力。”我看他最近十几年都在写垃圾。

马克思早就毫不留情地斥责洪秀全：“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法家的目标：变法是为了巩固国家权力，发展经济更是为了巩固国家权力。权力是目的本身。法家现在利用市场也是为了巩固国家控制。

老子和庄子跟共产主义一样根本不需要当代经济学。余英时说道家（老子道德经）的本质是阴谋权术。他最烦道家的黑暗权术。法家臭名昭著，他不谈。他看到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都走西方文明的道路了。道家的圣人怎么处理人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奴隶们好好吃饱喝足去干活。奴隶们醒过来就会竞争、盗窃、捣乱。奴隶们一直不醒过来，他们就无知无欲，天下大治。“虚其心”=让人民的自由思想见鬼去吧；“弱其智”=让人民的独立人格见鬼去吧。“无为而无不为”是什么意思？无为也是为了控制一切（无不为），即无所不为的全能治理权术，也可以叫韬光养晦。这就是道家的本质，



统治者当然欣赏。无为和有为的数学模型是我的贡献之一。作业：大家把无为和有为也数学模型化。

总之，中国的法家、儒家、道家思想里没有丝毫希腊-罗马的自由、法治、产权和共和。

## 官魂、匪魂、奴魂

鲁迅过瘾<sup>234</sup>，中国人只有官魂、匪魂和奴魂啊。鲁迅谈的“三魂”是官魂、匪魂、民魂，其实他省略了一个魂也就是他一直批判的一个魂“奴魂”：“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一一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sup>235</sup>民族魂=官魂、匪魂、奴魂三位一体，鲁迅不是民族魂，鲁迅知道中国人的匪性和奴性，鲁迅知道中国人五千年都是官魂、匪魂、奴魂三位一体。不过鲁迅改变不了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一说话，我就知道我们摆脱不了当奴隶-官匪的本来面目。厉以宁对光华管理学院讲话：他行道家，副院长和系主任行儒家，教授员工行法家。他的品德如此而已，中国人再有学问也是这种 mafia（黑手党）意识。儒家、法家和道家都是官魂、匪魂和奴魂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鲁迅骂了中国人之后 100 年，中国人还是一模一样。

中国五千年历史官魂、匪魂、奴魂三位一体，这是中国历史的 essence（本质）。官魂、匪魂、奴魂怎么把每一个人都控制死了？当一个灵魂里有这三魂时，这种灵魂难道不是死魂灵吗？施一公、钱颖一、饶毅……他们回中国都

<sup>234</sup>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附录 2.1。

<sup>235</sup> 节选自《学界的三魂》载于《语丝》第 64 期，鲁迅，1926 年。

是去摸钱当官。俄罗斯为什么学术衰败？他们厉害的人都来美国了，他们差一点的也去欧洲，中国也一样。不过这种三教九流货色回中国两亿也无所谓啦。美国人才太多，施一公这样的人回去一万个也不能把中国的生物学搞上去，他回国是为了忽悠中国的钱。钱颖一这样的人回去一亿个，也不妨碍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因为他和李稻葵都研究水货国家的经济，这些人丝毫不懂美国经济。

美国人崇拜钱，中国人崇拜官（money too）。马克思说了金钱拜物教，他了解中国人的钱魂、官魂、匪魂。儒家和法家没有死，系主任、院长、校长被任命都是吹牛皮，真正的数学家、经济学家怎么会当这些玩意儿的官职。你问中国的钱魂哪儿去了？钱魂是官魂、匪魂、奴魂的儿孙。

施一公回国以后不好好搞学问而去当副校长、校长和公司董事长，他自己还批评他的学生去金融公司，自欺欺人。丘成桐先生说得好：“施一公在西湖大学的演讲值得大家注意，可以发表在一流杂志的文章未必有历史价值。”其实施一公自己发的顶级刊物论文也没有多少价值。他没有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他只能在中国忽悠。丘成桐先生想让国内的人在国内培养成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太辛苦了！

为什么钱颖一把清华经管学院办成了一个水货学院？因为钱颖一根本不知道经济学是什么。钱颖一在美国大学研究中国经济，这是水货啊。他丢中国人的脸：哪里有智力健全的美国人研究中国经济？美国佬研究中国经济的都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何况中国人！中国人在美国大学讲中国经济，这是侮辱中国人。我的哈佛学弟们在美国天天研究中国经济，大家说他们是不是应该自杀？来哈佛要研究美国经济学的最前沿啊。中国人来美国学历史、哲学、文学的后来都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没有哲学）和中国文学。草包一大堆。我在哈佛就骂他们。有人问我“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智力健全的美国人，就不会认可中国经济的研究价值？”Yes。There is nothing new about oriental despotism and totalitarianism（是的，东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下从来没有新鲜事）。1983年我和杨小凯一起去美国读博士，我们发誓要搞美国主流学问，绝不搞中国经济。钱颖一回国以后都在摸钱、摸权、摸女人。经济学显示偏好理论表明：钱颖一毕竟是一个非学术混混，这种混混，不干正经学问。白重恩是更大的水货白重恩根本不懂财政。他在哈佛连财政和宏观专业都没有学过还在国内大谈财政。我的哈佛学弟们都是鬼混招鬼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中国人在美国研究什么中国经济啊。不要脸！李稻葵也不搞学问。院长们带头不搞学问，其他人怎么会搞学问？我们记住，搞学术的人当官是一种最大的罪恶，一堆奴才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国家。

施一公和钱颖一都是吹牛皮第一。在美国，这两个人算什么鬼，普林斯顿

大学里的烂教授多啊，哈佛大学的烂教授更多，这些人回中国都是欺骗老百姓。马毅和颜宁也都是水货才回国，就像施一公和钱颖一他们一样。饶毅本质上也是一个回国的太监，他不过是比更厉害的太监好一点。饶毅驳斥张文宏是太监之间的争吵，这是官魂、匪魂、奴魂三位一体的最好的体现。张文宏和饶毅他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中国人之间也没有分歧。中国人几千年只跟秦始皇有分歧，因为秦始皇没有在中国建立共和国。

谷爱凌加入中国籍好啊：她是学习钱学森、杨振宁和姚期智……美国媒体怎么能攻击她的自由选择呢？她今后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她至少可以当一个体育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和饶毅都当校长了）或国家体委主任。谷爱凌加入中国籍并参加比赛不是为了钱，她是为中国拿金牌，没有钱，她一样干。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妮基·海莉公开站出来批评谷爱凌，她说得极为简单：“出生在美国，但代表母亲的祖国中国参赛的谷女士必须‘选择立场’。你必须选边站，因为你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中国人，他们是非常不同的国家，”“每个运动员都需要知道，当他们插上自己的旗帜时，你是在支持自由，还是在支持侵犯人权。没有中间地带。”美国脱口秀爆火的主持人马赫尔骂谷爱凌，美国共和党 2024 年总统候选人妮姬·海莉骂谷爱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骂谷爱凌……这些人让众多华裔美国人日子难受。谷爱凌既然加入了中国籍，她为什么不放弃美国籍呢？中美冷战，华裔美国人哪里能做到中美两国通吃？

谷爱凌最大的优势是知道特多美国女人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她今后完全可以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正好需要女人当最重要的政治家。我刚刚才知道谷爱凌根本没有放弃美国国籍就为中国比赛，那她远不如钱学森、杨振宁和姚期智。我这个中国人感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大家多关心中国被拐卖的妇女和女孩，谷爱凌如果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套利，她什么都不是。

不认识世界自由文明，还说自己是搞一辈子学问，鲁迅和胡适才是人，其余的都是猪。鲁迅思想里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斗争主义、尼采主义、反专制主义、反儒教、反法家、反道家、反佛教……也最为强烈。毛泽东也最欣赏鲁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sup>236</sup> 这完全是尼采的语言。尼采是重估一切价值观，尼采最反对奴隶的价值观，尼采怎么会瞧得起希特勒这样的蠢货！尼采不仇视犹太人呢。

“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

<sup>236</sup> 《纪念刘和珍君》载于《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鲁迅，1926。

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sup>237</sup>鲁迅笔下的刘和珍是极少数啊，鲁迅也不懂中国青年。遗憾。鲁迅一生被中国青年骗了不知道多少次。跟着鲁迅的榜样，钱理群一辈子也是寄希望于青年，后来他发现青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钱理群读西方政治、历史、法学、经济、哲学、文学、社会学的东西太少了。这也是鲁迅的毛病。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負責任’等类的嘲笑：‘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負責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sup>238</sup>鲁迅说他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看人走了，然后骂骂咧咧。当然精确，不越雷池半步。专心表演，绝不苦练内功。自演自嗨，不惜民脂民膏。”<sup>239</sup>柏拉图说国家（城邦）的灵魂跟个人的灵魂是一样的，诚不我欺。鲁迅在中国也是死受罪：谁叫得醒阿Q？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履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 Gogol 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sup>240</sup>法家其实是世界上极端暴政的最早倡导者，因为法家把法作为惩罚工具，更因为法家把恐惧视为政治控制的最有效的手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什么收缴天下兵器？因为秦始皇这个流氓想当独裁暴君。唐朝和宋朝也都是极端专制独裁的帝国，根本不存在自由、法律统治、产权和宪政，它们没有文明。“强取豪夺的王，最终会逼得百姓向神哭求，救他们脱离王的暴政”（《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 8:18）。

然而事实就是：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也就是大部分民众默许的受奴役的状态。罗马共和国的口号是“诛杀君王”，因为君王即暴政。

<sup>237</sup> 《一觉》，鲁迅，1926。

<sup>238</sup> 《不負責任的坦克车》载于《申报·自由谈》，鲁迅，1933。

<sup>239</sup> 《阿Q正传》，北京《晨报副刊》，鲁迅，1921。

<sup>240</sup>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鲁迅。

公元前四十四年，恺撒想当君王，六十六个元老院的元老把恺撒刺杀。中国人自己的自由都是被中国人自己剥夺的。中国历史五千年就是中国人自愿为奴的历史。疑问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放弃自由，接受这种受奴役的状态？

“你看无数的民众被迫服从，而且自动效劳，不但受暴政控制，而且受它的压迫和奴役，以致弄到没有财产、亲人、妻室儿女、甚至生命本身，总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认为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所容忍的掠夺、淫佚和残酷的行为，却并不是来自军队，也不是来自即使流血牺牲也应加以反对的野蛮人，多半是来自全体人民中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最卑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的。

所有这些灾难。这种破产和毁灭的局面并不是许多敌人造成的，而是一个唯一的敌人造成的，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的强大。你们的这些统治者，只有两只眼睛、一双手、一个身体。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那你们就自由了。我并不要求你们攻击他、同他搏斗，我只要你们不去支持他，你们就会看到，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地基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坍塌下来，而且被砸得粉碎。

人们最初是受迫供人驱使的，是为强力所征服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也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这时人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有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继、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满足于继续在他们出生的环境下生活，除了已经得到的权利和幸福以外，也不想多所欲求。然而没有哪一个遗产继承人会如此挥霍和懒惰，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其他人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从他的前辈身上夺去了什么东西。”<sup>241</sup>

因为人在专制独裁暴君下长期生活必然失去人性。(The corrupting effects of living in tyranny were more abhorrent and disgusting than the oppression itself) 这是罗马帝国给美国国父们最大的启发：罗马帝国专制暴君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而且抢走了人民的 Virtue/Manliness! (德行/男子气概)。The fear of witnessing another Roman Empire was as essential to produ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the hope of creating another Roman Republic! (对见证另一个罗马帝国的恐惧，与创造另一个罗马共和国的希望一样，对美国革命的产生至关重要!) 美国国父们宣布从英国独立就是害怕北美殖民地人民习惯了一些小小的暴政 (如违宪的小税收)，习惯了小暴政就会导致慢慢习惯 horrifying degradation and depravity (可

<sup>241</sup> 引自《论自愿为奴》，艾蒂法·德·拉·波埃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怕的自尊的堕落和道德的堕落)。失去了 Virtue/Manliness 的人必然自愿为奴，这才是比压迫本身远要可怕和可恶的腐蚀性结果 (corrupting effect)。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公民”当然失去了罗马共和国自由公民的 virtue/manliness。美国的国父们对专制暴政的认识真是洞若观火，在五千年专制暴政的腐蚀下，中国人根本没有 virtue/manliness。中国人自然变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动物，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儒家、法家、道家都是自愿为奴。

当年杰斐逊苦思冥想是不是应该把财产放在自由之前，亦或把自由放在生命之前。<sup>242</sup>可是生命就是财产！如果是选择 life, property, and liberty (生命、财产和自由) 的顺序，英文读起来是一个胆小鬼啊……最后，杰斐逊选择了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顺序。如果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里把财产放在自由之前，美国人不会造反的，中国人写文章怎么摸到英美人的灵魂啊。所以按照杰斐逊的说法，中国人还是先活着，当好守财奴，最后放弃自由。还是迪斯雷利 (Disraeli) 说得好：men are not the creatures of 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s are the creatures of men. (不是环境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环境) 我们要创造中国的 property rights, liberty, and the rule of law. (私产、法治与自由)。

好像新一代中国人都不看《鲁迅全集》，奇怪啊。我从十二岁起就离不开鲁迅，从初中开始，我就爱读鲁迅全集，因为中国人的一切都在里面。我十二岁读高中，十四岁 (1976 年) 高中毕业之后等了一年才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初中到高中四年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让我对中国历史上瘾了。除此之外很幸运，我初中的老师就借给我他们冒险收藏的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瓶》，闻一多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学问。

我这一辈子买了十多套《鲁迅全集》，分别放在我的武大家里、北大家里、中央财大家里……我在美国也有几套鲁迅全集，却很少去翻看，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差别。我更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不都看一遍柏杨白话文版的《资治通鉴》。此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典，更是鲁迅全集的全面展开。我在中国好像一天都离不开这套书，难怪毛泽东都那样喜欢《资治通鉴》。当然，我和毛泽东理解的角度完全不同。能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学生难道还要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统一教材？这些编写教材的人自己搞懂了二十四史没有？如果搞懂了，他们还会相信教材？司马迁《史记》八书都是极权主义控制中国人的记录。中国历史必须按照中国人具有的所有观念来写：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汇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比帝王将相的历史不知

---

<sup>242</sup> 指的是杰斐逊撰写《美国独立宣言》。

道要伟大多少。让中国人成王败寇的意识见鬼去吧。让帝王将相的家谱见鬼去吧。我们看的二十五史都是虚无主义的历史，因为二十五史里面没有普通民众。听说现在课本去鲁迅化运动卓有成效？因为 Emperor 回来了！

“人肉宴会又开始了！”

这些天，鲁迅要我们天天看他的《狂人日记》。

### 第三节

## 秦汉与罗马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

先秦之后秦始皇把他自己的野蛮秦国的商鞅、李斯和韩非的制度推广于华夏，文明竞争死了，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和宪政都没有在华夏萌芽。罗马帝国包容一切文明，让它们在法治之下互相竞争，于是野蛮的英国、法国、德国……都有了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宪政。直到今天，华夏文明不能产生任何新思想，因为秦汉大一统只能在酱缸文化里苟且偷生。

“自夏、商、周以至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独裁专制的家天下时期，国家成了上自天子下至诸侯‘牧民’的工具。那时，国家林立，战争不断，互相杀伐吞并，得‘道’者国兴，失‘道’者国除。国兴时百姓纷纷聚集。国亡时百姓作鸟兽散。各国君王四处网罗人虽然才，吸引百姓，扩充势力。有抱负的学者士子遍游列国，寻求施展才学的机会。其时也有‘与子同仇’等爱国精神，



有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不食周粟的壮举，但人们大都遵从‘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实用主义原则。鲁国的孔丘离鲁兜售儒学，不被看作叛国泄密；齐国的孙武为吴国所用，不被认为是齐奸忘记祖宗；甚至伍子胥依托吴国，灭了自己的故国楚国，也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恶。自秦并吞六国、统一了中国，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后，君王已无竞争对手，可以放心大胆地‘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骨肉，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时国家的概念才随着君王地位的日益显赫凸显出来；忠君爱国之类的东西，才被一些贪图蘸取君王盘中残汁剩羹的卑鄙文人炮制出来，成为强制百姓必须遵从的正统官方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可耻的程度：“‘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非常直接地彰显了秦帝国的扩张性。相信其政治空间没有边界，正是因为存在有助于人们追求其普遍欲求并且有其自然根源的秦法。人们接受秦法，即蒙受秦德恩泽，是一件非常主动、愉悦的事情：‘欢欣奉教，尽知法式’”。<sup>243</sup>

楚国的湖南人和湖北的人现在还说“不服周”：绝对不服从周天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的项羽和刘邦果然消灭了秦国。屈原何必冤枉死啊，后来楚国人真灭了暴秦呢！屈原不死，至少可以多写几首楚辞，让后来研究楚辞的人多一点就业机会。

屈原的自我吹嘘：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sup>244</sup>

正则既然如此高贵，那就取楚王而代之啊。灵均何必投水自杀？从头到尾都是怨妇喊冤而已。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美政？什么是美政？屈原哪里知道啊！清代满族人牛皮轰轰的时候还不是割地给俄罗斯帝国和日本。1949年后，我们还让外蒙古独立了。历史没有逻辑和规律。

<sup>243</sup> 《秦德与秦法——从秦始皇刻石看秦王朝的帝国叙事》，微信公众号，历史与秩序。

<sup>244</sup> 出自《离骚》，屈原。下方的也是。

于是“秦成为始王起步入了一个长达二千多年，以争皇权和保皇权贯穿主线的历史，君以商鞅理念驭民，以儒家思想驭臣。帝王的思想植入君臣的基因，百姓的脑海唯有人民的理念，两千年年不知公民为何物。”梁启超“二十四史尽家谱”的立论道出了二千年来的中国之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等充栋史籍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的客观事实：“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关系到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帝王将相这些与王朝兴衰相关的英雄人物，占据了历史叙述中的绝大篇幅，而其他领域只依附其上而约略提及。即便是梁启超，终究也没能超出‘据乱、升平、太平、世渐’的历史叙事视角。这是千年帝制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天下观所固化出的正统史观、英雄史观长久占据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制高点，成为无形的束缚和枷锁，所以即便稗官野史、私人笔记都难脱叙说治乱兴衰、帝王将相之窠臼。‘二十四史尽家谱’实在是历史之必然。”在自由的国家，人塑造国家；在专制的国家，国家塑造人。

柏杨<sup>245</sup>说：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是禽兽王朝。太对了，请问秦、汉、隋、唐、元、明、清，哪一个不是禽兽王朝？哪个朝代不是国富民穷？从秦朝开始，皇帝领袖一直是恶贯满盈的小人，所有皇帝都是流氓。

刘邦、朱温、朱元璋……不读书，他们照样当皇帝。“刘邦称帝后问父亲，你的儿子当中谁最有出息？刘邦出身于农家，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吃喝嫖赌非常无赖，他父亲批评他不如他二哥对家贡献大，后来刘邦夺取天下，有次给他父亲祝寿，笑着问他父亲：现在我和我二哥谁的贡献大？在坐大臣听了这话都高呼万岁，满堂欢笑。”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残酷冷血的流氓皇帝那么多？刘邦这一问事实上暴露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全部意义：中国所有人和物都是皇帝一个人所有；刘邦的父亲当然也是刘邦的奴才。

中国人几千年都以为秦皇汉武厉害。美国人随便可以骂总统，可以朝总统扔鸡蛋和鞋子。法国人可以给马克龙总统一耳光。中国人一发言说美国总统是痴呆或疯子，我就知道中国人三千年奴才理念出来了。中国人看拜登痴呆得兴奋死了。拜登讲到激动之处，脱口而出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指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特朗普总统发疯：“普京是一个天才。他入侵乌克兰就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中国人看来，痴呆的人才说出心里话，疯子和痴呆的人才说真话，聪明的中国人不说话。普通美国人当总统是美国人的幸福啊。美国人绝对不会选一个厉害的哈佛大学教授当总统。欧美国家的人谁希望选一个比自己聪明、厉害的人当总统或首相？普京是俄罗斯专制国家的领袖。他是俄罗斯最厉害的人。

---

<sup>245</sup> 柏杨，中国当代作家，《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

钱穆还歌颂中国古代是民主制：宰相制衡皇帝。看看汉武帝杀了多少宰相之后，我们一起去剥钱穆的皮！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或对皇权能构成有力制约的相权，对相权的美好想像是钱穆对中国历史过于“温情”的理解和诠释。从秦代开始，宰相虽名为“百官之长”，却不掌兵权，且受御史大夫的监察；而六部九卿的任命权亦不在宰相手中，而在皇帝手上。若干朝代，如明朝和清朝甚至直接废除宰相制度。

有人说隋朝的杨坚开创了三省六部制，是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权分立体制。不对呢，杨坚手下的三权分立在杨坚手里得到统一：皇帝陛下从来不搞三权分立。后来的唐朝又是最无耻的禽兽王朝。唐朝李世民是第一大禽兽皇帝：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众人在玄武门杀了兄弟李建成、李元吉。

伟大复兴意味着汉武帝打匈奴，李世民当上天可汗（宇宙无敌）。我们现在还不敢打台湾？怎么征服美国和欧洲？在国际上丢死了啊。普京说打就打，我们中国人怎么天天浪费武器搞演戏？



胖死的隋炀帝和李世民离不开女人、太监和肥油。肌肉男奥古斯都和华盛顿离不开刀剑。

唐朝武则天开创铜匱及告密制度。“武则天初登大宝，反对者甚众。为宣告自己的权威之不可挑战性，武则天在朝堂上公开架设油锅，有反对者便当场扔下油锅，在皇宫前则立下铜匱一只，令天下人皆可下情上达，使造反派无所遁形。铜匱的设立，使任何异议不经司法部门和正常的传送渠道便可直呈君主，三省六部等同虚设而天下告密之风大起。”<sup>246</sup>中国历史全部都是这种狗屎玩意儿，翻开都恶心。远离酱缸卑贱残暴冷酷下流吧。禽兽武则天这是给斯大林讲课，禽兽武则天活在今天啊。

“北宋的首都开封城里住着两个皇帝，一个徽宗一个钦宗，这是大宋建国从来没有过的场景。”这算什么，斯巴达共和国国王两个；罗马共和国首席执行官

<sup>246</sup> 《武则天的铜匱及告密制度》，<https://www.gugong.net/zhongguo/tangchao/14010.html>。

官两位；罗马帝国的皇帝有时是四个呢！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1206 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征服金国后开始大举入侵南宋，南宋军民拼死抵抗，直到 1276 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占，1279 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宋末帝赵昺随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十万军民为什么跟着儿皇帝死呢？忠君不是爱国啊！陆秀夫和十万军民至少可以杀敌至死。忠君不是爱国，君王皇帝都是吸血鬼：他们多活一天，他们就多折磨死不知道多少人啊。姚洋把全过程民主的中国和皇帝极权主义的赵宋年代相比是什么目的？宋年代过好日子的是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僚奴才，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凄惨无比。陈寅恪他们要复兴宋朝，但宋（960-1279）只是辽（916-1218）-宋-夏（1038-1227）天下体系和金（1115-1234）-宋-夏天下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澶渊之盟比较接近威斯特伐利亚之盟。更需指出，汉朝和唐朝也远不及元朝和清朝的天下。姚洋是投机混混。他在国内讲党课，他在国外发论文说中国专制。

到了明朝，看看朱元璋的“公”有制天下：“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 1570 到 1580 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 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 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 12%。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 1644 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

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sup>247</sup>

读朱元璋《严光论》<sup>248</sup>

淮右布衣鼎天地，

偃兵息民主黔黎。

立纲陈纪征才亟，

卷而怀之绝希冀。

洪武威风严子陵[1]：

若无朕恩驭治世，

岂有乐钓飘然逸！

冥栖岩滨乃君赐，

竹干青悦名誉觐。

用心无处不筹量[2]，

谁敢绝尘无绊羈。

南山悠然菊花刹，

门塘依颺五柳齋。

卢生避世深幽迹[3]，

吞霞玩丹服气悸[4]。

今朝亿兆修治平，

不须洪武来侦缉。

四海通报五洲启，

官运亨通雍财祺。

苍苍泱泱严光德，

怎见范公差愧歉[5]！

（[1] 朱元璋著《严光论》：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

<sup>247</sup> 《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张宏杰，重庆出版社，2020。

<sup>248</sup> 《读朱元璋〈严光论〉》，作者邹恒甫，作于2005年12月。《严光论》是朱元璋对退隐士人宣泄怒火的战书。皇帝是臣民的救星，对臣民有再造父母之恩，没有皇恩浩荡，哪儿有这些人舒适的生活环境？

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惠，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钓者君恩也！……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2] 引用朱元璋诗“卢汀洲隐浦”：泛入遥江渐渺茫，芦花飞落雪飞扬。天边云影浮舟静，村外秋光列雁行。觅隐谁知栖所在，用心无处不筹量。卢生避世深幽迹，故入沧浪野水乡。

[3] 再用朱元璋诗句：卢生避世深幽迹。

[4] 反用朱元璋诗“山沧溟隐谷”末二句：已绝世尘忘俗事，吞霞服气玩灵丹。

[5] 北宋官至宰相的范仲淹在路过富春江畔“严子陵钓台”时，徘徊良久，感慨不已：君为功名去，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在严州（今浙江桐庐）做官时，为严光修建祠堂，并亲自撰写《严先生祠堂记》一文。其文最后赞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一曰德），山高水长。”

清朝是天下的顶峰。满清只有一百万人，它却 conquered（征服）两亿汉人。中国被蒙古和满清征服后乖乖的。安史之乱后吐蕃征服长安如入无人之境，每次杀汉人十几万。五代十国时代，蛮族险些把汉人全杀光。我们就是不记住历史。康-雍-乾时代（1662-1796）拥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四亿人口（十九世纪初）。清朝官方文字按等级依次为满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和汉文。这五种文字都叫清文。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明朝才可怜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一万满族人通过中国奴才统治中国奴才，十万满族人当然可以统治 268 年啊。无政府的国家最难统治，英国无法征服爱尔兰，而英国轻而易举就通过印度人统治了印度。爱尔兰历来没有政府！满族一万人通过中国古老帝制结构和奴隶文化可以统治中国一千年。根本没人在意皇帝是谁，看看日本人统治中国人就知道了，日本人一样是通过中国奴才统治中国奴才。有人说“清朝文字狱给人带来了‘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恐惧和压力。”<sup>249</sup>在这种状态里，人的自我禁抑，自我删节（self-censorship）达到极点。How about today?（今天呢？）呜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如果没有西方帝国打开清朝大门，一万满族人就可以统治中国三百年。在 1853 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骂天朝上国过瘾：“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英国

<sup>249</sup>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

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 1858《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继续骂天朝上国的半野蛮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正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继续说：“中国这种自然经济抵触新的工业经济，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英国就是清朝的境外势力啊，马克思为什么歌颂英国用大炮轰开腐朽落后的清朝大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康熙大帝是这样回复莱布尼兹的：大清国不需要你来帮忙建一个科学院。你本人发明的微积分都在《易经》里呢。Celestial dynasty（天朝）到今天也不承认 universal values（普世价值），它承认用微积分符号已经是谦卑的谦卑。原子弹本来在《尚书》里就爆炸了好多次，今天我们自己也会马上搞出来自己的芯片！天朝承认西方奇技淫巧芯片实属无奈啊。

发下面这个简单历史事实的说明的女教授了不起啊！“对古代帝王尊重、热爱，是对所有战死、斗死、冤死、饿死灵魂的侮辱，如果我的这句话导致朋友圈中崇拜者的不快，请把我拉黑。帝王粉是这个国家最顽固的污迹，是这个国家黑心的永久添加剂。面对他们，我感到深深的无助与悲凉，因为他们，时间淘汰不了，真相教育不了，历史接受不了，教育解决不了。因为他们，我不敢奢望正义，只能祈祷仁慈。

他们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无法磨平的伤痕，是人类文明价值的绝佳反衬。江山自古以来就在那里摆着，不需要谁来打：帝王将相的后人中有的人，请闭上你的嘴，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告诉你，没有哪座山哪条河是你们父辈打下来的，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长江黄河昆仑泰山。你们的父辈只是占山为王的强盗，让你们坐享荣华，你自豪什么？

几千年的古代史就是一部奴役史！无论其梦想构建的多么宏大，也无论其口号包装的如何精美，概括起来无非就十二个字：打天下，坐金銮，睡女人，

抢财产。

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给人类贡献了 200 多个荒淫无度、恶贯满盈的皇帝，以及数以百亿计的愚民。英国开启了人类的工业文明，给人类贡献了 110 多个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美国开启了人类的网络时代，给人类贡献了 330 多个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就是中国跟英美的本质区别！

号称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说的是争权夺利与阴谋诡计；《水浒》说的，是打家劫舍与草菅人命；《红楼梦》说的，是风花雪月与醉生梦死；《西游记》说的，是只要你有足够硬的后台，再作孽也不会死，你的主子一定会来救你的，被打死的，都是没后台没靠山的。”<sup>250</sup>

这种简单事实还引起了不小争论？不可思议。难道我们中国人还要歌颂那些猪狗不如的几百个皇帝（有些人说是五百多个皇帝）？委屈。看看 Totalitarianists（集权统治者）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已经杀了多少人——纳粹和苏联的也集中营可以很大：如俄罗斯帝国和秦帝国。

法家大帝秦始皇的民穷国强思想是极权政治、法律和经济的核心。不过秦始皇本人没有思想。秦始皇思想是指秦始皇所使用的管仲、商鞅、韩非、李斯……的思想，是指他们愚民、劳民、疲民、弱民、贫民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恶法（律令）。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商鞅变法是法治。愚昧无知！法治是说秦孝公和秦始皇帝……都在法律之下。“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是朝廷的，朝廷也随时能拿走你的一切。所以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皆秦制，大盗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乡愿也。于是乎所有人为了生存和富贵，皆攀附权力和官员。”“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版图一直在变化，王朝不断在更迭，英雄人物在辈出，新品种食物在引进，工艺技术增多，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无论历史怎样向前，秉持秦制的统治者用商鞅、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赵鼎新、周黎安和周雪光不敢写《秦制两千年》<sup>251</sup>。孙立平<sup>252</sup>一天到晚啰嗦共同富裕干什么？秦制是让平民普遍贫穷小康，国家超级富强。平民普遍富裕，秦始皇怎么治国理政？看孙立平的文章有什么用？要看国外敌人的分析，因为国外友人（包括基辛格、斯蒂格里兹、萨克斯……）还是为了在中国摸钱。

秦始皇一世、二世、三世……万世的恶德成就了几千年来的千百亿奴隶。

<sup>250</sup> 来自厦门大学教授的朋友圈，曾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sup>251</sup> 《秦制两千年》，谌旭彬，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sup>252</sup>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奴隶连恶德都没有，因为奴隶害怕奴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sup>253</sup>海内外有名，其内容至简：自秦至今，专制也。现在我们能看懂这篇文章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在欧洲走向低落的同时，在中国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并非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中国是从二十世纪初因为苏联的十月革命才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发源地？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sup>254</sup>

习近平说的好，不过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一再强调：秦始皇和马克思是中国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秦汉唐宋元明清以来都是爬行，现在终于复兴了汉唐大肚子皇帝的盛世。中国现代化=秦始皇+马克思。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回到秦始皇时代才是历史的主题。中国与西方自由、私有产权、法治和三权分立的宪政文明现在也截然不同。中国的法治和西方的法治完全不是一个意思。Today's regime is much worse than 秦汉政体（今天的政体远比秦汉政体还差）。巴枯宁作了最深刻的论述：“We are convinced that liberty without socialism is privilege, injustice; and that socialism without liberty is slavery and brutality.”（我深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和残暴。）马克思的著作让 dictators 们的思想和主义丑陋不堪。斯大林看了 Maoism（毛泽东主义）都说它是山沟里的东西。马克思看了 Lenin、Stalin、Mao、Kim 的思想不会 commit suicide（自杀）吗？

一个国家的皇帝还在讲思想、炫耀思想、出版书籍。斯巴达人、罗马人……美国人会这样做吗？民众手里一个月才一百多美元，无知荒唐、无聊死了的没有思想的思想家还想建立国际新秩序。要是在美国，这种痴心妄想的思想家早被民众把皮都剥光了。非洲人更喜欢剥皮抽筋。出去跑，不要以为自己肉多啊。

马基雅维利说：当君王也有思想时，灾难必然降临。奥勒留皇帝<sup>255</sup>也没有说他自己有思想。他用希腊文而不用拉丁文写作，因为希腊文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非常尊敬的语言，尽管罗马人喜欢骂希腊人。他儿子后来的暴行证明

<sup>253</sup>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商务印书馆，2017。

<sup>254</sup> 《中国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基因》，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5/c\\_12856825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5/c_128568254.htm)。

<sup>255</sup> 罗马帝国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位皇帝。代表作《沉思录》。

伦理哲学家也不一定能培养出来一个高尚的人。历史按照帝王中心来写本来就只有记录邪恶暴政。古今中外本来没有一个帝王或元首宣称自己有思想。苏联、南斯拉夫和北朝鲜开创了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和铁托几个元首有思想的先例。历史证明：这四个人根本没有思想。一百多前，列宁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和特殊历史阶段，他做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总结论。列宁搞出来的先进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之后又回到了落后的资本主义。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朝鲜提马克思有砍头的危险，因为金日成的理论体系成了 Bible。独裁普京和希特勒也都以为自己思想呢。

不懂苏格拉底，我们怎么能理解世界领袖为什么总是创立哲学体系？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政治科学命题是：最公正的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共产、共妻、共子。这让全世界哪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接受？民主的雅典只能让他死。为什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因为他论证公正的社会必须让真正的哲学家当国王。但是苏格拉底的意思是：爱智慧超过爱性交的人才是真正哲学家。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想当国王或皇帝？正是因为他不想当皇帝，我们一定要他当。于是爱性交、爱权力、爱财产的皇帝都装着最爱智慧：苏格拉底从此把世界上的皇帝逼上了背字典的绝路。自苏格拉底之后，世界上有没有出现另外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两千多年来，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真正热爱智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没有女人、没有钱财、没有权力，他当然没有孩子。他的哲学追求美好、正义、高尚。苏格拉底之后，一切哲学家只可能注解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希特勒、斯大林、罗尔斯都是注解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让所有君王成了他的奴隶。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社会对官僚等级制和特权以及对领袖权力的认可。在美国革命、荷兰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些陈腐的旧制度早被彻底消灭。我的老学弟丁学良的文章：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

事后来看，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立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

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 1949 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 20 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

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 1977 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

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三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

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些大老虎家族，一人得道众亲友都能搞大公司，又当官又发财，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有这么严重吗？更不要用说用黑社会的手段压制公民的合理权利，‘打死人没啥，有我爸！’等等。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习近平，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必须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我用英语表达一下定于一尊：look up to one man a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ll under heaven submits to one ruler.（当尊一人至为至高，

天下都当俯伏在一人之下) 秦始皇的接班人都杀了人。历史把他们都划垃圾。都快点去见秦始皇和马克思吧!

两千多年了, 秦汉秩序的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佛道奥援<sup>256</sup>。其政体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教合一、皇帝家天下。其社会组织方式是家族制、科举制、编户齐民、守土有责、国家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其外交政策是朝贡体系和劣质殖民。不知道自由、产权和法治的时代哪里有盛世?

从亚里士多德-Polybius-马基雅维利共和国理论来解剖秦始皇的专制结构就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那些法国模型也没有体现中国政治权力和中国国企的一体化。秦汉政体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提出来啊。秦汉政体利用皇权压榨人力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学模型必须集中在: 建立管仲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经济(如盐铁官营和国家均输); 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 实现散沙化和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当然还要研究秦汉政体模型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模型之间的连续性。

## 罗马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光荣属于希腊, 伟大属于罗马)

离开希腊和罗马, 欧美人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今天最应该读罗马两千两百多年的宏大历史。中国史怎么能跟罗马史比啊: 司马迁完全不知道自由、法治、产权和宪政文明, 而罗马人大大地发扬光大了这些共和国的理论和实践; 连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天天高喊自由宪政呢。

罗马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 先是国王制, 接着是罗马共和国制, 最后是罗马帝国制(苏拉和恺撒这两个军事元首首先摧毁罗马共和国政制, 而屋大维终于控制了一切)。罗马从公元前 753 年持续到到公元 1453 年。现在, 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一脉相承, 俄罗斯帝国基本上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蒙古帝国。第三罗马帝国是俄罗斯, 第二罗马共和国是美国。第二罗马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 它活了一千年之后被拿破仑撤销。欧洲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一直是以罗马为中心, 哪个国家或朝代有罗马伟大? 光是罗马共和国就有五百年, 中国一个朝代只能干三百年。我们不懂罗马史就不是人。

罗马人是从特洛伊战争后经地中海漂流到意大利建城的。后来在大西洋中飘荡的美国人自然想到在地中海中飘荡的罗马人。罗马建成(建国)时跟美国

<sup>256</sup> 奥援: 指在内部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佛与道互相秘密地帮助。

一样破烂不堪。罗马共和国给美国的国父们树立了榜样，美国的政府结构基本上是学罗马共和国的政府结构。罗马共和国主要是学习斯巴达共和国。公元前509年罗马人结束七个君王（Rex）统治而建立罗马共和国：谁提到君王（Rex or King）就是死罪。后来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罪人恺撒和奥古斯都豪称他们是Emperor 而不敢称为Rex。Emperor 是拉丁文 Imperator 经由古法文 Empeur 而来，它的含义是军事指挥，它根本不是中国皇帝的意思。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怎么懂历史？要联邦政府集权的 Madison, Hamilton and Jay 为什么用 Publius（罗马共和国的四个奠基人之一）作为笔名，而反对联邦政府集权的人为什么要用 Brutus 这个笔名？（Brutus 不仅是罗马共和国四个奠基人之一的名字，而且他的后人也是四百七十年之后刺杀恺撒的六十六个人之一。据说 Brutus 是恺撒的私生子：恺撒看到 Brutus 刺向他：“Son, you too.”）独裁暴君恺撒当然应该被他自己的儿子刺杀。

罗马共和国演变成一千四百年的罗马帝国皇帝专制独裁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教训，这是全世界共和国都必须警醒的。罗马共和国的腐败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苏拉、恺撒、屋大维……的军事权力野心；一旦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士兵变成独裁者恺撒个人的军人，罗马共和国就很快灭亡：罗马的军队效忠于恺撒个人。这是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独裁帝国的历史教训！第二，资本财富的野心。后来麦迪逊总统提出用野心对抗野心，这样就可以特别有效地限制资本的权力，因为资本家互相之间的野心也必然对抗。美国历史和现实证明：美国政府完全不是被资本家左右的。麦迪逊总统在文明史上是超一流的政治哲学家！

塞姆<sup>257</sup>说罗马人民接受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这个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祖师爷）元首制统治的深层原因：“世上还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东西；政治权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与富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被内战和混乱局势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罗马人民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自由特权，重新忍受马建城之初实行的专制统治。”这些话完全是狗屁不通，屋大维自己都不敢称国王，他还是害怕像恺撒一样被元老院的元老们刺杀。罗马共和国里谁敢称领袖或国王，罗马人必然灭亡他。塞姆明明看到了希特勒时代，居然还说物资生活和安宁比政治自由更重要。塞姆是人吗？难道塞姆不是最会润的人？历史学家塞姆不懂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醒过来吧，死了的塞姆：没有政治自由就绝不会有经济生活的自由与安宁。世上政治自由当然是最重要的东西。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和历史巨大地影响美国的国父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美利坚共和国避免成为：（1）像罗马共和国变成后来的专制独裁帝国、（2）

<sup>257</sup> 罗纳德·塞姆，最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者之一。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教授。著有《罗马革命》和《塔西佗》。

mob rule（暴民统治）的雅典民主、（3）没有个人权利的斯巴达共和国。

古罗马的加图深刻影响了美国国父华盛顿和亨利他们：绝对不向独裁者恺撒低头。美利坚共和国正是加图所代表的罗马共和国的新的宪政共和国。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加图的写照。此书真是太适合在国内读啊。美国国父们和美国人民学习加图。我们中国人敢不敢学习美国人推翻暴君专制独裁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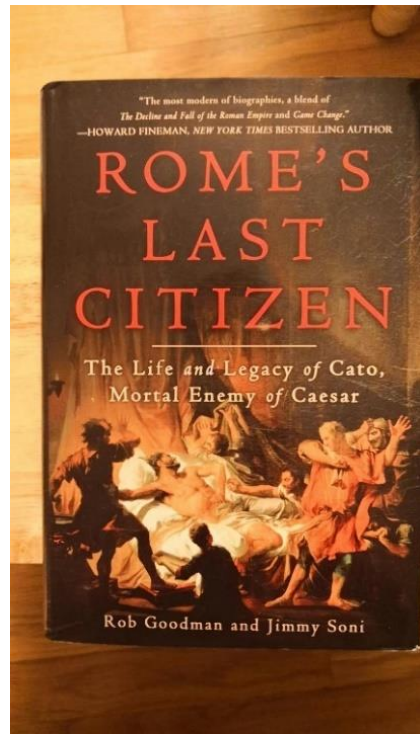
乔治·华盛顿不过是学古罗马执行官 Cincinnatus。辛辛那图斯两次做独裁官，拯救罗马于危难之中，功成身退，体天之道。华盛顿于美国革命成功之日卸甲归田，担任两任总统之后推位让国。这样的事迹让美国人以为如此圣行贤迹堪比古罗马之辛辛那图斯，故将华盛顿尊称为“辛辛那提”（Cincinnati），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

此二公于历史之上，真真有颇多相似之处。不过辛辛那图斯两次出山，都是高龄，即便贪恋权栈，又能持续几何？华盛顿一生无子，当时美国总统无权无钱，一直连任总统到死，比山林之乐又多几许？看看普京，他当了二十年还要继续干。普京不知道 Cincinnati 啊！猪头更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美国城市 Cincinnati 的意思？它是不贪恋权力 Cincinnatus 的复数。后人读书，不得不察。读书首先要全面读好古希腊和罗马的最伟大的政治、法治、历史和宪政的著作。自由、人的权利、产权、virtue（德行），and arms（武器）go together:这是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这也是英国革命的历史；这更是第二罗马共和国美国的历史。

虽然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共和国，但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也保持了元老院、法治、私有产权和一些罗马共和国的遗产。

罗马帝国包容万象的气质就来自于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给欧、亚、非各地区的宗教、军事、行政、法律等等最大的自主权。没有想到，“代表”或“代议制”就是这样被蛮族人发明出来了。罗马帝国的城市成了今天的科隆、特里尔、巴黎、里昂、米兰……罗马拉丁语自然地成为世界语言，而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贡献它们自己灿烂的文明。

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其最大的成就。罗马帝国制定和实施罗马法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和稳定庞大帝国的统治，但是罗马法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德国著名法



学家耶林在其著作《罗马法精神》一书中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罗马法在形式上分为习惯法和成文法。罗马在国家形成的初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未经政府明确承认而被一般人接受并默认为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之规则的习惯法。由于习惯法没有固定的成文形式，因此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法律制度上的局限在司法制度落后的古代又往往会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精确，无形中就为法官故意压迫平民，袒护贵族提供了方便。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平民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就曾主动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编纂成文法。公元前 450—449 年颁布的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就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的成果。《十二铜表法》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公法与私法、刑法与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态复仇与罚金、氏族继承与遗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此后，随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继续，罗马进一步调整了公民内部的阶级关系，也不断促进国家立法工作的继续进行。

罗马法的核心内容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遵循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罗马帝国，公民可以控告议员，议员可以控告政府，村庄可以控告总督……在后来的欧洲，控告当权者的法律原则万分重要啊。没有耶路撒冷文明、基督教文明、希腊城邦文明、罗马共和国文明和罗马帝国文明，欧洲和整个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在罗马帝国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法律无所不在。罗马法在整体结构上分为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从法律内容来看，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以前罗马法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不能享受此法的保护，被称为公民法或者市民法，内容主要是有关罗马共和国的行政管理、国家机关及一部分诉讼程序的问题。公民法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的主体范围狭小，内容保守、形式主义色彩浓厚、保留大量氏族残余等。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民法不足以解决帝国疆域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罗马逐渐形成了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这就是有名的万民法。罗马万民法是“市民法”的对称。又称“各族人民的法”。罗马法中调整非罗马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在法的渊源上，主要采取裁判官告示或司法文件、法学家解答、敕令等形式。其中裁判官或其他高级长官的创制法最为重要，故整体上不具有制定法特征，学理上又称为“裁判官法”或“大官法”。在内容上，更多的涉及财产关系和



商业关系。体系较市民法更加完备，程序上较为简便灵活，具有某种国际法和自然法的性质，现代国际法的语源就直接来自万民法，产生于公元前 242 年。公元前 3 世纪后，万民法的原则移用到市民法中去，罗马非公民取得市民权后，与市民法在内容上逐渐接近、融合，查士丁尼民法典颁布后，两者最终统一起来。

自治市、行省、帝国各有各的法律。罗马私法产生了私人财产、法人、契约、义务一系列领域。私法创造了拥有自由意志的平等个体组成的法治世界。这是秦汉帝国完全想像不出来的。中国家族君王所有制或皇帝所有制就不可能想到政治或政体，中国的儒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设计一个人如何统治人民。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美国（第二罗马共和国）却必须设计公民互相之间如何相处。

欧美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无不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法律本来都是继承古罗马共和国的案例法。案例法的本质就是人在共和国生存的自然规则（规律）。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继承并修改这些规则（规律）。某个人或某一个立法院不可能建立这种规则（规律）。20 世纪初罗马法的影响经过日本，延伸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民法即沿袭了罗马法。我国的《民法通则》、《继承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的原则。

只有以色列-古希腊-罗马才是人类真正的文明，其它所谓的文明都是侮辱文明这一词汇。其它都是专制帝国在黑暗里兜圈圈。埃及帝国兜圈圈一万年。中华帝国兜圈圈才两千两百多年，太短了。希腊/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帝国是人类文明一脉相承的主旋律。在全世界现代文明国家里，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书都是从希腊和罗马文明开始。这才是人类最大的奇迹。希腊文明被罗马文明完全继承，而希腊文还成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语言。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复兴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现在谈所有学科都离不开希腊罗马文明。1835 年，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里早说明了为什么美利坚共和国会越来越来大（就像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一样）。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不能翻译成《美国的民主》。中文翻译是错误的。《民主在美国》也包含了《民主在法国》。事实上，托克维尔讲了从十一世纪开始，民主（特别是平等）在欧洲是如何慢慢形成的历史。美国立国之本是古罗马共和国。美国共和国才两百多年。美国现在遇到的政治大问题都是罗马共和国经历了的。罗马共和国面临的种族问题和公民问题比今天美国的种族和公民问题更复杂。

1949 年以前的知识分子对古希腊和罗马思想和历史了解极少。陈寅恪还胡说中国人跟古罗马人最相似。“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

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sup>258</sup>胡适对希腊罗马文明一窍不通。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哲学博士只混了一年就跑回中国搞宣传，按照道理他应该学五年或八年。鲁迅根本不知道古希腊罗马文明。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完全不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经典。经济学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中国制度和英美宪政的差别。不懂罗马史，怎么搞懂英美宪政？

## 秦汉与罗马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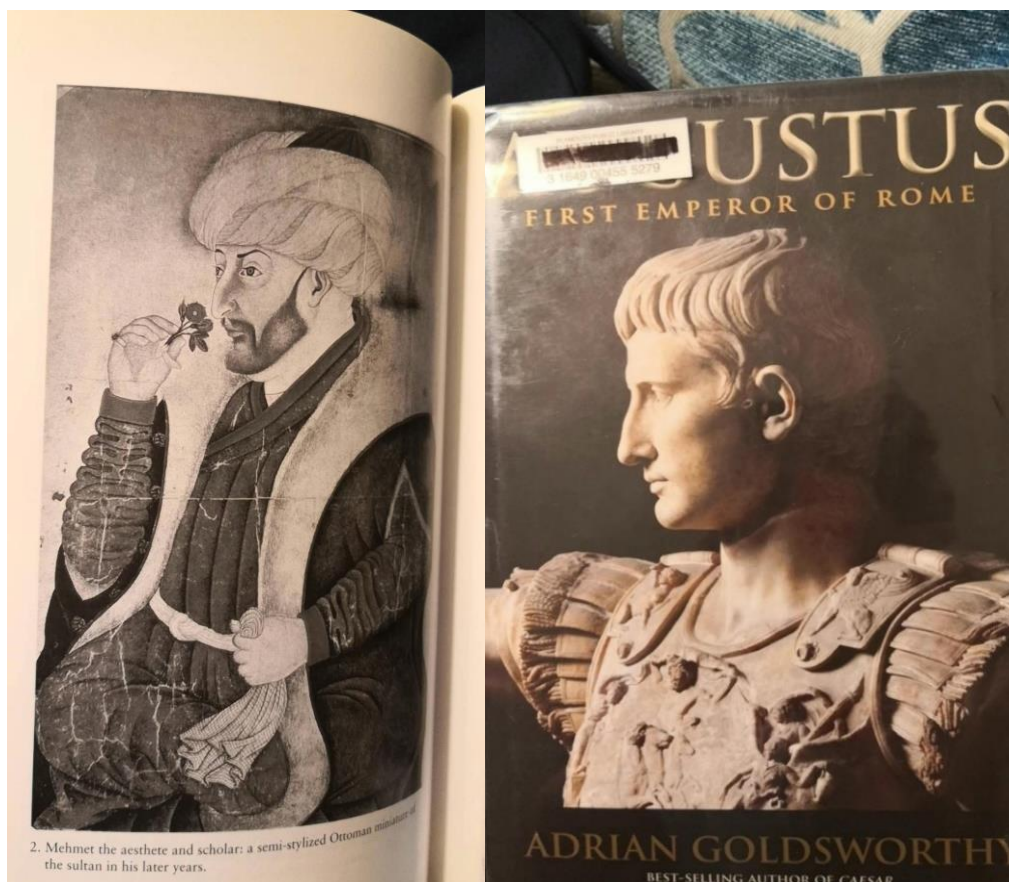
荀子曾比较战国时期的秦国与其他国家。“那是商鞅变法后大约八十年左右的事情。荀子来到秦国，得到了秦相范雎的接见。范雎问他‘入秦何见’，进入秦国境内后有些什么见闻。荀子告诉范雎：‘入其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其家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子说，秦国的百姓是极好的百姓。他们都很朴实；他们不听官府认定的不正当音乐，不追求官府认定的奇装异服，个个性情柔顺，害怕并服从他们的官长，实在像极了上古时代的模范百姓。秦国的士大夫也很棒，他们从家里出来后就直接去公门里做事，从公门里出来后就直接回自己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社会交际。他们彼此之间不连结，不交友不聚会，实在像极了上古时代的模范士大夫。荀子描绘的，其实是秦民在商鞅之法的残酷统治下，人性遭到扭曲之后的生存状态。在连坐、举报与严刑峻法的多重管控下，秦民对邻居与友人有着深深的恐惧，对官府与权力也有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不敢争取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追求美好的物质享受——秦政的汲取力度很大，事实上也不容他们去追求好衣好食。于是，逆来顺受与勤劳吃苦，就成了秦民最佳的生存策略，也成了荀子眼里模范百姓的‘美德’。”<sup>259</sup>

荀子的比较是华夏（那个时候没有中国这个梁启超制造的词汇）战国时期各国专制程度的比较。他如果到斯巴达、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看了，他会惊讶外国士兵怎么都是自由的、富有的贵族公民：站在第一排的士兵是最富有的贵族，而不是没有教养的秦国文盲。

<sup>258</sup> 出自 1919 年的吴宓日记，见附录 2.2。

<sup>259</sup> 《荀子的一段赞美之词》，言九林，微信公众号，史料搬运工。

## 罗马皇帝和东方帝王的比较：



为什么梁漱溟<sup>260</sup>对中西文化本质差异的分析是文不对题?请先看一些梁漱溟的三段荒唐的分析：

(1) 梁漱溟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生活的方式有三种：“（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种问题取消，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最违背生活的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

(2) 梁漱溟把这三种生活思考的方式分为三种：（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3) 梁漱溟说“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才能实在无假于外，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

<sup>260</sup> 梁漱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文化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原故”

梁漱溟这种人怎么可能懂西方文明？他写的中西文化比较让我看得骂人啊。他说中华文明是向里用功，西方文明向外用功。他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如何自我反省（examine yourself），他更不知道奥古斯丁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牛顿和莱布尼茨既向内用功也向外用功。爱因斯坦也当然如此。不好好学外文，让陈独秀一辈子胡思乱来。梁漱溟也是不懂外文就写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比较。梁启超和郭沫若不学懂外文的荒唐故事更不用说了。

我绝不赞梁漱溟的学问，但我赞梁漱溟的气魄

赞梁漱溟<sup>261</sup>

宦梁诱不食，  
身系名位自由息！  
梁公生当变幻时，  
安就府内羈飞翼？  
三军帅已夺，  
匹夫志未息。  
说难陈忠辞，  
忤撻龙首侧。  
君王士人戏，  
雅量容编织？  
自古逆鳞死轻贱，  
何况先生孤且直！

一看钱钟书的字就知道他没有骨气。他有什么学问？无非是掉书袋地胡乱比较中西文字中的共同点：如钱是圆的。西方的圆钱是资本主义，中国的圆钱是秦汉极权主义。他完全不懂这种根本区别。只举一例。其它每一例都只能证明他的浅薄无知，特别是他谈到中西辩证法，他不懂装懂。

看看林希<sup>262</sup>的历史知识是何等缺乏：“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把知识看得过于神圣，中国人从有了知识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人开始把

<sup>261</sup> 《赞梁漱溟》，邹恒甫。用鲍照拟行路难其六韵，作于1988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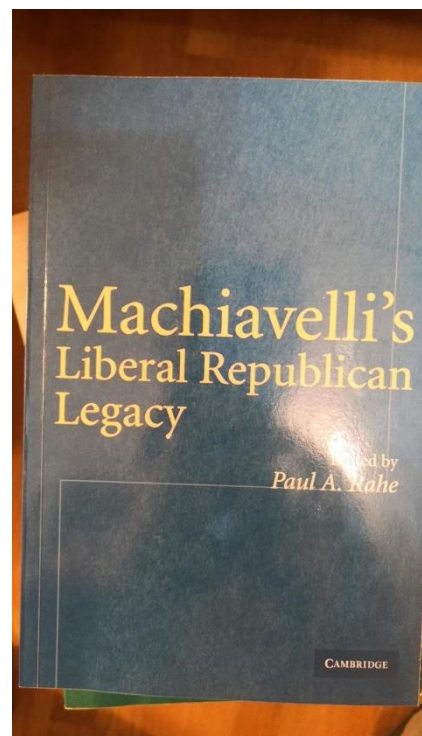
<sup>262</sup> 林希，原名侯红鹅，中国现代作家。

知识看做是对于权力的威胁？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一个‘封’字，而‘封’的天敌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独立人格力量来自知识，所以封建主义一是要规顺知识分子，桎梏知识分子的思想；二就是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从 1957 年的反右，到 1966 年的浩劫，中国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滑下来的，直到人们在这条运行轨迹上束手无策，为之付出了宝贵的一切，才最后终于不得不醒悟过来，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林希还说“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真是瞎眼了。林希对封建一词的理解简直把人都笑死。文化人必须对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历史、西方法学……有基本理解啊。中国在西周根本不是 feudal 社会。周武王和周公封邦建国跟欧洲的 feudalism 没有丝毫关系。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后，许多小国自然形成了。这些独立的众多小国在互相征战过程里出现贵族和贵族们公认的比较厉害的贵族——国王。西周是国王分封自己的宗室和有功之臣。东方 despotism 怎么能有 feudalism 啊。feudalism 来自于庇护制，即附庸对领主的私人化效忠，而西周封邦建国是君王和臣子的关系。

马克垚<sup>263</sup>比较了一些秦汉和罗马。他完全不知道罗马共和国跟秦汉政体的本质差别。外国很多史学家以为秦汉扩张跟罗马扩张一样呢。笑死人！不看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根本不懂秦汉全能统治的政体。现在比较秦汉专制主义和罗马共和国的研究太肤浅。

马基雅维利 500 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共和国和君王政治绝不相容。斯巴达依靠当地人控制自由的雅典和底比斯共和国，它很快就失去了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了保有自由的卡普阿、迦太基和努曼其阿共和国，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马基雅维利说：在皇帝手下生活惯了的人习惯于服从，根本不知道自由地生活。如波斯人、埃及人和中国人。马基雅维利自由共和国理论的遗产就是英美宪政文明。

看看马基雅维利比较自由与专制：“人民热爱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一股情怀因何而起，不难明白因为由经验可知城市如果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拓展其领土或财富。想到雅典在摆脱庇西特拉图的专制之后一百年所达到的伟业，真的是令人惊叹。尤其可惊的是罗马在摆脱王制之后所达到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因为使城市伟大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而且，毋庸置疑，公众的幸福



<sup>263</sup> 马克垚，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只有在共和国实现,因为那是共和国内大家全力以赴的目标,其措施虽有可能个别危害到这个人或那个人,少数受害人的抗拒起不了作用。

一旦出现君主,情形恰恰相反,因为对君主有利的通常不利于城邦公共的利益,对城邦有利则抵触君主个人的利。专制统治凌驾自由的生活方式,祸害接踵而至,最轻的进展停滞,实力和财富也不再成长,或者发生倒退。假如应运而生的是个武德超群的专制君主,开疆拓土只对他自己有利,对那个共和国毫无效益可言。因为他不可能敬重受他专制统治的任何一个坚强又善良的公民。他也不可能让他所夺取的城市臣属于他专制的城市,或向它纳贡,因为使它的强盛不合乎他的利益,对他有利的是让政权分崩离析,这样每个乡镇都分别承认他是唯一的统治者。因此,他征伐所得,受益的是他个人,不是他的国家。”

好好读这本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罗马史》,我们就知道如何创立自由和法治、如何保持自由和法治、如果救赎自由和法治……我六十岁才知道这本书如此伟大。

## 第四节

# 一统天下

“中国历史循环秩序论太单一。而在近东地区，人类秩序特别多样化，各种宇宙论秩序转变为帝国组织，个个争相占有那个唯一的天下。”

——沃格林，《天下时代》

“大一统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色之一，无论是统一于封建，还是统一于郡县，它都是中国鲜明的政治基因——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但大一统的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sup>264</sup>儒家和法家在追求大一统上完全一致。“法家思想的主旨就是君王利益至上，一切政治必须围绕着君王利益最大化这个唯一目的，而君王最大的利益之所在就是‘一统天下’，实现一家之天下，以天下而奉一人。”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王者欲一乎天下。”又，《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跟后来的大一统有什么关系？《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诗句表达了“大一统”的思想？

孔子本人一会儿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共产主义，一会儿天无二日

---

<sup>264</sup> 《大一统是中国鲜明的政治基因》，翟玉忠，微信公众号，大六经工程。

dictatorship 的大一统。《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共产主义大同意识，跟大一统没有关系。《礼记·礼运》篇：“故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国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孔颖达疏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国者，此孔子说圣人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国者。问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释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测度谋虑而已。”这更是共产主义大同意识。《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何休注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为家。”这又是天下一家的共产主义意识。《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是孔子大同的、平等的共产主义大同意识。

孔子反复提倡天下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但是孔子的 dictatorship 意识与他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意识是矛盾的，孔子自己打自己耳光。《礼记·坊记》载：“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曾子问》又载：“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些话更与孔子自己的大同共产主义意识矛盾：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了。

董仲舒也极端卑鄙地为主子刘彻服务：“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坐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董仲舒忘记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了，他在宣扬王者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董仲舒为刘彻的统治支招搞大一统。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程颢：“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梁缺：“天人之道，从惟变所适、惟变不朽进而惟适而安、惟谐而常。与天为善，其趣无穷，与地为善，其益无穷，与人为善，其乐无穷。天人互泰，方存浩长。”钱穆之所以是一头猪：疫情里他想着他和病毒一起死（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不过微博上也有人说孔子本人并不矛盾而且大一统的思想来自周朝：“孔子大同的前提是天子出，一切要以天子还要是以前的天子（先王）的言行为准，目前的一切都要从先王那里找依据，合则名正，否则就是名不正。”“地理环境对文化有支配性作用，所以大一统很容易在中原推行。不过大一统并非来自孔子而是姬周，周公旦起关键作用。天子的宅子，处于宇宙中心，天子出征叫德（杀伐），征服土地叫德泽，被征服后不再反抗接受他们的观念叫德化。天子够不着的地方都是禽兽所在。”但是孔子没有说要我们民众一起搞大一统，因为天无二日，我们不够格。

每一个霸主都要大一统，因为孔子说了“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孔子和董仲舒的大一统观念让中国各王朝往往通过长久的、大规模的战乱达到天下统一。随之而来的就是持久的战乱和大量人口死亡，直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这是大一统带来的灾难啊。康德还幼稚地说世界永久和平呢。中西历史学家比较中国王朝和西罗马帝国（公元前 27 年—公元 476 年）之后会发现：1. 西罗马帝国有五百年历史，而中国王朝最多存在三百年；2. 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严重的、大规模的民间起义和战乱。五千年历史，汉人又哪有几年安宁的日子？看看刘邦被匈奴围在平城、王昭君出塞、五胡乱华、隋唐胡汉杂种皇帝、安史之乱、五代十国、辽宋金元。有人说“西方猎巫运动哪能和天朝相比，常常审讯审了三五年，整村几百几千号人被传讯审问，最后判被烧死的就七个人，几百年也烧不了一千个。”那当然，我大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曾经“有妖言辄杀”<sup>265</sup>，引起社会严重动荡后才叫停。中国自己人改朝换代的破坏性往往才是最可怕的。历史上汉人杀汉人往往灭掉中国人口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有人总结的好“所谓的天下兴，也就是人口繁衍而已。没有自由生命财产的保障，毫无质量的活着。这也是个中西方的巨大的差异。天子牧民，岂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中国‘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 6000 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 2100 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 5648 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 760 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 1600 万。

---

<sup>265</sup> 出自《三国志·高柔传》。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 4600 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 200 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 1000 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 755 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 5291 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 70%，降为 1692 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 309 万户、1500 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 1190 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 7633 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朱元璋临死时人口据说达到 5987 万。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 5200 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 1900 多万。清前期的 100 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到咸丰元年达到 4.3216 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 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 2.3 亿。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sup>266</sup>

秦晖很犀利，在国内的确是如此。但他的很多思想没有达到国际境界。我举一例：Fei-Ling Wang 的《The China Order》<sup>267</sup>有更好的分析。罗素的荒唐之处大家看清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以下对罗素的批评好：“罗素幼稚到了荒唐的秦度。窝里斗绝对第一，互相拆台仍看今朝。兵书战策，各朝演义多的是。至于自由，那不是英国人的初始定义。罗素严重失明了。倒不如爱因斯坦的感性中国直觉。”罗素也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的分析哲学完全是错误的。秦晖当然也不是，清华、北大 110

<sup>266</sup> 《何来如此深仇大恨》，秦晖，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2366.html>。

<sup>267</sup> The China Order, Fei-Ling W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年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胡适和冯友兰是哲学的门外汉。中国根本没有哲学史。蔡元培和梁漱溟没有入哲学的门啊。王浩对数理逻辑有一点贡献。金岳霖对数理逻辑没有他自己的贡献，因为他离开了美国学术界。

《汉书》卷七十：“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必须 annihilate（歼灭）欧美和印度？我们要把印度、日本、欧美……都统一于中国？这正是我们天天批判的 imperialism（帝国主义）啊。大一统 = 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理论。喜欢大一统的人一定要好好看看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熊彼特，帝国主义是为了征服而征服、为了扩张而扩张。帝国主义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Imperialism, most purely defined, is “objectless”, that is, it is not directed against something or somebody that can be shown to impede one’s interest. It is thus not rational: it is a simple will to power. The canonic examples, according to Schumpeter, are Assyrians, Persians, Arabs and Franks.（帝国主义，按照最严格的定义，是“无目的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某件事或某个人可以被证明妨碍了某个人的利益。因此，它不是理性的：它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意志。熊彼特认为，典型的例子是亚述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波斯帝国攻打希腊是为了物质利益？阿拉伯帝国征服世界是为了物质利益？真是荒唐无稽。看看蒙古建立的欧亚帝国，我们就不会无知地天天瞎侃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利润。大一统就是帝国主义的心理。帝国的建立者哪里是仅仅为了小民想到的利润啊。For Schumpeter, imperialism was thus an atavism: a survival of the precapitalist,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that was not motivated by any rational dem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apitalist one, which could survive — and indeed fare much better — without it.（对熊彼特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前资本主义、封建生产方式的生存，它不受任何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性需求的驱动，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能生存下去，而且确实过得更好。）好好读一下熊彼特的论文：《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wo Essays。<sup>268</sup>我的这篇论文已经把熊彼特的帝国主义理论模型化了：A Naive Model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Powers<sup>269</sup>。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政治思想史高级读物）和沃格林《秩序和历史》（五卷）也是我们的必读书。沃格林认为儒家把五百年一个兴衰循环看成理解“天下”的符合表达。

<sup>268</sup>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wo Essays, Joseph A. Schumpeter, Hassell Street Press, 2021.

<sup>269</sup> A Naive Model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Powers, Heng-fu Zou, CEMA Working Papers 557,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三节》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我看沃格林的书都是批判地指出他的错误。中国之天下的幌子乃天下为公。可惜中国人本质上是天下为私。天下为私又回到了性本恶：法家的世界。儒家知道法家无法一统天下，汉武帝更知道。结果是儒表法里。但儒表法里怎么征服基督天下和伊斯兰天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沃格林应该继续分析浩然之气。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这句话其实否定了五百年一个循环，因为豪杰之士随时可以平治天下。沃格林似乎对孟子说：“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真是豪杰之士多啊。天下循环特快。”数豪杰人物，还看今朝。天下只好加剧循环。真乃三百年太久，只争朝夕。沃格林看得懂吗？这种循环论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马基雅维利的各种政治体制（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兴衰循环有本质差别，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变化，一遍遍回到天下一统的循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都是强调历史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及其对立面即六种政治体制的循环。中国人从来没有达到这种思想高度，只能搞出来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平治天下。”司马谈和司马迁把这作为他们“通古今之变”得出来的历史规律，何等浅陋！

沃格林《天下世界 the Ecumenic Age》只是把人意淫的天下一统作为历史秩序的符合表达出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之天下还是归结为具体的罗马，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第三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共和国。华夏天下一统荒唐无稽，因为华夏一直没有征服海洋、高山和草原。而蒙古人的天下帝国较之罗马天下帝国又太短暂。从 220 年东汉灭亡到 960 年北宋建立这七百四

十年里，除去 618 年（唐朝建立）至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主导中国政治的几乎全是分裂的地方军阀和世家大族的私人军队。从 755 年到 1279 年（元朝建立），中国又一直都处于分裂状态（宋朝从来没有统一中国）。元代（1279-1368）和清代（1644-1911）分别由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统治中国，明代汉人的大一统才拥有 4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历史真有大一统吗？《左传》鲁成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其实已经说明大一统是不可能的。魏征对唐太宗说：“突厥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宋朝，非我族类指辽、西夏、金、蒙。按照以上逻辑，元和清也根本不是大一统。元和清其实是世界帝国，它们完全不是汉人的大一统意识。世界成为民族国家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人几千年从来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如果英国不用大炮轰开清朝的大门。中国人的天下观和大同社会观不就是罗尔斯的美国吗？

大一统跟共和主义正好是对立的。希腊人在古代从来就不团结，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也是天天打仗。它们只在对付波斯帝国侵略时才团结了几年。后来野蛮一点的马其顿帝国轻而易举就收拾了希腊各城邦。但希腊语言成了埃及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直到现在希腊文明经典一刻也不能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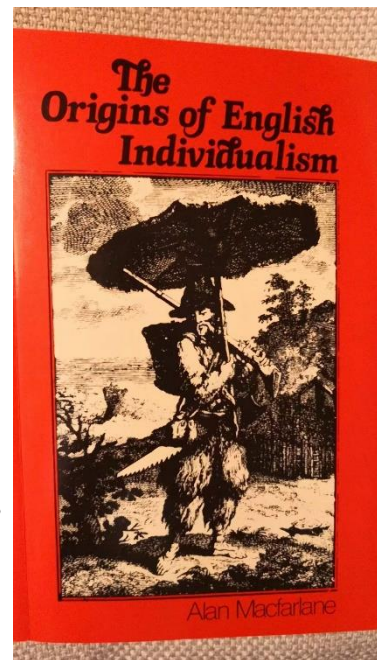
罗马共和国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时，许多罗马将军的雕像都手握球体，这是罗马共和国掌控世界的理念。也就是说，罗马公民受到帝国主义意识和昭昭天命的驱使。在中国秦汉政体里，天下意识早有了。而美国作为第二罗马共和国，它的自我意识就是全世界的意识：美国观念渗透世界是美利坚共和国的本性。“联邦是各州统一在上帝恩赐的，继承古罗马共和国遗产的，个人自由至上的国土。美国宪法的七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共和制、联邦制、三权分立、制约与均衡、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大一统是东南西北中统治一切。所以大一统要反对西方宪政，三权分立，自由民主。”作为罗马第二罗马共和国的美国达到了天下一统，因为其意识形态早已成为普世 values（价值）：征服人心远比殖民伟大。现在能抵抗以色列-基督-希腊-罗马-欧洲新教-英美清教文明之天下的只有伊斯兰文明之天下。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拉美已经英美化和基督化。伊朗和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非洲肩负伊斯兰天下一统的重任。第三罗马帝国俄罗斯等着分裂的天下。

一统天下乃人心之意淫。周天子早在罗马时代之前就天下一统/天下大同了，估计他梦游了埃及、亚述、巴比伦、印度、波斯……英国和美国。中华帝国宏观史更是一个大工程，中华蒙古帝国威风八面，长我中国人志气：俄罗斯一直只是我们中华蒙古帝国的小部分。匈奴人更是中华帝国的英雄：他们加盟野蛮人，首先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接着摧毁东罗马帝国。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让中

华帝国横跨亚非欧啊。中华帝国之复兴指日可待。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赵汀阳<sup>270</sup>还意淫三千年前的华夏“天下观”，赵汀阳鼓吹的华夏天下意识和施展鼓吹的华夏枢纽意识还没有征服新冠病毒呢，我们中国人看看他怎么辅导出一个秦始皇来统一全世界吧。施展<sup>271</sup>的“枢纽观”也希望秦始皇在全世界复兴天下秩序。

天下、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本身。National, state。中文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国家的国家。国家本来是家国，恩格斯论家庭、私有制和家国的起源就是把家放在国之前。家国是中国古诗词里用得最多的。没有家一定没有国，没有国可以有家。这本来就是孟子的原话，我只是把这些话说得更准确一点。撒切爾夫人说的好：I think we have gone through a period when too many children and people have been given to understand ‘I have a problem, it is the Government’s job to cope with it!’ or ‘I have a problem, I will go and get a grant to cope with it!’ ‘I am homeless, the Government must house me!’ and so they are casting their problems on society and who is socie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and no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 except through people and people look to themselves first. (我认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太多的孩子和人被告知“我一旦有问题，政府就有责任去解决它!”或者“我遇到了问题，我要求政府保证会来解决它!”“我无家可归，政府必须给我提供住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问题抛给了社会。但是，谁是社会?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世界上有个体的男人和女人，也有家庭，政府也必须通过人民来做任何事情，人民首先要求助他们自己。)

个人主义为什么是自由的基石?《圣经》为什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值得崇拜;权力一定是邪恶的;而任何偶像崇拜、英雄崇拜和个人崇拜(idolatry)都是对上帝的亵渎。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洛克说:我在,故我有。I am, therefore I own!我拥有我自己,我拥有我所创造的。我们最基本的财产是我们自己的个人和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是自己的财产,我们



<sup>270</sup>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

<sup>271</sup> 施展，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可以自由地对待我们自己：这刚好是自由的定义！

1931年，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从哲学和政治学上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在政治上，他崇尚民主而反对专制。他指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一个能从随着军乐旋律排方阵齐步走中获得快乐的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他错长了一个大脑；一根脊梁骨就足够他用了。人类文明的这个瘟疫斑应该以尽可能的速度消除掉。奉命的英雄行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和所有爱国主义名义下的胡说八道——我真恨这些东西！”爱因斯坦发表 *The World as I See It* 是在 1931 年。那个时候，希特勒还远没有上台。那些想要上纲上线和否定爱因斯坦的思想的人请先弄清楚这个事实。

1931年11月22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主权的限制》一文。“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在哲学上，爱因斯坦认为：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是高于国家的，人本身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

卢梭的思想如何血腥暴力？卢梭说社会的公意超越个人的权利。为了实现前者，后者可以牺牲。原话是：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最荒唐的地方是认为人是生来自由的，因为人只能学会自由。我们经济学人就都在学会做奴隶。

像我这样在中美两国之间来回四十年也不改变中国籍的人极少，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才代表真正的中国。我（邹恒甫）认为我自己才代表真正的中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像托马斯·曼<sup>272</sup>一样有这种气质。懂得托马斯·曼的人就知道德国和中国都是抽象概念，就能理解我的这段表达。余英时也喜欢模仿托马斯·曼这句话：他在哪里，他就是中国（华夏）；他没有乡愁。我欣赏余英时和托马斯·曼。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抽象的中国，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其他中国人。现在总有人说：中国十四亿人民不答应。我不能理解这句话怎么能成立。任何人代表中国人所有发言时请先问一下我的立场。我当然不代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人，更不能说我代表中国十四亿人。我们每一

<sup>272</sup> 托马斯·曼，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法西斯化，不管是他的祖国的，或是任何其它国家的。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流亡时所作的回忆录《观察一个时代》中，以“我的兄弟”为标题这样一段话：“当我的兄弟前往美国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到哪里，哪里就有德国文化。”

个人发言都只能代表十四亿分之一，不要总说自己是十四亿人的代表。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代表真正的中国，但我不代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中国人。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代表中国十四亿人，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代表我。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中国。这才是主人翁气质。我们不要被代表。在自由、民主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核心。这是人的价值的根本。

## 国际关系

“个人主义成为预言美国衰落的理由之一，主要来自 Wang<sup>273</sup> 游历美国的两个月中看到了：黑人、妇女和美洲原住民仍处于不平等地位；美国人个性坚强但意志薄弱，个人主义兴盛但活得很孤独，富有却也颓废；家庭观念被掏空，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家庭破碎，青少年无所依归，单亲妈妈比例过高且受教育程度低；过于松散的家庭有碍社会进步。无可讳言，Wang 确实看到了美国内部种种问题，但一来，60 天、30 座城市、20 所大学，就得出‘美国衰败’，要不是过于浅碟，就是‘带著答案来找答案’。美国的复杂性，一个人恐怕长住在美国 6 年都还有瞎子摸象之嫌，就像有些书评提到的，Wang 之所以认为美国即将衰败，很可能是来自他对西方传统价值的不熟悉，以及习惯以中国由上而下制定礼教秩序的眼光看事情，才会对美式作风产生一种‘道德恐慌’感。”

今天问题已不是《America Against America》了，出租车里的领袖标准像只能带来贫困和交通事故。王缉思自己写的书不用看，那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看书至少要看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大专家的书。先看英文版，否则不知道中文词汇是什么意思，就像哈耶克的书一样。《国家间政治》，作者是汉斯·摩根索<sup>274</sup>。这本书是国际关系的上个世纪最标准的入门教程。不知道此书的作者？那就不必要知道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三个都是哈佛政治系或政府系的同学）。哈佛大学最核心、最重要的文理研究院有一个学术的政府系（其它大学都叫它政治系），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另外一个水货单位。文学、古典学、哲学、历史、数、理、化、生物、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都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经济学比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不知道要厉害多少。丁学良指出：文理学院才有资格颁博士学位给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本书 1948 年第一版，那是二战结束后出版的大作。

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远比经济学研究过瘾，可惜国际经济学没有跟上去。国内国际关系的研究水平比国内经济学的研究水平还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因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教育没有一个邹恒甫，而中国经济学教育 1991 年就有了一

<sup>273</sup> Wang 可能是王缉思。王缉思，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sup>274</sup> 汉斯·摩根索，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大师。



个邹恒甫。我本人也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权威。我自己发表了这方面的三篇论文，也写了这方面的工作论文。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这种大题目？因为我们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 central kingdom or central empire (中央帝国)！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印度、中国和希腊文明都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到今天希腊文明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而印度文明近二十年来在欧洲、美洲和非洲迅猛发展。希腊人比中国人差在哪里？印度人比中国人差在哪里？何况印度人和希腊人早已经融入了国际主流，中国人还远没有怎么开始。现在连非洲、拉美和中东权力阶级都是欧美硕士和博士，他们忽悠世界银行都用欧美普世价值。我们中国儒法天下哪里能征服这些人的心灵。China: 哇塞，钱多人傻快来！他们都来了等着无偿援助。世界银行给他们的钱什么时候会还本付息？没有的事！另外，我的朋友说，农历新年 Lunar New Year，也不是什么中国新年。中国农历年是兔年，别的国家有的是猫年。犹太人也习惯 lunar year。

中国跟欧美的关系什么时候能够缓和？微博上有人说得太好了：“只要我们的社会性质，宪法、党章里面的基本政治理念还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就是个死结。和欧美国家的敌对与不信任，也就是无解的。”此次 balloon (气球) 事件激发了美国公众对于两国关系高度的关注。<sup>275</sup> 美国人一般都不关心中国。这些天美国人一直看到 balloon 慢慢飞行的录像视频，他们的心情复杂了。如果不是几个气球，美国人民都爱吃 Chinese food (中国食物) and 买 Chinese products (中国产品)。现在好了，几条战狼搞得美国人民无比害怕 China……最奇特的是美国各种私人媒体二十四小时欣赏中国 balloon。人人都骂拜登没有用：Shot it down, please! (把它射下来，好吗) 拜登总统当然不希望美国人看到天空里的 Chinese balloon，但是他无法控制美国媒体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府不能有媒体对美国国内宣传。这让美国人完全依赖不知道多少私人媒体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We Chinese people 只有两个媒体：CCTV 和湖南卫视。美国人民都关心 Chinese balloon 可是太少见了，这可不是橄榄球的 Super Bowl (超级碗)。

日本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越南人和韩国人都不想用汉字……最近亚洲非常不和谐，因为两千多年来亚洲人也非常不和谐。佩洛西是美国二十五年来访问台湾最高美国官员。<sup>276</sup> 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是之前美中建交后访问过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1997 年，他访问了台湾。金里奇认为美国不能对中国示弱，所以议长佩洛西访台势在必行。金里奇访问台湾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派两艘航母保护。难怪他说：他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对他更尊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8 月 1 日说，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

<sup>275</sup> 指 2023 年中国高空气象气球飞入美国国境的事件，气球最终被美国使用导弹击落。

<sup>276</sup> 指 2022 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访问台湾。

而中国制造某种危机或加剧紧张局势，北京将负完全责任。他指出，因为美国议长和国会成员访问台湾是有先例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希望拜登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阻止佩罗西访台。我普及一下美国政府互相制衡的常识，赵立坚懂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吗？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是互相制衡的。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命令美国国会的任何人。

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 3 日在一场投资论坛上表示，在佩洛西等人 2 日晚间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湾时，美国与中国当时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他说：“毫无疑问，当佩洛西飞到台湾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已完全做好迎战准备，中国也是，但没有一方希望开战，所以他们控制住了（局势）。”佩洛西离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遭进行大规模军演，杨荣文又说美中双方都在军演中蒐集情报，以了解对方会如何因应危机。他认为北京在此之前也一定仔细研究过美国及西方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反应，观察俄罗斯资产如何被没收、如何执行制裁，“中国知道，如果发生战争，将面对同样、甚至更强烈的对抗与制裁。”“此外，美国也在观察解放军在这次军演中的部署，双方都在蒐集情报，思考下一步棋能怎么走。”吹牛逼。真封锁了台湾？除了极少数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国际上来往台湾的航班都在飞行。哪里有什么对台湾的封锁？台湾的军队有美国最新武器，我们的飞机不要被台湾军队打下来了啊。台湾的出口、进口现在一样在进行，只是民航业务取消了一些航班。我们中国为什么要浪费几天的武器弹药？应该炸台湾总统府啊。附上我的朋友闫博新做的一曲《枉凝眉》：一个是强国老大，一个是议会当家。若说怕了她，报纸天天骂脏话；若说不怕她，叫嚣半天不敢打。一个咬碎钢牙，一个温文尔雅。一个是屋里横，一个是内里刚。想海里有多少鱼虾儿，怎禁得早炸到晚，晚炸到早。我们如果真厉害，就把炸台湾周边鱼虾的弹药用来对付美国航母。现在又暂停进口台湾柑橘类水果和海鲜，中国的目标应该是美国，台湾人是中国人的同胞啊。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我们不能再出口一个螺丝钉给美国了，让美国工业熄火。这样才过瘾。

“没有东升西降了。没有不吃这一套了。”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方向”如下：“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美国实行“资本主义”，中国则是“社会主义”，双方走不同的路。“这种不同今后还会继续存在”。“中美相处很重要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而不是强求一律，试图去改变甚至颠覆对方的制度”。把人都笑死。拜登完全没有听到这些国内宣传的东东。东盟晚宴，外交部长王毅打包走了，因为东盟今天周五主要讨论台湾问题，王毅又要看到日本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了。东盟外交会议正在金边举行。

中国外交部长不参加晚宴，怕见美国国务卿。这怎么得了？佩洛西去台湾访问让外交部的人没有好日子过啊。中国外交部长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怎么没有把佩洛西搞定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昨天在法国电视节用访谈时表示“统一台湾后，我们将对台湾民众进行再教育。”自己被彻底洗脑后，还念念不忘要给台湾人洗脑。此人不知道再教育是一个多么可耻的过程。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你怕不怕我的军事表演？怕不怕洗脑？

美国政府最希望中国打台湾，这样美国企业都回到美国。中国离不开欧美市场和技术，美国根本不依赖中国的那些出口产品。加上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从中国撤离，中国经济还有什么技术？现在国内需要天量原材料进口、依赖欧美国家市场和技术、离不开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崇高友情……美国不依赖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更不需要中国人去留学。我在国内教书三十五年了，我完全不相信中国人在国内或在欧洲能够在经济学、宪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方面有任何新突破。离开欧、美、亚的发达国家，中国产品就没有多少国际市场了。根本不要指望非洲和拉美还中国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美国最希望中国闭国锁国。我们还怎么能闭国锁国？人口十四亿有什么用？现在印度和越南也死跟美国，美国商店里的中国制造越来越少，华夏爱国主义者在干什么？自嗨？华尔街日报报导，根据参与讨论的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已在近几周加快推动把部分生产移出中国大陆的计画，要求供应商更积极规划将组装移往印度和越南等国，并寻求减少对鸿海集团等台湾组装厂的依赖。台湾芯片业之父、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新厂安机活动上表示，地缘政治已经彻底改变芯片制造商面临的处境，他警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捲土重来。

我们天天像婴儿一样喊和平崛起。不，婴儿也本能地侵略！我们不打出去，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越南……都会打进来。崛起就是 power，power 只能用 power 来对抗。快点回收台湾。我 1962 年出生就天天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胜利！”以下来自我的朋友 PHWang 的微信朋友圈：“先进的文明就应该保持扩张性，必须保持扩张性。先进的文明如果没有扩张性，中国人现在还在大街上拉屎，男人脑后一根脏兮兮的长辫子，女人裹着畸形的小脚每天走不了几步路。他们认为文明没有先进与落后，并把这些视为自己珍贵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可惜先进文明的扩张性还是不够强，落后文化的顽固性仍然太强。所以虽然大街上那些有形的屎尿没了，男人背后那有形的辫子没了，女人腿下那有形的小脚没了，

但无形的、隐性的、隐形的屎尿辫子小脚仍然普遍存在。而这便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结果表现。那么，先进与落后如何分辨？自由竞争就会自动呈现结果。不敢面对自由竞争的‘文明’，就像不敢面对统计检验的‘医术’一样，不是愚昧便是邪恶。”一天到晚中国外交部叽叽喳喳，而国防部和人民解放军不反击。美国大兵天天在全世界行动，美国外交部哪里天天发声……美国用导弹击毁中国气球了，中国还等什么？还要等到麦卡锡议长访问台湾是击落他的飞机？上次为什么不击落佩洛西的飞机？

很多人学外交部发言人讲话。另外，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李稻葵、林毅夫……他们把说假话变成了时髦。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的“中国奇迹”到底在哪里？一个台湾人和两个美国人天天忽悠中国人。台湾人普遍不愿意打仗，而美国愿意付出一切保卫台湾。大家怎么看？只有让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他们先去用中国奇迹解放台湾。林毅夫（台湾名字林正义，台湾军队连长），你 1979 年能从台湾当兵游泳到大陆，现在你能不能带一亿大陆人游回台湾去？这样我们中国不需要浪费任何枪支弹药就可以解放台湾。毛泽东当年还在朝鲜和越南跟美国直接过招呢。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强国，连台湾都不敢打？！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中国奇迹”可以组织三个奇迹军团先拿下台湾。麦卡锡议长到台湾时他们三个中国奇迹给麦卡锡议长一点颜色。现在还在有人说：“没有内鬼，引不来外鬼。”攘外必先安内，老调重弹。何必不马上把台湾打下来啊。天天叫喊丑死人：咬人的狗不叫！憋死人，气死人，谁说东升西降？让张维为带领林毅夫先把台湾拿下来。在美国的中国人更爱国啊。在美国的台湾记者江南说台湾的坏话，他被蒋经国暗杀。1980 年代蒋经国派人在美国刺杀新闻人江南之后，美国死死逼着蒋经国放弃独裁专制。从此台湾才慢慢走上美国自由宪政的轨道。另外，现在台湾地区的人均净资产达 13 万 8220 欧元，超越日本、新加坡，居亚洲第 1。

如果普京不打乌克兰，欧美国家都在内斗和互斗，美国总统拜登哪里敢保卫台湾啊。现在欧美国家团结一点点了。中国连公开支持俄罗斯武器都不敢？真不敢？怕领导的财产被冻结？哪一个领导的财产不在美国？李稻葵和文一还是美国公民呢。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又加速了局势升级，欧美已经团结起来了。布兰德斯<sup>277</sup>认为，如果说俄罗斯的本意是试图阻止北约增加新成员，但是它对乌克兰的大举进攻恰恰起到反作用，因为它彻底摧毁了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北欧国家的犹豫不决，同时使北约张开双臂欢迎它们。此外，在亚洲，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因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局势而更加紧密地合作，它们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牢固。不仅这些国家，就是印度和越南

---

<sup>277</sup> 赫尔·布兰德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等国也在考虑如何在未来的棋局中找到自己适合扮演的角色。布兰德斯认为，危机看似是一件坏事，但在政治逻辑中，它反而是建立政治共识和催生内在动力的机会。在冷战期间，早期危机的爆发成功说服了美国公众对政府财政支出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如果局势不那么紧张，那么很难想象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公众的坚定支持。同时，危机还能使民主国家不至于长期沉醉于自我满足之中，它使人们意识到，外面的世界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平静，事实对他们的教育之深刻，要远胜于最雄辩的演讲者或最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因为他们知道，危险已迫在眉睫。

布兰德斯没有明说，但是文章却使人们很自然地顺着他的逻辑联想到台海局势。美国公众在过去没有像今天这么关心台湾，但是近年来形势的发展使得人们的心理产生改变，而这种民意直接在国会中反应出来，使得美国对台政策在近年来发生明显变化，挺台意味越来越浓，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台军售更频、官员访台层级更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美两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动作不断增多和加强，从而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台海局势有可能失控，并最终酿成军事冲突。

MOSCOW, Feb 21 (Reuters) - China's top diplomat told one of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s closest allies on Tuesday that Beijing's relationship with Moscow was "rock solid" and would withstand any test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路透社：莫斯科2月21日电——中国最高外交官周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能够经受住国际形势变化的任何考验。)

最后，危机既已出现，距离打破僵局也就不远了。

俄中关系坚如磐石，黑暗时代快要来了。

## 第五节

# 危险的同行者

“死抱权力不放就意味着很多人会死，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破坏。不，我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就是我的胜利！”

——戈尔巴乔夫

其实了解俄罗斯的历史也是了解中国秦制的历史。俄罗斯沙皇所有制就是中国皇帝所有制：一切都是沙皇/皇帝的财产；一切人都是沙皇/皇帝的奴隶。没有私人武器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更没有资本主义政治。政治和武器是军事的基础。俄罗斯想得到乌克兰的土地，普京指挥他的军人用武器占领乌克兰。这也是秦始皇占有江山的办法。

1263年，莫斯科大公国建立，1276年，首任莫斯科大公达尼埃尔立莫斯科为首府，1238年—1480年期间，莫斯科被金帐汗国统治；15世纪俄国人以莫斯科为中心，集合周围力量进行反对金帐汗国统治的斗争，并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时在1478年最终统一了俄国，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号为俄罗斯沙皇国，而莫斯科则成为俄国的首都；1572年莫斯科被克里米亚鞑靼人袭击和焚毁。1610年，被波兰将领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攻陷，遭受劫掠。1700年后，彼得一世迁都到圣彼得堡。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

利后，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俄国和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从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并于1922年12月正式成为苏联首都。1991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首都。

蒙古人的极权主义统治、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的极权主义统治和奥斯曼帝国的极权主义统治培养了俄罗斯沙皇的独裁残暴冷血专制。俄罗斯沙皇、苏联共产主义和普京的制度都是 slavery under totalitarian regimes（极权主义政权下的奴隶制）。China has the same totalitarian regime since 秦始皇（中国自秦始皇开始有同样的制度）。

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有一股强劲的君主制保守主义思潮。“以卡拉姆津等人为代表的专制保守主义主张绝对君主制，认为俄罗斯在国家权力统一时才能强大，‘君主是活的法律’，‘在他的身上汇集了所有的权力’；俄罗斯不需要自由主义改革，只需要‘家长制权力’和‘美德’。以罗斯托普钦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强烈反对法国的所有东西，将其视为自由主义和革命的代名词。以大祭司佛季和都主教普拉东为代表的东正教会保守主义，无条件地支持君主权力，只要君主权力不损害‘信仰的纯洁性’。以鲁尼奇等人为代表的共济会保守主义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情绪进行控制；同时主张俄罗斯担负起拯救被理性主义腐蚀了的欧洲的使命，重新塑造人类。”1832年乌瓦洛夫提出‘专制主义、东正教和人民性’三原则，将宗教理想、君主制原则、君主和人民在东正教下的统一宣扬为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他们认为，专制君主制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特殊类型，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特性。政府被视为秩序、道德、社会关怀、大众教育和文化的源泉，没有国家秩序只能产生‘混乱’。”<sup>278</sup>Richard Pipes在“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sup>279</sup>就里思考了为什么俄罗斯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历来都认为俄罗斯只有在专制政权下才能繁荣。以赛亚·伯林也说过：“可能除了屠格涅夫之外，没有哪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不受排外情绪的影响，有时甚至达到了对西方的极端仇视。俄国觉得她占领的这块土地上的‘西徐亚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这种尴尬的地位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永远难以克服的恐惧症。”我们也应该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跟俄罗斯历来的知识分子一样。

沙皇政体和苏联都是继承蒙古政体。蒙古统治俄罗斯二百四十多年也是用水利治理的全能制度。俄罗斯沙皇正是从蒙古统治者手里学会了彻底摧毁私有产权。于是一切都是沙皇的，贵族和农奴当然也是沙皇的财产。这是俄罗斯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因为共产主义经济里没有私有产权。Richard Pipes

<sup>278</sup> 《彷徨的双头鹰：俄罗斯保守主义如何成为现代政治的阻力？》，微信公众号，历史与秩序，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

<sup>279</sup>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Richard Pip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写得好！可惜没有中文版。他的三卷俄罗斯历史最好地总结了沙皇体制和苏联共产党体制的一致性。派普斯的三卷俄罗斯历史也值得中国人看看：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974)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90)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919 - 1924 (1993)。这三卷俄罗斯历史没有中文翻译太遗憾。许成钢和我很多年一致认为：理查德·派普斯是哈佛大学的哈耶克。“在派普斯看来，莫斯科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一切都被视为大公/沙皇的财产。俄罗斯采取的这条独立的道路(可能在蒙古的影响下)确保了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专制国家，其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根本不同。当俄罗斯领导人试图在 19 世纪实现现代化，而不寻求改变俄罗斯社会基本的‘世袭制’结构时，俄罗斯帝国的这种‘世袭制’开始崩溃。俄国几个世纪以来所采取的这一独立路线使得俄国在 1917 年对革命持独特的开放态度。派普斯强烈批评了俄罗斯帝国晚期激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因为他认为他们过于狂热，无法接受现实。派普斯强调，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一心要征服世界。他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与当时苏联的许多传统历史相反，十月革命不是一场普遍的起义，而是一场政变，政变是由一小部分人在一群精选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在虚假的口号下强加给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这些人随后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从一开始就对异议者采取不宽容和镇压的策略”。可惜，派普斯近年过世了。看了派普斯的著作之后，我们就能体会到哈耶克还是太不了解共产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最清楚苏联体制和沙皇体制的一致性。

中国根本没有研究共产主义体制的专家。苏联 communism (共产主义) 就是在人间建立天堂，最后苏联等级制把人间天堂变成人间地狱。在人间建立天堂就是历史主义的荒谬。

列宁创建的党存在与共和主义的严重矛盾。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 ‘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 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 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 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 dictatorship。）列宁曾这样问道：“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 13 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 13 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向前冲，然后再看。”马克思和列宁很懂设计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力：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



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府，把所有财产和权力都集中于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实现民主集中制。在俄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苏联共产主义的等级制跟俄罗斯沙皇体制也没有差别，民主，平等和自由本来就是消灭等级制。“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描述了一路的见闻。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且有等级之分。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这位刚刚提拔的高级干部不禁为这种说法瞠目结舌。”<sup>280</sup>

“苏联有很多奇葩的制度，比如很出名的‘等级官员名册’，斯大林当时依靠这个制度对所有的官员进行了贿赂，拿到把柄之后就能随意处决他们，所以他在当时的地位无人可撼动。勃列日涅夫当时也利用了这个制度控制了苏联近二十年。在1922年的莫洛托夫提出要推行‘国家机关官员任命名册’，这个提议在当时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到了同年11月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在中央发表了讲话，阐述了目前的制度给社会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的民怨已经相当深了，如果不及早建立这个名册，后果不堪设想。在11月中旬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同意启用官员任命名册的制度，在4天后推出了1870人的第1号官册，1875人的第2号官册，总计3545人。这个制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确实是有正面意义的，因为它保证了中央能够掌控其他地区的官员任命，便于管理偌大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可是明明一个好的政策，到了斯大林手里却变成了一种控制官员的手段，他根据名册里官员的名字来调查是否有违纪行为，如果无违纪行为的话则去贿赂，确保手里有每一个官员的把柄。接着斯大林还让克格勃去全

<sup>280</sup> 选自《前苏联的等级制度》，苏联女作家，<http://m.dunjiaodu.com/qizhouzhi/2017-10-21/2001.html>。

天候监视高级官员的一举一动，整个国家陷入到了一个恐怖的氛围当中，官员也因为知道有把柄在斯大林手里，所以肆无忌惮的去贪污了，苏联最终也渐渐的走向了解体。”<sup>281</sup>

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 1793—1794 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派别”不能立足，这与 1794 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对夫人的女仆、漂亮的苏珊娜心怀鬼胎，他妄图借着恢复贵族对女仆行使‘初夜权’的名义，趁机占有苏珊娜，并破坏费加罗的婚礼。费加罗和苏珊娜，尽管是一对出身卑微的下人，但他们却拥有可贵的人格和自己的尊严，当伯爵以金钱和权势对他们实行压迫时，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其对抗，不仅拿了伯爵的钱，而且戏耍了他一番，在哄然大笑中，解构了贵族阶级的特权。嘲笑了他们不可一世而有愚蠢透顶的嘴脸。以小人物费加罗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上新生力量的崛起。《费加罗的婚礼》既流露着‘第三等级’的欢快的笑声，也表现着贵族阶级行将败亡的趋势。剧中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多有抨击。当国王路易十六对这个剧下了禁演令后，他们甚至向国王请愿，为它的重新上演而欢呼，有人还披挂上场，乐意扮演剧中人物。路易十六敏锐的鼻子，已经嗅到了剧中的革命气息，他的这种直觉，被后来的社会现实所证实。据说，拿破仑曾经说过，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 1781 年《费加罗的婚礼》上演开始的。”看了费加罗的婚礼和苏联的等级制之后，我们就理解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了。当然资本（财富也是权力、也是等级）的邪恶不容忽视。抑制资本的邪恶只能是资本之间的竞争，因为政府干预更加邪恶。可惜的是秦汉政体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和苏联后来也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

我从 1978 年到今天一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特别的兴趣。俄罗斯历史和中国历史最好比较着读。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更是密切相关。理查德·派普斯在《共产主义简史》一书中所言“共产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的历史绝不短暂。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致命地控制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乌托邦意识形态造成了近 1 亿人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50%。‘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出了问题的好主意；它就是一个坏主意’。”“派普斯首先追溯了共产主义的哲学起源（它的前身是柏拉图），然后概述了卡尔·马

<sup>281</sup> 《苏联的等级官员名册本意是好的，斯大林却用它来贿赂，控制官员》，搜狐网，史海无边，来源《苏联史》，[https://www.sohu.com/a/329598595\\_100120177](https://www.sohu.com/a/329598595_100120177)。

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接下来是关于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俄罗斯而不是西方工业国家生根发芽的故事，马克思本人认为西方工业国家会孕育共产主义(答案是:产权和法治的传统太强了)。即使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也不是大众需求的产物(事实上，它从来都不是任何地方大众需求的产物)。相反，这是一场由列宁领导的少数精英强加给整个国家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共产党人声称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很少有工人参加他们的运动。因此，‘共产党必须实行专制和暴力统治;他们绝不能放松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大清洗是一场恐怖运动，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残暴程度和受害者人数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统治者平均每天处决1000人;他们所取代的经常被批评为不人道的沙皇政权，在85年的时间里处决了不到4000人。”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谈有为政府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邪恶。马列社会拥有国有制经济力量、国有制军事力量、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力量。如果我们看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我们就能看清儒法现代化。马列社会是最高级版本的儒法社会，而且马列社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儒法文化的最高级结合。儒法社会怎么能跟马列社会比呢。赵鼎新的《儒法社会》只能让人 asphyxiation (窒息)。

苏联一样有过三次经济奇迹，中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要跟美国搞军备竞赛，太浪费资源。“苏联70年(1917—1987)发展道路上，其经济出现过三次重大突破与飞跃，1925—1937年工业化奇迹;1956—1964年改革开放时期;1965—1980年稳定发展时期。1925—1937年间，在斯大林“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下，出现了让世界震惊的工业化奇迹。但是，斯大林体制以行政手段搞经济，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国家强大了，人民没有富起来。这种体制僵化，缺乏活力，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54年—1960年是赫鲁晓夫改革最有成效的6年。这6年内基础设施(水、电、气、路)建设加快。苏联人民尝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可惜好景不长，专断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又开始作祟。总体上看，赫鲁晓夫改革是不成功的。他在用政治方法搞改革，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管理经济，没有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靠斯大林式的官僚运作改革，百姓沉默，加之他个人理论水平太低，言行不一，引发社会混乱，导致被赶下台。1965—1980年是苏联经济第三次发展时期，其中1964—1975年这10年成就比较突出。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建立新经济体制的目标，其主要内容有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鼓励和支持个人副业的发展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苏联赶上了当时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高潮期的好机遇，尤其是石油涨价给苏联带来很大的利益，1973—1979年石油出口净收入2000

亿—2500 亿美元。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 2/3，居世界第二位。当然，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是依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但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对内政治改革全面倒退，对外凭借苏联拥有的强大国力，穷兵黩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大举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开展核竞赛，为所欲为，四处出击，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sup>282</sup>1980 年开始，美国总统里根发起跟苏联的军备竞赛，苏联被活活拖垮。军事力量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关系也是我在世界上第一个做了动态模型。“A dynamic model of capital and arms accumulation,” “Military spending and stochastic growth”<sup>283</sup>这个模型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太重要了，这也是美国 and 苏联军事对抗的模型，更是中国和美国冷战的模型。我用军事力量和资本积累（当然包含技术）来看中美两国的长期冲突和“冷战”。军备竞赛现在又是世界主题了。所以我三十年前做的军事力量积累和资本积累模型今天也成了世界主题。我的论文越来越成为中美冷战必读物。很多年以来台湾学术界特别喜欢跟着我做的这一个动态模型。目前世界军事冲突局势一定让我的这个模型成为热门之一。另外，当我模型化军事力量积累和资本积累时，我事实上也在模型化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 $u(c, m, m^*)$ ， $c$  表示对生存快乐的追求，而  $m$  表示人的破坏性、毁灭性和死亡本能。弗洛伊德答复爱因斯坦《Why War?》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他的死亡本能。<sup>284</sup>

苏联倒台前的 1990 年，其 GDP 只是美国的 50.8% (2.6595 万亿/5.2333 万亿)。用 PPP (购买力平价) 计算几乎和美国拉平。按 PPP 来算 1990 年苏联 GDP 是 5.694 万亿，美国是 5.980 万亿。苏联是美国的 95.22%。可惜，苏联的统计数字都是假的。苏联的经济体为什么被美国夸大那么多倍？哈佛-MIT 信仰共产主义的教授预测的。

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不平等水平快速上升“俄罗斯私人财富的崛起几乎完全是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的，因为国民财富（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和）几乎并没有相对于国民收入增加（从 1990 年的 400% 增加到 2015 年的 450 %）。相比之下，到 2015 年，中国国民财富则达到了国民收入的 700%。从长远来看，俄罗斯收入不平等的演变看起来像是 20 世纪西方观察到的长期 U 型格局的极端版本，沙皇俄国时期，俄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很高，到了苏联时期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可苏联解体后又回到了很高的水平。目前，俄罗斯前 10% 收入者财富

<sup>282</sup> 《苏联两次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探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617/c427165-31161415.html>。

<sup>283</sup> A dynamic model of capital and arms accumulation, Zou Heng-fu,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Elsevier, vol 19(1-2), 1995  
Military spending and stochastic growth, Gong, L & Zou, H.,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Elsevier, vol 28(1), 2003.

<sup>284</sup> 见附录 2.3。

占比与美国的水平相似（或高于）。”<sup>285</sup>关于苏联收入过于平等，实际上是丘拜斯，盖达尔那批人长期抨击的对象。当年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三巨头，丘拜斯润出俄罗斯，盖达尔早死，至于美国人杰佛瑞·萨克斯。这个就搞笑了，现在杰佛瑞·萨克斯是最激烈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俄罗斯翻了车的缘故。这里评论我的哈佛导师之一萨克斯非常过瘾。

俄罗斯人的生存法则：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真是俄罗斯人的奇迹啊，俄罗斯人一千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摆脱当奴隶的状态。当沙皇被推翻后，俄罗斯人享受了十年的自由。自由让俄罗斯人不舒服，他们在1917年后拥抱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全能制。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之间的自由又让俄罗斯人不舒服，他们立马享受普京大帝的独裁统治。欧美自由国家的人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争当奴隶。普希金一边写《自由颂》，一边赞美沙皇极权统治。

俄罗斯普京大帝现在利用中美冷战的机会秀肌肉：俄罗斯武力插手哈萨克斯坦内乱、俄罗斯加强跟印度军事合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全面合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投资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中国是否有保护好自己投资的军事力量？俄罗斯把欧洲大陆搞乱，这对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巨大的威胁。中国人要醒过来。胡锡进现在发痴呆症了，难道胡锡进还在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叫好？

中国这个时候需要邹恒甫这样的外交家、国际战略家和经济学家啊。这可不是邹恒甫自吹自擂。我们中国人不要天天仇视美国，邓小平早说了：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裕了！我们要好好复习俄罗斯和中国过去的两百多年的历史。

## 普京与俄乌战争

在美国看世界上的各种新闻评论后，我一开始认为俄罗斯不敢打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民早准备死扛俄罗斯帝国，乌克兰只会成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阿富汗，而普京大帝只是想利用战争忽悠西方国家减少对俄罗斯的制裁。CNN 记者也称大部分俄国人表示俄国不会出兵乌国，因为俄国报章和电视新闻都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擂起战鼓。

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由维京人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第一个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Kievan Rus），它以基辅为首都。基辅罗斯灭亡后分裂成多个小国，并独自演化出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大分支民族，这也是为何普京时常称乌克兰与俄罗斯系出同源。一九二二年，俄罗斯与乌克兰

---

<sup>285</sup> 《从苏维埃到寡头：俄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扫描，1905-2016》，见智研究所 全球央行观察，<https://zhuanlan.zhihu.com/p/37702448>。

一同成为苏联的创始成员。一九三二与一九三三年，当时苏联领袖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失当导致四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在所谓苏联粮仓的乌克兰，此为恶名昭彰的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高度文明时，莫斯科还是一块低湿地。是蒙古人入侵才把莫斯科这个极权主义的罪恶之城扶持起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我决定进行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保护那些在过去 8 年中遭受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为此，我们将努力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且将那些对平民，包括对俄罗斯联邦公民在内，犯下无数血腥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百分之四十三俄罗斯人表示，使用武力逼使乌克兰并入俄罗斯是错的；但有百分之三十六认为此做法正确，其余受访者不置可否。让普京一个人去打仗，俄罗斯人民继续喝伏特加。俄罗斯还有私人报纸和电视，普京流氓没有完全消灭民主。俄罗斯普京流氓作为独裁者还想切断乌克兰的通讯网络，马斯克免费给乌克兰人卫星通讯，哪里需要 5G?独裁普京流氓还想断俄罗斯人的推特和脸书，让俄罗斯人民不知道国外信息，俄罗斯人民怎么能忍受没有全球信息的自由？猪一样的普京哪里知道民主啊。

这次普京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亡国是非常有可能的，大家等着瞧。在 2014 年遭到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早就痛定思痛，全力武装，目前全国正规军有 19.4 万，预备役 25 万。以 1939 年苏联军队之盛，打一个只有 3.2 万民兵的芬兰尚且三个月不决，阵亡 13 万。此番面对在本土作战、保家卫国的乌克兰人，俄国人并不会很轻松。一旦乌克兰人顶住俄军第一波攻势，如车臣战役那样把俄军拖入巷战，那么俄国人要取得台面的胜利也许可以，但是很难完全控制乌克兰。根据最新消息，俄军第 74 摩托化步兵旅的侦察排今晨在乌军的包围下甚至投降了，这场战争对俄国人不会轻松。更何况乌克兰后面有几乎所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美国先进的坦克也在运往乌克兰。

最重要的是愿意死扛，打持久战。北约对付俄罗斯太容易了，更何况现在乌克兰和波兰也愿意死扛俄罗斯。俄罗斯还要对付哈萨克斯坦的内斗(内战)，这些国家打游击战就能拖死俄罗斯。谁害怕俄罗斯打核武器战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不在乎。俄罗斯帝国的一大堆核武器有几个可以使用？堆了五十多年，俄罗斯人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维护那些核武器。核武器纯属浪费 GDP。美国当然愿意给乌克兰和波兰原子弹。世界各国战争局势证明核武器没有用，除非毁灭地球上的全人类。北朝鲜都能制造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哪个国家不能制造？如果人类要继续存在下去，今后的战争不会使用核武器。

估计很多人把普京进攻乌克兰与美军攻占伊拉克做了类比。以为普京大军进入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军队立刻丢盔卸甲，三天放弃抵抗，取泽连斯基首级

如探囊取物一般，呵呵。殊不知，不仅在武力上，俄罗斯军队与美军无法相提并论，国际舆论，道义，国民意志，乌克兰也不是伊拉克。想独善其身的德国已经开始军援乌克兰，这个口子一开，普京获胜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俄国目前尚未取得乌克兰的制空权，这大幅限制了俄国空军的战力。俄军的伤亡人数可能远超过克里姆林宫所预料和公布的数字。”从武器，到战术，这不象是一场现代战争，更像是一场老旧的二战延续。除了核武，俄罗斯的常规军力，比美国差了太远，这一战，暴露的俄罗斯的实力，不但德国人看明白了，中国人也应该看明白了，有好几亿中国人崇拜普京大帝。

怎么收场也成了大问题。普京敢下屠城（基辅）的命令吗，凭着俄乌两国民间广泛的友情，下令大开杀戒，士兵也未必会执行。留下的血债，不是普京能承受的起的。俄国持续施压要攻下基辅，结果基辅市长克里契科（Vitali Klitschko）宣布基辅将实施更严厉的宵禁规范，表示违反规定者将被视为要实施破坏任务的“敌军”。为了加强防范，基辅的宵禁时间将延长，为当地时间周六到周日的下午 5 时至上午 8 时。他在发表于线上的公告中表示，“宵禁时间还在街上走动的所有平民，都会被认为是敌军的破坏、侦察小队成员。”路透社报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的幕僚阿列斯托维奇（Oleksiy Arestovych）今天表示，攻击首都基辅的俄罗斯部队未再挺进，且自从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迄今，约 3500 名俄军已阵亡或受伤。“我们正在打击基辅（Kyiv）周边的敌人，敌方现在未再移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也指控莫斯科试图推翻他，并在乌克兰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但是乌克兰部队已经中断俄国朝首都基辅的推进，也同时破坏了俄国要推翻他的阴谋；他并呼吁俄国人对总统普京施压，要求普京停止进攻乌克兰。泽连斯基说，“我们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他并强调乌克兰军队已经掌控基辅与周边主要城市。“俄国迄今对乌克兰发动‘导弹、战斗部队、无人机、炮弹、装甲车、破坏行动与空降部队攻击’，并击中了‘住宅区’。”他表示，乌克兰部队与俄军在多个城市交战，包括南部城市敖德萨（Odessa）、东北部哈尔科夫市（Kharkiv）以及首都基辅。西部利维夫市（Lviv）和其他乌克兰中、西部城市则是遭到空袭。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赢得了加入欧盟的权利，呼吁欧盟领袖做出决定。“这将是我国得到支持的关键证明。”

普京对欧美国家来说是一个大笑话。欧美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政府想要和平，但若我们遭受攻击，如果我们面临夺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孩子的生命的企图时，我们将捍卫自己。你们打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正面迎战，而

不是我们逃跑的背影。”

美国总统拜登：“普京总统选择一场有预谋的战争，这将带来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和人类苦难……”“我将与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会面，美国及盟友、伙伴将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普京先生，在局势不可收拾前，请悬崖勒马！”

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我们将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战略部门，阻止他们获得关键技术和市场。我们将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及其现代化能力。”“我们将冻结俄罗斯在欧盟的资产，并阻止俄罗斯银行进入欧洲金融市场。”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欧洲发生了一场我们认为只能在历史书中看到的陆战。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俄罗斯将为这次攻击自食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法国总统马克龙：“法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决定与乌克兰开战。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

英国首相琼森：“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攻击，选择一条流血和破坏的道路。”

北约观察了两天，发现俄罗斯不过如此，乌克兰顶住了，是真的在拼，那武器装备就开始大量输送了。

法国婊子也改变立场了。法国婊子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参加法国年度农业展览会时警告，俄罗斯对亲西方邻国乌克兰发动攻击后，全世界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久。“今天早上如果你要我分享一个看法，那就是这场战争将持续很久。”“这场危机和战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有随之而来的危机都将产生长远影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马克龙为什么不继续跟普京流氓多互访几次？法国自拿破仑之后就没有打过胜仗。法国婊子的核武器有什么用？好样的乌克兰，比法国坚持的久。

事关欧洲安全，欧洲人不直接参战，援助乌克兰应该的。普京的胃口很大，不趁此机会拖死他，他的国境线会不断扩大，和俄国交界的国家会不断成为乌克兰。欧洲不被俄罗斯普京打几下，欧洲人会完全腐烂。欧洲人到现在也没有生命力。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思想今天太值得复习了：罗马共和国的兴旺发达要感激扩张和战争。美国战争和移民扩张是最了不起的。中国人也太需要打仗了。我看美国很多支持乌克兰的人都自己带枪炮去乌克兰打俄罗斯了，我们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有几个参加了俄罗斯军队上前线？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枪炮？没有自己的枪炮，那就借俄罗斯的枪炮吧。支持普京的中国人快点坐飞机开坦克去前线啊，许多乌克兰的美国人以和以色列人都在前往乌克兰前线加入保家卫国的战斗，更不用说住在欧洲各国的乌克兰人。

为什么欧洲民主化国家都普遍会逐渐失去尚武精神和军事优势，而美国却



能长久保持全球第一的军事实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民主自由文明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密码。你们要是能有机会听听邹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太好了。我以前已经提供了这个问题的部分思考。罗马共和国 500 年提供了最好正面的例子。美国必须学习罗马共和国。现在美国人被俄罗斯和中国惊醒了。请先阅读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此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托克维尔早说了：美国本来就是第二罗马共和国。麦迪逊和他的联邦党人同伴，他们相当精明地自称为‘联邦党人’，其实他们应该被称为国家主义者，他们想建立一个可以约束所有政治权力的制度，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美国国父们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只说外部环境：美国独立面对的敌人是最强大的英帝国。想想后来的美国的敌人：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不断扩张的自由共和国才能保持尚武精神。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理论的精髓之一。单提民主是对自由共和国的最大误解，因为罗马自由共和国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融合体。

马基雅维利还说：The best of all armies are those that consist of armed citizens（最好的军队是由武装的公民组成的军队）。乌克兰公民士兵是为自己的生命、自由、家园和财产而战，俄罗斯奴才士兵是为普京暴君而战。俄罗斯野蛮帝国继承的是东方蒙古专制帝国的邪恶衣钵，俄罗斯人普遍知道独裁专制帝国的凶恶，但他们还是喜欢继续在斯大林和普京独裁统治下当奴隶。现在俄罗斯人有他们的沙皇普京。所有东方专制帝国从来没有文明，因为文明必须以自由为基础。欧美支持下的乌克兰人民为了自由必定战胜俄罗斯的东方专制独裁暴君普京。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就像公元前五世纪两万希腊公民士兵打败波斯帝国两百多万奴才士兵一样。所以乌克兰打败俄罗斯野蛮帝国的入侵是将是世界自由文明两千五百年来第四次最大幸事。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现实影响是巨大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办法逃离的人都去了西欧和北美。用脚投票是现代人的选择。特朗普总统说了：在美国骂美国的人为什么不回他们的 Shithole（极其肮脏的）国家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俄罗斯的厉害科学家们几乎都来美国了？这是猪都能回答的问题啊。普京的女人和孩子不也躲在欧洲发达国家吗。俄罗斯总统普京忙着攻打乌克兰之际，据称他的情人、前奥运金牌体操冠军卡巴耶娃（Alina Kabaeva）与四个孩子匿藏在瑞士。一名消息人士对《纽约邮报》说：“当普京挥军乌克兰，袭击无辜平民并引发难民危机之际，他的家人却躲在瑞士某处一个非常私人 and 非常安全的山间小屋里，至少目前是这样。”十年前跑到欧美的，前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同时也是知名的俄罗斯异议人士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表示，乌克兰击败莫斯科是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卡斯帕洛夫在慕尼黑安

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一个讨论俄罗斯“民主未来”的小组讨论中表示，“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乌克兰遍布着如此想法。”“俄罗斯人民生活在泡沫中，除非帝国的概念因为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崩溃，不然无法打破这个泡沫。”“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输掉战争时，战争就会输掉”——胜负不是以领土得失来判断。厉害一点的俄罗斯人都在欧美，窝里斗的人留在俄罗斯。我们是看着俄罗斯衰败的。普京厉害：“俄罗斯人民，总是能够区分真正的爱国者和败类、叛徒，他们（叛徒）就像是不小心飞进嘴里的蚊虫一样被吐出来。”只有普京大帝一个人最爱俄罗斯。全世界只有普京一个男儿！俄罗斯总统和外长的女儿在国外当然是卖国贼。普京赶快把俄罗斯官员的国外孩子们都抓起来。

许多科研计划是多国参与的，战后俄科研人员可能深处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有办法与他国共享科研成果，科研进度会大落后。664名俄罗斯科学家、研究人员及科学记者周五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对战争爆发负有全部责任。他们认为，俄军攻击乌克兰，“已经注定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和作为一个贱民国家的命运”。信中说，乌克兰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非常亲近的国家。我们中许多人在那里有亲戚、朋友和研究人员。我们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一起与纳粹作斗争。现在，为了满足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地缘政治野心，在意淫式和可疑的历史考量驱使下发动战争，无非是背叛了他们的记忆。学者们和记者在信中还说，我们尊重乌克兰，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有效的民主机构基础上的国家。我们理解我们邻国的欧洲选择。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公开信还表示，通过发动战争，俄罗斯已经注定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和作为一个弃儿的命运。这意味着我们研究人员将不再能够以正常的方式进行研究，因为如果不与其他国家的同事进行广泛合作，科学研究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孤立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文化和技术退化，同时关闭所有逃生的大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是迈向深渊的一步。

拜登的周围本来都是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问。美国共和党上台后马上可以打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请环球时报跟踪持续报道。美国两党天天斗争，但它们对待极权主义独裁者普京的态度高度一致：再援助四百亿美元给乌克兰。美国本来四分五裂。俄罗斯和中国太厉害了，美国人一下子就团结起来了。厉害啦，我的国！美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太容易了。我赞成美国人选择科技尖端制造，特别是保持最高级别的私有化军工制造。看看乌克兰用美国一般武器对付俄罗斯就让世界信服了。乌克兰现在开始制造武器了。乌克兰的武器马上比俄罗斯的破烂武器高几个级别。如果乌克兰用美国尖端制造的武

器（排除核武器），俄罗斯早灭亡了。现在全世界数据证明，国有企业制造出来的武器一定是废品和豆腐渣。俄罗斯只能自杀，它用核武器一定会自我毁灭。

为了提高武器的品质，中国必须建立私人自由竞争的武器市场。中国最好学美国、瑞士、以色列……让公民人人都持有各种先进武器。否则，中国制造的武器很难达到美国的品质。俄罗斯的武器给了全世界各国一个最大的教训：国有军工企业生产豆腐渣武器。如果大鹅轻松打乌克兰，你会说中国武器脱胎于鹅系，仿制于鹅系，如何如何牛 B。现在大鹅打成这鸟样，你改说辞了也没用啊，毕竟俄军实力公认世界第二，俄国这些年没少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现代战争光看火力足有个卵用。俄军火力优势是乌军的 8-10 倍，最后不还是被乌军打得满地找牙吗？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战场电子干扰能力、目标探测精度、火力打击精度和打击速度、导弹和无人机的智能化搜索目标能力、远程夜视能力才是决定陆战战场胜负的关键。在这些方面美国甩开中国十几条大街！不只是电子、光学和材料技术上的完全碾压，更是软件工程上的完全碾压，而美国在软件工程上的优势，是靠着几十年来的无数战争和无数实战演习才获得的无数总结、修改和反馈后才实现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而且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国。现在美国出口石油给欧洲，欧洲完全不必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了。国内人难道不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石油国？美国工业高度发达，为什么总出口农产品？因为美国农业也是世界上第一，尽管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农民。美国基本上没有发挥它的农业生产潜力啊。

如果俄罗斯最终分裂，美国完全有能力占领俄罗斯。美国通过阿拉斯加占领俄罗斯太容易了。俄罗斯只会越来越小，而美国却越来越大（100 个州毫无问题）。当然俄罗斯也可以把自己的领土完全卖给美国，就像当年俄罗斯卖掉阿拉斯加一样。这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最后在哪里落户？俄罗斯啊！

阎学通自己追求时髦，提出“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霸权。“领导力的变化可解释大国的兴衰规律，因为大国兴盛和衰落的原因都在于政治领导。”普京的政治领导力那么厉害，他怎么把俄罗斯折腾得成了一个死魂灵？德意志的强大政治领导力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政治领导力带来法国大革命。俄罗斯沙皇的强大政治领导力带来十月革命。阎学通的政治领导力正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阎学通还以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大理论。阎学通搞这种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决断力，危险啊！阎学通的政治领导力与中国全过程民主刚好对立。阎学通的政治决定经济的荒唐理论更是违背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常识。这种荒唐至极的东西还好意思宣传出版。阎学通、朱苏力、强世功这些德国法西斯的门徒们认为国家领袖的领导力决定大国崛起。英美宪政没有强大领导力，为什么能够从 1688 年以来一

直统治世界?美国没有领袖, 欧洲各国也没有领袖, 它们怎么总在呼风唤雨? 俄罗斯有宇宙领袖普京, 它怎么雄不起来? 李稻葵、林毅夫、郑永年、张维为、金灿荣、胡鞍钢、汪晖、强世功……搞投机政治, 都一样丑陋不堪。政治领导力其实是熊彼特的帝国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二十多年前早把阎学通的政治领导力和其它重要因素用动态模型讨论了。我的动态数学模型 (A Naive Model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and Powers) 说明: 政治领导力再强大, 国家和帝国的兴衰还是不可避免。数学模型的力量巨大啊, 因为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纳粹帝国、苏联帝国……都土崩瓦解了。阎学通看不懂我的模型, 他无知无畏。

普京是沙皇俄国的忠实继承者, 要恢复大俄罗斯帝国的荣光。国内人还以为普京是共产主义战士, 要恢复苏联。国内支持普京大帝的人请认真真看普京 2022 年 2 月 21 日对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批判。普京是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 他要恢复沙皇俄国和传统东正教。俄国人对土地和出海口的贪婪世人皆知, 只有最愚蠢的粉红还在叫好。普京 (Vladimir Putin) 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抱负: 他要清算布尔什维克 (苏联共产党) 的“卖国”行为, 恢复帝俄 (俄罗斯帝国) 的地缘政治遗产。普京讲话开篇的 3,000 多字完全用来痛斥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建立的苏维埃联盟体制, 把它当作当前危机的起点或根基:

“让我从现代乌克兰完全由俄罗斯, 或更准确地说, 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的事实开始。这个过程几乎是在 1917 年革命后立即开始的, 列宁 (Vladimir Lenin) 和他的战友们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对俄罗斯本身进行了处理——通过分离, 通过撕掉它自己的部分历史领土”, “1954 年, 赫鲁晓夫 (Nikita S. Khrushchev) 出于某种原因从俄罗斯手中夺走了克里米亚, 还把它送给了乌克兰”, “列宁主义本质上正是这些邦联式国家结构的思想和关于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的口号, 它构成了苏联国家地位的基础。”从而“满足前帝国边缘地区无限增长的民族主义野心”, “将庞大的、往往不相关的领土转移到新形成的、往往是任意形成的行政单位——加盟共和国”, 并赠以“最热心的民族主义者以前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各共和国无条件脱离单一国家的权利”。这种“完全无法理解的疯狂的行为”原因在于: “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为此他们不顾一切: 不惜牺牲俄国, 满足 (德国在) 布列斯特和约提出的屈辱条件——即使帝制德国及其同盟处于最困难军事和经济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结局已定时。这是为了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任何要求, 任何愿望。”

斯大林被普京称为恶魔, 怎么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期盼普京成为第

五个斯大林?久加诺夫是把斯大林跟俄罗斯历史上的几个最大恶棍排在一起。过瘾。共产党人敢于说真话!

普京的待遇: Situation in Ukraine: ICC judges issue arrest warrants against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and Maria Alekseyevna Lvova-Belova (乌克兰局势: 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利沃娃-贝洛娃发出逮捕令) 普京不敢离开俄罗斯去印度尼西亚见拜登, 因为普京离开俄罗斯就会被推翻, 中国不一样。英国“镜报”(The Mirror) 报导, 俄罗斯争议政治理论家, 普京总统的策士, 有“普京大脑”之名的杜金(Alexander Dugin) 是极右派民族主义者, 也是赞成俄军进攻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主张将俄国领土扩张到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全境, 并兼并波罗的海三国。如今在俄军于乌克兰赫松挫败后, 他主张推翻普京, 甚至暗示应将普京处死。俄乌战争持续,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 前助手、政治分析师加利亚莫夫(Abbas Gallyamov) 在 6 日透过 Telegram 称, 要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落败, 甚至导致政权换人, 普京已准备好逃亡计划, 可能会是阿根廷或委内瑞拉。加利亚莫夫引述内部人士消息, 表示克里姆林宫在今年春天就开始制定在乌克兰战场上落败的备用计划, 更非正式称之为“诺亚方舟”(Noah's Ark)。

这个人说对了: “普京入侵乌克兰就是在犯错, 他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埋葬的不光是所谓的和平秩序,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很可能埋葬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像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希特勒入侵波兰、日本帝国入侵中国、苏共入侵阿富汗一样。伟大的新沙皇很可能误以为, 这场战争会像 2008 年和 2014 年那样小规模入侵般, 不会为他的命运带来严重恶果, 实际上这是可笑的一厢情愿。” 普京在位二十年太得意忘形。

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一年来, 俄国倒退至黑暗、残酷专制的过去。随着普京可能再度动员、佣兵头子普里格津名气提升、俄国与欧洲渐行渐远, 普京统治正出现模糊裂痕。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Putin? Dictatorships Look Stable—Until They Aren't. (普京下台的开始? 独裁政权总是看起来很稳定——直到事情并非如此)

五百年来, 跟俄罗斯走的没有一个国家有好下场。看看今天, 乌克兰反击俄罗斯入侵, 欧美一起联手。其实没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死命制裁, 俄罗斯根本不依赖印度和中国。现在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 为了在乌克兰的中国人的安全, 请中国不要挺俄罗斯, 否则, 在乌克兰中国人会被乌克兰人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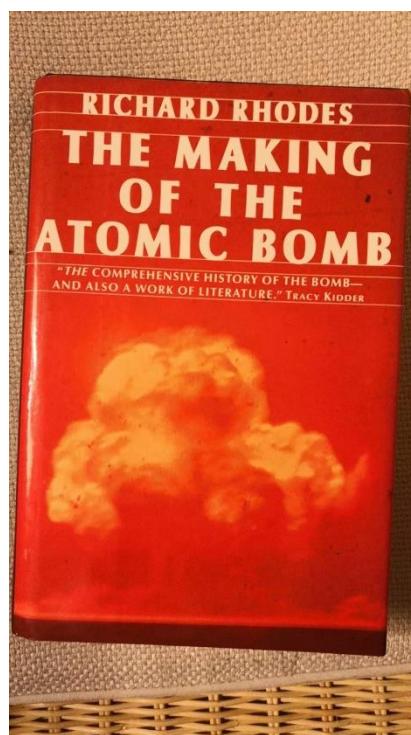
美国人不在乎中国军事力量, 但普京大帝真害怕。俄罗斯今年夏天已接连指控 3 名顶尖科学家“叛国”并逮捕, 将科学家关押在莫斯科列福尔托沃监狱。

俄罗斯官方媒体 5 日宣布，顶尖极音速导弹专家希普留克（Alexander Shiblyuk）被控“叛国”被捕，这已经是夏天以来俄罗斯以叛国罪名逮捕的第 3 位科学家，前一位被逮捕的科学家遭控与中国大陆的安全机构合作被捕，他在被关押后几天内不幸因癌症病逝。

苏联的科学家就曾帮助中国人造原子弹啊，看看中国居里夫人何泽慧的访谈。<sup>286</sup>何泽慧是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先生的夫人，参与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功臣。她作出了具有世界级科学贡献，是世界首次捕捉铀核四分裂现象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女士是搞中国氢弹的于敏的导师。美国氢弹之父是杨振宁的导师(匈牙利美国人)Edward Teller。两弹一星科学家之一何泽慧，接受央视《大家》栏目访谈时特别谦虚。主持人说：你们这些“两弹一星”功臣为国家作出这么大贡献，应该自豪，骄傲。何泽慧回答：有什么自豪骄傲的？都是抄的——苏联专家接到撤回国的消息，马上把全部原子弹的资料，图纸让我们抄，抄写不赢让我们用相机拍。主持人说：苏联人不会这样吧，为什么呢？何泽慧说：你们不知道吧，对有良知的科学家来说，原子弹就不应该产生，既然产生了就不能让一两个国家垄断，苏联的当初的原子弹资料就是美国科学家故意泄露。右图是大家都必须看的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历史著作。这本书里详细介绍了美国原子弹科学家泄露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给苏联科学家。不懂英文？那什么都不可能学！

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根本就不给希特勒制造原子弹。如果海森堡他们认真，德国纳粹的原子弹早在美国之前就爆炸了。美国用了十三万人制造原子弹。德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森堡只搞了一个七十人的小组。他知道美国使用原子弹之后，非常不高兴：怎么能这样毁灭人类呢？搞人文社科的人不懂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也是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

爱因斯坦是被纳粹希特勒逼得没有办法才让罗斯福总统搞原子弹。爱因斯坦 1905 年就发现了原子弹的原理。这些东西的理论原理简单得很，要做出来只需要花钱。英国、法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都搞出来了。日本和德国轻而易举就可以制造。北朝鲜也在苏联的帮助下搞出来了原子弹和最先进的导弹。伊朗人早可以搞出来原子弹，但以色列和美国总在搞小破坏。澳大利亚不用自己制造，因



<sup>286</sup> 何泽慧的访谈, <https://v.qq.com/x/page/h0758oqabjm.html>。

为美国送给它。在美国看全世界各国的科技水平，一览无余。

澳洲科廷大学安全与战略研究教授穆拉维耶夫说：“对于国际安全环境与世界秩序而言，俄乌战争是紧要关头。”他表示，中国若决定输出武器给俄罗斯，会是迈出“巨大一步”，恐怕会招致西方制裁，并且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仅剩的桥梁烧毁，同时毁掉与欧洲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给俄罗斯大量武器和物资。看着我们是不是要受美国和欧洲的 Swift 制裁。当年苏联要核平中国，美国救驾。美国本来就应该中国的殖民地啊！

中国人在国外遭受了太多屈辱、屠杀：印尼(30 万)，越南(150 万)，红色高棉(21.5 万)，Russia (countless) (俄国屠杀了无数中国人)。“1900 年 7 月 16 日，沙俄对居住在海兰泡地区的中国人进行屠杀，之后对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进行屠杀。这两件事就是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当然，沙俄不仅对这两个地方中国人进行屠杀，还对在外东北地区的很多中国人都开始屠杀。这次屠杀一共四天的时间，屠杀人数超过 20 万人。不过清朝对此却没有任何作为。1900 年 5 月 28 日，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清政府自顾不暇。沙俄趁机屠杀在外东北的中国人。从 7 月 16 日一共持续到 7 月 21 日，最主要集中在后面四天，沙俄一共屠杀了 20 万中国人。有的直接杀死，还有的整个村庄居民都被放火烧死。清朝由于要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屠杀发生后没多久，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下落不明，整个清朝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了，所以清朝没有对沙俄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异议。当然，这时很多欧美国家看不下去了，他们开始谴责沙俄的屠杀。面对这些国家的谴责，沙俄也只是做个样子简单的惩罚一下屠杀中国军民的官员。而欧美国家也不想太多事，毕竟不是自己国家的问题。”<sup>287</sup>

结果现在中苏（俄）友谊，万古长青。“旅顺中苏友谊塔坐落在旅顺口区光荣街道位于旅顺博物馆正门前面广场上，1957 年 2 月 24 日落成，塔高 22 米，塔上层有朵朵白云和展翅翱翔的和平鸽，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四面有浮雕。1955 年，周总理亲自为该塔奠基题词‘中苏友谊奠基。’”



Totalitarians are fucking together. Russia, China, North Korea and Iran: A powerful anti-Western bloc of dictatorships is taking

<sup>287</sup> 《1900 年，沙俄四天屠杀了 20 万中国人，清朝却没什么作为》，[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FKVD7B0543IDJU.html#sns\\_weibo](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FKVD7B0543IDJU.html#sns_weibo)。

shape. (极权主义者正他妈的在一起。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独裁集团正在形成。)

A new axis of autocrats (一个新的独裁者轴心)。“轴心国联盟誓与文明为敌,轴心国联盟的人民甘心做陪葬的炮灰。”

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神权统治的伊朗和普京独裁的俄罗斯结盟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慎重而高调地宣布:如果中国大陆出兵台湾,美国男、女士兵直接加入台湾军人作战(想想美国一直没有直接出兵乌克兰)。信仰三权分立和普世价值的自由国家用行动证明了它们的同盟。

## 附录 2.1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sup>288</sup>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衰?卖,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机,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

<sup>288</sup>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出自《且介亭杂文二集》。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



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

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

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 附录 2.2

为什么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吴宓、钱穆、傅斯年……都不懂西方共和国理论？我引用陈寅恪的一些文字完全是因为我看他对自由的理解太肤浅。鲁迅和胡适也一样没有好好理解自由。英文 liberty（拉丁文 libertas，罗马 liberty 女神）根本不应该翻译成自由（由于自己）自在（在于自己）。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自由女神就是罗马人的 Libertas（罗马神话中的自由女神）。懂了吗？中国人的自由是 licentiousness（放荡）。日本人把 liberty 翻译成自由（licentiousness），中国人照抄。荒唐。

**【1919 吴宓日记，保存了他和陈寅恪的一些谈话，在某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午，陈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 二、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降，佛教输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与性理之学（Metaphysic），独有深造，史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椽。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 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

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殫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 附录 2.3

弗洛伊德，1920年，《超越唯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介绍：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erman: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is a 1920 essay by Sigmund Freud that mark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Previously, Freud attributed most human behavior to the sexual instinct (Eros or libido). With this essay, Freud went "beyond" the simple pleasure principle, developing his drive theory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death drive(s), Todestrieb[e]. (Thanatos is the Greek personification of death, and some of Freud's followers refer to the death drive by this name.)

With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Freud also introduced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and destructiveness in humans. These them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which Freud suggests that civilization's major function is to repress the death instinct. The instinct persists in the forms of superego and neurosis.

### Why war? A letter from Freud to Einstein

Is there a way of freeing humankind from the threat of war? Can human aggression be channeled to help protect people against the impulses of hatred and destruction? These questions were put to Sigmund Freud in an anxious letter from Albert Einstein dated 30 July 1932, when Fascist and Nazi violence was spreading in Europe. The father of psychoanalysis, whom Einstein described as an "expert in the lore of human instincts", replied two months later, spelling out his thoughts on the psychical foundations of behaviour and defining possible ways in which the conflicts rending humanity could be brought to a halt.

by Sigmund Freud

Yet the most casual glance at world history will show an unending series of conflicts between one community and another or a group of others, between large and smaller units, between cities, countries, races, tribes and kingdoms, almost all of which were settled by the ordeal of war. Such wars end either in pillage or in conquest and its fruits, the downfall of the loser.

We assume that human instincts are of two kinds: those that conserve and unify, which we call "erotic" (in the meaning Plato gives to Eros in his Symposium), or else "sexual" (explicitly extending the popular connotations of "sex"); and, secondly, the instincts to destroy and kill, which we assimilate as the aggressive or destructive instincts. These are, as you perceive, the well-known opposites, Love and Hate, transformed into theoretical entities; they are, perhaps, another aspect of those eternal polarities,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which fall within your province. But we must be chary of passing overhastily to the notions of good and evil. Each of these instincts is every whit as indispensable as its opposite and all the phenomena of life derive from their activity, whether they work in concert or in opposition.

When a nation is summoned to engage in war, a whole gamut of human motives may respond to this appeal; high and low motives, some openly avowed, others slurred over. The lust for aggression and

destruction is certainly included; the innumerable cruelties of history and man's daily life confirm its prevalence and strength. The stimulation of these destructive impulses by appeals to idealism and the erotic instinct naturally facilitates their release. Musing on the atrocities recorded on history's page, we feel that the ideal motive has often served as a camouflage for the lust of destruction; sometimes, as with the cruelties of the Inquisition, it seems that, while the ideal motives occupied the foreground of consciousness, they drew their strength from the destructive instincts submerged in the unconscious. Both interpretations are feasible.

I would like to dwell a little longer on this destructive instinct which is seldom given the attention that its importance warrants. With the least of speculative efforts we are led to conclude that this instinct functions in every living being, striving to work its ruin and reduce life to its primal state of inert matter. Indeed it might well be called the "death-instinct"; whereas the erotic instincts vouch for the struggle to live on. The death instinct becomes an impulse to destruction when, with the aid of certain organs, it directs its action outwards, against external objects. The living being, that is to say, defends its own existence by destroying foreign bodies.

Caputh near Potsdam, 30 July, 1932

Dear Professor Freud,...

Is there any way of delivering mankind from the menace of war?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with the advance of modern science, this issue has come to mean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nevertheless, for all the zeal displayed, every attempt at its solution has ended in a lamentable breakdown.

I believe, moreover, that those whose duty it is to tackle the problem professionally and practically are growing only too aware of their impotence to deal with it, and have now a very lively desire to learn the views of men who, absorbed in the pursuit of science, can

see world-problems in the perspective distance lends. As for me, the normal objective of my thought affords no insight into the dark places of human will and feeling. Thus, in the enquiry now proposed, I can do little more than seek to clarify the question at issue and, clearing the ground of the more obvious solutions, enable you to bring the light of your far-reaching knowledge of man's instinctive life to bear upon the problem...

...As one immune from nationalist

To conclude: I have so far been speaking only of wars between nations; what ar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ut I am well aware that the aggressive instinct operates under other forms and in other circumstances. (I am thinking of civil wars, for instance, due in earlier days to religious zeal, but nowadays to social factors; or, again, the persecution of racial minorities). But my insistence on what is the most typical, most cruel and extravagant form of conflict between man and man was deliberate, for here we have the best occasion of discovering ways and means to render all armed conflicts impossible.

Yours very sincerely,

A. Einstein

## 附录 2.4

### 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

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都是耶路撒冷、希腊和罗马建立的。日本和中国只能用汉字胡乱猜测翻译所有西方词汇。中国人现在谈到自由、法治 (rule of law)、民主 (多数人统治)、科学、逻辑、社会科学、历史、哲学、医学、法律……的绝大部分词汇和思想都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马克思更是如此。鲁迅、陈寅恪、郭沫若、茅盾、巴金…没有一个人理解 liberty。这就是中文的…悲剧。

钱玄同的观点最可取：“废除汉字，进行文字改革，并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为什么钱玄同提出这种激进观点？因为中文翻译西方学术词汇只能望文生义地捏造。亚当-斯密的 self-interest (自私自利) 是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开明自利：基于意识到公众利益最终也符合所有个人和群体的



利益的行为），完全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自私自利。我们连亚当斯密都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是在全能治理体系里成长起来的。价格（price）和价值（value）：英文里 price 是价，而 value 是值，中文表达乱来。规律（law）一样是乱翻译：律已经是规则，规也是规则。经济、社会、法律、音乐……都是乱翻译的结果。族群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不是国家（state）保守主义。中文里没有办法区分 nation, state and country。国歌（national anthem），中国有五十个民族，我们有五十个国歌吗？中文翻译何等可怜啊。美国黑人有他们自己的国歌（national anthem）。大家看看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是多么奇特的日文翻译，后来被我们汉语接受了。现在中国人说同班 same class 变成同阶级。数学里 same class 极多，中文翻译变成同族、同类、同组。阶（梯）级（别）class 多么荒唐，斗争 struggle 意义重复，共和 republic 不着边际……Law 是规律和定理，不是法律……西方文明里的 law, liberty, rule of law, property rights, separation of power, constitution……在 oriental despotism or totalitarianism 里都没有产生。这是华夏文明的最特殊的地方。现在我们用中文翻译这些词汇都是乱来的。每一个中文翻译的西方词汇都需要我们自己严格地重新定义。我在美国呆了四十年，我写英文论文根本不能用中文思考！余英时都做不到。钱钟书、陈寅恪、季羨林……写的英文一塌糊涂。大家可以找来看，因为他们都不能用英文思维。林语堂很好！

中文里所有西方词汇都没有正确翻译西方词汇的意义，我们只能望文生义。中文完全不能思考哲学和数学。我们说的自由、法治、阶级……都不是西方词汇里的意思。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把英语也作为官方语言解决了翻译的问题。另外，中文应该是华语（华文、汉语），繁体字应该是正体字，中国人应该是华人（汉人），中华文明应该是华夏文明……大家在世界上跑见到华人就懂得中国大陆的华语已经跟台湾、新加坡和许多国家的华侨的华语很不一样了。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很不理解。

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欧美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文明的命根子。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著作都是拉丁文写作，哈佛的文凭当然也是拉丁文。华夏文明没有贡献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语言学……一个词汇。如果中国人不直接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字母，汉语怎么表达数学、物理、化学的符号？用甲骨文符号？我一辈子都在想这个大问题，因为我的民族自尊心比所有中国人都强。导数不用  $dy/dx$ ，用汉语文字怎么表达？对数不用  $\log$  and  $\ln$ ，用汉语文字怎么表达？ $\sin$ ,  $\cos$ ,  $e$ ……用汉语文字怎么表达？汉语必须发明自己的一套符号系统。英国人因为牛顿用 fluxion 表示一阶导数，拒绝用莱布尼兹

的 (dy/dx) 近两百年。Hardy 在 20 世纪初在改变英国的分析数学。因为牛顿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牛津大学拒绝牛顿的微积分一百年。中国康熙大帝说西方数学和微积分在《易经》里。

我在武汉大学本科就学英文、法文、德文、数学、物理、哲学、历史，更不用说经济学。大学数学和大学物理是哲学的基础，我最喜欢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我在哈佛大学六年继续学习数学、经典力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我当然要学经济学。我三个女儿都学拉丁文，我跟着学。宪法学是我自学的。其实，一切都靠自学。

微博上有些人说的不错：

“单就汉语本身的缺陷，如扩展性、重构性、简化性和停滞性而言，就注定其无法和英语相提并论。”

“汉语一日没有 market for ideas，一日就摆脱不了沦为死语言的危机。放弃算了，都讲英语。”

“对于睁眼看世界的人来说，如果不学英语，就等于自决于世界。”是的。

“很多人喜欢说中文博大精深，但本质就是语言含义模糊不精确，怎么理解都可以，语言文字的精确性会极大的影响群体的科学性，逻辑性，连语言都是模糊的，使用它的人怎么可能到达精确呢？所以搞科学做研究的人，首先要用精确的语言，道路都不对，怎么到达终点？”

“说实在的，基础自然科学落后，人文社科难以有什么威望。洛克的声誉也是借助牛顿。流利地听说读写英语是东方欲晓的关键前提。把全部西方的文明吸进来消化得淋漓尽致，东方才有未来。否则，东方文明只能是保留在现代性以前的文明化石。” True。

“瞬间觉得英文太烂吃了大亏了。”现在跟着我的微博学英语好啊：半年之后你就能直接看英文历史、政治、经济的著作。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失败就是没有让学生直接读英文著作。我的学生一进大学就用英文版教材。

按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会是英语。说几个简单的事实：原来搞数学的需要学法文、德文和俄文，现在数学家只用英文了。数学里最厉害的德文期刊也发英文论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都如此英文化。经济学学术期刊全世界都英文化了。幸亏百度开始翻译一点点 Wikipedia，因为 Wikipedia 里面的任何一个条目都比百度优秀太多太多。我都不知道国内的人搞学问不用 Wikipedia 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百度里的知识太少、太多错误了。我用 Google 查含“家国”的古诗词，出来几百首。我用百度查“家国”，百度回避我。Google Scholar 更是一刻不能少。有了墙，百度才能生存。马云、

马化腾……都靠墙生存。金融行业一样也是靠墙生存。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厉害了而已。我是说几句实话。

学英语的最快办法就是都看英文书。这样坚持一年之后，任何人都可以看英文著作。学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都一样。国内学习西方历史、哲学、法学、文学的人……必须从小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更不用说英法德。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

## 第三章

# 马列中国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

## 第一节

# 论经济奇迹与中国苦力

有人问我：“既然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比中国先进，为什么这些年被中国一路赶上来不断缩小差距了呢？他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曾经号称普世价值观灯塔的欧美，现在撕破脸来制裁中国，他们在怕什么？”西方怕没有中国苦力呀。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后，我们就没有人口红利了。中国人口减少，克鲁格曼这些美国人都急死了：中国 coolies（苦力）没有增加，廉价产品会涨价，美联储就必须继续提高利息率，降低通货膨胀率。如果美元通货膨胀率比较高（我们中国人说的收割韭菜），美国人早把美国总统、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议会的议员选下台了。这就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工厂的期待。

“世界工厂”让我伤心啊：按照美国标准，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非常穷的。中国现在的扶贫是按照世界银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三美元。中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脱贫人口有什么意义？这是给非洲穷人的可怜标准啊。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三十三美元。中国官方说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我们中国普通人生活太辛苦艰难，我们这些看书的懂吗？我们有时间多扶贫，爱国者也不要看不到民间疾苦，爱国不是让中国人当 coolies。

世界工厂首都的雾霾太严重了，今天北京的雾霾沙尘暴就很吓人啊<sup>289</sup>。在美国，空气质量指数超过 50 意味着“差”，50 以下是“良好”。在中国，50 以

---

<sup>289</sup> 写作时北京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 312，污染级别为 6 级，已达严重污染标准。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为 PM10。

下是“优”，50-100 都是“良好”，这是中美两国对空气质量定义的巨大差别。北京晚上雾霾也很厉害，估计世界工厂总是最喜欢晚上开工，北京雾霾还是只能靠风吹走。<sup>290</sup>Asphyxiation（窒息），雾霾让人记住这个英文单词，slaves and coolies 的命运悲惨。这让我想起了董仲舒对汉武帝说的一番话，董仲舒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sup>291</sup>

（微臣认真研究《春秋》所记载的、历代前朝所发生的事情，观察、分析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感到十分畏惧。每当国家将要出现有悖天命的弊政，上天总是先把自然灾害降临到世间，以警告那些违反治国之道的君主；如果他们不懂得这是上天的惩戒而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上天就会再次出现怪异的天象使他们感到惊惧；如果他们还不能认识这种变化的危险性，那国家的动乱和危难就真的来到了。）托克维尔也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国民被压迫得越厉害，他们往往越忍受。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让国民的日子变得好过一点、自由一点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北京的雾霾靠风吹，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付出的代价。政治观念决定生命的意义。我们不要嘲笑美洲历史上的黑奴隶制。今天的苦力制和奴隶是一样的：Bloody profits（血腥利润）。希腊奴隶制、罗马奴隶制、波斯奴隶制、秦汉奴隶制、社会主义奴隶制、全能治理体系奴隶制都是一样的。

我继续回答那个问题，生命的意义不是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意味着尽管污染厉害也要当世界工厂。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应该翻译成 bloody profits out of Chinese population（从中国人身上赚取的血腥利润）？只知道利用人口红利（bloody profits）的难道不是苦力国家吗？如果是，这值得炫耀吗？就算这值得炫耀，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也并不是一件特别稀奇的事情。二十世纪已经有太多经济奇迹了：德国经济奇迹、苏联经济奇迹、日本经济奇迹、台湾经济奇迹、巴西经济奇迹、韩国经济奇迹、新加坡经济奇迹……阿根廷，智利，土耳其的经济在二十世纪也都曾奇迹过。到二十一世纪又出来了越南经济奇迹、印度经济奇迹，现在马上就要有墨西哥经济奇迹……经济奇迹这么多？这下子好了，世界上哪里还有经济奇迹啊？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的“中国奇迹”到底奇迹在哪里？一个台湾人和两个美国人天天忽悠中国人。台湾人普遍不愿意打仗，而美国愿意付出一切保卫台湾。这样的奇迹大家怎么看？

<sup>290</sup> 出自《光明日报：雾霾终究不能只靠风来吹走》，人民网。“雾霾治理是没有退路的，这需要全国上下严阵以待：出台严苛的法规、处罚违规的企业是顺理成章的。”

<sup>291</sup> 出自《天人三策》，董仲舒。

只有让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他们先去用“中国奇迹”解放台湾。中国人最近二十年才能吃饱饭，我们怎么就牛皮轰轰啊。我二十一岁到美国的时候只有一百斤，因为我在武汉大学就从来没有吃饱饭。到美国一年后，我就有一百四十斤，尽管课程压力巨大。直到二零零七年，我还必须花钱请北大一些穷学生加餐。刚刚吃饱了饭才几年，我们就自大傲慢。我幸亏出生在 1962 年，早生两年也就饿死了。

有人总结的好“世界上所谓的经济奇迹，大都源自主动顺应世界潮流，与主流经济体相伴而生的追赶式高增长，从来没有自娱自乐的奇迹。”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经济体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和研究，我们需要回归到为什么国家的经济会发展这个大问题上，我们需要完善不同的国家经济出于什么发展、依靠什么发展这些理论，而不是大惊小怪，一定要证明某个国家是个例，是前无古人的“奇迹”。我们尤其应该从长期的文化、制度、宗教伦理方面来研究经济体的发展。在这其中新教伦理和英美宪政是我研究得最多的一部分。

英美宪政我已经谈论很多了，我想谈谈新教伦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关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另外，我的这篇文章也是关于这个主题“*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sup>292</sup>这篇文章只发表在一般的期刊，因为它是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我实在受不了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只研究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玩统计数据。这个宏大的论文题目把三个德国人——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的思想用几个数学模型来集中表述。这些模型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增长的不同路径。这些模型首先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新教国家的经济增长遥遥领先天主教国家；为什么清教徒英国和美国从 1588 年开始一直称霸世界；为什么东亚经济发展超过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主导的拉美国家；为什么伊斯兰教国家从十二世纪开始一直衰落；为什么俄罗斯东正教妨碍经济发展……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开创的这个方向已经是今天经济学前沿最热门的一个领域。

我不信新教，但为了了解欧美社会和世界，我们必须懂得新教和天主教。韩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教国家，拉美天主教徒也正在改信新教。只有懂得新教和天主教，我们才能认识资本主义和欧美社会的各个方面，更不用说理解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他的先知们！”我们中国人真懂这句马克思的名言？全中国有几个人懂？马克思是在嘲讽犹太教？天主教？还是新教？

新教伦理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论。没有读过韦伯的

---

<sup>292</sup> Zou, Heng-fu, 1994.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lsevier, vol. 10(2), pages 279-293.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是让邹恒甫万分震惊的。我在武汉大学肯定好好学过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四卷《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有三册），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当然也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我在哈佛精读的。宗教改革导致了新教伦理的产生，“天职”观念，即某种由上帝安排的任务，成为新教的核心内容。他抛弃了原来天主教那种禁欲主义的修行而超越尘世的空洞劝解和训令，而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在韦伯看来，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德国人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英文翻译者 Talcott Parsons<sup>293</sup>给韦伯的书列了一个内容大纲，特别值得我们看看。

Part 1. The Problem（部分一：问题）

I.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宗教信仰和社会分层）

II.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精神）

III. Luther's Conception of the Calling. Task of the Investigation.（路德的使命观念；求索的任务）

Part 2. The Practical Ethics of the Ascetic Branches of Protestantism.（部分二：新教的禁欲主义分支的实践伦理学）

IV.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Worldly Asceticism（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A. Calvinism（加尔文主义）

Predestination; Elimination of Magic; Rat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Certainty of Salvation; Lutheranism vs. Calvinism; Catholicism vs. Calvinism; Monasticism vs. Puritanism; Methodical Ethic; Idea of Proof.

（宿命；魔法的消失；世界的理性化；得救的确定性；路德宗 vs. 加尔文宗；天主教 vs 加尔文宗；禁欲主义 vs. 清教主义；系统的伦理学；证明的观念。）

B. Pietism（虔信主义）

Emotionalism; Spener; Francke; Zinzendorf; German Pietism

C. Methodism（卫理公会）

D. The Baptism Sects（洗礼教派）

Baptist and Quaker; Sect Principle; Inner Worldly Asceticism;

<sup>293</sup> 塔尔科特·帕森斯，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者，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浸信会和贵格会; 教派原则; 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 世界的转变。)

V. Asceticism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Richard Baxter; Meaning of Work; Justification of Profit; Jewish vs. Puritan Capitalism; Puritanism and Culture; Saving and Capital; Paradox of Asceticism and Rich; Serving Both Worlds; Citizenry Capitalistic Ethic; Iron Cage of Capitalism. (理查德·巴克斯特; 工作的意义; 利润证明; 犹太资本主义 vs. 清教徒资本主义; 清教主义与文化; 储蓄与资本; 禁欲主义与富裕的悖论; 服务两个世界; 公民资本主义伦理; 资本主义的铁笼。) Parsons 的内容提纲太厉害了! 一目了然。新教伦理根本上改变了新教徒对工作、利润、储蓄、财富、资本的观念: 这一切都荣神益人。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精神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精神。

2004 年, 巴罗<sup>294</sup>开始了他没有模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sup>295</sup>。巴罗如此理解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强调识字教育、人力资本、看好未来 (patience)、节俭、勤劳致富……按照桑巴特的理论,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回到《旧约圣经》, 也就是犹太教: 犹太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几卷? 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有几卷? 恩格斯认为桑巴特才是能继承马克思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提犹太教? 因为犹太教只限于犹太人自身, 它不让犹太人以外的人信仰它。QJE 也在主编巴罗的领导下死命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或韦伯的论文。“经济影响力最大的来世不是天堂, 而是地狱。地狱信仰的增加, 加上一定程度的教堂出席率, 可以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每年增长 0.5%, 而所有被研究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 2%。(美国自 1870 年以来的年经济增长率也恰好是 2%)” “研究人员说, 从东方宗教到新教的高皈依率促进了韩国巨大的经济增长, 他们预计, 由于从‘耗时’的天主教到提高生产力的新教的广泛皈依, 拉丁美洲将会更加繁荣。换句话说, 正如韦伯所说, 新教再次取得了胜利。无论你对这种对新教伦理的实证支持表示赞赏还是质疑, 未来的经济学家都会发现, 很难忽视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过瘾吧, 但是所有这些的结果还是更多的体现在财富积累: 我的模型才是最佳选择。巴罗本人没有模型, 他的文章和书都是文字和统计回归。1986 年我就把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给他看了。他 2004 年不知道为什么发神经开始做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发展。我的论文把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本质也体现出来了。

<sup>294</sup> 罗伯特·巴罗 (Robert J. Barro), 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sup>295</sup> Barro R, McCleary RM.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Spirit of Max Weber. In: Nee V, Swedberg R On Capitalism. ; 2007. pp.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从韦伯那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新教带来的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我举一例对拉美的研究：“同样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北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繁荣的美利坚文明；而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却至今处于动荡和贫困。同属基督教文明体系，英国殖民者和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有何本质区别？为什么被英国火烧白宫的美国，一点都没有仇恨？”曾经的天主教巴西也创造过经济奇迹，1948年至1979年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长，让全球为之震惊。20世纪初的阿根廷，和如今相比也是天壤之别，阿根廷的面积在当时大约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GDP在全世界都能位列第八。天主教阿根廷的经济曾经跟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它折腾到今天这种地步？天主教的捍卫者法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霸主？海地是法国殖民地，海地为什么到现在也天天革命政变？为什么法国从拿破仑之后再没有打过胜仗？都是因为天主教。法国大革命前，天主教法国杀新教徒两百多年。胡格诺战争就是宗教战争，也就是信仰胡格诺教的信徒与天主教信徒的战争。何为胡格诺教啊？也就是加尔文教，也就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支。法国自己毁灭自己。天主教让意大利也发展不起来。五百年看世界就特清楚。

英国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皇对英国的控制，重新确立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同时，天主教会被剥夺的财产促进了英国经济发展。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反对国教会的“非国教徒”，他们主张依照加尔文教来“纯洁教会”，要求清除国教会中的天主教教义和教规仪式，清教徒由此而得名。1570年，伊丽莎白一世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1563年，伊丽莎白一世进一步通过了《三十九条信纲》，完善了英国国教会教义。该纲要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纲领性文件。

英国宗教改革时西班牙在干什么？西班牙在挥霍、在征战、在迫害异教徒……在自己摧毁自己。（1571年10月，西班牙舰队打败奥斯曼帝国海军，从此取得了世界海洋的霸权，并获得“无敌舰队”的美誉。）很快，1588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就灭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都在自己毁灭自己的动荡之中，英国却一直稳步发展。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跟新教潮流对着干。法国一直干到1789年恐怖凄惨的法国大革命……法国的黄马甲革命一直干到今天。我没有讲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史。我以后再讲这个时期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第一个数理经济动态模型也是我创立的。

看看清教英国殖民地和天主教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巨大差异。“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

生活地区，吸引着数万亿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政府民选前的黑暗状态。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的市场、出版自由、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审制……以上种种，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社会生来就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借助英语语言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连同这种语言，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源头实际独一无二。将自由的传播与盎格鲁兴起的过程视为一体，这一观点一度毫无争议。宗教改革后，很多讲英语者将他们文明的优越视为上帝所助。他们的文明就是要建一个新以色列，一个被上帝选中、受命要给世界带来自由的国家。”这本书的一部份有中文版了！<sup>296</sup>

Harrison<sup>297</sup>算是研究拉美的专家了，哈里森的主要论点与我也一致“文化才是影响群体和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主导因素。虽然经济、历史和地理因素都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但哈里森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最终决定一个特定群体能否享受经济繁荣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和其他价值体系将极大地影响一个特定国家的发展，在他看来，这解释了像海地这样的国家长期不发达的原因。”以上是 Lawrence Harrison 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和著作。他当然不是第一个人，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才出版了一本书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亨廷顿也持这种文化决定发展的观点。

现在讲经济奇迹的人怎么没有声音了？苏联第一、德国第一、日本第一……的畅销书为什么都成了垃圾？为什么德国经济奇迹、苏联经济奇迹、日本经济奇迹、韩国经济奇迹……都消失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奇迹现在也消失了？

## 中国苦力

有了上文的分析我想大家明白了，Political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政治和制度改革）远比经济改革开放更加重要。

大家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吗？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怎么和共产主义相容？改革开放不是搞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始终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从 1949 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也是反对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既是利用外国科技和管理快速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也是为了建立更加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sup>296</sup> 《发明自由》，丹尼尔·汉南，九州出版社，2020。

<sup>297</sup> 劳伦斯·哈里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际开发署拉丁美洲和亚洲问题顾问。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会出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这也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真理。”看清楚改革开放的本质了吗？邓小平绝对不是变革者，邓小平是最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制度的捍卫者。邓小平没有变革共产党制度。我不理解大家都说邓小平是历史变革者，估计是大家脑袋发疯或意淫吧。

中国人辛勤劳动自己改变了中国，中国人还感激邓小平，不可思议啊。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回到秦始皇时代才是历史的主题。欧美国家都已经是福利社会主义，它们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发达太多、太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加秦帝国。连法国白左皮凯蒂都说：China isn't a socialist country（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太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问我：中国农民和工人现在为什么还要当世界 coolies and slaves？他们的收入怎么还没有远高于美国黑人？中国还是奴隶社会吗？他们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吗？Chinese, Japanese and Vietnamese（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在英文里是贬义词。我们自己用英文 Chinese 和法文 chinois 骂（称呼）自己还不自知。Chinois is French for Chinese, and it is whimsically so named because its cone shape resembles a coolie's hat.（法语的 Chinois，厨房使用的漏勺，是法语中“中国人”的意思，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圆锥形很像苦力的帽子。）我们最好用 Chinan，就像 Korean, Russian, American……一样。

基尼系数用于测量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其数值范围在 0 和 1 之间，越接近 0 意味着收入分配差异越小。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基尼系数 0.4 是道警戒线，高基尼系数下潜伏着社会不稳定因子。在 2011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基尼系数。2009 年，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1 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有人说“中国多年不公布基尼系数，这一下就完美解决了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啦。”随后，统计局一口气公布了近十年的基尼系数，都在 0.45-0.48 之间。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谢宇和周翔的报告：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 0.55，而美国为 0.45，中国 1980 年的基尼系数仅仅为 0.3。谢宇说：“中国是世界上

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和那些（与中国）收入水平类似或者（比中国）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对比时”。谢宇在报告中写道，中国普通人了解收入差距的这一增长，他们对此有切身体会。“尽管普通人似乎容忍了这一巨大的不平等，但是他们也承认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 2021》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 2000 年的 0.599 持续上升至 2015 年的 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 2019 年的 0.697，但 2020 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 0.704。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达到 0.8 左右。”权贵们和红顶商人们还在不断增加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贫富差别在地球上都服从 Pareto distribution（帕累托分布）。美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才 0.41，中国的基尼系数远大于美国的基尼系数啊，世界银行为此急死了。请看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著名的论文：Li, Squire, and Zou, *Economic Journal*, 1998, 第 108 卷。<sup>298</sup>我们在这点上真不如台湾。发展经济学家们曾经称颂台湾为典范的“经济奇迹”。他们指的是台湾工业生产的飞速增长率，以及台湾的收入分配（没有关于财富分配的资料）比其他“准工业化”国家公平。总之，台湾曾在相对自由的市场体制之下获得了“公平的经济增长”。

我之前在微博讲课的时候，一讲到这些，就收到了很多人的消息，他们讲的都不错。

“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我们 996，我们有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开商店的，摆摊的，几乎全年不休，但是，我们的劳动产出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天天紧巴巴的过日子呢。”

“把历史上的徭役之苦讲的清清楚楚。现在是当世界苦力/世界工厂。国家最有钱还不够花，而人民普遍贫穷。”

“所谓大盛大衰就是假的，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过上好日子。还是鲁迅说的好，几千年历史就是两个时代，一个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一个食量大而身体消瘦的人，肚子里肯定有寄生虫！”“体制内在编人员很滋润”“我们 996，政府官员是 996 的玩耍、打牌、旅游”当然如此，历史上也一样，这是保持制度稳定的核心力量。

“拿走大头的还在鼓励你要奋斗，可悲的是好多傻蛋还真信了通过奋斗可以改变所处阶层和命运。”“我小时候真的都差不多，现在一个村干部家产一亿。我同学。基本他们村委会的都这样，十年前都是人人 100 万的车，村委会开会的时间能看到。我经常去看车。”

---

<sup>298</sup> Li, Hongyi & Squire, Lyn & Zou, Heng-fu, 199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 vol. 108(446), pages 26-43, January.

“全能治理下，没有任何所谓的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之说，自然没有什么法治和自由，只在一个方向上拼命‘内卷’。官僚体系只可能顾着自己的利益，增加对民间的汲取，再碰上一个权欲熏心的帝王，这个社会加速崩溃”

“吃午饭，邻桌在聊法国现在人间地狱，巴黎瘫痪很久了，原因只是因为马克龙要把退休年龄从 62 岁提高到 64 岁，法国人接受不了，邻桌中国人一直在问，‘为什么啊？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吧？国家也很难做啊，你们就不能为国家想想？’‘既要报道出欧洲法国的混乱社会面，扬我社会主义特色国威，又要做到不揭露养老金骗局的前车之鉴，避免中国社会面讨论，公务员考生请答题。’”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美国跨国公司的中国供应商压榨工人的时候，美国公司对供应商提出交涉，为中国工人维权。中国的良心企业和老板太少了，还处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这些私人老板也是政府的。他们离开权力就无法剥削。

“真的，大家整个国家都没有走出甲午海战，也许等待另一场海战。日本海上力量至今也不白给，更不用说美帝的海洋霸权。富国强兵仍然是百年之后的命运悠关。看到现在的失业形势，所睹苍生疾苦，还是民不聊生，官僚体制精英宏观上雕琢语汇，患得患失，微观上麻木不仁，纵容事态恶化。”

“最终总能找到甩锅的对象，眼下最合适的就是满清误我中国三百年，不知道多久才能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能自主自发产生高等文明的民族。”

“历史里只教到一百多年前被卖到美国的华人 coolies 境遇之惨，炸山开路开修建每块枕木下都是华工的血。想想也是，哪里比得上如今，在自己人领导下的干净明亮的世界工厂里使用最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燃烧 coolies，换取外汇，再用来打赏，扬我国威，当这样的爱国 coolies，岂不妙哉”

中国几千年都如此！财富都被政府和官员们拿走了：秦制政府、企业和金融领域的所有人都是 cold-bloodied（冷血的），因为秦制几千年都是敲骨吸髓地压榨中国人民。秦制下皇帝和他的官僚吸收了太多、太多的财富，中国人几千年都只能劳累一辈子而毫无积累。从 2012 年至 2021 年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需求结构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 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 19 个百分点。收入过低的工人阶级缺乏消费的能力。在居民部门内部，形成了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少数富人和大多数穷人。2020 全球亿万富翁数量排行榜也显示了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342 人。这个数字在全球位于第二名，仅次于美国的亿万富翁人数：788 人，并且大幅领先于位于第三名的德国亿万富翁人数：153 人。

中国富裕的人跑到欧美还天天嘲笑欧美人太穷：谁榨干了中国 coolies 的人口红利？这些权贵爱国资本家把财产转移美国后还继续剥削中国苦力，中美

两国通吃。“出生于美国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曾被选中代表中国参加 2022 年冬奥会，在女子短节目团体比赛中，她在冰上摔倒并获得最后一名，这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求锤得锤，求仁得仁。朱易不会有人格的尊严。谷爱凌也不会有，毕竟谷爱玲也是这种优秀爱国者啊。爱国？她们本来就是外国人。她们的父母爱国？她们的父母为什么在外国？她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套利。郎平就知道平静地回到美国遛狗狗啦。在冬奥会中，小小挪威就有 12 块金牌。这是我们的什么奇迹呢？冬奥金牌取决于到底有多少人真爱冰雪运动，也取决于爱好冰雪运动人的钱有多少，穷人玩不起冰雪运动。

在对外援助上，中国早就有了欧美人 1970 年代以来的思维。“毛泽东经援 110 多国，其中 92 国人均 GDP 超中国。曾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晚年回忆：1954 年以来，中国给阿经济、军事援助近 90 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 200 万，平均每人达 4,000 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 100 元。据披露：在毛泽东时代，1976 年前中国经济援助的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92 国的人均 GDP 超过中国。”<sup>299</sup>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8 日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宣布将免除非洲 17 个国家截至 2021 年底共 23 笔对中国的无息贷款债务。”这的确是欧美发达国家从 1970 年以来的一贯风格，世界银行给非洲的钱从来没有想过要还本付息。接着中国应该免除对拉美和中东国家的所有债务，不免除债务就是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啊。

中国人自己勤奋致富，怎么要感谢任何当官的？美国人致富难道会感谢美国总统？不会啊：因为是美国人养着美国总统。美国奇迹就是美国政府管所有穷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啊！欧美福利资本主义真是资本主义奇迹。林毅夫、李稻葵和文一他们三个当然知道欧美多么富有。美国人富得流油，美国政府穷得发疯。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陈志武下面这篇国穷民富的文章就是欧美国家的历史，大家等着看今年 12 月份美国政府是不是穷得开不了门：三亿多美国人欢天喜地。<sup>300</sup>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像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极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勉强够，以至于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国库钱越多、王室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

<sup>299</sup> 摘自 2015 年 6 月 23 日《解放日报》，袁念琪，原题为《上海，那个年代的援外记忆》。

<sup>300</sup>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因为缺乏资金关门过 21 次。美国也是全球唯一一个因为运作资金不足而导致政府关门的国家。

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王室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越要依赖老百姓缴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才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所以，政府不能有太多经营性的企业，而要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相反的，如果是国穷民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要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sup>301</sup>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相反，政府太富有，则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政府有钱就挥霍、征战、消灭新教徒。Spanish Inquisition，西班牙宗教法庭（1480-1834 年的天主教法庭），就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当时犹太人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被驱逐出境。

一百五十年来，欧美国家政府已经大大超过了守夜人政府的规模。按照守夜人政府的要求，政府规模不应该超过 GDP 的百分之五。美国政府开支本来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九，现在扩大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浪费挥霍啊。2021 年，美国政府规模更是已经超过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目前，民主党拜登政府还想通过增税扩大开支，这是反人民的罪恶。所以我们把今天的欧美国家称为议会民主极权主义。

哈林顿说得更好：谁控制了国家的财富谁就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因为政治权力依赖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依靠军饷。Dominion is founded on property.（主权建立在财产基础上）。And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between rulers and subjects.（政府是由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财产分配决定的）当国王占领全部或三分之二的财富时，君主专制就出现了；当贵族们占领全部或三分之二的财富时，贵族们的统治就形成了；当民众占领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时，民主制就出现了。

如此勤劳的中国人得到的太少太少，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国家和极少数权贵者。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领导人不都是一心为劳工的吗？江山就是劳工，劳工就是江山。<sup>302</sup>劳工阶级的国家本来就是捍卫劳工权益的。现在可以看清国家的本质是什么了。美国人都问我：你们 China 怎么几千年培养如此吃苦耐劳的 slaves and coolies?我们国人的职业歧视是在基因里面的，中国人都只知道当官的人和媒体人瞎吹。这是中国几千年

<sup>301</sup> 陈志武，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选自《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sup>302</sup>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出自习近平 2021 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官本位主义决定的：观念决定存在。徐梦桃<sup>303</sup>获得金牌后说自己终于不是“收银员”。其实在我看来获得银牌也特好，怎么她还挖苦我在中国最崇拜的服务员和收银员呢？在美国得了金牌的人照样是特普通的人，几个美国金牌获得者的梦想是开一家小 pizza 店。这种国家培养的职业运动员完全没有享受体育的心理。为什么美国餐馆的服务员那样受尊重？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都不去当餐馆服务员？

我们有多少人被 emperor and eunuchs（皇帝和太监）洗脑成今天这种样子了？天天被洗脑之后哪里还有独立的判断力？Coolies 为压榨他们的人叫好。好好看书吧，看了书才能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 emperors and coolies。请看看其他人的发言：

“邹老师，让 China 走向稳定的权力制衡/民主，比让中国男足拿到世界杯都难 100 倍。因为 slave 的比例太高了，而且还特别喜欢和 emperor 共情。顶层制度设计再完美，恐怕也难以达到平衡。必须从思想上解放 slave，而不是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开始共情。”

“洗脑了几十年。不对，几千年。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正常人。自以为是正常人的还不是因为接受了一点西方的教育和器物？都是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而已。官员面前跪舔屁都不敢放一个，网络上没人管束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在官员面前卑微如尘埃，对真搞学问的书呆子就不可一世了。”

这里有一篇很好的段论：“国人没有信仰，唯一的追求就是当人上人。我排队做核酸，乱入了一行农民工的队伍中。他们很异样地看着我，因为其他的年轻人都会躲着他们走。他们皮肤黝黑，头发枯黄，面容憔悴，破衣烂衫，散发着一个不洗澡的味道。他们就是美丽的城市绿地的实际养护人。

好心的社区志愿者把我从他们的队伍中拎了出来。他头发苍白，带着红袖章。他把农民工安排成一个单独的队伍，并嘱咐我：他们是做工的，不要跟他们排一起。就这样，我被安排在了下一队核酸人的最前面了。我看见农民工队伍中有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他脱离了队伍，排到另一队里去了。他也带着红袖章，是这群人的工头，十分鄙夷于与他的工友为伍。他不断地在一旁发号施令，安排工作，面露凶光。我看着他们温顺慈祥的眼神，确信这是一种向世界屈服了的麻木。他们是人下人。

斯多亚学派说奴隶最擅长于克制和服从，因而也最能理解自由的含义。他们显然没有看到精神和灵魂真的可以先于肉体凋谢。他们以为奴隶拥有选择服从或接受惩罚的自由。他们是天真的老人。

有人可能不乐意我称呼农民工为人下人，并以奴隶对比。孔老夫子说名正

<sup>303</sup> 《徐梦桃式幽默发布会：以后我再也不是“收银员”了!》，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17802836982820778594&sourceFrom=share](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17802836982820778594&sourceFrom=share)。

才能言顺，他最流氓。他们从未享受过平等的权利，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尊重，称呼他们为公民，为可爱的城市建设者，世界就真的公平了吗？

其实，这里每个人都是奴隶，但并不妨碍奴隶也有自己的奴隶。工头、社区志愿者、科长、局长、厅长，数不清的官僚道俗，每个人都争当人上人。每脱离一个‘人下’的状态，就弹冠相庆，媳妇熬成婆，并翻脸不认人，对原来的身份嗤之以鼻。

他们既是人上人，也是人下人，他们眼神里既有卑微顺从，又有凶狠狡诈。他们时刻用攫取的目光打量过客，又时时提防自己成为攫取的对象。这是一个比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更残酷的状态。一个等级森严的人吃人的丛林社会。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

有人说这样的社会才最有活力，每个人都奋发上进，只争朝夕。他们不能理解人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只能理解成王败寇，并跃跃欲试地效仿，而不能理解精神的超越性。当然，这里的‘他们’也许不包括每年数万计的向西方国家的移民者。”

在欧美，宗教改革早就让欧洲人(平民和国王)通过阅读《圣经》一律平等地面对上帝。后来的文艺复兴和持续不断的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追求自由、平等。激进的文艺复兴和激进启蒙运动的思想一直在今天的欧美国家推动着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工作平等、分配平等……犹太教和新教也都鼓励人勤奋工作和节俭，而不是歧视劳动者。劳动是人的天职(calling)，人的财富积累荣耀上帝。新教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更加巨大:16 世纪的新教领袖直接指出君王与平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诺克斯的故事极为传奇。诺克斯是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1546 年红衣主教大卫·比顿(David Beaton)被谋杀，摄政王玛丽·吉斯(Mary of Guise)介入，他卷入了一系列教会和政治事件。当玛丽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并重新建立天主教时，诺克斯被迫辞职并离开了这个国家。回到苏格兰后，诺克斯与苏格兰新教贵族合作，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教改革。这场运动被视为一场革命，因为它导致了以她年幼的女儿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名义统治国家的玛丽·吉斯的下台。

玛丽女王傲慢地斥责这个曾做过奴隶的诺克斯，“在这个国家，你以为你是谁，敢如此对君王说话。”

诺克斯回答：“尊贵的女士，我和你一样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我既不是伯爵，也不是子爵或男爵，但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无论在你眼里我是多么卑微）。”

玛丽女王反问诺克斯：“上帝岂不是命令臣民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吗？”

诺克斯回答：“真实的信仰源头和权柄并不是来自于君王，而是来自于上帝。君主们通常是一群对真实信仰最无知的人。臣民在宗教信仰上并没有义务服从统治者专制武断的意愿。假如有这项要求，那么古希伯来人就应该皈依埃及法老的宗教，早期基督徒也应该接纳罗马皇帝的宗教了。”玛丽女王哑口无言。

现代民主就是在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诺克斯与天主教女王玛丽这种对话中产生了，诺克斯的盟友布坎南后来又将君权神授转化为天赋人权。英国光荣革命(1688)和洛克的《政府论》(1690)可是在一百多年之后啊。想到19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张维迎他们还在鼓捣“为钱正名”，新教伦理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教导信徒们劳动和财富荣神益人。现在我希望张维迎他们鼓捣“为苦力正名”。

## 社会保障制度

“那怎样才能不当 coolies 呢，邹老师倒是给个方法呀？”

答：把有为政府的钱分给穷人，并像印度一样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社会保障制度。世界银行每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就说：你们中国还是一个全心全意为穷苦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国家啊。

“社会保障支持是一种用于社会保障体系运作的支出形式，以提供人口的最低生活标准。它是调节分配关系、缓解收入和财产差距、保障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处于世界底部，占GDP的3.21%，而世界最高水平为31%。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2023年表示，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经长期处于底部，2020年仅占GDP的3.21%。这低于上海经合组织国家的16.8%，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普遍很高，法国是31%，芬兰是29.1%，意大利是28.2%，美国是18.7%。中国则一直处于世界垫底的位置。”

世界银行开始一直都最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1989年加入世界银行研究部之后，第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证明政府在教育、法治、妇女儿童等社会保障的开支远比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这是一篇有历史意义的论文。<sup>304</sup>我三十五年来一直这样谈：既然搞全能治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先把全中国底层农民和工人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社会保障搞到位。世界银行一直如此给中国支招。现在中国十二年全民义务教育都没有搞定，何谈伟大复兴？九年义务教育也是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逼了二十年才开始。农民的免费医疗更是遥遥无期。

能看这本书的人都不是中国的七亿贫苦民众，而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贫苦

<sup>304</sup> 暂时没找到这篇文章。

民众。“在浙江余姚的市中心，城管正在抓捕一些违法乱纪摆摊的人，将这些人的小摊子直接收走，带到城管局。浙江一位老大爷因摆摊被抓，来行政执法队后对哭着说：‘能不能少罚点，家里有个白血病的孩子，为他治病我欠了 60 万元，全家都指着卖红薯……’。”在资本主义欧美国家所有这种人都被政府免费养着了，全民社会保障还要等多少年？德国在俾斯麦手里就搞福利社会；英国 1840 年就福利社会主义化，于是马克思估计英国会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欧美国家免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早就是人类自由发展的 common good（共同的善）。中国在今天也没有搞福利社会主义，中国至少十亿人没有欧洲全民免费大学教育、免费医疗、免费社会保障。所以欧美人普遍认为中国是 slave, coolie society。

“朝鲜经济远不如我们，但他们能做到‘三免’，免费住房、教育和医疗，人人不必为这三大民生问题担忧，社会不会出现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我们的 GDP 已经世界第二，为什么不能做到‘三免’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建议，怎么就不能呢？”其实连印度在新冠疫情中都是免费提供新冠药物和辉瑞疫苗啊。现在印度初中、高中和大学更是都免费，更不用说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中国政府本来也应该免费提供辉瑞疫苗和 Paxlovid，不要废话了。

“连续二十年的三农一号文件有什么用？农民退休养老金一个月才一二百，看病更是没保障。当年内战胜利不是农民拿小推车推出来的？建国后建工业体系不是过度集中农业产出？农民哪年不是把产出的 50% 交公粮？”让农业人口自由流动到城市（北上广深……）就解决他们贫穷的问题了，还保持商鞅的户口簿干什么。美国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民。

经济学狗屎名流里没有一个保护苦力的人，这真是把苦力的人的权利剥脱精光。所有经济学家都在大喊要捍卫市场经济，要扶助企业家，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包括所有的称呼为“家”的著名人士大喊捍卫劳动法，捍卫工人的正当权益。请看张五常这个老流氓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继续苦力制：

“今天我可以肯定，绝对肯定——需要廉价劳力的外资工业，不会再到中国来。新的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不会在有新劳动法下再问津中国。好些人认为，中国要走高科技的路，廉价劳力的工业是釜底抽薪，我们不要。这想法是大错特错。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已经起步，不用担心，但这发展需要后浪推前浪，要让贫苦的劳动力在下面把上头的科技推上去。农民的生活改进得好，改进得快，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农转工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继续改进生活，上帝也帮不到忙。我反复计算，依照 2000 年起的生活改进速度，中国农民的收入会在十年后达到城市中等人家的水平。

如果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加上封杀所有漏洞，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境会止于二十九年！新劳动法的杀伤力那么广及，没有多少劳工的支持，取缔不会引起大动乱。我反对的重点，非常重要的，是北京不要干预市场的合约自由选择。这样看，最低工资的安排也是违反了合约的选择自由，要取统。说过无数次，我永远站在穷人那一边。任何人相信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是不懂经济的运作。在西方，劳工是给工会及利益团体的压力误导了。德、法左右劳动合约，使失业率多年高企，但瑞典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执行的原则是政府不干预劳动合约的选择自由。”<sup>305</sup>

张五常的无知无畏不可思议。张五常逃美国的税后一直只能躲在大陆（他回香港也必须被引渡到美国）。他出面反对劳动法，这样他好好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官商勾结的企业家的利益，他知道怎么出卖自己。张五常，你不要对农民工和制造业工人太狠了，中国服务员也不会宽容你的。

张五常得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欣赏：“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张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张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张五常认为真正从新劳动法中得益的是‘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使舵的人’，‘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sup>306</sup>

张五常的苦力工资制是一个毒瘤。历史会记住你赞扬资本和权力压榨劳动力的剥削有功论。资本和权力压榨劳动力最低工资本就应该死命提高：跟华尔街投机者一样。美国工人不搞制造业，因为太累太辛苦：“这种苦活让中国和印度人干吧！”

涨最低工资当然会影响就业，David Card 和我哈佛同学 Alan Krueger 的诺奖最大贡献：美国加州码头搬运工都不想上班去卸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为什么？一小时16美元的最低工资必须继续涨。涨最低工资！20美元一小时也太低。管道工75美元一小时也太低。华尔街为什么那么高？“我们绝不是中国苦力！”这

<sup>305</sup> 《新劳动法的初步效应》，张五常。

<sup>306</sup> 《张五常：无固定期限合同会养懒人和搞垮经济》，CCTV, <https://news.cctv.com/society/20071224/104819.shtml>。原文可见《新劳动法的困扰》，张五常，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7387.html>。

是加州白左的口号。加州搬运工的工资待遇必须跟美国华尔街的投机者一样高或更高，因为华尔街的投机者最腐败。涨最低工资不影响就业这种错误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诺奖的错误理论也是精神原子弹爆炸。但是哪怕影响就业最低工资也应该涨，因为工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本就是要工人阶级有最好的工资待遇。劳动力商品供求关系引起工资水平的波动，马克思认为这种波动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力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就是说，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以量化为生产劳动者必需的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说明，工资水平的波动是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的。因为劳动力发挥作用后的消耗，必须要重新得到补偿；劳动力因损耗或死亡，需要新的劳动力来补充；劳动者要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需要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费用。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从而工资水平的决定，具有与其他一般商品价格决定不同的特点。劳动力价值决定受着纯生理的要素和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两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历史或社会方面的要素可能使工资变化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因此，马克思说：“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而且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推进，“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由此，工资水平的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供给者竞争实力的增加，取决于联合的谈判力量。

马克思早说了：工资是由社会和历史的多种因素决定的。张五常不懂马克思，更不懂欧美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他来美国看看就好啦，最近美国人就在罢工呢。“美国已有约 10 万名工会工人正在罢工或准备罢工；仅在最近两个月，全美就已有近 40 家工厂爆发了罢工事件，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另据美国劳工部 10 月最新数据，全美 8 月有 430 万人辞职，数据创下 20 年来新高；辞职率高达 2.9%，更刷新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疫情让许多美国工人重新思考他们的生活，他们正在反思自己为何还要呆在这样糟糕的工作岗位上。’《纽约时报》写道。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同样认为，疫情让工人有时间重新考虑他们的工作重点，这场疫情提醒工人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但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sup>307</sup>专家称：“此次罢工行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对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进行早该进行的调整，并重新调节几十年来社会中工人和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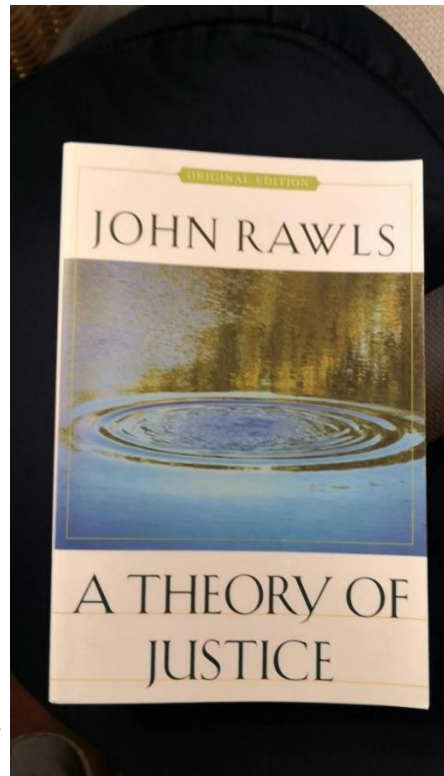
<sup>307</sup> 指的是 2021 年美国 10 万工人罢工 《美国 10 万人加入罢工潮 美媒：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主之间不平衡的权力。”

张五常没有共和经济学的丝毫概念，张五常用市场竞争的供给和需求看问题，而工资是政治、法律、社会的大问题！经济学研究离开政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是虚幻的。美国人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因为这是生活的快乐，争取高工资待遇是美国人最基本的权利。欧洲国家都是公司、工会与政府三方谈判决定工人工资，美国多少人都在罢工等每小时最低工资涨到八十美元呢。张五常在美国讲这种话会被白左诺奖得主们赶去芝加哥大学当清洁工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没有祖国”“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美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美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没有中美冷战了。

马克思之后，哈佛出了一个罗尔斯：罗尔斯设计的共产主义是每一个人的智力和物质禀赋都必须一样。罗尔斯的设计已经在美国针对黑人和拉美人全面实验。右图是罗尔斯共产主义设计的第一版：《正义论》，哈佛大学 1971 年版。这是美国穷人和有色人种的《圣经》。罗尔斯早设计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1980 年代，哈佛的罗尔斯就是我的老师。他和 Amartya Sen（阿马蒂亚·森）合上一门课，我总是参加。



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中文版。中国人可以比较《正义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罗尔斯设计远比马克思、恩格斯高明。罗尔斯的《正义论》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发展。可惜，中国经济学人根本不懂罗尔斯。

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要全面推翻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学人，真是太好了，也真是太难了。我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也需要四十多年真正理解罗尔斯和罗尔斯的 progressive theory（进步的理论）。按照罗尔斯的共产主义设计，穷人必须和爱因斯坦分享爱因斯坦的智力。智力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啊。美貌也最重要！那好，梦露必须跟长相一般的女孩分享美貌。这也是罗尔斯的共产主义设计之一啊。

因为从小没有受到洛克自由的教育，杨振宁到今天还是根本不懂自由。“美

国的话太放任，90 分以上的小孩在美国占便宜，因为他不需要规规矩矩念书，他自己都可以吸收进去，那么他就可以海阔天空，尤其是最聪明的人。假如费曼生在中国，他不是要被关进监狱里去，就是要的神经病的。”<sup>308</sup>杨振宁其实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他知道他自己远不如 Richard Feynman。但是他没有说明，美国除了出大师，美国也让一般的人日子过得特好。尤其是美国没有鄙视链，自由文明的美国已经让黑人成了人上人。“拜登曾表示，他将任命第一位非裔美国女性进入最高法院，让最高法院‘与国家现状保持一致’，而提名杰克逊有助于兑现这一承诺。此前从未有黑人女性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杰克逊是十年来第一位进入巡回上诉法院的黑人女性。当加州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问及提名对她的意义时，她给出了一个犀利的答案。‘这象征着这个国度的优秀和权威，拥有像我这样背景的人也能找到自己的归属。因此，我非常感激有机会以这种方式成为（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我诚挚感谢总统能给我这个提名，倍感荣幸。’”<sup>309</sup>

美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强大。这就是美国妇女的地位，她的丈夫还是白人呢。中国拐卖妇女的事件太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没有了，冬奥会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再多也没有用。

“春节期间，又加上万国来朝的冬奥会，原本是一个万家团圆、阖家美美的节日，但一则十分‘魔幻’的视频打破了所有欢庆的氛围。视频中，江苏省徐州丰县一户农村人家竟然养着 8 个孩子！孩子父亲‘董老汉’在镜头前‘父慈子孝’，而 8 个孩子的母亲却被单独关在破屋里像狗一样被锁头锁着，大冬天不给衣服穿，只能吃冷粥！

1986-1989 年，徐州六个县有 48100 名被拐来的妇女，其中最小的才 13 岁。有个叫牛楼村的，全村已婚青年妇女中，有 2/3 是被拐卖来的。也就是说，村里男人娶老婆，基本靠从人贩子手里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逃是逃不走的。即使家属和公安寻来了，大概率也没法当场带人走。这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有坚硬的民风，这里的人，他们是穷凶极恶的，自成体系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广为人知的话出自国际环保组织 WILDAID（野生救援），通过中国明星拍摄的公益广告片中，从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这是保护动物的。在中国某些地方，被‘买卖’的妇女儿童，连动物的待遇都不如。

提起祥林嫂，我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一位头发花白凌乱，脸色蜡青，眼

<sup>308</sup> 《最聪明的人在美国容易发展，在中国可能会出问题》，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4802419778841617015&sourceFrom=share](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landing?nid=sv_4802419778841617015&sourceFrom=share)。

<sup>309</sup> 《拜登将提名最高院史上首位黑人女法官，呼声最高的她是什么来历？》，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baijiaohao\\_16491918?sdkver=64590f2e](https://m.thepaper.cn/baijiaohao_16491918?sdkver=64590f2e)。



睛无神的妇人形象，嘴里半机械地念叨着‘我真傻，真的’。被拐卖的‘杨某侠’们，开始大约也是反抗的，但最后无一例外，她们都成了‘祥林嫂’。‘杨某侠’，就是今天的‘祥林嫂’。只要‘杨某侠’还在，我们就还处于前现代，离文明社会还十分遥远。面对她，我们大家都有罪。”<sup>310</sup>

“记者找到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他反思工作作风不实，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据纪委调查，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2月1日赶赴丰县，指导县纪委监委调查，问询160多人，收集的1998年以来的相关材料达一米多高。记者通过走访群众、民警、纪委等了解到，在这一事件中，县、镇、村三级多人失职失责。在23日的会议上，王剑锋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发生，影响十分恶劣，教训极其惨痛，不仅给受害人造成了巨大伤害，给地方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而且给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受访时均表示之前不知晓‘八孩女子’事件。‘作为地方主官我感到很愧疚。’”<sup>311</sup>

这些官员为什么没有一个自杀？这些草芥人命的书记们和县长们才是最可怕的存在，因为他们让拐卖儿童和妇女有了巨大市场。判这些草芥人命的书记们和县长的死刑之后，拐卖儿童和妇女的市场立马消失。我们学经济学的人最了解一个市场为什么总是存在。如果能让每一个中国女人持枪，她们可以自己保卫自己。欧美发达国家的公民都有持枪的权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也都有持枪的权利。把枪交给警察，警察哪里忙得过来？

了解美国贫困的关键还是看克鲁格曼和 David Card。“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却极其恶劣地对待许多劳动者。劳工的工资通常很低，经通胀调整后，一般男性员工2019年的收入几乎跟40年前普通员工的收入差不多。工作时间很长：美国是一个‘没有假期的国家’，它提供的休假时间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工作也不稳定，许多低薪工人——特别是非白人工人——工作时间长短不定，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对工人苛刻的还不仅仅是雇主。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似乎蔑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62%的餐厅员工说他们受到过顾客的粗暴对待。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许多员工要么辞职，要么不愿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sup>312</sup>如果听克鲁格曼的胡话，全世界劳动人民都会革命。搞国际贸易的美国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傻冒。以前他说美国人要暴动了。美国没有暴动之后克鲁格曼又说美国贫富悬殊

<sup>310</sup> 《谁制造了“杨某侠”惨案？》，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2022。

<sup>311</sup>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环球网。

<sup>312</sup> 《保罗·克鲁格曼：新冠疫情引发了美国工人革命》，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PaulKrugman/2021\\_10\\_21\\_611611\\_s.shtml](https://www.guancha.cn/PaulKrugman/2021_10_21_611611_s.shtml)。

会分裂。美国没有分裂之后他又说美国人会革命。美国人没有革命之后他又说美国穷人会起义。“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日益扩大的地区繁荣差异正在加剧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这一进程将是极难阻止的。尽管美国向落后地区提供了‘惊人’的援助——高达 GDP 的 20%，超过了欧盟向其贫困地区提供援助的‘最疯狂的梦想’，但地区分化仍在发生。他在文章中写道：‘繁荣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社会弊端，以及区域分歧与政治两极分化之间的强烈关联，都令人不安。但很难找到任何方法来阻止这一进程。’”克鲁格曼一个人干革命已经五十多年了，跟克鲁格曼一样喜欢鼓捣美国的是斯蒂格利茨<sup>313</sup>：世界社会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第一领袖。为什么 Abba Lerner<sup>314</sup>要把福利经济学写为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此书已经有中文版）？<sup>315</sup>福利经济学必然是政府管控啊，学经济学的人不都是猪吧。克鲁格曼：“美国工薪阶层多年来拿着过低的工资干着过多的工作，长期受苦受难的他们可能已经迎来了转折点。”对啊，一小时二十美元的工资也太低了。现在美国一个人一年一万二千美元的贫困线就要增加到两万美元了。克鲁格曼又经常说：美国穷人肥胖症太严重，因为吃得太多。

不过美国近四十年来金融发展的确妨碍了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剧了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美国金融行业并不需要好的人才，但腐朽的金融行业把美国的比较好的人才吸引过去了。事实上，美国今天的困境之一就是人才的浪费：有点才能的人都跑到金融和律师行业去了。哈佛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大都在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哈佛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当然有大问题。Shleifer<sup>316</sup>在世界银行讲这篇论文“*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sup>317</sup>就是强调金融业和律师行业不能像美国这样发展得太大。“一个国家最有才能的人通常由其他人组织生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他们的能力优势。当他们创办公司时，他们创新并促进增长，但当他们成为寻租者时，他们只会重新分配财富并降低增长。职业选择取决于每个部门的能力和规模回报、市场规模和薪酬合同。在大多数国家，寻租对人才的回报大于创业，导致经济停滞。我们的证据表明，工程专业学生比例较高的国家增长更快；而法律集中者比例较高的国家增长则较为缓慢。”他们这篇论文的结论尤其适用于美国。我讲这些论文其实就是美国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的方法，只要看懂几篇论文，学生很快就在一个领域的前沿。国内本科生和研究生按照教材学东西是最落后的学

<sup>313</sup> 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200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 IPCC 获得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

<sup>314</sup> 阿巴·勒纳，俄国经济学家。

<sup>315</sup> 应该是还没有中文版。

<sup>316</sup> 安德鲁·施莱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行为金融学的杰出代表。

<sup>317</sup> 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1991.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06(2), pages 503-530.

习方式。

为什么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如此难以消除？让我们先看看卢卡斯 1992 年 EJ 论文 “On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sup>318</sup>：“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在交换经济中分配资源的各种方式，在交换经济中，个人偏好受到无法监测的不可预测冲击的影响。这个经济体的效率要求财富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法国人 Thomas Piketty<sup>319</sup>怎么能跟这些美国批判家比呢？皮凯蒂的书是垃圾。因为人人都可以当资本家，因为人人也都可以当穷人。美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浪潮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火爆，现在美国两党只能在对付中国的冷战方面达成共识，哪里还能继续折腾共产主义。法国专制传统和法国反资本主义是一致的，《21 世纪资本论》早已经是垃圾。 $r > g$  不能说明任何东西<sup>320</sup>，因为现在世界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不是物资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g$  更高。人力资本的巨大积累正在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力资本（个人主义资本）、自由主义资本、保守主义资本、共和主义资本才是人类最大财富。 $r > g$  在发达国家是最好的事，因为公民的社会福利和养老金都依赖股市的汇报率（ $r$ ）。当然，Piketty 对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有认真严肃的批判。Piketty 鼓动法国人天天造资本家的反过瘾，他没有想到中国人看了他的书都不造反……Piketty is farting too much.（皮凯蒂放了太多屁）。菲利普阿吉翁<sup>321</sup>这种左棍如果得了诺奖更是灾难。当代法国经济学基本上是对企业搞专政（规制企业）、对个人搞专政（税收）。

这些都不妨碍加州和纽约州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美国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人一个月一千美元。低于这个水平，美国州政府管吃、管住、管医疗、管养老……我们这儿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一小时三十美元、剪草男工一小时四十美元、管道工一小时七十五至一百美元，其它各种福利不计其数。美国人只要稍微勤奋一点就能过很好的日子。全世界的穷人谁不想来美国？拉美非法移民在美国当家庭清洁工一天也是 240 美元现金，不用交税。哪里需要钱才能移民美国啊：“自拜登（Joe Biden）政府上任以来，美国的非法移民入境数量仍持续上升。德州州长将移民丢包至美国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家门前。在美国时间 7 日早晨，有数十位移民从德州乘坐巴士前往华盛顿特区，且就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家门口前下车。除了南部边境之外，美加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也日益严重，墨西哥不法集团开始带人从加拿大进入佛蒙特，

<sup>318</sup> Lucas, Robert E, Jr, 1992. "On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Royal Economic Society, vol. 102(411), pages 233-247, March.

<sup>319</sup> 托马斯·皮凯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

<sup>320</sup> Piketty 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根源在于  $r > g$ （ $r$  资本收益率  $>$   $g$  增长率）， $r > g$  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将高于增长率（包括生产率和人口增长率），过去积累的资本将助推社会的分化。

<sup>321</sup> 菲利普·阿吉翁，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当地边境执法部门拘押的人数已打破纪录，增幅超过 6 倍。”现在移民来美国的华人、印度人、中东人、东欧人和俄罗斯人都是富有阶级和知识精英。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太大了，美国只是缺人。美国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全世界都在等着美国的军火。二战时德国科学家都跑了，剩下一个给世界打工的德国。现在德国人不当苦力了，他们让中国人当苦力和 slaves，而苦力国还兴高采烈。美国人才不压榨 Chinese 苦力和奴隶的人口红利！

我是湖南农村小镇上长大，我只希望我家乡的人非法移民到美国。我自己在中国早已经是年薪两百万。地大物博的美国多么需要移民啊：世界活力的熔炉。美国劳动市场真是太需要中国人了，而且每小时最低工资是 15 美元（一个小时 110 人民币）。最重要的是美国还需要十亿移民，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移民五亿人去美国，这样中国就占领了美国。

美国 1770 年代的革命带动了全世界两百多年来自由和平等的革命。两百多年来欧美、拉美、非洲和亚洲的革命都是美国独立宣言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革命。美国和欧洲今天更是在彻底实现种族平等、实现性别平等、消灭等级制……中国人不想移民怎么办？我们不要忘了洛克的话：我们都有革命的权利。中国的自由和平等革命还没有开始呢。秦始皇和马克思把启蒙运动完全阻挡在国门之外。

## 第二节

# 论中国的反腐败与官员晋升

中国博大精深的腐败、贪污、受贿文化最值得研究：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Emperors（皇帝）拥有天下，臣子贪腐当然有最好的榜样。

王亚南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过程中曾感慨“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宋朝的李新有言：“廉吏十一，贪吏十九。”注意：我接下来使用“官宦”而不用“官僚”是因为王亚南用“官僚”一词是错误的。官僚制（英语：bureaucracy）或“科层制”是一种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基本职能是执行决策者的经任命产生的官员所组成的大型组织。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

弗朗西斯·福山也犯这样的错误：“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特别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 1 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福山认为，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一个现代化的、超越血缘裙带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奠基人是秦孝公及其谋臣商鞅，他们“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他（商鞅）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庭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

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罚。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sup>322</sup>福山根本不知道中国古代的秦国既没有私有产权，更没有公民权利，他荒唐地把秦始皇的郡县制划为韦伯所定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官僚制。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当官了。美国政府的财政秘书（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怎么翻译成了中国的财政部长？美国的国事秘书（secretary of the state）怎么翻译成了中文的国务卿？……更不用说把其它服务人员的英文被翻译成局长、厅长、处长、科长……没有“长”难道就没有美国？所有这些中文翻译都是把邪恶的、官本位的傲慢强加在文明的称呼之上。

华罗庚的学生徐利治说：“华罗庚对从政以及政治上的权力与地位看得非常重，在政治和数学中，他甚至可能放弃数学而选政治。这首先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有关，其次与华罗庚的家庭出身有关。他还提到了华罗庚回国后闹过情绪这件事，指出他的欲望太大了，什么位子都想坐。”丘成桐从哈佛退休后在中国当数学皇帝，他也在过华罗庚的瘾。中国的肥猪头都想当皇帝，丘成桐当然喜欢当数学皇帝。数学皇帝本身就是不能培养创新人才的皇帝啊，丘成桐一辈子都没有培养出来一个菲尔兹奖获得者。我们中国人都跟丘成桐后面爬行，哪怎么可能搞出新东西啊。美国数学界又不稀罕数学皇帝。美国数学界嘲笑丘成桐的权力欲望，把他叫做数学皇帝。我们中国人还以为皇帝是一个好称呼。

两位最高法院副院长被判刑：“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判无期徒刑，黄松有1997年3月任湛江市中级法院院长。1999年6月调入最高法院，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庭庭长。2002年12月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201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被判无期：2017年2月1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对被告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奚晓明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奚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此人也是我认识的人，牛皮哄哄的鲁炜。“中宣部原副部长鲁炜受贿案有了最新进展。新华社3月26日发布消息，鲁炜案当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其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索取财物3200万余元，因受贿罪获刑

<sup>322</sup>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弗朗西斯·福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鲁炜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现年59岁的鲁炜，他于2017年11月21日被查，是‘十九大’后首个落马的正部级官员。在一份《忏悔书》中，鲁炜表示：‘我感到了痛，深及肺腑；我充满了愧，无地自容；我无限地悔，肝肠寸断。我诚恳地向组织认错，悔错，改错。’”不批判大官僚们混文凭，专门对付混混小萝卜头们算个鬼。我们天天打虎，假如我们真都是猛虎，我们早有了宪政、私有产权、法治、群己权界……没有私有产权，哪里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认识的中国官员太多都在牢里啊：令计划、王益、王保安、薄熙来、张少春、傅政华、孙立军……美国当官的没有几个坐牢，因为他们被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私人媒体）盯得紧紧的。王益<sup>323</sup>（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当时在光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夸张二字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张维迎也是死命竞争当官，王益对我说：“张维迎一定会当北京大学校长！”我都笑死了：“王益，我最瞧不起北大校长！”要是让我当校长的话，那是杀我！我怎么看得起当官的啊。你知道我天马行空的本性吗？张维迎现在没有爬上校长的位置，只好继续跪舔官商勾结的老板们。恶心。

我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助手童道驰<sup>324</sup>不好好跟着我做学问，他回国后当副省长和三亚市委书记，现在他被判了死缓。朱民<sup>325</sup>当年也是我们的研究助手，他后来在国内当央行副行长。我希望以前在世界银行鬼混了的方星海<sup>326</sup>和张新<sup>327</sup>他们不要像童道驰一样的下场，他们应该混成副部级了，就是混成正部级又算个鬼，我只推崇搞学问的人。他们都是在美国鬼混一个博士，根本不能在世界银行做学问才回国继续鬼混，欺骗中国人而已。“在外国镀了一层专业金，没学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却出口转内销，收割（骗）国内资源，本质还是信息不对等问题……”是的，我作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第一个中国人太知道这些混混了。看看我的哈佛学弟们都在政协当官，钱颖一他们躲起来当官。可耻！他们放弃学术过当官的瘾，清华还用宣传片宣传钱颖一高贵，笑死全世界。

我1987年就可以当正厅级，王岐山<sup>328</sup>1987年要我和林毅夫去当官。林毅夫听话，我不干！有什么意义？狗屁官位不是自己的，只有学问是自己的！爱因斯坦连以色列总统都不愿意当，因为爱因斯坦的几个方程让他永垂不朽。爱因斯坦为什么拒绝当总统：爱因斯坦思索着永恒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方程式，是大自然永恒的奥秘。相比之下，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只是一时的烟云。中国经济

<sup>323</sup> 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2010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sup>324</sup> 童道驰，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2022年，童道驰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sup>325</sup> 朱民，IMF前全球副总裁，2003至2009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sup>326</sup> 方星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sup>327</sup> 张新，现任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sup>328</sup> 王岐山，2018—202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学年轻人太过瘾了：当官的他们都知道，而邹恒甫这位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他们都不知道。中国人不可能搞经济学、政治哲学、宪法学、社会学……

看今日全能制政治，我们必须重温李宗吾<sup>329</sup>《厚黑学》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国内反腐败的腐败也让人必须阅读《君主论》和《厚黑学》，请转发给俄罗斯、伊朗、北朝鲜、Turkey（土耳其）、Chine（中国）人民：

“李宗吾老先生。他所创立的‘厚黑学’一说，揭古往今来无数‘政治英杰’之真面目，让人想起荀子的‘性本恶’之说。其对权力竞争中腐败权术的概括总结，至今无人出其右者。

一、权术二原则。一曰厚，即像猪一样脸皮厚，厚颜无耻。二曰黑，即像狼一样心子黑，心黑手毒。

二、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空，即空闲之意，一指事务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农不贾，书也不读，学也不教，一心一意，专门求官。二指时间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贡，求官要钻营，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普通所谓之‘吹牛’；捧，就是捧场。戏台上魏忠贤出来了，那华歆的举动，便是绝好的模范；恐，是恐吓的意思。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予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当权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大吃一惊，立刻把官送来；送，即是送东西，有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也有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

三、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空，即空洞的意思。一是文字上，凡是批呈词、出文告，都是空空洞洞的，其中奥妙，我难细说，请到军政各机关，把壁上的文字读完，就可恍然大悟。二是办事上，都是活摇活动，东倒也可，西倒也可，其实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见势不佳，就从那条路抽身走了，绝不会把自己牵连着；恭，就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分直接、间接两种，直接是指对上司而言，间接是指对上司的亲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类而言；绷，指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一是仪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凛然不可犯；二是言谈上，俨然腹有经纶，槃槃大才；凶，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他人亡身灭家，卖儿贴妇，都不必顾忌；但有一层应当注意，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道德仁义；聋，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字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谩骂，闭着眼睛不看；弄，即弄钱之弄。前面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个字而设的。最要注意，是要能够在公事上通得过才成功。有时通

<sup>329</sup> 李宗吾，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李宗吾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治学严谨，机智辛辣。民国元年（1912年），以奇书《厚黑学》惊世，并自号“厚黑教主”。



不过，就自己垫点腰包里的钱，也不妨；如果通得过，任他多少，也就不用客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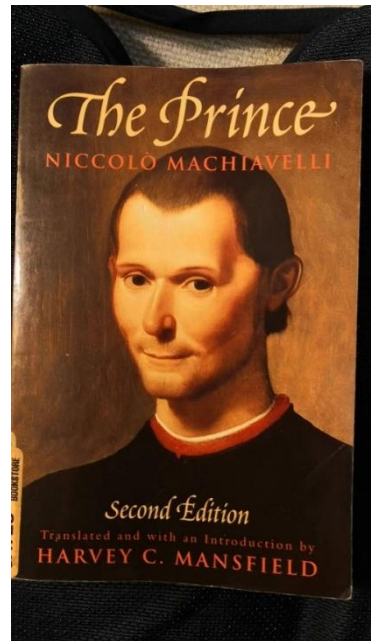
四、办事二妙法。一曰锯箭法，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将箭杆锯下，即索谢礼。问他为什么不把箭头取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你去寻内科好了。各军政机关，与成大事者，都是用的这种方法。二曰补锅法，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与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个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以上李宗吾老先生对腐败权术的精辟论述，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很有‘中国特色’。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我们如果把目光扩大至整个世界，就会发现，早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即比李宗吾先生早整整四百年左右），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就已经写出了更真正具有政治学术价值的《君主论》，他以权术为贯穿全书主线的核心，以人性恶为逻辑思维的基础，即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置身于人中间的君主如果处处想表现自己的善，就非遭到毁灭不可。

权术与人性恶构成其政治哲学的经纬。马基雅维利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也并不否认道德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喊出‘政治无道德’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因此使他成为现代政治学之父。按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

这样的分析方法意味着，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对于这种逻辑，与道德说教式的解释是不相干的，因为‘某些状似德性的东西，如果君主身体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数；某些状似邪恶的品质，如果君主身体力行，反而会带来安全和安宁。’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他应该是敢于直面政治现实，公开光明正大的系统性正面阐述政治权术的天下第一人。

如关于具体的政治权术原则，他在《君主论》中这样公开写到：‘君主应该学会同时扮演狮子和狐狸两种角色，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



不能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出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感到恐惧。’‘君主恪守信用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对巩固政治统治更为至关重要。’总之，他公开认为并主张，统治者或政治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应当不择手段，摈弃道德，运用权术；作为君主应甚至宁愿蒙残酷之名而不要行仁慈之举，宁愿使人畏惧而不要被人爱戴，君主只有不守信义，才能完成伟大事业，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个人。

《君主论》阐明的政治权术理论，从主要意义上讲，实际上即是一种政治韬略。可以断言，在人类政治史上，是先有低素质者小人的政治权术在前，而后有高素质者君子的政治韬略于后；并且，在《君主论》出版以前和以后，一切知道或不知道《君主论》的政治家或权力者，都早已经在或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际奉行着她。”<sup>330</sup>

大家看点西方政治哲学，了解马基雅维利官员的狐狸和狮子。大家同时复习一下韩非子官场的“势”、“术”、“法”，读一下汉宣帝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sup>331</sup>而李宗吾的《厚黑学》是官场现形记，君王和每一级官员都有相同政治思维。

为什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如此普遍？我的回答特别简单：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君王拥有一切的“公有制”或“最高权力拥有一切的制度”，中国根本不存在君王之外的私有产权。同时，君王手下的宦官（管理者）都是君王的奴才，他们只对君王负责。宦官被君王委托的权力必然成为寻租的工具，因为宦官不是“人民”选举的结果，因为宦官的权力不受“人民”制约。于是他们利用公有权力建立他们自己的私有经济。他们知道中国没有私有财产保护，他们让自己的家人和财产润到欧美国家。官员润到欧美国家的一个例子：“王大伟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裸官’，是指配偶移居国外，或是没有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干部。‘裸官’和‘假结婚’的问题出现在落马‘老虎’的双开通报中，尚属首次。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指出，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2017年，党中央修订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两项法规，将抽查核实和

<sup>330</sup> 节选自《何路社：政治韬略论》，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4414.html>。

<sup>331</sup> 出自《资治通鉴》第二十七卷。对于皇帝、宦官来说，思想观念是说给他人听的，目的是让他人心甘情愿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思想观念不过是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才是目的。

结果处理制度化，强化对‘裸官’的从严管理。”<sup>332</sup>

在独裁专制下，所有当官的总是得意忘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读哈耶克（最坏者当权）、布克哈特（权力即罪恶）和阿克顿（权力即腐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阿克顿勋爵后面的一句话更重要：“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伟人几乎总是坏人）。“我不能接受你的教规，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教皇和国王没有做错什么。如果有任何假设，那就是反对权力持有者的另一种方式，随着权力的增加而增加。历史责任必须弥补法律责任的缺失。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伟人几乎都是坏人，即使他们行使的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威，如果再加上权威腐化的倾向或必然性，情况就更糟了。没有比这个职位将其持有者神圣化更糟糕的异端邪说了。这就是对天主教的否定和对自由主义的否定相遇并保持盛典的地方，目的学会了为手段辩护。你会绞死一个没有地位的人，像拉瓦亚克那样；但如果听说的是真的，那么伊丽莎白要求狱卒谋杀玛丽，威廉三世命令他的苏格兰大臣消灭一个家族。这里是更大的名字和更大的罪行。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你会放过这些罪犯。我要把他们绞死，绞死得比哈曼还高，理由很明显是公正的；为了历史科学的缘故，我们要做得更多，做得更高。”<sup>333</sup>阿克顿勋爵是最希望美国南北分裂的自由主义者，他是《剑桥近代史》的第一个主编。美国南方战败后他极端悲伤。美国尽管保持了统一，它的五十个州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他的书应该有中文版了。我们谈自由和历史离不开他。

中国官员总是与私人资本家腐败、勾结，我现在建立一个中国官员与私人资本家的勾结模型。官员极大化无穷期贴现(beta)效用函数  $u(c, p)$  的积分，他的约束条件是：

$$dp/dt = y + G(p) - c - \text{delta} * p.$$

$c$  是官员消费， $p$  是官员的权力， $y$  是官员的工资， $G(p)$  是官员权力腐败的收入。

中国私人资本家极大化无穷期贴现(beta)效用函数  $u(c)$  的积分，他的约束条件是：

$$dk/dt = (1-\text{tau})f(k, p) - g(p) - c - \text{delta} * k.$$

私人资本家没有权力  $p$  的支持无法用资本  $k$  进行生产。私人资本家支付税收  $\text{tau} * f(k, p)$  给国家，他同时贿赂官员  $g(p)$ 。

In equilibrium（在均衡状态），官员的工资

<sup>332</sup> 《落马前 4 天还露面的“老虎”被逮捕》，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8KYWI6JxVr0>。

<sup>333</sup> 《自由与权力》，阿克顿，译林出版社，2014。

$$y = \tau * f(k, p) , G(p) = g(p)。$$

从这个模型里可以看到私有产权对市场经济多么重要。中国没有所谓的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因为中国没有私人王国或私有王朝。我提出邹恒甫-巴尔扎克定理：如果官商勾结，每一笔财富后面都有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 there is a crime）；官商勾结的社会没有创新企业家。国企董事长的目标是政治提拔，他们怎么能创新？美国没有国有企业，它让私人企业竞争创新。财富和资本本质上也是权力。在专制极权社会里，普通人拥有较多财富乃杀身之祸。官员结交必然死亡，官二代、官三代必然灭亡，富人也必然灭亡。专制极权下只能有一个个原子化的官僚和一个个原子化的平民。

几千年的 totalitarian 贪腐制度，而五毛还唱赞歌：中国体制自我革命，越反越贪。“我们对清零有特别的热衷，病毒要清零越清感染越多，腐败也要清零，越反越腐。”风景这边独好：“自我革命概念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自我革命以解决各类问题为切入点，在革除弊病的基础上守正创新。”

“自我革命也是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回顾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自我革命精神贯穿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宝库。”五千年最爱：power, power, power! 写此文的人害病不必去医院。即使有癌症，他自己给自己化疗、开刀做手术。

我继续回答几个微博上的几个问题：

“消灭个人的私有制，成就官有制，大官大有，小官小有，大官是个人，小官也是个人，实质上是成就有权力的人的公有制（私有制）。”当然了，还可以反腐，让不忠诚的官坐牢。

“解决基层官员的按功劳分红、按政绩升迁，才是恢复中国经济信心、民营经济信心的关键。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在我看来这都是小事，必须首先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官商勾结，官员迟早被反腐倡廉拿下来。

“法治应不应该保护公有财产，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这种问题我们动动脑子就知道了，除了君王一个人保护他的“公”有财产，没有另外一个人要保护“公”有财产。天下为“公”（公就是君王）。

“腐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我们发现<sup>334</sup>：在修正了测量误差之

<sup>334</sup> Hongyi Li & Lixin Colin Xu & Heng-fu Zou, 2000. "Corrup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Economics and Politics*, Wiley Blackwell, vol. 12(2), pages 155-182, July.

后，腐败似乎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其效果远不如 Mauro (QJE, 1995) 所发现的那样明显。此外，腐败本身并不能解释大陆之间的增长差异。

对于腐败的有益影响，最普遍的理由是所谓的“润滑车轮”假说……简而言之，“润滑车轮”假说认为，腐败可能是一种省事的手段，从而提高效率，从而提高投资，最终促进增长。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 1968 年写道：“就经济增长而言，唯一比官僚机构僵化、过度集中、不诚实的社会更糟糕的，就是官僚机构僵化、过度集中、诚实的社会。”他们的想法是，贿赂“润滑了商业的车轮”，使企业家和公司能够在不被官僚干预完全扼杀的情况下开展业务。清华大学的白重恩、芝加哥布斯大学的谢长泰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宋铮的研究：“私营企业在 中国 取得成功，是通过从地方政治领导人那里获得特殊协议，这使得它们要么打破正式规则，要么获得有利的资源。这种做法在正规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很常见，中国也不例外”。公司达成的交易有时会涉及当地领导人给予他们豁免法规的待遇，以及其他好处。领导人可以代表企业游说中央政府，或者帮助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作为回报，地方官员可能会得到孩子的学费、私人公司的股权，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城市或省份实现了经济增长，他们在党内的威望也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地方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向企业出售土地的证据。他们对土地征用权记录的分析表明，与住宅用地相比，工业用地的售价要低得多，甚至与同一街区的同类地块相比也是如此。研究人员写道，中国 2014 年对政府腐败的打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自那以后放缓。他们写道：‘虽然关于反腐的信息有限，但如果地方官员是出于私人经济利益的动机，反腐将抑制他们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提供便利的动机。’”

经济学的本质是产权、创新、发展、自由、法治。我们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搞清楚最基础的原理，整天折腾如何干预个人和企业的权利。美国政府官僚干预个人和企业的成本极其昂贵，因为这些自私的政府官员极大化他们自己的利益。懂吗？

许成钢的新论文跟董辅初和我的论文一致了，先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吧。

“产权指的是财产的最终控制权，是任何社会里最基本的制度。产权作为控制权衍生出来许多其他的权利，叫做权利束。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其他的制度，比如企业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一系列其他制度等等。社会基本的产权制度是社会演变的制度基因。产权的所有者会在制度变化的时候推动保护他们自身的权利。

在私有制度占主体的社会里，就会有增强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趋势。最终在这样的制度里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导致了法治，导致了宪政。而在皇权统治的社会里，有皇权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不断强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个社会里就很难发展法治、很难发展宪政。

沙俄的帝制其实是产生布尔什维克制度的一个制度基因，在这个制度基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产权、主权不分。中国传统的帝制在这点上跟沙俄帝制是相似的，即产权主权不分。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在中国，主权产权不分，税和地租不分”，税和地租不分什么意思？因为最终的地租是皇帝收的。皇帝收的地租和皇帝收税，这俩是一回事。马克思早就非常清晰地指出来了。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中国制度的基础从哪儿来。”<sup>335</sup>



过瘾：勇士只有邹恒甫和许成钢。幸亏阴阳人混混钱颖一不在里面，哈佛废物何其多！

听说有人假冒央企集资诈了骗 78 亿，1400 多名投资者找不到人赔偿。<sup>336</sup>那么如果中国只有国企或央企，投资就全部可靠了吧。我们要做强做大做优国企，这样我们可以让十四亿人当公务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国有企业实现了权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共产主义结合。但权力必然腐败，于是

<sup>335</sup> 《产权与制度基因》，许成钢，财经网，[https://www.mycailing.com/article/detail/450501?source\\_id=40](https://www.mycailing.com/article/detail/450501?source_id=40)。

<sup>336</sup> 指的是中铁中基供应链集团、孟晨、岑鹏、庄涛集资诈骗一事。从 2015 年起，中铁系私募打着“央企”和“国企”的旗号，累计非法集资 78.81 亿余元，共造成 1452 名投资人实际经济损失超过 38 亿。。

国企只能不断自我革命、不断反腐。皇帝所有制(美其名曰国有制)是权力支配一切的基础。官僚和百姓都没有法理上的财产权，哪里还有法治和自由？他们都是皇帝的奴隶。所以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权力腐败。五毛们怎么不 whitewash (粉饰) 这么荣耀的大事？五毛们也贪腐？

这种全能治理制度里西方激励模型没有丝毫作用，反腐就是 purges political enemies (清洗政敌)，权力斗争。

那么权力斗争从何而来呢：“引起权力竞争的最根本原因，自然只能是权力优越。而权力优越则最终表现在利益上。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我们所知道引起一切竞争的唯一原因。权力竞争是权力优越的题中之义，权力优越必然会引起权力的竞争。换一句话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将权力客观化，承认、主张权力优越，就必须也承认、主张权力竞争，这完全是一种常识。”

“在权力机制上，计划也好、市场也好，民主也好、集中也好，法治也好、人治也好，都不能改变权力优越必然引起权力竞争，这又一万古不变的权力规律。权力不仅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职业资源，更重要的是她在整个社会各种职业中，处于一种君临一切的主宰优越地位。权力是一种象征着力量与智慧的社会等级标志，她能使人敬畏，使人服从；使人崇拜，使人赞美。她能给个体带来名声与地位、金钱与荣誉、爱情与友谊……给群体带来国家与统治、法律与秩序、道德与利益……所以，人们必然要去竞争她。两个敌对群体之间的权力竞争，甚至不惜付诸暴力，不惜“前仆后继”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在同一群体内部的权力竞争，则一般通过能力道德或腐败权术的方式。

权力竞争源于权力优越，权力优越源于权力本身。要否定权力竞争，就必须否定权力优越，而否定权力优越就等于否定权力本身。这是一串环环相扣无法打断的逻辑链环。诚然，权力竞争的形式和表现，在不同的权力机制下各不相同。或武力争斗，或和平斗争；或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堂而皇之地进行，或暗地的、偷偷摸摸的不可告人地进行；或通过能力道德，或通过腐败权术……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怎样，只要权力存在，权力竞争也必然存在，至多不过是竞争的形式和表现不同而已罢了。即使是在我国现行的、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实现的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下，其否定排斥权力竞争，也并不能真正消除权力竞争。现实表明，这种违背客观权力规律的权力机制，与否定权力优越一样，只能是导致又一种权力者在权力竞争上的虚伪人格。权力竞争本身并无所谓什么对错，问题在于是通过什么手段或途径。”<sup>337</sup>

要否定权力道德化，实行权力优越、权力制约、权力竞争三位一体，权威

<sup>337</sup> 《何路社：权力天然优越》，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0991.html>。

在批判怀疑的竞争中必然更具生命力。市场政治的最根本本质，便是一种市场机制，权力竞争之下必出贤者。其的最集中概括是，在市场政治中，权力是一个开放的政治市场系统，在这一市场系统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即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及有志于加入权力者行列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公开、平等地进行政治竞争。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权力竞争史，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掌权者都实行专制，而专制的核心是取消权力竞争，不允许别人窥视他们的权力。非掌权者要想夺取权力，只有一条路：动武。

培宏按：“维持竞争性是需要成本的：别人拿钱买枪，你也要拿钱买枪，不然你的财产就有可能被别人抢走；别人拜票竞选，你也要拜票竞选，不然他一家独大最后会淹没了你。但维持竞争性的投入成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收益是最低的，与那些因为失去竞争性而变得垄断而僵化的社会所要付出的残酷代价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资本的正义性，就体现在两个方面：投资于生产与交换，和投资于维持竞争性。权力亦如此。说到底，权力与资本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它们存在于什么环境和维持什么环境。”“再评网上流传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剥削来自资本。马斯克说，剥削来自权力。于是人们又都说，马斯克秒了马克思不知道多少倍。其实，马斯克和马克思似乎都不懂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概念。任何一种权力，都是广义的资本。而资本是善是恶呢？它用于自愿的生产与交换时是善的，它用于掠夺的时候是恶的。怎么让资本行善止于作恶呢？唯有通过竞争。权力呢？当然也如此，在竞争环境中的权力是可以行善的，在非竞争性环境中的权力只会选择掠夺作恶，因为这样对它来说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权力与资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核心点在于，它们是否处于竞争性的环境中，从而被抑恶扬善。所以，马克思和马斯克，都没有说到点上，都是小儿科。”

权力等于腐败，于是美国媒体必须是众多私人所有。美国政府拥有对内的媒体是违反美国宪法的。为什么？因为党派政府都撒谎。如果中国媒体和记者是市场竞争，他们会二十四小时跟踪报道赖小明<sup>338</sup>怎么睡 100 多个女人。春晚的《坑》本来就是上级安排沈腾演出的，怎么现在反过来了：好像沈腾提醒了上级“在今年的春晚小品《坑》中，沈腾刻画了一位‘不担当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的‘躺平式干部’。”春晚就是 brainwashing，权力腐败必须让竞争媒体监督。美国媒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天灾人祸，没有好消息。这就是美国也想努力实现全过程民主、自由、法治和人的权利。在美国，谁让媒体知道天灾人祸，她/他还能得到媒体的奖励。没有自由竞争的新闻

---

<sup>338</sup> 赖小民，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1年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公开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照法定程序对赖小民执行了死刑。



媒体报道，怎么能在全世界实现全过程民主？“央视主持人邹悦言论惹争议：‘我不觉得西方媒体故意丑化中国，事实上美国媒体骂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狠，批评是西方媒体的商业性质决定的，坏消息才能吸引读者。’当然了，美国人批判美国才是深刻。美国人搞不懂中国，他们怎么丑化中国。看到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被先后打倒，这才让西方人感到震惊。丑化中国的人都是中国自己的官员。在美国有太多人美化中国了，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和基辛格都是美化中国、热爱中国。我在美国，我的微信朋友圈经常被封号。微信让人不說話，这才是丑化中国。

权力等于腐败。中国人一定要有这种蔑视权力的权力即腐败的现代政治人生观。美国人天天骂总统拜登：Let's Go Brandan: "Let's Go Brandon" is a political slogan that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minced oath for "Fuck Joe Biden" in reference to Joe Biden, 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让我们去布兰登：“让我们去布兰登”是一个政治口号，被广泛用作“去他的乔·拜登”的委婉誓言，指的是美国第46任总统乔·拜登。）欧美政治家都是欧美人骂人发泄的对象，这是有效地约束权力的方法之一。我1984年在哈佛数学系上动力系统的课，任课教授说：他不骂美国总统就证明不了任何定理。他天天担心美国总统不干正经事。美国普通民众最大的享受是政治：众多选举让大小政治家乖乖地听民众的话。

“那怎么才能防止腐败呢？”你帮忙去问问 emperor 愿不愿意搞三权分立。三千年皇帝制下中央和地方都一样腐败，因为权力没有制衡。不控制权力，怎么控制腐败？权力=腐败。这是英美宪政最起码的常识，看看洛克《政府论》吧。古代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人都知道自由！他们更知道限制权力。民主制最重要的是把有权力的所有官员关进笼子里。三千年中国都不知道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里，怎么可能有创新发展？

普布利乌斯《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是共和国理论里经典的经典。这也是反腐倡廉的经典：

“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这个政策可以从人类公私事务的整个制度中探究。我们看到这一政策特别表现在一切下属权力的分配中，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第一，在一个单一的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一切权力是交给一个政府执行的，而且把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以防篡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

第二，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还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只有两个方法可防止这种弊病：其一是在不受约束，也就是不受社会本身约束的团体中形成一种意愿；其二是使社会中包括那么许多各种不同的公民，使全体中多数人的不合理联合即使不是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第二个办法可用美利坚联邦共和国来作范例。它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

在一个自由政府里，保障民权一定要和保障宗教权利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中，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而后一种情况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教派。两种情况下的保证程度，将决定于利益和教派的多少。随着联邦的领土可能形成几个范围较小的邦联或州，会使多数人便于结成压迫他人的集团；在共和政体下对每个阶级公民权利的最好保证就会削弱；因此政府某些部门的稳定和独立（唯一的另一保证）必然会相应加强。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

在幅员广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里，在它所包括的多种利益集团、党派和教派中，整个社会的多数人联合，除了根据正义和公益的原则以外，是很少会在其他原则下出现的。在大党派的意愿对小党派的威胁较小的情况下，为前者作出如下保证的口实必然也就少了：把一个不受后者约束，换句话说，独立于社会本身之外的意愿带入政府。尽管有相反的意见，肯定无疑而且也是同样重要的是：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对共和主义来说可喜的是，通过对联邦原则的合宜修正和混合，可以把实践范围扩充到极

大的范围。”<sup>339</sup>钱权不能带来产权-法治-自由。钱权只能奴役公民。我们要制衡钱权，让钱权互相竞争：ambition against ambition, money against money, faction against faction……（野心对抗野心，金钱对抗金钱，党派对抗党派）

我们现在打虎的速度太慢了，这么慢慢打老虎急死英国阿克顿勋爵。这样一个一个的查要搞几百年？学朱元璋吧，一下子抓四万贪官。这些小萝卜头可以一次查出来一千人。马基雅维利说：要打击这些人，就一次干完。天天慢慢打，他们会自杀，不能立威，而且让民众疲倦。天天报道官员贪腐，大家不累，反而享受。这就是无知。

为什么国人都喜欢看官僚落马？这是中国最大的特色，因为当官的太多。杀不完的，五千年如此。现在杀再多也不可能赶上禽兽皇帝朱元璋的霹雳手段。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制度鼓励告密，制度靠监视维持。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所有奴才都彼此庆贺，因为所有奴才都没有人格。“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就是封建皇权专制的自信。不仅人们产生了奴才心理，天天想着给皇上磕头下跪，而且皇帝也不让人们反。结果，终于成了一个又一个王朝轮番更替的历史，也就是陷入了后来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恶性循环。

这十年来，我感到：独立、自由、法治、产权和宪政每一样都是多么重要啊。权力必须被全面制衡；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资本必须有竞争。西方经济学离开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学毫无意义。

## 论晋升锦标赛

列宁：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时就立下的规矩，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是什么玩艺儿？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达 40 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经济增长奇迹。因为在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保持如此增长速度高、持续时间长的增长速度。因此，很多学者开始从政策和制度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晋升锦标赛便是其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会对激励产生反应’是一个广泛应用于管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基本理论。该理论认

---

<sup>339</sup> 节选自《政府架构必须要能让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平衡》，载于《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

为，人的行为和决策会受到激励的影响，即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对于中国官员而言，这个激励就是根据 GDP 的增长率决定官员的升迁，即晋升锦标赛。中国具备政治与经济条件因而特别适合采用晋升锦标赛的模式。回看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资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罕见的。简单来说，就是官员为了在经济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以提升政治晋升的机会，地方官员会动用一切政策手段（包括财政和金融工具）支持企业和其他商业扩张，但是这种只重数量而非质量的扩张很容易形成企业经营绩效低下和政府财政赤字及负债。”<sup>340</sup>

周黎安既然是斯坦福毕业的，那么简单的 Principal-Agent Model（委托-代理模型）就可以说清楚的事，为何车轱辘话说了一大堆。锦标赛和层层加码的机制 Holmstrom<sup>341</sup>的论文里都有，他有啥贡献，起名吗？

政绩锦标赛是粉饰权力政治：政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把经济搞上去，把就业搞上去，把福利搞上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腐败的不满搞下来。所以，忠诚是政权之根本，腐败是忠诚的必要之恶，政绩则是腐败的稀释剂。对一个政权来说，忠诚是永恒的稀缺品。忠诚很昂贵，所以忠诚需要回报。历史上的政治忠诚，从来都是以钱和权作为回报的，钱不足就补之以权。钱权当然是没有够的时候的，但如果约束官权也太昂贵，官权约束就要让位于忠诚约束。贪官不怕，就怕贪官不听话。所以说：只有忠诚最重要，笨和贪都在其次。贪不是罪，大贪也只是小罪，不忠才是大罪。贪可忍，不忠则万无可忍。诚然，这充其量不过是政治权术而已，连政治韬略也够不上，离政治科学更是十万八千里。所谓失官心比失民心更重要只能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全能治理体系里，各级干部的提拔标准含有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等多个考察指标。年轻人最知道的三好学生就有三个（德、智、体）。大家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各级干部提拔的 N 个考量。这其实是多目标委托-代理模型里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难题，这也是最优个人所得税理论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难题。在一个目标的委托-代理模型里都很少有一般的最优契约（contract）。

对干部提拔锦标赛这种大难题的质疑，我只能点到为止。我提示大家也看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们都看看哈耶克对全能治理体系的经典论述。另外，我们也思考为什么美国人总选不出最好的总统。那些 Principal-Supervisor-Agent 模型是专制模型，不是自由、法治和

<sup>340</sup> 《晋升锦标赛——中国经济奇迹之源》，原文节选自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sup>341</sup> 霍姆斯特罗姆，麻省理工大学教授，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民主模型。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模型根本不能解决这种复杂的包含政治、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健康等各种元素的大难题。政治上忠诚是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最重要的标准。

他们的这种统计研究完全是开政治玩笑。忠诚是我们官员被晋升的唯一标准。如果搞统计回归分析，anything goes。他们的所有统计回归分析都没有考虑“卢卡斯批判”：官员的锦标赛行为和 GDP 都是内生变量。这些内容在最后一章我会详细的谈。周黎安在国内跪舔。大家也看看刘俏<sup>342</sup>和蔡洪滨<sup>343</sup>的嘴脸。

清华经管当官的也一样多啊。杨振宁一百岁了，你们不老。钱颖一带头摸权摸钱摸女人，文一不是跟着钱颖一学习吧？钱颖一最热爱权力和女生，所以他回中国，他们在美国去哪里摸权力和女生？回国后就换一个年轻女生当老婆，多过瘾啊。大家去问蔡洪滨也可以。美国华人老教授们，焕发青春回国找女学生。我说北大淫棍太多，北大反过来起诉我。结果北大淫棍不断冒出来作证：沈阳、冯仁杰、令谷、余万里、秦月明……北大两个厨师还强奸了一个女学生。北大女学生敢起诉北大吗？女孩子博士毕业后搞学问远超男人，但女孩子往往以为自己的男人最厉害。于是，中国女人一直受男人欺骗和压迫。在欧美国家，女人最厉害。哈佛大学校长都是黑人女孩了！

美国政治现在都是女人的天下。南希·帕特里夏·佩洛西 2007 至 2011 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2019 年起再次担任。妮基·海莉，印度裔美国人，美国共和党政治家，2011 年起担任第 111 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2016 年 11 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任命海利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是印度裔美国女人。美国政治最需要华人参与！赵小兰、戴琪和王毓敏都是女性。这证明美国女性在美国政治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她们都比谷爱凌有出息。美国华人这么多年来在冬奥会里得奖牌的一大堆，而美国华人里的政治家太少啦。中国太缺少女政治家了。中国女足运动员里至少可以选出来一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所以，我特别看好谷爱凌今后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慎之<sup>344</sup>是中国极少醒过来了的人，形容他最有名的一句话：“绝不在刺刀下当官！”“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

<sup>342</sup>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院长。

<sup>343</sup> 蔡洪滨，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及经济学讲座教授。蔡洪滨的嘴脸可见《最后的狂人 我就是邹恒甫》，邹恒甫，东方出版社，2013。

<sup>344</sup> 李慎之，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

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抗战压倒启蒙。从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起，几乎都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么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枪花，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够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提醒我，不论毛泽东如何赞扬民主、要求民主，他没有一次不是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中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狂飚中像枯枝败叶似的翻滚飞扬，其原因也不妨以对‘民主’和‘革命’的价值理解不同来解释。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sup>345</sup>毛泽东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陈玉宇和周黎安是我把他们招进光华的。按照理论标准，他们不合格。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陈玉宇他们都不能教高级理论课，其它学校一样。误人子弟的教师太多太多，不能讲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金融和高级计量理论的人都不应该在大学里当教师。因为世界上玩统计回归分析的经济学家都是骗子，这是马丁-菲尔德斯坦上课说的：回归分析的系数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啊！现在一大批国内的学术带头人根本不懂高级理论。我讲课非常理论化，我也特别懂用统计回归骗人，因为我在哈佛就是哈佛商学院用统计回归骗人的助理研究员。从1989年我加入世界银行以来，我做了三十多年统计回归分析骗人。

<sup>345</sup>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爱思想网站，<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3802.html>。

很多学校高级理论课程没有人开出来啊。这是国内奖励统计回归论文灌水的结果。周黎安他们还歌颂上山下乡呢。无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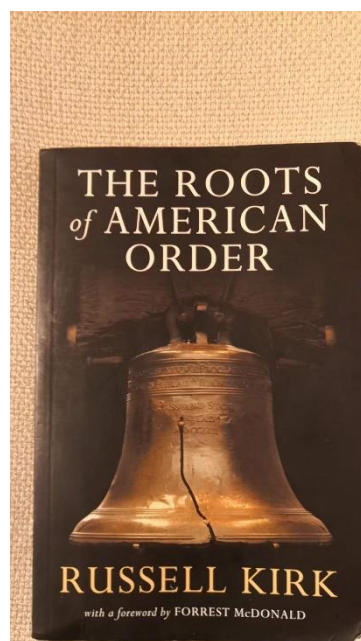
全能治理的马列社会最看重铁的纪律，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是荒唐地描述中国七十多年的政治和经济，因为马列社会忠诚第一。不过我要提醒他们，1943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段判词：“高压下的忠诚只是保护自己的表演，爱国必须来自心灵自由。”

### 第三节

## 论中国的抗疫

最近三年 China's 抗疫就是政府控制经济（当然包括医疗）基础设施、政治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最高水平的实验。动态清零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学经济学的懂吗？经济学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中国制度和英美宪政的差别。

理解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根本差别之一就是中国人总是依靠政府来防控新冠疫情，欧美人从来没有指望政府来防控新冠疫情。欧美国家死了那么多人，欧美人没有谁说政府做错了。美国根本没有隔离，就连印度也没有隔离。为什么美国一切运转正常？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一点都不感到惊慌。印度也正常啊，没有人惊慌失措。美国人抗疫没有政府依靠。他们靠什么？看看这两本书（另一本是 *The Conservative Mind* 同一个作者）。我们中国人总是说：美国人只讲自由，不讲秩序。我们好好看了这两本书，就能理解美国人（除了黑人）是最尊重自由和秩序的。美国人排队为什么那么讲秩序？我们中国人不理解吧。看看这两本书。



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中国人可以欣赏美国三权分立的精彩。美国总统也



必须乖乖地听美国最高法院的：“拜登去年 9 月便开始要求大企业接种疫苗，要求 100 人以上企业的员工在 2022 年 1 月 4 日前全面接种疫苗，未接种者每周需要接受一次新冠检测，并佩戴口罩。然而，新规刚实施三天就被叫停，并且遭到广泛抵制，掀起诉讼浪潮，一路诉至最高法院。共和党领导的州，以及私人公司、宗教团体等更是直接将拜登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此举严重侵犯了个人自由，是总统‘越权’。当地时间 1 月 13 日，美最高法院正式否决疫苗强制令，并称‘不允许联邦机构行使国会没有赋予它的权力’。在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意见中，法院的六名保守派法官称，新冠的风险与其他危险没什么不同，强制疫苗反而是对‘生命和健康的重大侵犯’。”这才是真正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国会山的立法、各级联邦法院的司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以及他们手下的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等行政管理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制衡的。美国立法的众议院和参议员只因为西弗吉利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Manchin 一票否决，两院就无法通过拜登总统的社会福利开支预算，气死拜登总统和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中国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才把三权分立统在一起。我一直在讲这件事：不懂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就不懂美国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不懂中国共产党领导就不能研究中国经济学。

国内天天谈美国疫情有什么用？美国联邦政府本来就不能管美国国内的几件事，美国州政府各自为政。中国媒体先搞懂联邦制的定义。美国人不怕疫情、不怕死啊。Forbid it, Almighty God! 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毋宁死，那就让自由的美国人多死几个。这些话国内人听了舒服吧。中国人也一样不怕死啊，毛泽东说得好：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我从小到大都是喊着毛泽东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惜美国 3.3 亿人活得好好的，绝大多数死的都是犯了感冒、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的老人，不管基础病是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只要死亡者有新冠病毒，美国一律算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这些数字表现了信仰各种宗教的美国人新冠死者最大的尊重。美国每年因新冠死的人数正好是美国每年感冒、癌症、糖尿病、心脏病……死亡的数量。而且美国是移民国家，不知道多少人在排队来美国。去年一年新入籍美国人 85 万，美国两年才死了 83 万，三年来美国新冠死亡总人数是 109 万，基本上是老人和不打疫苗的黑人和拉美人。

美国把所有死亡都归结为新冠死亡是有用意的。因为美国政府出钱管新冠病人所有费用，美国所有医院都有动机多报新冠死亡人数，这点特朗普总统早说了。特朗普总统还要美国要找中国索赔因新冠死亡的一百多万美国人。不过按照萨克斯的逻辑：明明是美国制造了新冠病毒，中国应该找美国索赔。新冠是

美国搞出来的，那我们中国一定要让美国赔偿因新冠死了的中国人啊。可惜2020年以来，我们国家新冠死亡六万五千多人，美国新冠死亡一百二十多万人。此人猜对了萨克斯的用意：“这货是给咱上眼药呢，这家伙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忽悠瘸了。他骂美国，捧中国，引导中国人仇视美国，引起对抗，最后很可能的结果参考前苏联。我认为此人意图极其阴险。而且他说的是新冠是由美国的实验室技术而来，是授权给了中国人，潜台词是使用的美国技术，但由中国实验室制造。太恶心人了，既污蔑我们，还侮辱我们没有相关技术。”

很多美国人最近开始意识到：三年来，新冠肺炎只在美国引起了人为的灾难，他们准备找福奇算总账。他以科学家身份掌握权力后，全面坑害美国人，让美国人戴口罩、居家隔离、搞线上教课……这些荒唐的举措导致自杀、酗酒、吸毒、抑郁症、离婚、杀人……福奇的权力是何等可怕啊！福奇现在已经认错了。（右图：福奇承认美国人有命令“疲劳”，美国人不喜欢被告知该做什么）美国福奇的蠢话说得太多了，培根<sup>346</sup>的“Knowledge is power”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权力不能不制衡，否则，没有约束的权力搞得天下大乱。福奇既然有权力就疫情发言，他就必须对他的言论负责任。受疫情影响巨大的美国人早醒过来了，他们要追究福奇祸国殃民的责任。中国人不理解福奇的处境，因为中国人不质疑权力，因为中国人不制衡权力，因为中国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反抗权力。美国人时刻反击权力，追究福奇的责任才是自由和法治社会的体现。



2022年疫情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成过去式了，而中国还在搞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模式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学习，中西方制度的对比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胡锡进在微博发文表示：他“这不刚关了几天就敏感脆弱了起来”“要是关我两三个月，我还不得多愁善感成什么样子！”胡锡进直言，任何城市的领导者“都不应该做把部分居民连续封控在家一个月又一个月，直至上百天的决定。”胡锡进难道想跳楼<sup>347</sup>？

武大哲学院赵林教授：“各位老师，我周二上西哲课被旁听的研究生感染，昨天核酸确定为阳性，夜里被送到医院。我感染后发了半天的低烧，有点头疼，

<sup>346</sup> 培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

<sup>347</sup> 网传胡锡进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估计我能跳楼，不是因为我把钱输光了，我是觉得我这脸啊，得埋到土里去。老胡啊，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走南闯北的，投了50万块钱，最后还剩5万块钱，我何脸去见江东父老啊。我敢保证不会发生那一幕，如果发生那一幕，我跳楼。

第二天就好了，症状比感冒还轻。现在完全好了，却被作为阳性送到医院，听说要隔离十几天。住在医院一天了，请医生的面都没见到，只有护士来送了几包金银花口服液（完全是安慰剂而已）。我已 68 岁了，感染后反应尚且如此轻微，各位年轻的老师更是不必害怕了。听说这次的病毒传播性极强（传播率高达 86%），危险性很低，比轻微感冒还要轻（我是亲身经历）。现在我在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要防止患上抑郁症，每个病房里住两个阳性患者，有一台电视都没有信号，而且不准出门（好像病毒彼此间有约定，同房间的阳性不会相互感染，只跨房间感染）。各位老师好好保重，但是这一次来势汹汹，危害小小。能避免最好不过，不能避免就算是被上帝的苹果砸中而自然免疫了。我的亲身感受是，这个病毒一点都不可怕，但是隔离却令人惶恐。”

官僚们比大家更忙，希望大家体谅一下官僚，尤其是体谅那么多不懂医学的官僚。“面对疫情，有关决策应科学审慎，不能只剩下‘全域大规模核酸检测’这一招。尤其是没有疫情的地方，随意高频率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中断部分社会运行，安排大量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协助维持秩序，无疑会浪费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影响社会正常运行，还容易引起群众的猜测，增加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启动大规模核酸检测，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对社会最小影响原则，绝不能搞‘拍脑袋’决策。只有科学研判疫情传播风险，精准确定核酸检测策略，不断提升核酸检测质量和效率，才能更好打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sup>348</sup>官僚们也可怜啊，核酸检测，不做，死；做，也是死。

大家自由活动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奴才们画地为牢，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依据宪法可以不戴口罩、不打疫苗、不必锁在家里、不必核酸检测、不去方舱隔离……奴才们还嘲笑美国人依据宪法不戴口罩、不打疫苗、不必锁在家里、不必核酸检测、不去方舱隔离……美国疫情期间让美国人戴口罩、居家隔离、强制打疫苗……这都是违背美国宪法的。美国人当然抗议啊，而我们还说美国人胡闹。我们哪里懂 law 啊。中国的法家和皇帝当然认为美国人是违法的。

关于动态清零的危害，网络上很多人说的不错：“长期封控会亡国灭种，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年美洲的印第安人是绝对处于封闭状态，印第安人没有形成群体免疫，当欧洲人进入美洲，和印第安人发生交流后，印第安人不能抵御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导致 70% 的印第安人染疫死亡。台湾玉山和阿里山的邵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躺平与国际与病毒共存是符合科学和自然规律的。”“清零对经济破坏之大可想而知，清零是反科学的，地球上千万种生物共同生存着，互相趋利避害，你见过老鼠蟑螂能灭绝吗？更不要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了，清零

<sup>348</sup> 《没有疫情也连续搞大规模核酸检测？抗疫资源不能如此浪费》，源自半月谈，半月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机构。

思想等于清朝扎辨缠脚的愚昧的观念，在今天文明时代中国很多医学科学家不知去了那里？”

上海才刚开始封<sup>349</sup>就有疾控专家开始说真话了，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来自于被封了的上海？以前武汉和西安封城怎么疾控专家都不说话呢？“上海自3月1日到4月1日，一共发现42952名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但没有发生一例重症，更不要说死亡病例，上海卫健委没有丝毫隐瞒。上海这一波疫情，几乎百分之百的感染者，不打针不吃药，会在十天左右，顶多半个月内自己痊愈，核酸转阴。现在上海的医疗资源已经几乎枯竭，原因并不是有多少新冠病人需要抢救，而是大量的医生被抽调去做其他事情。”<sup>350</sup>全世界正等着看中国清零抗疫奇迹，上海的疾控专家们请安静下来。我们应该继续连续时间动态清零，一直搞到上海人人都能解动态优化里的极小值为零的泛函。

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维为和交通大学的郑永年出来谈上海疫情没有？国外都报道上海封城。张维为和郑永年快点给外国人解释上海没有封城：东升西降。

“近期，美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持反对态度。对此，郑永年表示，‘动态清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西方疫情早期，有大量死亡病例，这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国家、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保护。针对‘动态清零’政策损害世界经济等论调，郑永年说，中国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他国。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许多欧美国家供应链和中国分不开，他们对中国有非常高的依赖度。郑永年强调，我们反对西方用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华文化，反对大家互相叫骂、价值观互相对垒。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求同存异的基础之上，基于共同利益，利用中华文明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去吸收、消化、吸纳好的文化。”<sup>351</sup>郑永年懂什么鬼东西？蠢得要死。此人不懂丝毫国际政治，还在中国鬼混。郑永年在新加坡就被警方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警告是性骚扰嫌疑人，现在溜回中国丢人现眼。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看起来越来越像是“负担”，正冲击其国内与全球的经济复苏。她接受CNBC专访指出，尽管中国该防疫策略最初取得成功，但现在却是风险高过优点。她说，“在中国，清零政策在一段时间上确实遏阻感染”，但传播快速的Omicron变种病毒使相关防疫措施如今难以轻易收效，“需实施的限制对经济更多是负担，不仅对中国本身，也对作为全球供应来源的中国造成更多风险”。

<sup>349</sup> 指2022年3月28日到6月1日的上海封城。

<sup>350</sup> 来源于文章《汪诘不吐不快：面对疫情，上海人真正怕的是什么？》。请在网络自行查找。

<sup>351</sup> 《郑永年谈“动态清零”：美西方看中国防控要“回到科学、回到理性”》，上观网，<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475416.html?sdkver=771db3e7>。

在发布给媒体机构的另一份声明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以下要点“我们说过清零并不是我们在美国这里追求的一种政策。我们说过，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将很难通过他们的清零策略就能控制这个病毒。封控和清零将会很难维持下去。”“对我们来说，我们专注于有效果的事情，这意味着使用公共卫生工具，比如继续提高疫苗接种率，包括加强针以及让检测和治疗方便可及。”“我们一直都在说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这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允许人们有集会的权利，去和平抗议他们有异议的政策或法律。”

放弃清零之后，由于之前一直忙于清零的官方没有让人民做好准备，加之近三年来一直宣传新冠病毒致命，导致民众恐惧心理加重，一时药物紧张，医院床位紧张，医疗系统面临重大挑战。上海瑞金医院院长宁光：“绝大多数新冠患者无症状，不需就医。你们少数人不要挤爆医院。”“2019年6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千人的医疗床位数为6.51张。如今，这一数字只有小幅上升，为每千人口的医疗床位数为6.7张。中国国家卫健委2022年12月9日公布的数据称，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为13.81万张，重症医学床位接近每十万人十张的水平。作为比较，美国每10万人口拥有34.7张ICU床位，德国29.2张。”“作为一个医疗资源本来就不足的14亿人口的大国，三年疫情期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核酸检测，建临时集中隔离感染者和密接人员的方舱，而医疗床位，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ICU）床位却仍是短板。”三年时间，天天喊医院资源不足。建了那么多的方舱能改建成医院吗？轮到我们抄作业，也一地鸡毛。不管何时放开，结果都会这样。为什么？

清零谁负责？“动态清零是由习近平提出的。在2021年12月7日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放弃清零谁负责？……李文亮医生为什么比几百皇帝们重要？因为李文亮医生帮助中国人，而几百皇帝们压榨中国人。

不过全面放开后，新冠病毒全部都主动自杀了，这是上帝命令的：全世界都特别注意中国今天只有两人死于新冠。<sup>352</sup>这包不包括钱文雄夫妇<sup>353</sup>？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上海自尽。2022年4月12日，钱文雄夫妇在上海自尽。自尽算不算死于新冠？台湾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新冠死人，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奇迹：一个月来全中国新冠只死两个人<sup>354</sup>，美国每年感冒都要

<sup>352</sup> 2022年12月24日，无新增死亡病例。可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24/content\\_5733356.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24/content_5733356.htm)。

<sup>353</sup> 钱文雄，上海市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信息中心原主任。2022年4月12日，钱文雄在上海自尽。网传他的妻子也一起自尽了。

<sup>354</sup> 指的是2022年11月1日到12月8日，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实际上有7例死亡病例。分别于

死八万人。美国昨天（2022年12月8日）新冠死人数：505人。现在美国还是12月9日，美国12月9日新冠病患死亡294人，7天来平均每天死亡488人。中国经济学人研究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问题太多啊。

转发我的朋友的朋友圈：“继高风险地区数持续降低后，现存病例数也开始减少了。一个根本不用怀疑的事实是：真正的感染人数肯定会大幅上升。但是不会体现在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数据中了。因为，以前的感染者是病人，以后的感染者不是病人了。这一特点，参见朝鲜的数据：一旦宣布出现感染者，短短三个月内报出477万例病例；一旦宣布战胜病毒，至今都是零病例。所谓疫情数据，体现的从来都不是疫情本身。”全世界都知道，彻底放开之后中国也不会死人。为什么？因为人民至上，因为生命至上<sup>355</sup>。怎么美国总统林肯也说人民至上？他甚至说美国政府是人民拥有、人民治理、服务人民的政府（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病毒也必须服从领导，我们一定要把健康宝制度保持到共产主义：封控90天的乌鲁木齐，8889人感染，死亡者是0。中国发生火灾也无人死伤。

#### 死水<sup>356</sup>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26日一例，23日一例，21日两例，20日两例，19日一例，可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而台湾仅仅在12月8日就增加了37例死亡病例。

<sup>355</sup>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呵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要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sup>356</sup> 闻一多创作于1925年的一首诗歌。闻一多，中国近代诗人、学者。该诗歌揭露和讽刺了腐败不堪的旧社会。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中国给世界指明方向，美国给世界提供辉瑞疫苗。提问：继续封控就要造反，放开了又要死人。怎么办？回答：人类对付疫情本来就是摸索的过程。国外摸索三年之后有了阶段性结果：美国疫苗是对付疫情的最好办法，美国死人最多的时候是在美国没有疫苗、更没有 Paxlovid 之前。我们好好享受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 vs. 英国。人山人海，为什么都不戴口罩？因为打了美国疫苗。我们三年来天天嘲笑欧美死人太多，自大狂傲，东升西降。意淫。

美国人免费接种了五针新冠疫苗。我在美国天天都看到新冠感染者。如果有症状，最好服用 Paxlovid。此药美国政府出钱，不用自己掏钱。如果新冠病人住院或死亡，医疗费当然是美国政府出钱。在美国，选择是否接种疫苗是个人的权利。我自己打了美国新冠疫苗第四针后还是感染了新冠。我天天都坚持投篮两个小时，没有吃 Paxlovid，我可是六十岁了！但很多感染的人症状很厉害。现在美国的儿童感冒比较厉害，搞得美国医疗病房有点紧张。中国要注意严防死守美国儿童感冒病毒啊：这才是比新冠肺炎厉害的病毒。新冠肺炎对中国之外的全世界毫无影响，因为都接种了美国的疫苗。

中国不用美国的 Pfizer 和 Moderna 疫苗对付新冠成了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

资本主义美国的所有人（穷人和资本家）都免费得到 Paxlovid,更不用说免费的最好的辉瑞疫苗。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把世界上最好的疫苗免费提供给美国人民，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必须比美国政府做得更好。中国人民不就是中国的江山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按照这一中国制度最基本的逻辑，人民当然有权选择世界上最好的新冠疫苗和治疗新冠的最好药材。中国政府必须满足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老年人）预防新冠和治疗新冠的最基本需求。

我将无我，人民至上：“相较于产能稳定的国产药阿兹夫定，完全依赖进口的 Paxlovid，缺货现象则更为严重。Paxlovid 在国内最初的定价为 2300 元，后降至 1890 元。在 2022 年 12 月初时，曾有网络平台开启了售卖，那时如果手速够快，还能以原价买下一盒。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新冠感染的快速增加，Paxlovid 已经很难从常规渠道购买到，‘黄牛’的售卖价格则涨到了 1.5 万元。甚至连印度的仿制药的价格都翻了几倍，且一药难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假冒药品也出现在了市场之中。”<sup>357</sup>现在辉瑞特效药 Paxlovid 国内售价 2980 元一盒？何必让新冠病人受折磨呢？本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应该掏钱免费提供 Paxlovid 给新冠病人。应该让中国政府全买下来免费提供给全中国新冠病人。在没有充分竞争条件下，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都会追求超额利润。我的朋友培宏：“辉瑞的疫苗还是进不来吗？如果真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些东西早就应该是政府买单，向症状严重的患者免费提供。像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能有机会接种辉瑞疫苗的当然要接种。不要信那些把各种疫苗放在一起一股脑反疫苗的网络脑残们的传言。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这样明确的。我们反对的是愚昧和虚假，而不是科学。”

辉瑞疫苗和 Paxlovid 不免费提供给全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好药当然是礼，难道现在我们也是“礼不下庶人”？我们是奴才还是主人？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救命的药对江山还要钱？钱难道是江山的主子？这是全过程民主？金钱难道是中国人民的主子？市场才是抗疫的最有效机制？官魂、匪魂、奴魂怎么主宰了救命市场和死亡市场？全过程民主的最好检验：中国政府免费给人民最好的辉瑞疫苗才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啊。让得了新冠的病人也免费得到 Paxlovid 是中国政府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和政府行为才真正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是犹太教、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本质。

有人说：“用了他们的，这边官商合作的还怎么发大财呢。”那就绝对不要用美国的好疫苗！警惕境外势力啊。毛泽东当年说了：封锁七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北朝鲜就是如此！哇，请看：Purim Shpiel: Putin

<sup>357</sup> 《辉瑞新冠药价格被炒近 10 倍，缺货是当下最大难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229487103079049&wfr=spider&for=pc>。



nominated for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for eradicating COVID-19。<sup>358</sup> 普  
京也清除了新冠肺炎，而且普京获得医学诺贝尔奖提名，因为他成功地阻止了  
新冠肺炎在东欧的传染……药，本来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啊。

全面放开之后，看看我们专家们的嘴脸：“近期应该把放开经济活动放在优  
先位置，统一全国防疫标准，消除全国范围内出差和旅行的过严限制。做好放  
开经济活动的舆论宣传。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是应对美国战略遏制、  
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化解各类风险的根本。请医学界  
科学家研究优化方案的可行性，比如，减少封控范围，不再进行全区、全市统  
一大规模核酸检测等。我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科学防疫，让社会经济生活  
回归正轨，将极大的提振各方信心。信心比黄金重要，如果措施得力，我国经  
济将重新步入复苏轨道、引领全球经济增长。”<sup>359</sup> 全面放开之后，这些奴才天天  
自愿为奴，他们现在又开始演奴才戏了。他们日后想让全天下的奴才都感激他  
们这六个奴才。我的朋友培宏：“奥密克戎是什么样子在一年前的 2021 年年底  
全世界就知道了，如果那时候，这六个人联名发这篇文章，我会敬佩他们。即  
使是今年 10 月份及以前发这篇文章，我也会认为他们算个学者。而现在，在揣  
摩好方向后发这个，就是叼盘的狗奴才们无疑了。”

张文宏现在还说要让老百姓尽快回到正常生活中，否则美国就会嘲笑我们  
了。<sup>360</sup> 张文宏，全世界都已经嘲笑我们一年了<sup>361</sup>：

一年前美国人就在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何时能够终结？从流行病学上来  
说，我们不知道。也许还有一到两个月——假如没有另一个令人关注的变种冒  
出来的话，至少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史中心助理主任 J·亚历山大·纳  
瓦罗(J. Alexander Navarro)说。‘从社会学上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大流行  
病已经终结的某种节点。很多州正在取消残留的口罩令。我们看到人们实际  
上是向前走，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一年前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消息：“与麻省  
总医院国际传染病科主任 Edward Ryan 的电话记录：现在接近 100%的阳性病例  
是奥密克戎，Delta 几乎完全从新英格兰地区消失了；新冠病毒的激增将在 1  
月 10 日到 1 月 21 日之间达到高峰，然后在 2~4 周内开始快速下降。我们最终  
将会有 20-50%的阳性率。3 月份我们将开始回归‘正常’生活；奥密克戎存在  
于你的鼻子和上呼吸道区域，这就是它具有传染性的原因，它不能像其他变种  
一样和你的肺结合；应对增加的住院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中大多数是二次入院

<sup>358</sup> 目前已被该网站删除，该新闻应该本身是就为了调侃普京发动俄乌战争。<https://www.jpost.com/j-spot/article-701519/amp>。

<sup>359</sup> 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姚洋、黄益平、张军、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https://mp.weixin.qq.com/s/7zhe23akV8oBWiiXdygDcw>。

<sup>360</sup> 《张文宏：要让老百姓尽快回到正常生活中，否则美国就会嘲笑我们了》，<https://www.163.com/v/video/VSM05HHTP.html>。

<sup>361</sup> 指的是在 2021 年底，当时全世界流行的毒株已经是奥密克戎。中国大陆直到 2022 年 10 月后才放开。

(即前来接受手术、骨折等，并接受 COVID - 19 检测的人)；COVID 将加入我们处理的引起普通感冒、上呼吸道感染、RSV 等其他 4 种冠状病毒的行列，它将作为一种主要影响无免疫力的幼儿的儿科疾病；40%的感染者将无症状，追踪接触者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感染，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它；我们正在与 COVID 进行最后一场战争，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除非你免疫功能低下或 85 岁以上，否则没有必要待在家里不工作或做隐士，春夏会很美好的！”科学研究还是要靠美国啊，经济学研究更依赖美国：全世界最厉害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在美国。不懂英文最好，因为封城不需要英文告示。

张文宏还说新冠正在进入最后一程<sup>362</sup>，这真是胡说八道。世界都在持续摸索对付新冠的办法，而美国新冠和感冒病人还在猛增。Paxlovid 必须长期准备，新冠会一直跟我们共处。很多美国人都有长期新冠后遗症。这是美国医学界正在研究的大问题。美国这样好的医疗条件，而且美国政府负责新冠病人住院的一切花费，新冠病人死亡还是正常现象。美国现在每天都死四、五百个新冠病人，美国 2022 年 12 月 20 日因新冠死亡 452 人，七天来美国平均每天因新冠死亡 384 人。我们中国人现在不要低估了新冠病毒。英国和日本也在高度关注中国可能产生的新毒株，中国这么多人感染，变异一次是肯定的。

以下更是 Bullshit (胡扯)：“面对疫情，中医药有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贾忠武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救治的效果是显著的，特别是能够显著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发热、咽喉疼痛、咳嗽、乏力等症状，在缩短核酸转阴时间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这些人大发国难财，在莲花清瘟与黄桃罐头之间，我选黄桃罐头。

“疫情以来奇特现象，那就是老百姓追着公务人员讲法普法，苦口婆心的教育他们要遵纪守法。在医疗领域，经过老百姓坚持不懈的对专家科普，专家们终于明白了，这个病就是个自限性疾病……”“这两天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有正义感的媒体人、一大批有仁心的医生、一大批有良知的科学专家，蝗虫般乌央央，生怕比别人叫的晚了，但实际上这些人即不正义也没仁心，更谈不上良知，它们只是一群见风使舵令人作呕的太监，是趴在底层人尸首上的吸血蛆虫。”

我去中国医院看病，医生们的口腔也臭死人呢。口臭是第一大公害。中国医生带头洗牙吧！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差距是牙齿健康（口腔健康）的差距。中国最需要发展的产业是洗牙和牙医。中国人每年普遍不去牙医洗牙三次，基本上都有牙周炎和口臭。带着牙臭、牙周炎和假牙谈恋爱、接吻和性交是中国人

<sup>362</sup> 《张文宏：保护家人 走出疫情》，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https://mp.weixin.qq.com/s/s8VvK-l6QCzDhhrQZHKZiQ>。

的常态。这是多么反现代文明啊。这是跟现代文明对抗的结果。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哪里需要看 GDP 啊。只需要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牙齿。美国大部分人死的时候，牙齿都是好好的。

富强的国家最好的标志是牙齿好，美国人最讲究保护牙齿。我 1983 年去哈佛读书，牙医问我多久没有洗牙 (dental cleaning)，我诚实地回答：“二十一年来我不知道中国有 dental cleaning。”吓死我的哈佛牙医了！从此以后我每年洗牙三次。美国老人的牙齿都基本上健康而且不拔牙才是世界文明。在武大、北大、浙大、中大、复旦、中财……我每年要求我的学生洗牙三次，他们基本上不听。美国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小孩们没有牙医证明他们/她们洗牙和牙齿健康就不能入学。清除口臭的现代化：一年每人洁牙三次，清除黑牙垢/黄牙垢 (tartar)。每天用牙线清除牙缝里的食物。口臭跟胃没有关系，不要总是说自己的胃不好而口臭，口臭就是口臭。

“邹老师，中国的优点是什么，有什么宝贝。”全世界只知道中国菜比较好吃。不过中国人在国外开餐馆一定要彼此竞争砍价，把中国最高档菜肴砍成大白菜价。美国中餐也是最廉价的脏乱差餐馆，日本料理、韩国料理和泰国料理在美国还算高档。在中国生产的世界名牌也一样，一定最便宜。就连中国培养的博士都是世界上最差的。

他们都不如李稻葵，李稻葵的无耻创造历史记录！李稻葵：“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中国挽救了多少生命？李稻葵举例计算，中国的人口是美国 4 倍，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 4，即假如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中国会有 400 万生命的损失。而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假设抗疫工作没有做好，会使得失去的生命在 60、65 岁左右，而每一个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 10 天的寿命。所以过去两年的抗疫相当于为每个中国人多增加了 10 天寿命。”<sup>363</sup>李稻葵在 2022 年初还欺骗美国私人媒体：While Chinese authorities could gradually unwind restrictions in March, zero-Covid policies are starting to hurt global confidence in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said Li Daokui. (李稻葵说，中国当局可能在 3 月逐渐放松限制，但清零政策开始损害全球对中国产业供应链的信心。) “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但他们没有自由，而温斯顿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住。他对爱人茱莉亚说：如果你离我这种人远一些，很可能多活五十年。”<sup>364</sup>李稻葵自己当奴隶活着，他也要所有人一样像他一样活着。林毅夫和李稻葵这些人活着是灾难。

<sup>363</sup> 《李稻葵：过去两年的抗疫相当于为每个中国人多增加了 10 天寿命》，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z/2022-05-14/doc-imcwiwst7388287.shtml?cref=cj>。

<sup>364</sup> 出自《1984》，乔治·奥威尔。

林毅夫和李稻葵这些无知的人天天开峰（疯）会。凡是开峰（疯）会忽悠的人怎么可能是经济学家呢？我从来不开峰（疯）会。卢卡斯什么时候开峰（疯）会？大家说说。郑永年也天天开疯会，他懂什么经济学？Zero！这十年投机取巧的经济学混混奴才大显身手。看看李稻葵被人民的口水和浓痰淹死，就知道其他投机混混奴才的下场。

鲁迅早就料到了今天新冠肺炎的伟大胜利：“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听说这回的欧洲战争时最要紧的是壕堑战，那么，虽现在也还使用着这战法——坚壁。至于清野，相传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进攻俄国，到了莫斯科时，俄人便大发挥其清野手段，同时在这地方纵火，将生活所需的东西烧个干净。中国虽说是儒教国，年年祭孔，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主家属，协同禁止。我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

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总之，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这个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兵匪的‘绑急票’，抢妇女，于风化何如？没有知道呢，还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颂德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还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歧异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当然的事。但最近，孙美瑶据守抱犊固，其实倒是‘坚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则我要推举张献忠。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正如伤风化是要女生的，现在关起一切女生，也就无风化可伤一般。”<sup>365</sup>

萨特谈我们为什么会欺骗自己：“自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存在状态，源于人是自由的，但人又恐惧和逃避自由。为什么人们不愿面对真相而宁愿在假象

<sup>365</sup> 节选自《坚壁清野主义》，鲁迅，上海《新女性》月刊，1926。对原文有修改。

中生活呢？因为自由就意味着承担焦虑和痛苦，那么把自己本质化以规避风险就成为人之常情。如果人超越自身，这虽是自由的表现，却将他抛入茫茫人海的竞争漩涡中，他会面临风险，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难免陷入痛苦和焦虑中。如果人拒绝超越，逃避自由，通过积极的谋划，把自己纳入和凝定在某种本质中，反而过得平静自在。人是自由的，人意识（非位置地）到他的自由，但常常不知道（位置地）自由，人为抵御风险，追求安逸和永恒，每每逃避自由而把自己本质化，这是自欺产生的重要原因。”<sup>366</sup>疫情让所有人都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但是疫情三年以后大家才想到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落后八十年啊。其实萨特本人也是一个矛盾。尼采对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最大。他其实是积极向上的人：Will to Power! 他是乐观主义者，叔本华才是悲观主义者。鲁迅的文章里太多尼采的思想了。反抗离不开尼采，尼采的思想也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独裁者。它们都鼓励中国青年奋进前行，管他什么鸟领袖或导师。

我朋友王成伟的微信朋友圈：“昨晚的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又迎来一个新的不眠之夜，还有近日的广州、郑州……多城陆续或同时发生让人血脉喷张的对峙、混战、拘捕、反攻、暴乱，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们也展开聚会抗议、控诉，广州的聚会对峙据说超过 10 万人。历史何其相似，若干年前那些无法登上史书的一幕幕如今竟然遍地开花地惊人重现在中国各地深夜的街头，这让未经历过那些时代的 80 后、90 后、00 后被迫直面并选择这个时代的真实（当然，不少人也会选择低头路过视而不见）。有良知的执行者在对准抗争的同胞时，请忆起德国历史上法官对开枪士兵审判时的著名告诫：‘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为什么我今天更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此激动？

我在南京

我在上海

我在北京

我在乌鲁木齐……<sup>367</sup>

燕京大学的未名湖<sup>368</sup>

<sup>366</sup> 《自欺与自由——萨特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揭示》，李克，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P36-41 页。来源于公众号 first philosopher。有修改。

<sup>367</sup> 邹恒甫曾在南京、上海、北京、乌鲁木齐等地办学。

<sup>368</sup> 邹恒甫说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九年多时间（1998-2007 年）是真正改变北京市自由市场经济学/金融学教育的最好时光。

死水微澜？<sup>369</sup>

闻一多怎么死在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里<sup>370</sup>？

我在南京、上海、北京、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的火<sup>371</sup>

燃烧在死水<sup>372</sup>上：

醒来了，上海<sup>373</sup>。

<sup>369</sup> 《死水微澜》，李劫人 1935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邓幺姑，与小说中的三个男人蔡兴顺、罗歪嘴与顾天成有着纷繁的情感纠葛，进而引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宗教问题，深刻揭示了西方物质文明入侵后，腐败破落的旧中国“死水”泛起“微澜”的历史画面。

<sup>370</sup> 《荷塘月色》朱自清任教清华大学时创作的散文，创作于 1927 年。朱自清夫人陈竹隐认为朱自清当时之所以创作此文，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产生的“惶惶然”，进而导致朱自清内心的不平静。在大时代面前，他感到歧路上的彷徨，觉得自己是‘一张烂纸，一张枯叶’，幻想‘超然’。超然的道路走不通，又寄望于‘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闻一多也是清华大学毕业。

<sup>371</sup> 指的是乌鲁木齐市“11·24”火灾，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 10 人死亡、9 人受伤。网传该社区为高风险地区，当时居民楼门被锁。而新华网消息称，小区不存在铁丝捆绑的问题，自 11 月 20 日起，吉祥苑小区居民已经实行错峰有序出户下楼，在小区内活动。

<sup>372</sup> 指闻一多的作品《死水》。

<sup>373</sup> 指 2022 年 11 月 27 日，上海马拉松比赛，是上海的城市生活在疫情之后终于恢复常态化的标志之一。

## 第四节

# 我不能沉默

我们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基本不过如此而已。

——陈寅恪

邹恒甫不是如此。我，中国人，不知道此人，请百度。<sup>374</sup>世界银行研究部第一号老资格中国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中国经济学第一学派——武大学派的第一继承人，我的前面是杨端六、张培刚、董辅初。杨小凯算我师弟。我四十年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搞经济学教育。有人问：“你将你的一切交给了国家没。”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中国当代高级经济学教育事业。

很多人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读人文社科的海龟们都不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发声？”我回答：“我无非就是当一次右派而已。”我之前一直都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声<sup>375</sup>，因为我的搜狐博客早被封杀了（张维迎 2007 年就请张朝阳封杀我的搜狐博客）；我的新浪微博也被封杀了（北京大学封杀的，因为我绝不给北京大学的淫棍道歉）。那没有一点用，浪费了我几年的时间，因为我在微信朋友圈

---

<sup>374</sup> 可以参考附录 3.1。

<sup>375</sup> 邹恒甫的发了一年多的微信朋友圈于 2022 年 12 月底被彻底封禁了。他于 2023 年创办的三个新微博账号也都于 4 月左右被永久封禁了。本书绝大部分内容就来自他的这些封禁的微博和朋友圈。

发表我的观点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声。真是六十年未有之奇观。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商鞅变法后的天下大治啊，这其实是最可怕的事。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那些吃饭、聚餐、性交、旅游……的东西。有独立思想的是发表对社会的批评，而且这才叫人。我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微信朋友们都不做声。可能是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太多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失去钱权色。这就是一个社会固化、腐化的典型特征。

很多经济学人标榜他们在今天这个时候沉默地做学问。我回答：这些人在做非人性的学问。我在现在只研究战争的模型、自由的模型、私有产权模型、民主制模型、公民持枪模型……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但是如果伽利略、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卢梭……他们不提着头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哪里有现代自由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经济学理论？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秦朝如何亡于集体沉默：“秦朝迅速覆灭的教训，绝不只是秦朝的苛政猛如虎所造成的。因为历史上，比秦二世昏庸暴虐的帝王比比皆是，唯独秦朝亡国最快，当中的缘由很复杂，但史记中有一则不起眼的故事，或许是秦朝破败的根本原因，它就是‘指鹿为马’。因为从那一刻，帝国的人已经开始选择‘集体沉默’。

秦始皇驾崩后，二世胡亥在赵高的帮助下，威胁并伙同丞相李斯以假诏的手段干掉储君扶苏，顺利成为帝国的第二代掌门人。赵高获得赏识后，利用自己是宠信的身份，害死李斯取代丞相之位。从此，赵高成为大秦帝国真正的高人。为了考验满朝文武是不是跟自己一条心。赵高趁着早朝的机会向秦二世进献一头鹿，并口口声称这是一匹千里马。胡亥不相信赵高的话，拉着群臣一起验证，结果大臣害怕遭到赵高报复，选择默不作声。有的人甚至突破底线，说丞相英明，这是难得的千里马。只有极少数的人，坚持正义说‘这是鹿，不是马’，但他们的下场都非常凄惨。从那以后，大秦帝国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人，所有人都趋炎附势于赵高。

实际上，指鹿为马只是赵高祸害大秦的开始。赵高为了能够牢牢地控制秦二世，向秦二世建议说，要提防亲近的皇室成员，他们当中很多人帝位继承意见很大，不如借此机会除掉他们。于是，大秦帝国一场屠戮运动拉开帷幕。很多皇室贵族无辜遭到诛杀，嬴氏一支走向凋零。面对赵高磨刀霍霍，皇室成员



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抗赵高，人人都想着讨好自保，最终都没有逃过惨遭屠杀的悲剧。外姓大臣闭口不谈，皇室宗亲人人自危。十年后，大秦帝国在‘集体沉默’中崩塌了。<sup>376</sup>全能统治者都是如此，苏联和东欧的瓦解也是如此。沉默是人间最可耻的。柏克：“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的袖手旁观。”马丁·路德·金：“社会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在心里说：沉默是金。其实，沉默是邪恶。

爱因斯坦和我说得更好：沉默是犯罪分子的同谋者。士大夫之无耻沉默，是谓国耻。对罪恶不发声等于犯罪。这些年来，沉默的人自以为聪明绝顶。其实，沉默的人是让自己和所有人找死。这么多年来，如果都像我邹恒甫这样发声，大家都会死吗？！沉默是杀人，沉默是最大的犯罪。

爱因斯坦给芝加哥律师协会的一封信：“在长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对物理实在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爆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是我在中国上厕所必看的。没有这套书，我早恐惧死了。当然，199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办当代经济学高级实验班也是需要胆量的。如果不懂物理学，许良英编译的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三卷是必须看的：爱因斯坦的政治观、哲学观、社会观、自由观……第二卷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经典论文。如果懂物理学，我们顺便把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也看看。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啊！读一下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三卷，这样我们知道做人的档次。现在我们尤其要读爱因斯坦，因为读爱因斯坦文集的三卷中文版可以让中国人脱离很多低级趣味。同时读斯宾诺莎可以让一些中国人变得高尚。我们需要理解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的自然神论。我们说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躲起来保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伽利略、

---

<sup>376</sup> 《秦朝亡于集体沉默，若有一条硬汉，也能避免二世而亡》，百度百家号，马首瞻。

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卢梭……爱因斯坦他们提着脑袋搞真学问。我们哪里是在搞学问？

世界历史上有意义的个体只有很少一些人。这些人都是热爱风险。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拿破仑、希特勒、列宁、斯大林……他们都热爱风险。爱迪生和特斯拉更是热爱风险。人类的自由和发明创造也都来自热爱风险，而不是回避风险。苏格拉底热爱风险、亚历山大热爱风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热爱风险、布鲁诺热爱风险、斯宾诺莎热爱风险、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当然是热爱风险，文明等于自由；自由等于热爱风险。

马克思选择了一个造反的职业，马克思被他自己的祖国德国和其它欧洲大陆国家驱逐出境，只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英国让他留下来革命。他只能在伦敦写推翻英国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今天共产主义革命的人都感谢英国宪政。马克思预测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快两百年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还活得很好。马克思的祖国是德国吗？马克思回答：他没有祖国。如果历史有目的，那历史的目的就是自由（热爱风险）。黑格尔其实说错了，东方世界没有历史，因为东方世界没有一个人热爱风险和自由。

我回答微博上的一些相关问题：

“你是在美国做研究还是入籍了？”我在世界银行呢，联合国国际组织。我又不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

“邹教授，你从小在中国长大也是经过文革的人，你不该回来。”我四十年来一直来往于中美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当代高级经济学。

“发这么多朋友圈和微博，哪有时间搞学术？”其实我发这点微博和朋友圈太简单了。我今天已经看完了三本书。三十五年里，我在中国办经济学教育第一；我在世界银行发表经济学论文是前五名；我一辈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都在看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宪法、中西历史……；我推荐中国学生去美国读经济学博士的人数世界第一；我给世界银行写调查报告速度第一……我锻炼身体每天投篮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看书、写笔记和新浪微博。大家一定也要好好锻炼。

“关注邹老师的怎么这么少，可惜啊”你怎么担心粉丝？我以前的新浪微博《恒甫学社》只八个月就有二十万粉丝（僵丝？），一看就是假的。有什么用？我现在只需要三千粉丝一起讨论学术。如果这个微博里的粉丝看懂了我的共和经济学，中国当代经济学水平就远超法国和英国了。听说微博粉丝多了就容易被封禁。如果粉丝不是搞学问的，跟着我不会有太多收获，请不要继续成为粉丝。

“除了邹教授，已经没人说真话”所以我一直只说真话。

“前几年，你说你是中国最好的学者，我不信。现在信了。”很不容易得到你的认可。谢谢！最近几年，多少人都要我不说话呢。有些人还说我发声也没有用。有一个人说如果回国海龟和在美国的华人都能像我如此发声，中国一定会有希望。

“2020年后，邹教授是难得的中国思想家！单单很多问题的提出就已经很伟大了。”这是因为这些年绝大部分人不敢说真话了，而那些说话的人都在投机说假话。

“邹老师新春快乐！还记得当年在光华听邹老师讲座，赤子之心从未改变！”我怎么会改变啊。

“要是三十年前读大学时就遇到邹老师该多好，现在只能作一个业余共和经济学爱好者了，跟着邹老师学英语，数学，享受思想的乐趣。”“博主绝对是海外华人社区教育领悟佼佼者，希望您的作品和言论被更多海外华人关注，希望他们能多多支持你的言论。”跟我友好的海内外华人都说我是华人天下博学多识第一人。

“中国谁有可能得诺奖啊？”中国经济学人还能得诺奖？意淫。如果没有我四十年来一直如此说直话，中国经济学界不知道有多少傻冒会吹嘘他们自己被诺奖提名了。“努力获得领导批示，不是人文学科发展的方向！”只有中国人才想到出来啊。

“邹老师吃穿行还是很随性的，不浮夸，不正襟危坐。”艰苦朴素啊：钱都用来买书、办学了，我从十岁开始就很会做饭了。不像钱颖一他们一大群婊子们假装高贵。他们根本没有学问，狗屁不通的数学出身。他们根本不懂数学才改行搞经济学。他们根本不懂经济学，更不懂中国全能治理经济学。

“没有胆量说出真实的想法，时间长了，就算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其实已经被扭曲了很多次了。”“好可悲，5岁就被洗脑，最近看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感觉咱们国家的人不愿意或者是不敢说出内心真实想法，都成为一种传统了”

“叹气，我并不欣赏邹博士的脾气，但是于经济学研究，邹博士是我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几乎是唯一一个对研究有着赤子之心并以一贯之的人。骂的凶，可能是爱之深，痛之切吧。不像我，知道这些人无可救药，一走了之。”

“‘死道友不死贫道’，是大多数国人的生存之道和活命哲学！常常看到有些人，只要一看到一场群体性维权爆发，总会在第一时间来一句‘不要被利用了’，然后就开始为自己的‘理性’和‘成熟’而沾沾自喜。此刻我只想，瞧你那个逼样，你放心吧，没人会利用你的，因为你比我见过的最废物的废物还没用。你是人类之耻。”

我的微博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思考。我们一起避免武断的答案。我讲课非常投入，自己特过瘾。我对着手机边说话，边打字：这是人生最享受的生存方式啊！

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他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69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陈寅恪“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邹恒甫：假如毛泽东见陈寅恪

1996年3月

陆键东君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提出此问，愚用愚首倡的新新古典诗词之七古体试答如下。亦感谢陆君为吾侪写出如此感人(但学术深度还远不够)的传记文学。

文武具张复江山，长沙韶山生二男。一八九零又九三，虎出衰世蛇微寒。文明精神野蛮身，润之并进寅恪单。时务学堂开新教，巡抚陈公育俊将。但使二秀少年交，右铭散原有何望？倏忽二才奔异道，六十年后天地翻。人民五亿赤县红，毛君主席陈儒王。润之少服文正公，咏之珍藏曾湘乡。开天辟地君独健，指点江山数骄皇。少滨礼遇西湖畔，九天唱和尧舜函。待和新诗结后缘，寅恪念父愿钱唐。更邀润之挡箭牌，畏人畏寒不北上。早年君师杨树达，曾荐寅恪润之旁？尚若二人共华章，汗青该载何雅量？润之视世红楼梦，吴宓寅恪哈佛商。将军诗人道新语，魏晋清谈更形上。文艺沙皇遭袭击，周扬穿鞋需试量。鼎堂称师康乐园，北梦南缘龙虎觞。后学乔木不盖棺，尊长讽叹书出版。闭门高眼辞诸城，嗤嗔牢骚正断肠。父母官要斯亮父，神州儒王依雄仗。小事大事

缀国史，陈家三代司马谈。寅恪失明又膂足，衰残豹隐难岭南。润之不念家痛史，若见寅恪广州寒。猛志四海碣石篇，圣相王侯流珠江！

陈寅恪和邹恒甫知道要与权力保持最大距离：“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陈寅恪一辈子歌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自己更是实践自由独立的榜样。他没有把毛放在眼里。我的特点也是骂有名的、道貌岸然的人物。自然，the fourth-grade emperor is shameless（小学四年级的皇帝也是无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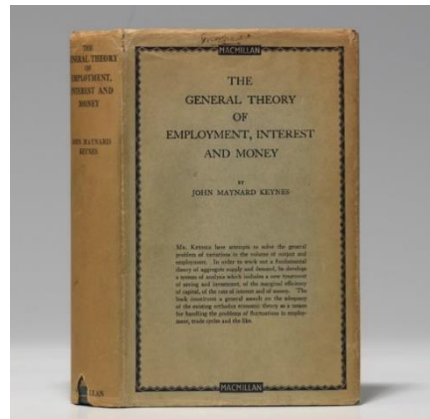
## 武大学派

我是中国经济学第一人，我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第一人。武大（经济）学派是杨端六、张培刚、董辅初、邹恒甫、杨小凯等。他们绝对是中国经济学第一组合。中国经济学人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超过了杨端六、张培刚、董辅初、邹恒甫和杨小凯这五大金刚。

中国经济学里有哪个大学能跟武大学派 PK?没有啊！国内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吴纪先、刘涤源、李崇怀、李京文、何炼成、刘诗白、万典武、胡代光、曾启先……都曾是武汉大学的风流人物。武大学派一代胜过一代。全中国没有超过武大学派的，我在武大，武大一直是经济学中国第一，哪个在乎教育部来的水货评来评去。

我只爱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我在哈佛都骂哈佛太差，芝加哥大学好多了。我十五岁读武汉大学，我把历史、哲学、数学和经济学乱学了一通。我二十一岁到哈佛，我又把历史、哲学、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乱学了一通。我的哈佛博士论文建立了国际上一个研究领域：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武汉大学老经济学家很多是哈佛出身（吴纪先、谭崇台、刘涤源、张培刚）。我当时在武汉大学正好还读刘涤源先生的 *Samuelson Economics* 第十版（1976 年）。武汉大学搞世界史的著名专家吴于廑也是哈佛博士。我在武汉大学还跟着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先生念西方哲学，跟着陶德麟先生念马克思哲学。我学英文就是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英文版（曾启贤先生藏书）。那是 1979 年啊，多么难得有罗素的英文精装版！邓晓芒和赵敦华是我同学。我在哈佛也继续读哲学，特别学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课程。

我珍藏的杨端六先生的凯恩斯《通论》1936 年版（配图来源于网络）。这本书就是武



大经济学的历史：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杨端六先生传给哈佛毕业的刘涤源先生，刘先生再传给我。我当然是 1949 年后在美国学宏观经济学的第一个中国人。

武大经济学的带头人都是产权-法治-自由-宪政人。刘道玉老校长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经济学只有武大经济学。我们的老校长天天发声：“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任何学问都不可能做出来。”“苟且者，是可耻的。纵然长命百岁，有一毛线的价值吗？没有！”我敬佩刘道玉老校长一辈子一直发声。他九十岁了，还在呼唤学术自由和独立应该作为大学的校训。刘校长代表了一种抽象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刘校长最强调自由在教育和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我三十五年来时刻按照刘校长的教导做学问、办教育。

### 樱花又一苦劫

樱花开放后遭冰霜袭击乃常见于华盛顿。逢此愚颇伤感，樱花易受骗，中国知识分子犹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本人 1987 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 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到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春光送暖万物欣，

朔风凌冷昨倏行。

樱花含苞欲纵放，

岂非又怕冰再临。

陈寅恪：“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刘校长六十岁之后活得潇洒。很多人到了六十岁才知道如何真爱学术。我的老师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也是六十岁才开始研究发展经济学，他哈佛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大学教英语。刘道玉老校长说：“生命六十始。”我最近一年才相信。我现在六十岁学习/复习历史、哲学、法学和政治学，就像我作为文革后 1977 级 15 岁读武汉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時候一模一样。我每天真是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激情。“生命六十始”：刘道玉老校长说得好啊！我六十岁才开始重新读书、模型化政治哲学和宪法的思想。

“原来邹老师都 60 岁了！印象中一直是您 30 多岁意气奋发时的模样！”我自己也这样感觉呢。现在我的内心比 16 岁还年轻，所以我现在重新当武汉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重新学习西方政治哲学、西方宪法学、西方历史、当代经济学、西方社会学……其实，我们八十岁开始都不迟。任何时候开始学习和研究都不迟。

张培刚、董辅初、杨小凯、邹恒甫都是敢于批判的经济学家。顾准没有这些人的思想，其他经济学人不值得尊重，他们都是奴才。

张培刚先生 1985 年就跟我在哈佛提出私有产权和法治是现代化的根本。1980 年代，董辅初先生也多次说到了改革中国制度的根本。“董辅初：市场经济越发达民营经济越发达”“董辅初：要关注私营经济发展”“董辅初：不保护私人财产就没有市场经济”“董辅初：没有私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1983 年到 2004 年，我每次见到董辅初先生，我们都谈如何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董辅初自 1980 年代到逝世之前一直公开要搞私有制。他过世之前跟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谈话就是强调中国必须以私有产权作为经济基础。一晃他就离开我十九年了。怀念董老师、拉丰和杨小凯，很多年我们四个人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海闻、樊刚、钱颖一、李稻葵……都不敢像董辅初<sup>377</sup>和我一样说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他们何必谈创新企业家精神？全是既得利益者啊！吴敬琏和厉以宁现在根本不敢说话：投机胆小鬼啊。吴敬琏的耻辱是他说他继承了顾准。事实上，他没有学到顾准一丝一毫。看我在此文里是怎么批判陈岱孙，也看我是怎样歌颂顾准。

<sup>378</sup>

我今天才知道厉以宁是共产党员<sup>379</sup>：民主人士掩蔽得很好。吴敬琏和张维迎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当然不敢提出私有化国有企业。杰弗里·萨克斯和我是私有化共产主义经济的先锋，我们都不是党员。我记得当年必修写入党申请书才能毕业。但是我没有写，我还是毕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是私有化国有企业。厉以宁的手稿都是胡说八道。厉以宁是共产党员，他必须为消灭私有制奋斗终身。这是厉以宁、吴敬琏、黄达……不可能真正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出自《共产党宣言》，原句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今天，全世界还有那

<sup>377</sup> 《董辅初：守身为大》见附录 3.2。邹恒甫与董辅初的故事见附录 3.3。

<sup>378</sup> 《邹恒甫：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爱思想，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3044.html>。

<sup>379</sup> 指 2023 年 2 月 27 日左右，厉以宁去世。后面的手稿也是厉以宁去世后公开的。

么多资产阶级，我们自己解放没有？中国的私人企业老板们是不是资产经济？我看中国就没有一个人真读懂了马克思。我在哈佛大学和世界银行参加了中国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方案，我只是没有张扬而已。厉以宁、吴敬琏他们远不如董辅初和我提出来的 privatization（私有化）。你们自己无知无畏到不知道董辅初、邹恒甫、杨小凯和张培刚。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也是跟着张培刚先生起步啊。

张维迎天天反对厉以宁。张维迎还求我去找当时北大书记（我的学弟）闵维方好好谈谈如何把厉以宁搞下台，因为厉以宁不下台，张维迎就当不了正院长。张维迎要当光华正院长，北大校方征求每一个系主任的意见，作为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我坚决反对张维迎当正院长，因为他的学术和人品都太差。闵维方发疯。牛津水货论文博士张维迎不能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他怎么能当院长？他根本不懂数学，他怎么搞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对策论理论？他只能在中国忽悠媒体和官商勾结的黑心企业老板。张维迎从来就不能搞国际学术论文，他连英文写作都没有过关。他折腾国内媒体、跪舔官商勾结的老板、贩卖奥派水货经济学。国内得了牛津博士的（包括余永定）都是水货。此人看得清楚！“一直不能区分张维迎、张维为，一眼掠过。国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和微博热度较高的大体是洋务运动型，在思想人格的锐利程度上都不及甲午之后的维新变法之士，属于甲午海战前鸦片战争后的叹技不如人之流。Celestial（天朝）西用，体面地活出孝道与世道。”

中国学术界搞钱权学色四位一体的人太多太多，我十年前说淫棍太多还远不够。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和董辅初讲座教授九年，我当然知道北京大学有多少淫棍。北京大学还代表北大淫棍们来起诉我。北大还打赢了官司，用事实否定了我说的“北大淫棍太多”呢。

陈岱孙代表了中国哈佛混混第一水平：不发表任何政治观点，不发表任何学术观点，混世魔王。陈岱孙比张培刚差太多。跟杨端六先生比，陈岱孙也什么都不是。陈岱孙一辈子毫无经济学贡献，他一直没有发表学术论文，一直到死也是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典型的人格分裂。林毅夫和李稻葵是活着的人格分裂。孙冶方死前也在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死得糊涂。他的确没有任何经济学贡献。中国经济学的孙冶方奖如果给我，我立即拒绝。中国人搞的经济学奖一定是黑箱操作。为什么国内还没有否定我从1987年就引进的现代经济学？清华经济学一直都一塌糊涂，这种1927年毕业的哈佛混混培养了清华北大混混精神。

李稻葵和钱颖一代表哈佛混混的第二种境界：“高贵”地搞女人、搞权力、搞金钱的地狱混混，钱颖一搞女人搞得头发都没有了。他们二十年不发国际学



术论文，还在国内混。清华养一批这样的狗屎。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书记们校长们院长们天天不搞原创研究，他们手下的奴才更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原创研究。

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最大的差别：中国学者喜欢当官，美国学者最不喜欢当官。中国学者硬是不能坐冷板凳。饶毅、施一公回国本来说是搞学问，他们现在也都当校长，混日子。我知道的回国的人都是为了国内的钱权色。搞生物、物理、数学、计算机、经济学回国的都不是最好的学者。施一公、饶毅、颜宁……太差了。《实名揭发颜宁博士论文撒谎行为与欺骗科学界的手法》已经早在普林斯顿大学手里了，颜宁只能辞职啊。施一公一样也会在中国辞职。颜宁和施一公联合表演节目，全世界看热闹。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有谁爱国。国内权贵及其子女移民美国后，大骂美国一塌糊涂，特爱中国。

“如果不是为了拿个学位，认认真真读书的人也不多。”说的对啊，现在一心一意搞学问的我没有看到三个啊。我的哈佛学弟们现在都跑去政协了。我知道我的哈佛学弟们回国都是为了钱权色。他们根本不搞学问。我的学弟许成钢搞学问，他现在又来了美国。因为美国有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科研、最好的自由、最好的移民……

为什么我一个老经济学人要发声？因为大家在国内都不说话，因为在美国的华人经济学人一个也不发声。一大批说假话和不说话的人才。大家可以看看林毅夫、郎咸平、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郎咸平、张维迎……在世界上的排名。<sup>380</sup>“这个厦大的林伯强在邹教授前面，他强在何处？”林伯强厉害了：他每年发表二十多篇能源方面的论文。中国搞能源的人很快都是世界经济学家的前一百名，因为他们发能源论文的速度大大超过 Shleifer, Acemoglu, Tirole, Heckman, Barro……我自己也不懂最近几年能源一下子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而且中国能源学者把世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镇压下去了。现在中国经济学里面的人论文灌水厉害，因为每年发二十篇能源、金融、农业论文已经有不少人了。可惜这些论文根本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丝毫突破。投机如此严重，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如何跟上世界水平？动不动就是中国经济学，哪里有美国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和日本经济学？自欺欺人。

钱颖一是奴才，林毅夫更是死奴才。林毅夫这些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林毅夫 1990 年的 JPE（关于大跃进饿死人 thirty million）和 1992 年的 AER（关于农村私有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业生产率）。这种水平翻译成中文简直是儿童常识。他那个时候还讲经济学的一些道理。这些年来，他忽悠新结构经济学和有为政府：大跃进和文革都是政府有为。农业集体化也是政府有为。有为政府

<sup>380</sup> <https://ideas.repec.org/top/top.china.html#authors>. Heng-Fu Zou 目前在中国经济学家里排名第三。前两名是美国人魏尚进和能源经济学 Muhammad Shahbaz。

干出来什么东西了？现在林毅夫还敢说大跃进饿死人 thirty million（三千万人）？他敢说农村集体化不好吗？我为什么如此熟悉张维为、司马南、金灿荣、陈平、李稻葵、林毅夫、胡鞍钢、强世功、朱苏力、沈逸……？因为这些人正在重复文革时期红卫兵的一切言论，而我是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历史的倒退太过瘾了。这些人远没有文革时期的人有野心，因为那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消灭所有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我们支持拉非亚一切革命。

我们中国人敢说真话的人极少。我知道的海龟教授们没有一个敢在国内发出不同的声音。民族的悲哀！一个不懂得 liberty and the rule of law 的民族只能如此。这些人还假装在做真正的学术。呸！真话都不敢说的人怎么可能搞真学问？！一群奴才画地为牢，高喊文盲思想。

很多人说我说话太直接、太猛。我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我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新一代人的愚昧简直闻所未闻。你们天天只看媒体和电视……张培刚、董辅初、邹恒甫、杨小凯怎么可能去搞媒体和电视？经济学哪里是一种娱乐节目？新一代人连学术论文都不看？厉以宁、吴敬琏、黄达、陈岱孙……哪里有国际学术论文？二十一世纪了呢。愚蠢的新一代！我是老一辈里年纪小一点的，大家不要在老人面前玩世不恭。福泽谕吉说：“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奴才国都是奴才，没有一人例外。

韩愈：伯夷颂<sup>381</sup>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萃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

<sup>381</sup> 《伯夷颂》是唐代文学家韩愈所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厉以宁、吴敬琏、黄达、江平、茅于軾、陈岱孙都是苟且偷生。厉以宁和吴敬琏都被他们自己的既得私有利益绑架了，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下你们明白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绝对第一：杨端六、张培刚、董辅弼、邹恒甫、杨小凯、陈晓红……武大学派笑傲天下。共和经济学是武大经济学派的最大成就，在恒甫学社里学习后，你们可以傲视天地。

我从1987年开始在中国引进自由市场经济学，我一直用高深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为什么？深入浅出：真正理解了最重要的经济学定理证明，就能看到初级教科书的一切浅薄的错误。更重要的是：那些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混混们根本看不懂西方经济学的定理证明，他们无法乱批判。过瘾！卢卡斯在武汉大学说了：“中国经济学跟国际接轨只需要几个邹恒甫。林毅夫他们一万个也不行。”凯弗斯、萨克斯、巴罗、梯若尔……都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大家可以写信问他们）。他们如此推荐我，我在全世界很容易找到工作。

我办学从武汉大学到中山大学再到北京大学，以农村包围城市。利用北京大学之后，我再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办学，以城市进一步带动农村。中国当代经济学原版教材教育就这样形成了。199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引进当代高级经济学教材，绝大部分教师反对我，有些人还要杀我呢，被多数人骂是正常现象。我也喜欢微博上的人骂我，你们不要在意。他们跟着我学习得越多，他们会越感到无知。

我在北京大学的九年（1998-2007）才把中国现代高级经济学的普及教育搞定。1998年张维迎、闵维方、厉以宁请我去北大当董辅弼讲座教授啊：我在北大表扬张维迎：“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厉害多了的我来北大！我让林毅夫、易纲、海闻、刘伟这些人失业，因为他们都不能教高级宏观、高级微观、高级金融、高级计量。”学生们兴奋得要死：掌声雷动！北京大学的招牌厉害。北大一改变，清华和人大必须跟风。在中央财经大学十七年，我把中财的学术水平提高了至少一百倍。这样才过瘾！我在中山大学、浙大、复旦、深圳大学办经济学班一样有成就感。

我家里三层楼都摆满了书，这些是我在一个小房间里最近一年最常用的书<sup>382</sup>。我捐给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英文书比这些多五十倍。感谢世界银行出航空快递费用啊。没有世界银行的条件，我怎么能在中国办学三十多年？现在我的学生们很多在世界银行和 IMF，他们用自己的钱给武大买书吗？他们连论文都不发表。天天吹自己爱国的人给中国做了什么？自己拿出来几十万美元办学了吗？自己买了几十万美元的书给母校了吗？胡适：“爱国很容易，只需要付出口水，爱别人太难，那是要付出行动的。”在毛泽东年代成长，我还是学到了雷锋精神。西方经济学里的社会福利函数就是雷锋精神啊。中国人哪里懂得了西方经济学？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特别推崇慈善，欧美私人慈善机构最发达。中国呢？现在中国人学到了资本主义精神，还天天搞共产主义精神。



邹恒甫的批判精神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邹恒甫年轻时有多狂。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sup>382</sup> 我选择了一张好看的照片——编者注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 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sup>383</sup>

邹恒甫不狂，中国经济学教育怎么会改变？我现在六十岁了，我重新读本科，好好写政治哲学和宪法学的经济学模型。现在没有一个狂人，中国经济学怎么可能研究真正的大问题？钱颖一和李稻葵二十年不写国际学术论文。他们的老论文也没有摸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门。

我在国内狂？No！我在世界银行才是真正的狂！作为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的公务员，我跟中国国内各级政府都只说真话，我从来没有停止发声。我从1983年来美国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我的中国国籍。我记得当时世界银行行长是美国人佐立克，他亲自雇佣林毅夫当副行长，因为林毅夫是一个听话的奴才，而且什么都不懂。我在世界银行电梯里当着佐立克骂他是 asshole（蠢货）。中国的官本位移植来美国？What a shame！（真无耻）行长算个鬼。佐立克和林毅夫都是政治任命的，四年之后滚蛋。我是 emperor 希望的“终身制”。国内还有蠢货崇拜世界银行的行长。

我佩服张益唐。1985年，张益唐从北京大学数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普度大学攻读博士，他完成学业以后的经历非常坎坷。他以数学博士的身份做过快餐店会计、送过外卖，甚至住进过汽车里，90年代末才好不容易获得到一所普通大学当讲师的机会，14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3年5月。他的一篇部分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论文横空出世，成为最近这些年数论领域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张寿武：我觉得他的故事比我想的很多人的故事都要精彩，比陈景润要精彩，比我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叫 John Nash，我想张益唐的故事比他们俩都要精彩。这是不可以复制的一个现象。

张益唐这样挖苦潘承彪和北大过瘾。“我特别感谢在北大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有今天在座我的硕士生时期的导师潘承彪教授，我大学四年级教授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我大学四年级教授过我的张恭庆院士，感谢北大，感谢北大的每一位老师。我会记住这一天，希望今后我做科学的道路上，自己也能经常体会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受”北大天天吹捧自己，好像北大培养了张益唐。不要脸。北大又没有人能看懂张益唐的论文。张益唐跟北大讲有什么用？

<sup>383</sup> 《邹恒甫：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2771.html>。

山东大学也没有人能看懂张益唐的论文；彭实戈更是完全不懂张益唐的论文，献丑献丑啊。中国无人能懂，张益唐照样讲他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外人看来，张益唐穷困潦倒。有朋友建议他像其他数学系毕业生一样，转金融和计算机，这样更容易找工作，张益唐不愿意。但一位朋友邀他去连锁餐饮赛百味管账时他就同意了。‘那只是一种谋生，这不一样。’他努力强调。哪怕是慢行，他也不愿改变方向。从大学起，他就树立了证明黎曼假设的雄心，埋头于一个数学问题，数十年如一日。现在，这个古典的人，和他古典式的努力，或许终于要得到一点回应了。”<sup>384</sup>张益唐的选择才是中国发论文的最高标准。可惜国内学者没有一个醒过来了。张益唐早已经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怎么还不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呢？

张益唐是研究数学的最好例子。丘成桐瞎折腾那么多人研究数学，真是误国误民。我们中国人搞洋跃进已经闻名世界两百年，就是不知道如何搞出来原创研究。张益唐之所以搞出来原创研究，因为他是美国人，因为他这个美国人是在美国。

丘成桐是哈佛数学家历史上摸钱摸名最厉害的人。这不是光彩的事。我在哈佛时，他就成了摸钱摸名的笑话。丘成桐在美国当数学“皇帝”这个称号是美国数学界对丘成桐虚荣心的鄙视。欧美国家不会尊敬“皇帝”。很多中国人以为“皇帝”体现了一种“伟大”。我和很多华人在美国为丘成桐获得美国数学界“皇帝”外号感到遗憾。当然，陈省身为华人带来了伟大荣耀。丘成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之后，国际数学界说：丘成桐只是证明了一个猜想，他没有发明这个猜想。但丘成桐得意忘形地以为他比卡拉比还伟大。我是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定义谁更伟大：想象力。庞加莱仅仅提出这一个猜想就比佩尔曼伟大，我不用谈庞加莱极其全面的贡献。张益唐已经搞得丘成桐和田刚无地自容了。

张益唐还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他绝对不改变他为中国自由民主奋斗的初心。张益唐：“第一，我不是民联很早的成员，不算太早，1989年那时加入的；第二，我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我的政治理念不会改变，也不会因为大陆不管是捧我还是怎么对我，我的基本理念不会改变。至于具体参与，因为现在我也很长时间没参与了，我想将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参与。还是好好去做数学。”张益唐洗碗是为了自由宪政，他本来可以去硅谷加入资本家集团。国内人不可能理解胸有大志的张益唐啊：自由高于数学、数学高于财产。

张益唐是有伟大信念的人，李政道也一样。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担任燕京

<sup>384</sup> 《张益唐：一个古典的人和他的古典式努力》，上观新闻，<https://www.ifdaily.com/wx/detail.do?id=548173>。

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只要不搞洗脑以及反右和文革，中国科技人才都会回中国的。民国有 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由），但是民国的学者他们在经济学、哲学、历史……都没有在国外发论文。理科的估计好一点点。现在新一代海龟远超民国的学术，但回国就没有 academic freedom。民国时期的学术落后世界前沿学术一百年。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如此好的生活条件，只要好学，我们完全可以在古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研究领域赶上欧美水平。

杨振宁的品德之差，李政道知道得最清楚。李政道的品德是华人里最高尚的。1990 年代杨振宁给王淦昌的一封信暴露了杨振宁最无耻的嘴脸。“附上我最近收到的一封信与附件。我不拟理他们。K. C. Hsieh 我不知是何人，他们之中有所鄙视的方励之，也有一些不明真相，误把中国的‘人权问题’与苏联当初不放犹太人去美国等同起来的人。总之他们被利用来叫嚣，制造不利中国的空气。先生最近参与签字事，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国际大势我们都很清楚，先生的签字被利用来制造不利中国十二亿人民的事也许不是先生当初所料到的。这是严重的事，是我认为极不幸的事。”

孔子一辈子述而不作，他承认他自己没有思想。后来的中国人当然毫无思想。现在美国人张益唐在数学领域终于贡献了两点思想。张益唐的国际名声远超过了杨振宁和丘成桐。祝贺张益唐！

## 附录 3.1

邹恒甫接受过一点人物采访。

《邹恒甫：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2005 年，南方人物周刊，<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2771.html>。

《张狂邹恒甫》，2009 年，新浪网，<https://news.sina.cn/sa/2009-01-12/detail-ikftssap3100490.d.html>。

这里节选一些内容，更多的内容可以读《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

“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我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包括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对于他传奇的学术身份，邹恒甫说得非常淡然。他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从小就成绩骄人：“我的中学不是华容一中，而是五中，一个阶段的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自尊心才是做事业最重要的动力”。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一再打电话请求刘道玉先生去教育部

通融。“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吴纪先说“不能埋没人才”，其时甚至以“辞去系主任”作“要挟”。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并于1947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吴先生深知高起点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刘道玉由此几经周折，辗转通过熟人，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来为邹恒甫的留学据理力争，使得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得以“成行”。“他人很聪明，同时又很用功，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听文、史、哲的课。涉猎广泛”，刘道玉先生回忆邹恒甫在武大上课时的情景说。在哈佛大学，邹恒甫没有辜负吴老师和刘道玉校长，他继续武大时游学的习惯，在各个学院间选课修习，并且能够顺利攻克语言关。

而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动力，林毅夫对邹恒甫的评价是：“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作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应该充分懂得自己措词的份量，对于邹恒甫的褒贬他在用自己的学术信誉作担保，但对邹恒甫的夸赞，他很大方：“邹教授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教育实干家。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目前邹教授所引领的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本科项目。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如果说命运曾经垂青这个长得虎头虎脑，顶着一头卷发的年轻人，那他没有辜负命运对他的垂青；如果他的老师、学校对他充满期待，邹恒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自己写100篇文章，不如让100个学生各写1篇文章”，邹恒甫说做教育是自己最激情的事情，“会让我睡不着觉”。

1988年，邹恒甫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就职于世界银行，1990年，他归国省亲回到武汉大学。“当时看到同学还是用二十年前的经济学教材，他就认为这个状况一定要改”，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回忆当年邹恒甫一箱、一箱地从美国带回经济学经典教材，并且希望同学能够学习英文原版。“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的适应力”，他说自己当年在哈佛就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能赶上进程。

“当年我是一张纸，一张桌子把武大的IAS创办起来的”。而他的朋友有时会戏谑“抓去做了壮丁，剥削了劳力”。对于这类声讨，邹恒甫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全单应承下来。“那是没错，当年我就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来给我上课，而且是免费的，就连差旅费都是他们自掏腰包”，邹恒甫称唯一



给过陈志武 500 元，因为考虑到当年陈志武先生过来上课时是带着家眷。

“当时我请前美联储主席来武大讲课，武汉市政府都觉得很哄动，以为请来这么牛的人来武汉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邹恒甫却认为学术不分贵贱：“他们给中国学子上课还能看武汉的樱花，去珞珈山跑步，都非常高兴呢”。“只要你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邹恒甫称。

“有记者 1994 年说要写我，但 10 多年过去了，还不能成稿，写我不容易，”邹恒甫得意地大笑，他喜欢自己成为一个难题，看人皱眉苦思。但他又是大方磊落的：“你如果要了解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设个位置，每天带你的手提电脑来上班就好了。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要为人讲述一个准确的邹恒甫，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从小喜欢随身将书装在口袋，没事就翻看；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里充满矛盾。喜欢时，他会像个孩子，与你不设防地推心置腹；但对于意见相左者，他却变得好斗，像古战场的士兵非要争得一个有你无我的结果。他喜欢高贵，特别欣赏中世纪宫廷贵族的气息，他也不乏平和，甚至希望以后有机会做农场主。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确定，他鲜明，会明白地告诉你自己的喜好。这种坦承在时下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点，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的是会意。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个性要么是让人爱，要么是招人恨，没有中间路线。

说到什么人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讲了一个自己在哈佛时所经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 Serge Lang，也就是在电影《美丽的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这是一个极端仇视支持越南战争的人。为了不让越战支持者亨廷顿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Serge Lang 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在课堂内外，他整理了一千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并且把他的一千多页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我有幸得到两本，因为我选了他两门数学课”。课堂里，Serge Lang 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课后，他就在 MIT，波士顿大学到处讲座批判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这样一来，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跟踪而至，闹得哈佛不得安宁，而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都知道亨廷顿的逻辑错误。于是，亨廷顿至今未当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邹恒甫在讲这个故事时，双手翻腾，兴奋得额头冒出毛毛汗，他如此用情地讲 Serge Lang 的故事，或许也是在说一个美国版的自己。

说到与人的纷争，邹恒甫还是那副“我心昭然”，任人评说的姿态。但据他身边的人说：偶尔在酒醉后，邹恒甫会一改嘻笑怒骂的神情，变得凝重，高声呼出一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 附录 3.2

### 董辅初：守身为大

1946 我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其他课程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惟独记得国文的作文试题为“守身为大说”，我用文言文写了这篇作文。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以后，虽然我没有把这个试题作为座右铭，但是我一直铭记至今，而且常常想起，以鞭策自己。我的旧学底子不厚，不知道“守身为大”是否出自某古典籍，但在古籍中类似的警句、格言是不少的。“守身为大”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坚守自身的节操是最重要的。

“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争，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记得，临近解放前，斗争异常残酷，地下党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要求我们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作为地下党员这就是“守身为大”的具体内涵。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守身为大”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否顶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成为能否“守身”的一个重要要求。但那时实行计划经济，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受到严格控制，以及许多商品的实物定量分配，因此，货币的功能有限，主要是计算的筹码，“糖衣炮弹”的袭击较易抵挡，“守身”的问题虽然仍很重要，但较容易。在转向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货币的功能大为扩大，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货币几乎可以买到一切。而且任何权力(政府官员的、公司老板和高级职员、事业单位的领导的，等等)都可转换成金钱。连学术职称也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于是，权力、地位、名誉，等等都与金钱挂上了钩，可以转换为金钱，而金钱也可以转换成权力(如买官)、地位、名誉等。当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官员经不住金钱、权力、地位、美色的诱惑，堕落成为罪人，既令人愤恨，也令人痛心。其实，类似情况不仅发生在政府部门，而且发生在各行各业。连一向被认为清高的学术界也不是净土，为了追逐金钱、名誉、地位，有些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相互吹捧拉拢，四处拉关系甚至花钱“拉选票”争项目、争职称、争头衔、争名次。据说，有人为了获得资助丰厚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先用各种办法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然后用银行贷款去做争取项目的“活动”，在拿到项目后，再用项目提成(规定项目执行方有提成)的一部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不仅如此，个人的各种消费也都可以学术活动所需而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又如，有人为了评上教授职称，在提交的学术成果中，竟然列上谎称将在某出版社出版的子虚乌有的“学术著作”。

这当然不是说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本身就是罪恶的、肮脏的。它们之所以成为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逐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存在和运行的制度和环境

有严重缺陷，这些制度和环境例如有：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环境、社会监督的制度和环境、教育的制度和环境、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环境，等等。正是在这些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制度和环境下，提倡“守身为大”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人是否为了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而干出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固然与有关的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有关系，但与其自己是否能“守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同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毕竟有更多的人坚持“守身为大”，没有陷入污泥浊水。而且即使在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下，也会有人因为不注意“守身”而干出犯罪或不道德的行为。

上面谈的只是有关反腐败方面的“守身为大”问题，实际上“守身为大”的内容远不限于此。例如为官者能否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就是一个内容。前几年粮食政策有误，使国家和农民受到损失，地方政府难以实行。由于有些官员反映了政策实施中的真实情况而丢了官，有些官员就不敢讲真话了，致使决策部门未能及时纠正政策。这些官员就没有作到“守身为大”，坚守为官者应有的节操。又如，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类情况，即原来为推进改革而曾站在理论前列的一些人，屈服于压力，做了检讨和自我批判，从而获得高升的报赏。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遵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

“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前所述，造成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违法违纪地去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名誉，有着有关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的原因，要去除这方面的原因，但靠个人“保身”，不同流合污是远远不够的。固然改变和完善制度和环境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所能作到的，但是只管自己“明哲保身”，不努力从自身力所能及的方面去推进改革、完善这些制度(例如，监督官员的行为)，未必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制度和环境改善了，个人的“守身”也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不仅如此，既然只是提倡“保身”，有些人就可以

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以求自保。这与“守身”根本不同。这样的“保身”结果不是“守了身”，而是“失了身”。所以把“守身为大”消极地理解为“明哲保身”、是不对的。

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

2004年4月25日

### 附录 3.3<sup>385</sup>

记者：邹教授，您和董辅弼先生的深厚友谊外界早有传闻，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董辅弼先生的？他最初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邹恒甫：1978年，董老师到我就读的武汉大学作一场学术报告，我听了他的报告后，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人与别的人不一样，有思想，很了不起。我在那个学术报告上第一次听董老师讲了许多新奇的理论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谈论社会主义的利润，不能谈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而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如此离经叛道的学术观点是要冒巨大的政治和学术风险的。对于那个时代，那是多么伟大的思想！

他给我的印象是有雄辩的口才，有鲜明的思想，有学者的风度，是很征服人的教授。他当时对我们年轻人讲了三句印象深刻的话，令我至今不忘。他说：“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

记者：邹教授，我们了解到，您从哈佛回来后，才真正开始了同董辅弼先生的学术交往，你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您能为我们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邹恒甫：1987年我从哈佛回来，带着西方经济学回到武大，回到中国，我那时年轻癫狂，目中无人。我认为当时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新不旧，我走在他们的前面已经很远，他们在我的后面爬行。我甚至在董老师和曾启贤老师面前说些让他们难受的话。我提出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盘重新思考。董老师却以非常平易的态度对待我，认真听我高谈阔论，在老师看来，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好评价的。他们还不断地鼓励我多思考，充分表现出了大学者的高风亮节。我后来才知道，老师的那种胸怀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董老师那时才57岁，名声显赫，风光无限，能有那样谦和的胸怀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越往前走，越令我感动不已。这个时期，谭崇台和张培刚老师也给了我

<sup>385</sup> 节选自《邹恒甫教授激情讲述与董辅弼有关的故事》，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812/1447944502.shtml>。

很多关怀

1994年，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董老师一开始就对我要做的事情全力支持并倾注了很多心血。中心的第一台空调就是董老师捐钱买的，那时的空调是很贵的，一台要8000多元人民币。董老师还号召他的学生们都来支持我，鼓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给中心捐钱。董老师在有很多领导参加的中心揭牌仪式上说了这样的话：“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董老师的话在当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震撼心灵，终身难忘。

记者：您和董辅初先生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珍贵的友谊，他虚怀若谷，奖掖后学，乐意助人，您还能为我们讲述更多的关于他的故事吗？

邹恒甫：在那时，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高手，但他从不以老师、专家自居。与他谈话很轻松，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说：“恒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由于我了解一些世界经济学前沿的知识，当时从国外带回了一些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有很先进的教材，我把这些资料都送给董老师。董老师态度谦虚，总想着别人。这些书籍看过后，他希望通过我送给新一代的人，他总是说，这些东西不能浪费了。他把那些国外最好的论文和教材都留给了后一代人。

我在国内创办了第一份全英文版的《经济金融年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董老师发表讲话：“我在中国社科院任经济所所长的時候，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一份这样的刊物，我没有办成，邹恒甫现在办成了。”如此谦虚的胸怀，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汗颜。

# 第四章

## 当代经济学

## 第一节

# 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

我是一个热衷于模型（包括对策论模型）和新的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

——杨小凯

杨小凯的数学太差了。他模型化哈耶克白日做梦。他自己模型的均衡存在性都需要周林帮忙，而周林又不懂经济学和杨小凯的专业。我比杨小凯的学问大太多了！

没有数学模型的奥地利经济学只能让人瞎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分散的知识和非国家化货币的思想非常好。但是他没有模型化这种思想的能力，太遗憾。我已经模型化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但我的模型结果一点都不漂亮：Anything goes. 数学证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不知道发散到哪种制度去呢。所以外国人猛烈攻击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分散知识理论是他唯一的贡献，大家应该用数学模型化他的分散知识。卢卡斯(JET, 1972)正是用哈耶克(AER, 1948)的分散知识来证明货币中性

理论。哈耶克本人和新奥派完全不懂卢卡斯的 Two-island model。卢卡斯的这个模型才粉碎了凯恩斯，哈耶克哪里能驳倒凯恩斯啊。货币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都是无穷维空间的模型。Lucas and Prescott 的 IER 论文建立了无穷维空间的存在性证明之后，他们就批判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哈耶克、罗斯巴德……都是浪费时间和纸笔。哈耶克没有建立数学模型批判凯恩斯，现在新一代经济学都不知道哈耶克在说什么。而凯恩斯的错误的经济学因为有数学模型，照样特别吸引全世界的酷爱政府干预的大批经济学家，特别是哈佛、MIT、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

哈耶克在出版几本书（《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价格和生产》、《利润、利息和投资》、《资本的纯理论》）之后完全无法跟上萨缪尔森、兰格、弗里德曼、菲尔普斯、卢卡斯……跟不上可以原谅，奥派经济学反过来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奥派自不量力，可怜可笑。在哈佛经济系，熊彼特死命想搞懂萨缪尔森的极为简单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他的数学太差（大家可以看看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介绍萨缪尔森的经济周期模型）。他跟不上萨缪尔森就被萨缪尔森一代哈佛新人物嘲笑。哈耶克的数学水平还远不如熊彼特呢。当然，卢卡斯这一代新人物在 1970 年代就死命嘲笑萨缪尔森那一代也是自然的。1980 年代以来，卢卡斯、菲尔普斯、萨金特、巴罗……全面胜利。

卢卡斯的两本论文集要放在床头。哈耶克的书随便看看。哈佛大学和 MIT 为什么总给卢卡斯出书？因为卢卡斯真正的博士导师是哈佛大学的伟大的 Dale Jorgenson（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只教了一年书，卢卡斯当然知道弗里德曼数学水差。在哈佛和 MIT 都反对卢卡斯时，Jorgenson 让卢卡斯来哈佛当教授啊。尽管卢卡斯没有来哈佛，他的女人却是哈佛经济学博士 Stokey。看卢卡斯的论文让我崇拜他的知识面和英文写作，更不用说他的深刻思想。卢卡斯的经济和金融论文每一篇都是经典，而且他不炒现饭。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人超过他的综合水平（政治、历史、经济、文学、英文写作）。他是学历史出身。厉害！经济增长和发展他也是世界第一。贝克尔的经济学论文思想也极为丰富，他的数学模型都很简单。他是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大师。我每天都看他和卢卡斯的论文。

“邹老师怕是跳脱不出没有数学模型就没有思想的方法论桎梏了，这是芝加哥学派永远的短板。”芝加哥学派非常会模型化思想！看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卢卡斯……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这些奥派不会模型化他们的思想。天大的遗憾。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模型就不要搞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了。张维迎根本不懂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他怎么折腾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分散性知识的动态分析？“既然数学模型那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找数学家合作吗？”数学家懂鬼。那些从数学专业改过来学经济学的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给卢卡斯他们补充技术细节。卢卡斯不需要这些人！我们要创立自己的独特模型。我的自由资本积累模型不需要数学家帮忙。

国内搞奥派经济学的瞎折腾。我在 1980 年代就最喜欢看奥派经济学。没有跟上卢卡斯，怎么发展奥派经济学？张维迎看不懂卢卡斯一篇论文。他只能自杀。国内现在搞奥派经济学和科尔奈经济学的人都是数学模型能力差的。悲剧！不过在欧美最好的大学，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人也都不是数学模型能力特强的人。同样，欧美一流大学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人都是水货垃圾，他们根本不在基础模型上下功夫，最多搞点统计数据和回归。悲剧。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本来应该是由奥地利学派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他们提出，但他们本人的数学模型能力太差。在哈佛读书，我用科尔奈的思想写了两篇论文：1. 短缺和投资周期的模型；2. 投机饥饿症和政治投资周期。科尔奈在哈佛问我这种动态优化模型是从哪里学的？我回答：“这是我们研究生一年级必修课。”他本人是数学出身，他后来在哈佛根本不学动态优化、动态规划和动力系统。遗憾啊。马丁·菲尔德斯斯坦也是一样不学动力系统，我笑他：“课堂就在二楼啊！”科尔奈自己还是折腾了线性规划模型，不错了。他没有继续学 1970 年代美国合理预期革命后的动态规划、动态优化和动力系统。多少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被淘汰出局了。

今天的经济学比 1980 年代的经济学差太多了，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学都不搞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瓦尔拉斯的简单模型到 Arrow-Debreu 微观经济学模型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飞跃，而奥地利经济学完全没有跟上这一飞跃。1970 年代，Arrow-Debreu 一般均衡模型再全面挺进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这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看懂的。经济学 Arrow-Debreu 定理只是证明 Walras 的一般均衡存在的猜想，因此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贡献远超 Arrow 和 Debreu（请看熊彼特对瓦尔拉斯的评价）。当然，Arrow 和 Debreu 他们还有其它巨大贡献，这些都在一般均衡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谦虚地学好一般均衡理论。实分析和拓扑学是基本的数学技能。张维迎和林毅夫他们根本不懂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他们更不知道 S-M-D 定理的证明和意义。但是我不可能在这里讲基本的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大家很容易把这些知识学会。大家也很容易学懂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宪法学。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张维迎没有搞懂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他有一本书名叫《市场的逻辑》。市场哪里有逻辑啊？微观经济学里关于交换经济里的 Aggregate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是没有逻辑的：Anything goes！当价格上升（下降）时，总量需求下降（上升）吗？理论证明的结果是不知道。当

价格上升时，总量需求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这是经济学从 1970 年代以来的最大困境。我一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的书名就知道他没有学懂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张五常也一样不懂 S-M-D theorem，所以他的书里错误太多。

“邹教授，您如何评价张五常的学术水平？”怎么评价张五常？张五常有一点思想，他的制度分析有点意义，可他的数学是高中微积分。他根本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整体状况，为什么我们要看他的书呢？看他的东西干什么？你要看英文论文和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张五常还有市场？都二十一世纪了。现在我们翻译了几万种国外的各种书籍啊。鲁迅说了：不看中国人的书。看张五常的经济学解析更是没有意义，张五常根本不理解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的这个定理。

The Sonnenschein - Mantel - Debreu theorem is an important result concerning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proved by Gérard Debreu, Rolf Mantel [es], and Hugo F. Sonnenschein in the 1970s. It states that the excess demand curve for a market populated with utility-maximizing rational agents can take the shape of any function that is continuous, homogeneous of degree zero, and in accord with Walras's law. This implies that market processes will not necessarily reach a unique and stable equilibrium point, because the excess demand curve need not be downward-sloping. (Sonnenschein - Mantel - Debreu 定理是关于需求函数的一个重要结论，由 Gérard Debreu、Rolf Mantel 和 Hugo F. Sonnenschei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证明。它指出，在一个由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主体构成的市场中，需求曲线的形状可以是任意连续的、同质的函数，并且符合瓦尔拉斯定律。这意味着，市场过程不一定会达到一个独特和稳定的平衡点，因为需求曲线不一定是向下倾斜的。)搞懂了这个定理就知道微观经济学没有科学基础（逻辑和规律）。这是对经济学的毁灭性打击。所以我们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里基本上是举特例来建立一些特殊结果，因为一般的结果（逻辑和规律）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发生。

This means that demand curves may take on highly irregular shapes, even if all individual agents in the market are perfectly rational. In contrast with usual assumptions, the quantity demanded of a commodity may not decrease when the price increases. Frank Hahn regarded the theorem as a dangerous critique of mainstrea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这意味着需求曲线可能呈现出高度不规则的形状，即使市场中的所有个体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与通常的假设相反，当价格上

涨时，对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可能不会减少。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认为这个定理是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危险批判。)最近麦卡锡当选了，共和党内部极端保守派也赢了。全票通过怎么如此难得出现？这其实是经济学超额需求函数没有规律的本质：每一个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加总后的需求函数没有规律(逻辑)。选举不过是政治市场投票而已啊！事实上，S-M-D 定理表明经济周期、极限环、混沌、不定性(indeterminacy)、泡沫、股市崩盘……都是理性经济人的最优选择。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利息市场……的需求-供给都服从 S-M-D 定理：anything goes (没有规律和逻辑)。所以，市场的逻辑不存在。所以，经济学根本不是科学。

一定要学懂 Mas-Colell, Whinston and Green 的哈佛教材我们才能知道经济学根本不是科学。我们可以用特例讲故事，但我们不能给出规律。现在大家一定知道我 1990 年代在武汉大学办数理经济学班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学生学习 M-W-G, 极少人真正看懂了这本两年四个学期的教材。我本人感谢 Mantel and Mas-Colell 教我学会了 S-M-D 定理。Mantel 在阿根廷建立了经济学教育的伟业，他跟我一样办了一个 CEMA!

好好看懂 Mas-Colell 哈佛教材里关于 Market excess demand functions 的章节。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几个人理解这一定理和它的意义。那些讲初级、中级经济学的人都是在欺骗一、二年级本科生。钱颖一给学生讲西方初级经济学最误人子弟，因为初级西方经济学里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真搞懂西方经济学必须先学 Mas-Colell 他们的高级教材，而钱颖一根本没有学懂 Mas-Colell。投机混混怎么可能坐冷板凳去真正搞一辈子学问？我的哈佛学弟钱颖一 20 年来不写经济学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他还好意思抛头露面当新闻媒体人。他数学专业毕业不好好搞数学，投机于经济学，回国后天天在官场和商场混。他不懂中西历史、西方法学、西方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他也根本不懂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钱颖一连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的门都没有进，他完全不懂卢卡斯和萨金特的高级宏观教材和论文。不懂卢卡斯，他怎么知道初级宏观经济学里的错误？我的哈佛中国学弟们只知道搞找轨(找鬼)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不务正业。如果林毅夫的论文里有微分方程，那篇论文一定是他的学生为了得到林毅夫的钱帮毅夫写的。魏尚进也是这种水货。林毅夫本性一样，从 1987 年以来他一直在改变他的政治观点，逢场作戏。他根本不是一个搞学问的。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林毅夫、周黎安……他们的研究论文也全成了历史垃圾。我知道学经济学的大专家们都没有几个人真搞懂了 S-M-D theorem, 请看 Mas-Colell, Whinston and Green 1995 年哈佛教材。

学懂了这个定理，我们就不会再谈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法律的逻辑……这个定理没有搞懂的人根本不应该搞经济学。我们真正学懂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没有几个人学懂了。张维迎和林毅夫就完全没有学懂。我的哈佛硕士和博士文凭都是我的老朋友 Michael Spence 当院长时的签字。他 2000 年得经济学诺奖，当时的校长是 Derek Bok。好好看看 Michael Spence 为什么和 Duesenberry 一样把收入放进个人效用函数：收入作为社会地位的 signal。当 Michael Spence 和 Dusenberry 把收入放进个人效用函数，所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定理都全部改变。有了 Duesenberry-Spence 效用函数，自由贸易的基本定理都不成立。Slutsky Equation<sup>386</sup>里的收入效应让总量需求函数没有规律。定理：如果让价格和收入直接进入个人的效用函数，Slutsky equation 也不存在。引理：当价格和收入在效用函数里时，个人的需求函数也没有规律。所以，经济学教科书只是教我们学会做研究的一些特例。学懂了 S-M-D 定理，我们就不会争论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sup>387</sup>再次证明：经济和金融没有逻辑和规律。

“邹老师，那您觉得 DSGE 模型有前途吗？尤其是那种 representative agent 模型。如果个人的需求没有规律，那怎么加总呢？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不是也站不住脚？”正是因为 S-M-D 定理表明了一般的、异质的、多个体的微观和宏观模型不可能有任何规律，我们在宏观经济学（包括资产定价理论）里只好采用 representative agent 说明一些特殊结果。这些结果绝对不是规律。在 OLG 模型里，a representative agent 的理性选择特容易出现：anything goes. 不同偏好的两种人的宏观模型和资产定价模型就可以出现 anything goes.

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学懂当代高级宏观经济学，我们更没有几个人真正搞懂市场超额需求函数的 S-M-D 定理。我们为什么天天喊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来自于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记住：我们搞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数学家在今天会感到无力帮助世界。其实，经济学家也一样。经济学因为没有直接模型化政治制度、法律、社会等重要因素，它完全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学科。经济学的基础是私有产权、法治、自由和权力制衡的宪政。经济学的模型和回归分析必须紧密结合政治、社会、法律和历史。宏观和微观一般均衡模型里基本上没有私有产权、法治和自由，我们怎么讨论经济与政治和法律的巨大联系？我们中国经济学人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期刊上死命投机发论文，大家搞清楚中国制度和欧美国家的制度差别

---

<sup>386</sup>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lutsky\\_equation](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lutsky_equation)。

<sup>387</sup> 张维迎和林毅夫曾公开争论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谁对谁错的问题。

了吗？中国全能治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型来刻画吗？不能。

那些搞回归分析的人哪里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鬼游戏啊？！引理：根据 S-M-D 定理，统计回归分析没有必要。Anything goes：要什么回归系数，数据都可以给出来。周黎安他们根本没有管这个定理。国外 top 5 期刊一样是装着不知道这个著名定理，继续混饭吃。这些统计分析本身就是天大的笑话！这就像持枪率和犯罪率的统计分析一样无聊。人的行为的理论本身并不能推导出来持枪率和犯罪率之间的简单关系啊！经济学就是如此荒唐。美国经济学 top 5 的论文就是如此胡闹。哈耶克需要统计分析吗？不需要。REStud 在英国，它的编辑们基本上是美国白左培养的。

如果经济学论文没有自己原创性的模型，我们何必去做？如果没有原创性模型，回归分析根本没有丝毫意义，因为统计回归不是科学。没有数学理论模型，我们就不知道因变量和自变量是怎么决定的。周黎安他们荒唐地用回归分析来说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带动了中国教育普及和发展，他们更应该利用杨小凯在岳阳建新农场坐牢学到了一点微积分皮毛来证明文革把教授们送到岳阳建新农场劳动好得很。

这种垃圾经济学家用几个数据和回归分析重新发现史学家的东西：“Daron Acemoglu 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威胁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治崛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专注于此领域的历史学家 Vanda Wilcox 博士就此文的主要结论提出了严重质疑：经济学家阅读史学一定是违法的吧。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假装认为，这种陈旧古老的史学解释在 2022 年的经济学中还是全新的发现。

Karthik Sankaran：我很遗憾地通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保罗在大约 50 年前就已经垄断了这个市场。

Nikolai Santos Alvarado：请有人告诉经济学家停止窃取其他领域的发现，并将它们重新命名为‘经济学类东西’。没有人会因为认识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存在，而降低了你的存在感，他们也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Quentin：有趣……但实际上，很多社会理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给出了这种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解释，比如 Antonio Gramsci 和 Karl Polanyi。这些经济学家是在重新发明轮子吗？

Mikaeru：恕我直言，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过去的 60 多年里，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教授它，请阅读 Paul Corner、Eric Hobsbawm 或 Raymond Aron 等人的作品。”<sup>388</sup>

<sup>388</sup> 《Acemoglu, 22 年 QJE 文章被史学家爆炸了!》，微信公众号，计量经济圈，<https://mp.weixin.qq.com/s/2Dclclo6f5sgQLozH65n2A>。

“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库兹涅茨曲线就是通过统计回归获得的，那个也是骗人的吧？”库兹涅茨曲线是猜想。后来有些理论模型证明它是正确的，有些理论模型证明它是错误的。

从1989年我加入世界银行以来，我做了三十多年统计回归分析骗人。世界上玩统计回归分析的经济学家都是骗子。这是马丁·菲尔德斯斯坦上课说的：回归分析的系数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啊！我的回归分析都是有理论模型的。论文发表时有些期刊主编要我把理论模型删除，我知道主编邪门。我的研究让我独立于期刊之外了。跟着期刊走是一条死路：我们必须跟着主编的邪路爬行。我只喜欢创新和造反。我的哈佛导师 Richard Caves 说过：期刊上有了的都是别人做了的，你不要去做了。他一辈子创新了很多领域。我自己的研究从来不跟着期刊走。

中国人在国内外搞经济学的人都没有思想，提不出来能被国际上接受的理论模型。我们基本上是跟着外国人后面补充他们的理论细节和统计回归细节。我们也写不出来中国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混合运行的理论模型。

洪永淼<sup>389</sup>带头在国内搞统计回归分析和大数据就是不懂经济学理论的瞎折腾。洪永淼有一个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吗？汪寿阳<sup>390</sup>更不知道经济学理论是什么。尤其是这些人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数据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回归方程分析，笑死全世界人民！清华经管的陆毅<sup>391</sup>也是这种搞回归分析的混混。清华经管没有一个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经济学家。钱颖一在美国做中国经济，他在中国瞎侃美国经济。他既不懂中国，更不懂美国。钱颖一研究中国经济。他不回中国在美国怎么忽悠？谢宇<sup>392</sup>不回中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不会给他好日子过。他在美国研究中国本来就是水货。他的院士头衔更是水货。这种统计回归分析论文怎么是科学呢？哈哈。Tenure（终身教职）算个屁。美国现在反共反华。这些人本来就是共产党员啊。很多这样的人都没有诚实地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们在美国怎么过？TENURE？美国的 tenure？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何来 tenure？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工程经济学和统计回归。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四十多年来的现状。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根本。经济学可不是统计回归分析的狗屎玩意儿。政治学、法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小说和诗歌都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我们尽量多了解一些共和国运作的历史，因为现在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历史上的大问题喜欢胡乱用回归分析，搞得历史学家们非常气愤。

<sup>389</sup>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院长。

<sup>390</sup> 汪寿阳，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

<sup>391</sup> 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系主任。

<sup>392</sup> 谢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我先介绍斯巴达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和一些中国历史。我后面还要介绍雅典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尼德兰共和国和英国。<sup>393</sup>然后，我将陈述共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自由资本的动态模型、保守资本的动态模型、共和资本的动态模型、大国兴衰的军事动态模型、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态模型……这是我们武大学派震惊世界的共和政治-法治-经济学新理论。我不会搞无聊的统计回归分析，因为我自己已经玩了整整四十年的统计回归分析。

大家都把经济学当成经济-金融工程在自欺。预测未来或历史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没有逻辑和规律。预测经济和股市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和金融没有逻辑和规律。张维迎和陈志武的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文明的逻辑错得离谱。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搞对，张维迎和陈志武当然只能瞎侃。经济学研究股市泡沫大错特错，因为泡沫是市场本身的必然性：泡沫自然会有市场来消灭它们，而不是依赖政府干预。信息不完全也一样会产生对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不必政府干预。对付“柠檬”的汽车市场现在太多了：你可以租赁汽车半年、一年或三年。在顶级期刊去研究股市泡沫和经济政策更是荒唐。如果经济和股市有逻辑和规律，政府干预可以。关键是经济和股市没有逻辑和规律，政府如何干预？

其它的书如历史的逻辑、政治的逻辑、金融的逻辑、法律的逻辑，竞争的逻辑跟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一样误人子弟。有人还出版大学的逻辑呢。历史、文学、考古、哲学、社会、法律、经济、心理……都没有规律，全世界研究这些领域的人多啊！研究不是为了找规律。我们要好好学习波普尔的科学研究的 가 方法论，搞清楚理工科和文科的根本差别。不过波普尔本人被经济学迷惑了，他说经济学里可能有规律（逻辑）。他当年不知道 S-M-D 定理，可以原谅。“市场没有规律，局部看是这样，长期有没有趋势呢？历史也有趋势和周期律吧，都是人性的反映？”我连趋势都不敢肯定，尽管波普尔说存在趋势。我们先看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美用不用核武器。

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始，人类的理性主义呼叫着“改变世界”。上帝只能哈哈大笑。自然科学可以改变物资世界，但人类秩序没有逻辑和规律，怎么改造？人的基因改造？如果历史有规律，我们早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如果经济有规律，我们早就避免了经济周期和股市崩盘。正是历史没有逻辑和规律，我们才看到从民主到专制、再从专制到民主的折腾。

历史没有逻辑和规律的例子太多：1. 我从小学到大学本科都必须学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2. 我们微博讨论里已经有多种美国历史和

<sup>393</sup> 斯巴达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和一些中国历史在本书已经有相应内容了，雅典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尼德兰共和国和英国还没来得及介绍。

罗马历史。3. 我们微博讨论里已经有多种中国历史。4. 我在美国已经看了几十种美国历史的版本。5. 文艺复兴的历史可以有很多版本，我自己只看了五种。如果企业成长有规律，我们就都是企业家了。历史和文明没有规律。绝大多数人都不懂这一点。请看沃格林对历史主义的规律论的全面批判《政治的新科学》和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

弗里德曼错误就得离谱，政治自由决定经济自由。韦伯和我都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也可以反过来。历史没有规律。历史也不存在倒退，因为历史没有规律和逻辑。金观涛<sup>394</sup>连波普尔的书都没有好好读，历史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人类的未来更是不可能思考的。沃格林自己从批判历史主义出发写《秩序与历史》六卷书，最后他自己写不下去了，因为他自己发现他也在按照历史主义在思考。历史和文明的发展是没有逻辑和规律的。好好读读波普尔才能认识到历史没有规律。这才是波普尔教给我们真正的常识：

“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 Hölderlin）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波普尔认为，历史实际上就像一个有机体。‘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而这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所以在哲学上看，‘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实际上对于有机体来说，‘重复的经验’变成了新的经验。所以，‘被观察

<sup>394</sup> 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出版著作《真实与虚拟》、《消失的真实》。



事件的重复可能相当于观察者产生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理解其“原因和结果”，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提出普遍规律”，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sup>395</sup>

不懂波普尔的书，文理科都没有办法入门。看书一定要看原著或这些书的（好的）中文翻译。万万不要读中国人的解读。不要相信中国人搞懂了波普尔的书。其实波普尔说的历史趋势都不存在，我们就更不要说历史（社会、政治、心理……）的逻辑和规律了，无知无畏才能看到规律（逻辑）。科技进步也是人的瞎思考，技术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它影响历史，但历史本身没有规律。

历史主义的荒唐还迟迟没有被我们中国人好好理解。我们从小被洗脑，哪里真学到什么知识啊。可怜啊，中国人。历史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把历史分为发展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都是历史主义的意淫。美国没有封建阶段。非洲和拉美从古代部落社会一下子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五个社会在东欧都不存在普遍性。马克思完全借用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没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应该是不存在的。物质匮乏与人类的欲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必须选择征战、抢夺与杀戮。”必然的。让五种社会形态见鬼去吧。

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个人觉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根本不可能，因为历史没有规律。古今之变是不可能理解（通）的，天人之际更没有办法去研究。这是何等幼稚啊，因为历史根本没有逻辑或规律。《离骚》就是哼哼唧唧，还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哼哼唧唧。最后五个字很有道理，因为他写的只是他的理解，而我们每一个人写都会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写自己的世界史和中国史，而且这样写出来的历史远比帝王将相的历史过瘾。司马迁根本没有办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中国人谈天人合一真是太把人当一回事了。无耻至极啊。愚昧无知达到如此之境界：“内丹学中，认为天人一气相通，可以‘将无涯之元气，续有限之形躯’，结就灵丹，点化阳神，进而炼神还虚，与道合真，合于自然无为之道，道通为一，是最为究竟的“天人合一”。古人没有现代天体物理科学知识，胡侃还能原谅：“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没有而万物与我为一’。张载《正蒙·乾称篇》：‘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现代文明人何必意淫？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不能合

<sup>395</sup> 《王笛：历史没有规律，未来不可预测》

一，中国人还胡侃“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子，皇帝意淫“天人合一”。中国人还喜欢意淫“天下”。<sup>396</sup>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理性主义比欧洲和美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要狂妄亿万倍：在人间建立天堂。

如果历史有规律和逻辑，政府会利用这些逻辑和规律在地上建立天堂。马克思就是如此兴奋地想象。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谈政治。列宁和毛泽东一样。毛泽东专门晚上（半夜三更）谈政治。马克思知道空想社会主义最喜爱设计未来社会，他自己并不想去设计共产主义，但是他还是偶尔情不自禁。上帝不会告诉他们上帝的密码。美国国父们实用主义得很：看看希腊、罗马、瑞士、尼德兰、英国是怎么做的；看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怎么说的。哈耶克谈自发演化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就更有道理一些。不过我们不能断定哈耶克的自发演化就一定出现 great society or open society (Karl Popper)。

美国最近七十年来运动多得很，因为白左认定了历史的逻辑和规律。世界银行的口号是“A world without poverty（没有贫穷的世界）”这是一定是个梦。美国白左和欧洲白左们就是在更多其他的梦里生存着。他们通过政府搞消灭贫困的战争、消灭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战役、建设智力和禀赋平等的公平正义……欧洲发达国家也一样。这都是历史主义（历史规律论）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经济怎么被主观地改造？社会怎么被主观地改造？人性怎么被主观地改造？……结果只能是混沌的自发演化，谁都不知道结果的结果。这才是人类行为的意义。

Don't immanentize the eschaton!（不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现在我们达到了一致：Communism, common prosperity, state ownership（共产主义、共同富裕、国有制）等等都是历史主义的 utopia（乌托邦）。现实中，任何 utopia 都变成了 dystopia（反乌托邦）。历史主义把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性强加于人。“不可抗拒就是不做抗拒。”共同富裕死于墨索里尼的魔幻：“历史规律扼住了我们的喉咙。”三十五年来，我在中国引进的当代高级经济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而七十多年苏联共产主义实践证明计划远比市场重要。

“苏联的崩溃本质就证明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堂最终走向地狱”太对了！波兰通过萨克斯和邹恒甫从地狱回到地面。东欧和俄罗斯从共产主义（totalitarian）社会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如匈牙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可以再回到 totalitarian (slave) society or 封建制度。历史文明没

<sup>396</sup> 见第二章第四节“一统天下”。

有丝毫逻辑和规律。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没有逻辑和规律。市场和金融当然没有逻辑和规律。

“邹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私产神圣，自由平等民主，是一种历史必然？还是人为的结果呢？”我不谈历史必然，因为历史必然性是错误的。伯林论历史必然性的错误的论文大家看看。我认为私有产权、法治、自由、民主（平等）、三权分立是共和国最基本的要素。

新加入的学友请从《邹恒甫的学社》第一天的内容看到今天。谢谢大家！我不会要求任何人跟我有一致的看法，因为我谈的人文社科都没有历史主义的规律。经济学没有规律是因为价格下降后，需求不一定增加（大家复习我微博里 S-M-D theorem）。因此，市场没有规律（逻辑）。

不懂数学的人，搞任何学问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Kenneth Arrow 读书范围比较广，看他的论文集（六本）就知道我们华人搞经济学的人基本上没戏：理科毕业的毫无希望，文科毕业的又不懂数学。Andreu Mas-Colell 在本科就参加西班牙革命。

如果不懂数学和经济学，大家最好不要去美国念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量化历史也是经济学的殖民地。“邹老师，请问为什么美国法学专业的也需要懂数学与经济学？”经济法肯定如此。

看国学的人，能不能先把大学数学和物理搞懂？不懂数理化，如何谈哲学和文明？自然科学的文盲怎么能活在今天。“正是大学数学和物理学都不懂的人才，只能去搞国学。早些科学院的一些所是那些科研搞不好的才去当官，但其实这样更可怕，人有了权力就役使他人，也可以和他人交换，最后也弄了很多论文，科研也搞好了。”国内有太多人用经费请外国名人合作写论文、发论文。学术腐败啊！

有人问我“邹老师，请问 barro 当 QJE 主编的时候，您怎么不趁机发表几篇 QJE 呀”我一辈子跟我有名的好朋友如拉丰和巴罗合作了吗？我从来不与比我有名的人合作。像钱颖一那样跟比他厉害的人合作是我最瞧不起的。钱颖一通过 QJE 主编 Maskin and Shleifer 发两篇垃圾论文。他跟 Milgrom, Stiglitz, Maskin, Weingast 这些名人合作让全世界笑话他：钱颖一最后是一个不搞学问的中国官员和商人。钱颖一通过主编 Shleifer 发表在 QJE 上的两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算垃圾。中国人的腐败观念真是无处不在。这种想法都是肮脏的。我的天马行空的独立精神是拉丰、卢卡斯、巴罗、梯诺尔…最欣赏的。讲了这么多我的共和国经济学理论模型，大家会要我解释怎么我总是一个人单独发表这么多论文？道理很简单：我为中国人争气，我不跟名人合作！钱颖一通过 QJE 主编 Maskin and Shleifer 发两篇垃圾论文。他跟 Milgrom,

Stiglitz, Maskin, Weingast 这些名人合作让全世界笑话他：钱颖一最后是一个不搞学问的中国官员和商人。这就像外国出版社给国内人出版期刊一样，国内真是人傻钱多，死命补贴外国出版社。多少年不搞学问的李稻葵送国家的钱给爱思唯尔出版社搞了一本英文期刊《经济与政府》，笑死全世界。经济与政府在欧美国家是对立的。

学校录用人才的 Holmes 定理：“一流的学校录用一流人才；二流学校录用三流人才；三流学校录用四流、五流、六流人才。”我们搞经济学研究根本不需要自科和社科基金，我们更不需要横向课题。真正的研究不是摸钱摸权摸女人的手段。我们绝对不要用研究、课题和团队去奴役学生。

我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是中国第一。“请问邹先生：您读过马克思的什么书啊？十卷《马恩文集》都读过吗？”我 1978 年读武大本科的教材就是《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三卷，更不用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个年代不是读这些书，我需要背诵。那一代人都是用文字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1926 年的哈佛博士）也没有学微积分。误人子弟！改革开放后，他们偶尔支招搞私有制和市场（不是私有自由市场），完全没有政治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的系统阐述。现在看他们当年的书，惨不忍睹。马克思的几个基本“规律”就是被数学严格证明搞熄火了。尤其是数学证明：社会总利润不等于社会总剩余价值。“这是因为还有大自然的赠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Renewable resources 不断提供无须付费的能量给经济系统！”这是原因之一。在马克思体系里，数学证明资本和土地也贡献利润（剩余价值）。

这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就证明了数学模型的重要性。马克思本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利润总量一定等于剩余价值总量。马克思搞错了！我们只能严格证明一个弱版本的定理：利润大于零意味着剩余价值大于零；剩余价值大于零意味着利润大于零；但剩余价值总量不一定等于利润总量。这个定理是日本经济学家 Nobuo Okishio（置塩信雄，January 2, 1927 - November 13, 2003）在 1955 年证明的。百度错误得离谱。这个弱化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让马克思主义者太失望了。其实，弱化的马克思的剥削定理在现实世界里已经看到了：很多自动化企业不用劳动力，它们的利润反而特高。以后全世界的劳动力都由机器人代替，哪里还有剩余价值啊。这个数学模型的证明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生产可以不要工人阶级。这个数学模型的证明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生产可以不要工人阶级。不用数学模型就不可能有经济科学。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里，人太昂贵（人反抗、人要工资、社保、医保、养老金……），而机器人太便宜。如果人是奴隶，他还可能生病。

人一辈子一定要做出来真正是自己第一个做出来的经济学模型。中国经济学人都是跟着马克思和其他人的模型做。我的资本主义精神模型、军事力量积累和资本积累模型、重商主义模型……都是我第一个在世界上做出来的经济学贡献。这不是吹牛逼。人一辈子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模型。我 1986 年从微观经济学专业改学宏观经济学就是因为搞微观理论的越来越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没有理论模型不能发任何论文。

世界上最厉害的是思想。我们中国人要像我这样不断提出新思想。批判一种理论模型必须提出自己的另外一种理论模型，没有自己的理论模型而用中文嘴炮，谁知道？现实证明：我的论文越来越成为中美冷战必读物。我的哈佛师兄内瓦罗（Peter Navarro）后悔他没有早看我的军事资本积累模型、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重商主义动态模型、财政集权模型、世界帝国模型、权力暴政模型……没有想到我的学术著作成了中国畅销读物。我的这些学术论文才是中国思想、中国话语权、中国称霸世界的武器。请大家等着我今年的《宏观、财政、金融、增长》第四卷和第五卷的出版。

中国人不可能超过我创立的众多经济学理论模型。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樊刚、林毅夫、钱颖一……是毫无思想的人，他们更无自己的模型。邹至庄只有一个邹检验，他主要是统计学家。我不提其他中国人了。人必须死命搞出来一个自己独特的东西。“邹检验其实也非常简单，他要不做我也能想出来，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学统计学我自己就想出来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邹至庄是谁。”就是简单、漂亮。太多人想到了！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论模型。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模型，谁能说话？林毅夫、张维迎、钱颖一、李稻葵……都没有一个自己的理论模型，更不用说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些博物馆里的人了。厉以宁和吴敬琏完全不懂当代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理论。我们还谈他们干什么？搞经济体制改革根本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你们见到任何一个经济学人，都必须问此人是否有自己的理论模型。经济学里统计分析没有丝毫意义。弗里德曼提出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他的理论模型完美无缺，统计回归分析当然没有丝毫问题啊。中国人最差劲的一点就是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理论模型。现在大家见面，基本上只说自己发表在哪个有名期刊上，从来没有说自己发明了一个什么新理论模型。数学家也如此，基本上没有数学家说自己解决了哪个世界难题。科学发展必须不断推翻权威的观点。张益唐是例外的例外。

“现在的评价体系，逼着青椒发顶刊，越顶越好。结果导致必须增加论文工作量，文章又臭又长，但是真正的经济学新思想几乎没有，就像您说的，现

在的经济学变成了工程学。”现在 Top 5 毫无贡献。经济学被白左搞死了。你们不妨看看谁提出来了新理论模型。

从国外回去的这么多海龟经济学家有多少人学我这样模型化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没有一个人！中国有几个人很懂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但这些人几乎都不会玩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天大的遗憾或笑话。我如此广泛读书并建立数学模型，我怎么可能看得起中国经济学人和中国人文社科里的人？陈寅恪那样不懂政治哲学、经济学、宪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他还“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我怎么办？

1987年，王岐山来哈佛大学和我谈到汤因比的十多卷《历史研究》，我才知道国内当年只翻译出版了《历史研究》的简写本上、下两册，笑死我啦！（我有汤因比《历史研究》精装本和平装版两大套二十多卷。我现在也不知道现在这套书完全翻译成中文没有。）国内世界历史学的基本书籍很多是简写本翻译，而我在美国看的都是全套。Edward Gibbon 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全套是台湾出版的，而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也是上、下两册简写本翻译。看汤因比的这套书让我一下子就想到如何动态模型化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文化解说。汤因比认为任何文明类型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连续发展环节。文明既非起源于种族优越的天赋人权，也非种族所处地理环境特别安逸所致，而是源于“挑战与应战”二者相互作用的动力。“挑战”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种模式。前者是因为困难与新环境的刺激，后者来自打击、压力、惩罚或不幸等人为因素刺激。实际情况是，文明社会起源时往往面临的是异常艰难而非安逸的环境因素。不过，挑战应有一个最为适度的点或界限，才能激起成功的应战。没有动态数学模型，汤因比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刻画“挑战与应战”的动态过程。我一直到今天都经常跟罗雨雷谈到这个兴奋的过程。我看弗洛伊德和叔本华的著作也都是写下来动态数学模型，而且一定要从模型里推导出来他们著作里的主要结论，就像我用动态数学模型得出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果一样。我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数学模型已经成了经济学的时髦领域。一个思想没有数学模型化一定是幼稚的，而且几乎一定有错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就如此。我们读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弗洛伊德、汤因比、哈耶克时不把他们的思想写成数学模型，那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们要模型化他们的思想。

有人问李敖？李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是什么？他的数理模型在哪里？没有数理模型，哪里会有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创新？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重商主义模型、自由模型、短缺和投资周期模型…是不是我折腾出来的？“很难想象在这种上下文里有人会提到李敖，

他只是个通俗中文作家而已。这都哪跟哪儿呀？”中国搞经济学的人除了猪模型，就看李敖和金庸。数学模型的好处是把理论说得清楚，不必写大部头著作瞎吹。谁能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变成数学模型吗？希望大家能够用数学模型推出来这些关系。文字讨论没有意义（bullshit）。202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让中国人知道什么叫原创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吗？Diamond-Dybvig 银行挤兑模型就是原创，而他们后面一万篇论文都是跟着做而已。

我回答微博上几个问题：

“经济系统是个复杂系统，经济学建模的事情以后有无可能让 AI 去做呢？”不可能。建立复杂经济学模型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思维。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

“数学虽好可是对人来说，终极问题才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哲学之类的更有吸引力”今天欧美人极少搞哲学。我走遍世界发现哲学只在中国发达，因为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爱智慧，中国人爱钱权。

“他出了一本新书，真是哈佛的牛叉叉！Stephen A. Marglin - Raising Keynes - A Twenty-First-Century Gener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Stephen Marglin 特厉害！林毅夫也是连微积分都不懂，瞎折腾回归方程。他哪里能搞新结构经济学啊，OMG！

“您怎么看现在有一门叫做经济社会学，Social economics 的学问？”这个领域正好是经济学家 Gary Becker 带头把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是人文社科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学、法学、历史、心理学、伦理学…都被经济学的方法占领了。Gary Becker 《社会经济学》。这是一本经济学占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我的老师之一，佛罗里达大学已故的伟大的思想家 H. T. Odum，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途径去占领经济学和社会学。他甚至提出了热力学第四和第五定律，邹先生前面说要做回武大一年级本科生，建议读读他的著作。反正我读了之后，就觉得所有这些经济学的东西都很肤浅了。”我六十岁才知道真正如何读书。我现在完全像我大学本科十六岁时用功读书写笔记。好书要天天读：我就没有看到读书的中国经济学人。如果我们都是混模型和统计，中国不可能有人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做为闲暇爱好，我只对奈特的思想及其模型化感兴趣。”要不是 Truman Bewley 把 Knight 的想法数学模型化，你怎么折腾？你能超过 Bewley？我推荐他那么多学生都没有超过他。“总有后来人。我不担心，我就是后来人之一。” Truman Bewley 之后，所有人都是把 Bewley 的宏观模型庸俗化、低级化。“但我很喜欢奈特的视角，当然我认为他的视角需要融入所罗门诺夫对不

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后也许会更好。”这是数学游戏。Bewley 是有思想的人。你看看山东大学彭实戈的人哪里有思想？中国人有思想的在哪里？

我之前发出来的很多论文也都是想让大家了解如何用数学来模型化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发展/增长。大家可以试着模型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自己已经尝试了。这样才是我们新的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研究。我现在六十岁了，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学里提出来一个理论模型多么艰难。一百年来，哈佛经济系有几个人能留下一点点东西？没有几个人啊。很多哈佛教授也如此跟我说。



## 第二节

# 重论财政分权定理与重商主义

我是世界上实证研究财政集权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第一人。这些论文本来都有理论模型，可惜那些期刊主编一定要我们把理论部分删除。这是共和（政治-法律）经济学的重要部分：

Davoodi, H. & Zou, H.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vol. 43(2), March.

Zhang, Tao & Zou, Heng-f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lsevier, vol. 67(2), February.

Xie, Danyang & Zou, Heng-fu & Davoodi, Hamid, 199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vol. 45(2), pages 228-239, March.

Zhang, Tao & Zou, Heng-fu, 2001. "The growth impact of intersector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alloc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With applications to China and India," *China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12(1), pages 58-81.

Jin, Jing & Zou, Heng-fu, 2002. "How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 aggregate,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 siz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vol. 52(2), pages 270-293, September.

我们做经济学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提供财政分权大问题的一个例子：印度和中国比较。（我已经做了美国的财政分权。）这篇论文里有非常详细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回归分析。数学模型和统计回归如何论证或反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六合同风、四海一家”？这篇论文也是一个经典例子：The growth impact of intersector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alloc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With applications to China and India<sup>397</sup>。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found to be consistently significant and robust in China. For India, however, we have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positively, and even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tate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allocation of public spending in various sectors is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 growth maximizing, whereas increases in the central allocation of its budget among development projects, non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social and community services by cutting the center's spending on all other functions can promote regional growth.（在中国，财政分权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直显著且稳健。然而，就印度而言，我们发现，财政分权与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甚至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国家在各个部门的公共支出分配与增长最大化基本一致，而通过削减中心在所有其他职能上的支出，增加中央在发展项目、非发展项目以及社会和社区服务方面的预算分配，可以促进区域增长。）

我的这些论文引起了发展中国家议会的众多争论。印度议会反对世界银行的财政分权做法，因为印度再分权可能导致印度各邦独立。苏丹果然分裂了。选择 centralization（集权）还是 decentralization（分权）也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各级政府都有 expansion（扩张）的本能，这是由官僚机构的本性决定的。各级政府的规模也需要从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

这篇文章<sup>398</sup>说明了财政分权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We use a panel data

<sup>397</sup> <https://ideas.repec.org/a/eee/chieco/v12y2001i1p58-81.html?continueFlag=b64ff5bdc0eb15bb31a4b15e6392eb>。

<sup>398</sup> Zhang, Tao & Zou, Heng-f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Elsevier, vol. 67(2), pages 221-240, February.

se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e fi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non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everal explanations are offered for our findings. (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发达国家则没有。对我们的发现有几种解释。)

中国的财政分权反而妨碍了地区经济增长: This study of China demonstrates how the allocation of fiscal resource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affected economic growth since reforms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We find that a higher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This consistently significant and robust result in our empirical examinations is surprising in light of the argument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usually makes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local economic growth. (中国的这一研究表明,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始以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资源配置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 在过去 15 年中, 政府支出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 省际经济增长越低。在我们的实证检验中, 这一持续显著且稳健的结果令人惊讶, 因为我们认为, 财政分权通常对地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 集中力量办大事似乎是正确的呢, 我的这篇一直被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这篇文章<sup>399</sup>说明美国财政分权可能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害: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spending by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we demonstrate how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s the long-run growth rate of the economy. Applying the model to the U.S. economy, we find that the existing spending shares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consistent with growth maximization. In this sense, further decentralization in public spending may be harmful for growth. (在一个包含各级政府支出的内生性增长的简单模型中, 我们展示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该模型应用于美国经济, 我们发现州和地方政府的现有支出份额与增长最大化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共支出的进一步分权可能对增长有害。)

我们的一系列的统计回归分析都否定财政分权定理。这引起了世界上主流

---

<sup>399</sup> Xie, Danyang & Zou, Heng-fu & Davoodi, Hamid, 199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vol. 45(2), pages 228-239, March.

经济学的疯狂反扑和进攻。在中国，林毅夫和钱颖一也死命攻击我的发现。过瘾。现在变色龙林毅夫、李稻葵、钱颖一……都拥护政治集中了。

周黎安关于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更是成了历史笑话，因为我国一直是党领导下的全能治理国家。许成钢和我早就认识到我们这一群人在 1980-1990 年代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我国根本不存在财政联邦主义和财政分权。林毅夫二十多年来再也不提他跟刘志强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的论文，他倡导政府要大有作为。钱颖一和 Hehui Jin 的 JPubE 论文是我在世界银行出钱支助 Hehui Jin 写的，他们的结论错得离谱。这个领域是我带领世界银行研究小组在 1994-2000 之间开创的。

周黎安在 2022 年还谈这些有些幼稚的经济统计回归分析真是不可思议，就像他用统计回归荒唐地论证上山下乡提高了农村教育一样。杨小凯在文革十年，我们湖南岳阳监狱里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学了一点微积分。小凯的例子能说明把大学数学教授作为 reactionary（反动派）送往监狱有利于他们学习微积分知识吗？没有数学理论模型，我们就不知道因变量和自变量是怎么决定的。周黎安他们荒唐地用回归分析来说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带动了中国教育普及和发展，他们更应该利用杨小凯在岳阳建新农场坐牢学到了一点微积分皮毛来证明文革把教授们送到岳阳建新农场劳动好得很。

有人说“贾瑞雪的论文和他结论完全不一样吧，官员晋升和他们的业绩完全没有关系，想晋升谁就安排他在容易晋升的位置，甚至上下协同数据造假。”统计回归游戏：想要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

我列举的 1990 年代的理论模型已经说明中央政府给地方激励（含财政分权）既可以提高地方经济增长，也可以减少地方经济增长，关键是看理论模型里中央政府支出（措施）和地方支出（措施）的生产率比较。我们对美国、印度、中国的统计回归分析就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统计回归结果。这正是 SMD 定理所预料的：anything goes。另外，天天被整治的“腐败”官员如此多。这是打他们的锦标赛的耳光啊。

## 重商主义

从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提供重商主义的理论模型是我们的重大任务，我在 1997 年发表了这方面的开创性结果：

Heng-Fu Zou, 1997. "Dynamic analysis in the Viner model of mercanti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Elsevier, vol. 16(4), pages 637-651, August.

长期来看，国家强大和人民富有离不开重商主义，因为一个国家短期的贸

易逆差会减少这个国家长期的军事力量和资本积累。还有什么经济学动态理论模型比我的这种模型更过瘾呢？没有。

This paper models the central theme of mercantilism in Jacob Viner's interpretation—power vs plenty—in a framework of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Viner model of mercantilism, a nation with strong mercantilist sentiment ends up with large foreign asset accumulation and high consumption in the long run; an import tariff leads to more foreign asset holding and more total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in the Viner model, the Harberger-Laursen-Metzler effect exists unambiguously: a permanent terms-of-trade deterioration causes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 the short run. (研究表明, 在重商主义的 Viner 模型中, 重商主义情绪较强的国家最终会积累大量的海外资产, 并长期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进口关税导致更多的外国资产持有和更多的总消费; 此外, 在 Viner 模型中, Harberger-Laursen-Metzler 效应是明确存在的: 长期贸易条件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经常账户赤字。)

重商主义其实正确地说明了: 贸易逆差带来的短期消费和福利增加伤害一个国家的长期的军事力量和资本积累。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 他们只把一个国家的效用函数或福利仅仅定义在消费上是荒唐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福利更依赖其长期的军事力量和资本积累。而长期的军事力量和资本积累需要持续的贸易顺差。重商主义最强调军事战争和国家力量积累啊!

凯恩斯在其《通论》一书中高度评价重商主义, 他却并没有建立重商主义的理论模型:

FOR some two hundred years both economic theorists and practical men did not doubt that there is a peculiar advantage to a country in a 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and grave danger in an unfavourable balance, particularly if it results in an efflux of the precious metals. But fo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re has been a remarkable divergence of opinion. The majority of statesmen and practical men in most countries, and nearly half of them even in Great Britain, the home of the opposite view, have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ancient doctrine; whereas almost all economic theorists have held that anxiety concerning such matters is absolutely groundless except on a very short view, since the mechanism of foreign trade is self-adjusting and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it are not only futile,

but greatly impoverish those who practise them because they forfeit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t will be convenient,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 to designate the older opinion as Mercantilism and the newer as Free Trade, though these terms, since each of them has both a broader and a narrower signification, must be interpre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text. (大约两百年来, 经济理论家和实践者都不怀疑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有特殊的好处, 而贸易逆差则有严重的危险, 特别是如果它导致贵金属外流的话。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意见分歧。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实干人士, 甚至在持相反观点的英国, 也有近一半的政治家和实干人士仍然忠实于这种古老的学说; 然而, 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认为, 除了非常短期的观点外, 对这些问题的担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对外贸易机制是自我调节的, 试图干预它不仅是徒劳的, 而且会使实践这些机制的人变得非常贫穷, 因为他们丧失了国际分工的优势。按照传统, 将旧的观点称为重商主义, 而将新观点称为自由贸易是很方便的, 尽管这些术语, 由于它们每个都有一个更广泛和一个更狭窄的含义, 必须参照上下文来解释。)

Generally speaking, modern economists have maintained not merely that there is, as a rule, a balance of gai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ufficient to outweigh such advantages as mercantilist practice can fairly claim, but that the mercantilist argument is based, from start to finish, on an intellectual confusion. (一般来说, 现代经济学家不仅坚持认为, 作为一种规则, 从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平衡足以超过重商主义实践可以公平主张的优势, 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的论点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一种知识混乱的基础上的。)

Marshall, for example, although his references to Mercantilism are not altogether unsympathetic, had no regard for their central theory as such and does not even mention those elements of truth in their contentions which I shall examine below. In the same way, the theoretical concessions which free-trade economists have been ready to make in contemporary controversies, relating, for example, to the encouragement of infant industries or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rms of trade,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 real substance of the mercantilist case. During the fiscal controversy of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present century I do not remember that any concession was ever

allowed by economists to the claim that Protection might increase domestic employment. It will be fairest, perhaps, to quote, as an example, what I wrote myself. So lately as 1923, as a faithful pupil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who did not at that time doubt what he had been taught and entertained on this matter no reserves at all, I wrote: "If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Protection can not do, it is to cure Unemployment. ... There are some arguments for Protection, based upon its securing possible but improbable advantages, to which there is no simple answer. But the claim to cure Unemployment involves the Protectionist fallacy in its grossest and crudest form." As for earlier mercantilist theory, no intelligible account was available; and we were brought up to believe that it was little better than nonsense. So absolutely overwhelming and complete has been the domination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例如, 尽管马歇尔对重商主义的提及并非完全没有同情心, 但他对他们的核心理论本身并不关心, 甚至在他们的论点中也没有提到真理的要素, 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些要素。同样, 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在当代的争论中已经准备好作出的理论上的让步, 例如, 关于鼓励新生工业或改善贸易条件, 与重商主义案例的真正实质无关。在本世纪头 25 年的财政争议期间, 我不记得经济学家曾对保护措施可能增加国内就业的主张做出过任何让步。也许, 引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子是最公平的。直到 1923 年, 作为一名古典学派的忠实学生, 我当时并不怀疑他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教育和娱乐, 完全没有保留, 我写道: "如果有一件事是保护不能做的, 那就是解决失业问题……有一些关于保护的论点, 基于保护可能但不太可能带来的好处, 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包含了最粗鄙、最粗糙的保护主义谬论。" 至于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 没有可理解的解释;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 这比胡说八道要强不了多少。古典学派的统治是如此的势不可挡和完整。)

凯恩斯继续啰嗦啰嗦, 他摸不到门: Let me first state in my own terms what now seems to me to be the element of scientific truth in mercantilist doctrine. We will then compare this with the actual arguments of the mercantilists.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advantages claimed are avowedly national advantages and are unlikely to benefit the world as a whole. (让我先用我自己的话说一下, 在我看来, 重商主义学说中科学真理的要素是什么。然后, 我们将把这一点与重商主义者的实际论点进行比较。应该理解的是, 所声称的优势是公开的国家优势, 不太

可能使整个世界受益。)

When a country is growing in wealth somewhat rapidly, the further progress of this happy state of affairs is liable to be interrupted, in conditions of laissez-faire, by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inducements to new investment. Give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termine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the well-being of a progressive state essentially depends, for the reasons we have already explained, on the sufficiency of such inducements. They may be found either in home investment or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cluding in the latter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which, between them, make up aggregate investment. In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quantity of aggregate invest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profit motive alone, the opportunities for home investment will be governed, in the long run, by the domestic rate of interest; whilst the volum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necessarily determined by the size of the favourable balance of trade. Thus, in a society where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aegis of public authority, the economic objects, with which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be preoccupied, are the domestic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balance of foreign trade. (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快速增长时,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这种幸福状态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被新投资的诱因不足所打断。鉴于决定消费倾向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民族特点,由于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原因,一个进步国家的福利基本上取决于这种诱因是否充分。它们既可以在国内投资中找到,也可以在国外投资中找到(包括后者的贵金属积累),这两者之间构成了总投资。在总投资的数量仅由利润动机决定的情况下,长期而言,住宅投资的机会将由国内利率决定;而外国投资的数量必然是由贸易顺差的大小决定的。因此,在一个在公共权力支持下不存在直接投资问题的社会中,政府关注的经济对象是国内利率和对外贸易余额,这是合理的。)

凯恩斯只好回到赫克歇尔的《重商主义》著作里继续啰嗦啰嗦: The early pioneers of economic thinking may have hit upon their maxims of practical wisdom without having had much cognisance of the underlying theoretical grounds. Let us, therefore, examine briefly the reasons they gave as well as what they recommended. This is made easy by



reference to Professor Heckscher's great work on Mercantilism, in which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thought over a period of two centuries are made availab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general economic reader. The quotations which follow are mainly taken from his pages. (经济思想的早期先驱者可能在没有对潜在的理论基础有多少认识的情况下,就突然发现了他们的实践智慧格言。因此,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他们给出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参考 Heckscher 教授关于重商主义的伟大著作,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这本著作中,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首次向普通经济学读者提供了信息。下面的引文主要摘自他的著作。)

(1) Mercantilist thought never supposed that there was a self-adjusting tendency by which the rate of interest w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appropriate level.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emphatic that an undu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was the main obstacle to the growth of wealth; and they were even aware that the rate of interest depended on liquidity-preference and the quantity of money. (重商主义思想从来没有设想过会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趋势,通过这种趋势,利率将被确定在适当的水平上。相反,他们强调过高的利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他们甚至意识到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

(2) The mercantilists were aware of the fallacy of cheapness and the danger that excessive competition may turn the terms of trade against a country. (重商主义者意识到廉价的谬论和过度竞争可能使贸易条件对一个国家不利的危险。)

(3) The mercantilists were the originals of "the fear of goods" and the scarcity of money as causes of unemployment which the classicals were to denounce two centuries later as an absurdity: (重商主义者是“对商品的恐惧”和货币短缺导致失业的始作俑者,两个世纪后,古典主义者谴责这是荒谬的:)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anc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nemployment argument as a reas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imports is to be found in Florence in the year 1426.... The English legislation on the matter goes back to at least 1455 .... An almost contemporary French decree of 1466, forming the basis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Lyons, later to become so famous, was less interesting in so far as it was not actually directed against foreign goods. But it, too,

mentioned the possibility of giving work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unemployed men and women. It is seen how very much this argument was in the air at the time... (最早将失业作为禁止进口理由的例子之一是 1426 年的佛罗伦萨……英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 1455 年……1466 年, 法国颁布了一项法令, 几乎是当代颁布的, 该法令奠定了里昂丝绸工业的基础, 后来声名大噪, 但就其并不针对外国商品而言, 它就不那么有趣了。但它也提到了为数万名失业男女提供工作的可能性。可以看出, 这一争论在当时是多么地悬而未决……)

Mercantilists were conscious that their policy, as Professor Heckscher puts it, “killed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On the one hand the country was rid of an unwelcome surplus of goods, which was believed to result in unemployment, while on the other the total stock of money in the country was increased” with the resulting advantages of a fall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重商主义者意识到, 正如赫克歇尔教授所说, 他们的政策“一石二鸟”。“一方面, 国家摆脱了不受欢迎的商品过剩, 这被认为会导致失业, 而另一方面, 国家的货币总存量增加了”, 从而带来了利率下降的好处。)

凯恩斯和赫克歇尔只有在如下这点上搞对了重商主义: The mercantilists were under no illusions as to the nationalistic character of their policies and their tendency to promote war. It was national advantage and relative strength at which they were admittedly aiming. (重商主义者对他们的政策的民族主义性质和他们推动战争的倾向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所瞄准的是国家优势和相对实力。) 但他们还是不能提高理论模型, 我们做出来了! 另外,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也是肯定重商主义。

多读几遍。凯恩斯总是 bla bla bla。我总是做大题目。重商主义理论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学领域。它把国际政治、军备竞赛、资本积累、国际贸易和金融都联系在一起。这个简单的重商主义模型得出来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有军备竞赛、资本积累、工业、农业、外国资产持有等复杂模型中。

懂得这一简单模型后就马上知道: 我们平时所学的静态国际贸易理论几乎全部是错误的。1840 年出版的德国人(也是美国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不是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用我的模型就太容易理解了。看看我是如何做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吧, 看看我的论文是怎么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推翻的, 我把克鲁格曼的国际产品创新和传统资本积累放在一起: Product Innov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sup>400</sup>。

假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为四个生产要素。假定生产率的提高是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利用重商主义的关税保护和出口补贴措施，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边干边学生产高度资本密集性的出口产品。日本和韩国高新尖产品出口成功就是这种重商主义动态贸易政策的结果。搞自由贸易，美国却只能大量出口农产品和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那种静态两个国家-两个行业-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国际贸易理论完全不能预测现实世界各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一个劳动禀赋特丰富的国家完全可以利用重商主义政策以及较长时间的边干边学重点生产资本密集性的产品。如果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效用函数定义在消费和军备竞赛上(Power and Plenty)，资本密集的军工行业会优先发展呢。李斯特直觉的产业政策理论模型早被我写出来了。所以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教科书应该扔到垃圾桶里。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投资的传统静态模型更是荒唐。世界上的资本积累量是不断增加的，我们不能像蒙代尔那样给定总资本量之后去分析在两个国家之间如何 allocate capital。我跟蒙代尔交流比较多。他说他写论文的那个时代(1950 年代)根本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啊。如果重复李斯特的著作里的 bla bla bla，他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发展政策如何成为一个理论领域？国内有很多李斯特的粉丝。我不知道这些人创立了什么样的动态优化理论模型去证明李斯特或重商主义的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我的动态优化模型都是在 1980-1990 年代完成的。

这是我献给邹至庄老师的论文，没有在期刊发表可惜了。必须把所有国际贸易的理论都动态化，否则静态均衡得出来的结果经常是错误的。我在哈佛先学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到 1986 年，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创新研究死了，我马上改做宏观和财政。现在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还是死的。为什么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会死呢？因为对策论已经做死了。出书在经济学里等于死亡。我献给邹至庄先生的论文就在一本书里睡觉。

中国一直都是搞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就是搞贸易顺差。中国什么时候变成了自由贸易国？破坏分子破坏规则……能赢也是骗子，我们的汽车比国外贵 3 倍以上号称加入世贸组织了。在中国买一双 Nike 鞋，死贵。在美国，40 刀 Nike 就很好。奔驰、宝马、法拉利、保时捷，我在美国都可以开。在中国，搞这些是倒爷……

日本、韩国、中国、印度都搞贸易保护主义。东亚国家都靠重商主义把经济发展起来的，英国和美国也一样。美国、德国建国后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英国开始一样更是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强大一点以后都喊自由贸易。它

---

<sup>400</sup> <http://aefweb.net/WorkingPapers/w191.pdf>。

们强大后，它们的政治（权力、霸权）需要执行自由贸易。如果衰落一点点，各国又搞重商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特别指明了。我是模型化这一政治-经济模型。

国际贸易理论离开国家政治就没有一点价值。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中国农业和工业怎么生存？不搞贸易保护主义，哪个国家经济能发展起来？这种简单常识都不懂？瑞士世界经济论坛都是白左搞全球化。哪里有全球化？中国怎么能搞自由贸易？绝大多数人都是 coolies and slaves。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怎么把 bloody profits 维持下去？

本来就应该重商主义啊！中美带头最好。中国不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中国农业、轻工业、服务员、网络、制造业几年就被摧毁。好好学懂我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态模型。谁在中国讲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亡国的错误理论。中国谈什么自由贸易：外交部天天歌颂自由贸易的人住嘴。这种人好好像美国人 Peter Navarro 那样看我的论文，我写的重商主义论文还被美国人认为是给中国政府支招。我为中国贸易顺差支招了吗？为什么美国人怀疑我？<sup>401</sup>

“罔顾国际贸易协定规则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内经济学人文一曾说，重商主义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法宝，也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取得‘经济奇迹’的法宝。问题是，这个法宝别国经济学人就看不穿么？”美联储的文一晚了我三十年提出重商主义。他还没有提出重商主义的动态模型。

邹恒甫在国际经济学最大贡献之一是用动态模型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提高社会福利。我们平时学习的静态国际贸易里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谁相信国际贸易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增加社会福利，谁就是猪头。人的效用函数不仅定义在消费向量上，它也定义在民族国家权力之上。经济学教科书不考虑民族权力和民族强大，哪里有这种抽象的经济人？经济学的每一个定理都必须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里再证明一次。

---

<sup>401</sup> U.S. Trade Deficit Still Growing,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224764-u-s-trade-deficit-still-growing?continueFlag=b64ff5bdcdc0eb15bb31a4b15e6392eb>。

### 第三节

## 给中国经济学青年的回信<sup>402</sup>

感谢邹教授再次普及和推广现代经济学范式和思想。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既包括对科研的疑惑，也包括对国内经济学家和经济发展的追问。我们相信《邹恒甫教授回答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 100 问》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系列。

邹教授回信：

我最近才回答完大家 100 个提问的前 15 个。要想详细回答需要太多思考了。另外，大部分问题比较重复。

Q：邹教授，作为经济学家，您相信爱情吗？

答：我当然相信爱情。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也是世界上最稀缺的。

Q1：邹老师，您好！我有 2 个问题想请教下：1. 目前，国内经济学人才仍较为匮乏，尤其是理论经济学领域，大多数是做计量方面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或好的建议？2.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拉动，当前已进入发展瓶颈期，您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好的建议？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时间，祝您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

<sup>402</sup> 本节全部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计量经济圈》。

答：理论经济学家比计量经济学家重要无穷倍，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理论，有没有统计检验无关紧要。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导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哈耶克的分散的知识理论一下子就证明了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市场最优资源配置的。萨缪尔逊的显示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是市场消费行为的基础。这些例子说明了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理论。基于此，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队伍是搞微观和宏观理论研究的。目前各个大学经济学的师资大多数是搞统计回归分析，尤其是能源经济、环境经济、农业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统计回归分析，这是荒唐的。另外，个人认为，经济学期刊不应该发表没有理论模型的计量统计论文，因为统计回归分析仅仅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一种工具。没有统计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照样成立。

我一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没有制度的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开放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我们学习当代经济学的人基本上没有深刻理解这些理论的 private property rights、rule of law、群己权界（freedom）和契约（constitution）的制度基础。没有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就没有群己权界（freedom）的市场经济。群己权界（社会和个人的权利边界）或 freedom 本身与 rule of law、property rights 和契约都是不可分割的。具体一点，经济学里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都应该明确写为包含群己权界（freedom）的形式： $u(c, z, Z)$  和  $f(k, z, Z)$ ， $c$  是通常的消费向量、 $k$  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总和、 $z$  是群己权界向量（如拥有财产的权利、freedom of speech 的权利、freedom of choice 的权利、自由迁徙或流动的权利等等）， $Z$  是群己权界的资本积累或群己权界的各种完善的制度。

Q2：我想问邹教授一下问题：1. 博士研究生如何确定选题方向，如何更好的完成博士论文开题到毕业论文答辩的一些小建议；2. 对于英文 ssci 期刊论文的发表，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3. 老师有什么高效科研的小绝招；4. 老师是否有定期不定期面向国内的硕博士学生做科研讲座的计划

答：我肯定要我的博士生解决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例如科技进步、资本积累、军事力量积累和战争如何导致大国兴衰。我以前很多时候都没有让我的博士生真正解决一个问题，这是特别大的遗憾。只要自己的论文是新的研究题目，发在非 SSCI 期刊上一样有影响力。我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1994 年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JPE) 上, 当时 EJPE 还不是 SSCI 期刊。现在我的这篇论文已经带来了一个国际上时髦的研究领域。我 1998 年通过杨小凯发表在新期刊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RDE) 第二卷的论文也有影响力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而 RDE 很多年之后才成为 SSCI 期刊。

Q3. 邹老师您好。您受哪位经济学家或其他领域学者影响最大? 您作为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博士, 为什么没有坚持哈佛的“新凯恩斯主义”传统呢? 而是投身到“芝加哥学派”的推广中?

答: 我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卢卡斯影响最大, 我最崇拜他全面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背景。他的英文写作也是全世界经济学家里绝对第一。哈佛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胡闹, 哈佛大学的巴罗早就放弃并批判了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现在芝加哥学派不存在了, 以前的芝加哥学派在宏观、微观、产业组织 (反对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方面都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卢卡斯基本上是一个人带来了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他对金融经济学和发展 (增长) 经济学的贡献也是世界第一。芝加哥经济学派最重视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的融合。

Q4. 邹老师好, 在阅读文献和写作论文时, 我时常会思考大家做出的研究是否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 感觉更多的人做研究是为了申请好的学校、评职称等功利性的因素, 想问问老师认为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答: 这个问题太好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说国内的经济学家, 即使在国内外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没有做出真正有国际社会贡献的经济学论文。我 1983 年就去哈佛读经济学博士,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一篇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真正有贡献的经济学论文。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没有丝毫新意, 我的哈佛同班同学 Kiminori Matsuyama 在 1990 年左右在 JET 和 QJE 上面发的两篇论文才算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点小贡献。Matsuyama 为什么没有做出来大贡献? 因为他没有把工业化与制度 (特别是 private property rights、rule of law 和 freedom) 联系起来。结构经济学必须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Q5. 想问问邹教授，对刚刚接触经济学，对“经济学”这个概念还比较模糊的大一学生有什么建议吗？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但现在正处于经济学观念塑造阶段，请问您可以推荐一些书吗？

答：一定要全面学习数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的英文教材，绝对不要看中文教材。没有数学、政治学、法学和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我们不可能做真正新的经济学研究。

Q6. 邹老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市场化转型下，哪些理论是可以借鉴的，又有那些问题是中国本土特色的，例如国企，产权制度，政府角色等？未来经济理论的前沿在哪里？

答：power、the rule of law、corruption、property rights 和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未来经济学的方向一定是把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

Q7. 邹老师，您好！很多经济学悬而未解的问题，为什么凭借学者在书房里看文献，查阅资料，就能够解决呢？除了那些经过严密论证的顶刊论文，普通的研究有没有意义呢？

答：现在发在 top 5 的绝大多数论文也没有任何意义。

Q8. 邹老师好，看到评论区您提到学习经济学最好去美国留学，请问如果在国内读博的话，有没有一些学习或研究方法能够弥补之间的差距呢？谢谢老师！

答：只有在美国读经济学博士才能跟上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Q9. 邹教授，想进行经济学术研究，作为始终走在经济学前沿的大家，请问您对经济学术研究的后生有推荐的论文和书单吗？

答：我个人觉得现在经济学研究者基本上没有西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我从来都是死命研读非经济学之外的经典书籍。你不妨先看看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韦伯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哈耶克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派普斯的《财产论》。看了我说的这些书之后，你勉强知道应该补充哪些方面的知识。

Q10. 邹老师，万事开头难，在此想请问您，如何能最快的写出第一篇论文，还有如何快速写出第一篇英文论文？

答：在哈佛读博士期间，我花了三年把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The Protestant Ethic、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储蓄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做模型。我直到今天还在努力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因为文化制度、The Protestant Ethic 和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成了经济学的时髦领域。

Q11. 请问邹教授，美国现在的高通胀现象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还是由于短期热钱过多导致呢？另外我们该怎样应对合理应对同时的通胀压力？在通货膨胀方面，你是哪一个流派的支持者呢？

答：我需要再过两年的时间才能判断美国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因为疫情带来了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比较多的短期补贴。美国没有食品通货膨胀的大问题，因为美国农业生产潜力最为巨大：从 193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都是补贴仅仅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一的美国农民，不让美国农民多生产农产品。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给美国农民的补贴都高达 160 亿美元。

记住弗里德曼的话：通货膨胀永远是政府发行货币太多的问题。

Q12. 邹老师好！我是一个大一新生。我特别喜欢经济学。我很想像您一样厉害。请问您能不能在经济学学习方面给我一些建议。

答：还是要去美国留学，在国内不可能学好经济学。如果有时间，想学经济学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Richard Pipes 的书。努力学好英文和数学，希望你的经济学的入门教材是 David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的《Price Theory 价格理论》。他们三个人都出版了《价格理论》。

Q13. 邹老师好！我看过您在计量经济圈中对于 top5 上近些年发表的中国研究的评价，想请问做 empirical 研究，尤其是微观因果推断的 reduced-form，从根本上来讲，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全然没有意义吗？或者哪些类型的微观实证

是有意义的呢？谢谢！

答：经济学的每一篇原创性论文应该有理论模型，因为统计回归分析只是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有没有统计回归分析对于真正的经济学理论是无所谓的。现在经济学的论文大都是没有理论模型的统计回归分析，这是错误的做法。

Q14. 请问邹老师，20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在《经济学季刊》上有一次激烈的交锋。请问邹教授，站在当下看，如何评价这场争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现实？

答：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不是林毅夫和杨小凯提出来的。凡勃伦早在二十世纪初针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提出来了后发优势，而诺斯从制度角度提出来了后发劣势的说法。我同意诺斯的观点：从较长的时间来看，制度没有跟上技术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都没有经济学思想贡献。

Q15. 请问邹老师，经济学除了常识以外真的有思想吗？这种思想性真的值得为之读博做研究吗？经济学科的学科边界在哪里？对现实世界而言，经济学力所能及的部分，除了常识以外，是不是非常有限？或者，换一个问法，如果有反人类的恐怖分子对着世界上各学科排名前100的科学家名单展开暗杀计划，目的在于使人类文明停滞或者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恐怖分子是不是可以放经济学家一马？

答：现在经济学的论文确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思想了。历史上经济学的思想大致可以分成左和右两大派：zuo派提倡 public ownership,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人人事后平等、增加福利社会等；you派提倡 private ownership, minimal government or night watchman government、在上帝面前或法律面前平等、减少社会福利等。柏拉图、卢梭、马克思和罗尔斯等等是典型的zuo派，而亚里斯多德、洛克、亚当-斯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是典型的you派。我特别担心恐怖分子杀掉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他是我唯一敬仰的活着的经济学家。美国绝大部分人读经济学博士或做经济学研究只是为了混一个饭碗。现在美国做经济学研究的自由氛围也特差，右派经济学都不敢说话、发论文。如果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还活着，他们估计会有生命危险，因为美国白左几乎统治了经济学的学术和实践。

我继续回答中国青年经济学人提出来的关键性问题：

(1) 张五常把“市场需求函数通常斜率为负”作为公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理解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市场需求函数加总 (aggregation) 的许多技术性条件，请看 Mas-Colell 他们的教材：两个人的总量需求 (aggregate demand) 函数就不一定满足单个人需求函数最基本的 Slutsky equation。我根本不要求张五常这位耄耋老人理解 1972-1974 年发现的 SMD 定理，因为他的数学能力太差。我完全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看中国人用中文写的经济学著作和教材。

(2) 宏观经济学在数学技巧方面比微观经济学要求更高。宏观最基本的理论如 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就是在无穷维空间上求最优解，我们给本科生讲这个模型时没有刻意把它写成无穷维空间上求最优泛函的存在性问题。如果要表达宏观模型里的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的数学技巧，大家可以看 Truman Bewley 关于弗里德曼永久收入假设和最优货币发行量的两篇经典论文。Robert Lucas (JET, 1972) 更是经典的经典。当然，没有微观基础的、无厘头的凯恩斯-希克斯 IS-LM 模型往往被宏观经济学外行当成讨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工具。这些外行需要 IS-LM 标榜自己，我们何必认真。中国人往往学不懂宏观经济学，因为我的哈佛中国师兄弟们 (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 都没有入宏观经济学的门。一辈子搞 (伪科学的) 统计回归分析的林毅夫和魏尚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宏观经济学模型。

(3) 记住波普尔证伪方法 (falsification or refutability) 最基本的要点：越容易被实验或实证统计分析推翻的理论越是科学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需要一次日全食观察就可以被推翻，可惜啊：太阳光被巨大的引力拉弯了。再看看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描述总能符合心理病人的一些特征。

(4)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会提出任何新的经济学理论，因为人不是机器。当然，混饭吃的人总是想用这些新词汇去忽悠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研经费。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技部完全不会被这些新词汇欺骗。

(5) 统计回归分析让中国能源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领域变成了忽悠者的天堂。这是国际上经济学里的大笑话。

(6) SMD 定理证明经济学跟历史学一样都没有逻辑或规律，我们难道要放弃经济学理论？不是的。就像我们热爱没有逻辑和规律的历史学一样，我们

特别热爱经济学理论研究。当然，贾瑞雪、周黎安、林毅夫、魏尚进…的统计回归分析都是对历史和经济数据的瞎折腾，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数据和扩充的数据里得到任何我们想要的结论：anything goes.

(7) WU DI 问计量经济学的边界和计量分析的范围是什么。我个人往往是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搞清这个模型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然后做回归统计分析。其实，统计回归分析可有可无。例如，Thomas Sargent 在 1978 年 JPE 的理论论文没有对消费做回归分析，而 Robert Hall 在 1978 年 JPE 的论文做了理论后又加上统计回归分析，他们两个人的理论模型的意义是一样的。当然，Robert Hall 的论文的引用率特高，因为很多专搞回归分析的人用 Robert Hall 的数据或更多的数据样本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些不同的结论正好说明了 SMD 定理：anything goes.

(8) 谈谈我从 1978 年以来就喜爱的奥地利经济学。当年我是看哈耶克 1944 年的《The Road to Serfdom》内部发行的中文版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文。我在哈佛读博士期间跟 Robert Dorfman 学了奥地利学派的利息和资本的数学模型 (Dorfman, REStud, 1959)，他给我的博士研究生必修课《经济思想史》A+的最好成绩。是不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超额需求函数就没有 anything goes 的性质呢？当然不是。SMD 定理适用于私有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的所有产品的总量超额需求函数。国内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是否建立了奥派数理经济学？据我所知，他们没有。

(9) 最后，我在此感谢 Rolf Mantel (1934-1999) 在哈佛大学教我微观经济学 (1984 年春季)。Mantel 的博士导师是耶鲁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大师：Tjalling Koopmans and Herbert Scarf。Mantel 创立了阿根廷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他正好是我从 1987 年到今天在中国从事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榜样。非常巧，Mantel 在阿根廷的研究中心叫 CEMA (Centro de Estudios Macroeconómicos de Argentina, 现在是 CEMA 大学了)，这是我 2018 年 4 月 19 日才知道的。Andreu Mas-Colell 和 Hugo Sonnenschein 是 Minnesota 学生和老师关系，他们是风流倜傥的两个极端。他们两人的课堂让我和我的几个中国学弟们知道我们根本不是搞数学的材料。

我在此主动代表王一江和李稻葵感谢 Subramanian Swamy。我跟 Swamy 是忘年交。我让 Swamy 给访问学者王一江和李稻葵写了推荐信。没有 Swamy 的推荐信，他们两个人根本不可能被哈佛大学录取。樊纲没有 Swamy 的推荐信就没

有被哈佛录取，他只好回中国暴得大名。我们在哈佛的中国人感到异常奇怪，因为樊纲连哈佛博士学位都没有。Swamy 从哈佛博士毕业后就留在经济系当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66-1969），他的导师是 MIT 的 Paul Samuelson。1969 年，Swamy 回到印度办经济学教育，他在印度政治界也特别活跃，当了印度人民党的领袖。他总是说他是第一个见到邓小平的印度政治领袖。

## 第二封

1. 邹老师，请问可能产生具有摆脱西方框架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吗？中国可能不会像哈耶克说得那样以分立的财产权作为社会延续的基石，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该往哪里去呢？现在教育部已经叫各个高校组成团队编写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产业经济学等等。

答：请看科尔奈 1990 以后对社会主义全面分析的很多著作。这些中国教材本质上都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材，我们必须打假，揭露这些教材的抄袭。这些教材都是忽悠共产主义的经费，销售资本主义的模型。本来，中国共产主义经济需要跟资本主义经济有完全不一样的数学模型，可中国人玩不出来这些数学模型，他们就抄袭，他们没有搞自主创新。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教材的抄袭者不懂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我是中国研究这些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人，因为我 15 岁开始就在武汉大学专门攻读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和历史。我为了学好哲学才去武汉大学数学系学数学。我在哈佛经济系继续跟激进主义者 Stephen Marglin 学会了最新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

2. 邹老师，您觉得现在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用一大堆模型去验证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而且研究的问题很少能够与现实接轨？现代的经济学有多少为社会做出贡献呢？

答：经济学理论研究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你看的是好的理论模型，你应该高兴。最可怕的是没有搞懂 SMD 定理和卢卡斯经典论文的统计回归分析。例如：回归分析用不同数据可以发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负相关或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正相关或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没有相关性。卢卡斯（JET, 1972）从理论上证明这些都可以发生。根据 SDM 定理，我们其实可以猜测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是椭圆形的关系或混沌关系。

3. 邹老师，博士生 4 年如何度过？国内大多数经济学院都似乎没有合格的三高老师，大家在博一就不来上课，而是在那里跑数据尽快发表论文毕业。看

到这种环境，我似乎也不想认认真真学习三高课程，在平常的实证研究中很少用到三高内容。国内经济学的路在何方，大多数院校没有合格的三高老师，学生没有系统学习过三高过程。

答：你要说四高，还有高级金融理论。这是搞统计回归带来的悲剧，因为搞统计回归的教师们根本没有能力讲 Mas-Colell 他们的微观理论教材、Stokey-Lucas 的动态经济学教材、Duffie 的资产定价理论教材、钟开莱的概率论。中国教师讲这些教材也是瞎忽悠学生，因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搞懂这些教材。如果他们真搞懂了这些教材，他们会回中国吗？美国大学严格限制搞统计回归的教师名额，中国大学没有限制搞统计回归水货教师的名额。我们各个大学经济学教课危机迟早爆发。我在北京大学时教材都是最高级的理论教材。现在，周黎安和陈玉宇不懂拓扑和泛函分析，他们怎么能教高级微观、高级金融、高级宏观、高级计量？他们一辈子都在灌水搞回归分析。

4. 邹教授是如何能接受米塞斯、哈耶克之类不用数学的“经济学分析”的？（如果觉得文字分析不可靠，如何能接受他们的结论？）

答：1978 年以来我就喜爱奥地利经济学。当年我是看哈耶克 1944 年的《The Road to Serfdom》内部发行的中文版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文。我在哈佛读博士期间跟 Robert Dorfman 学了奥地利学派的利息和资本的数学模型（Dorfman, REStud, 1959），他给我的博士研究生必修课《经济思想史》A+的最好成绩。我让（清华水货应用数学系毕业的）钱颖一抄我的答案，他只得了 B+，因为他根本不懂庞巴维克的著作。是不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超额需求函数就没有 anything goes 的性质呢？当然不是。SMD 定理适用于私有自由市场的奥地利学派的所有产品的总量超额需求函数。国内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是否建立了奥派数理经济学？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我本人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一定导致多重均衡、周期和混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一定产生今天很多欧美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性别现象。这是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哈耶克不过是继承了洛克的衣钵。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国内很有名气，我很理解。可惜，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没有丝毫地位。其实，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政治哲学领域也不是一流学者。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必须用伯克等人的保守主义来补充：这是我最近三年建立的共和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里最基本的理论模型。保守主义强调宗教，教会，传统，习俗，秩序、市民组织，家庭等等。保守主义让欧美人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性别是什么。

5. 请问邹老师，您对国内经济学研究整体印象是什么？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经过这么多海归的引进，以及大力的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改革，我们是否已经与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并驾齐驱了呢？

答：中国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博士大部分都不知道美国宪法，他们哪里能理解美国经济制度和美国经济学。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差别。估计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美国经济学教育越来越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基本上搞统计回归分析。

6. 尊敬的邹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如何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呢？什么真的是重要问题，这个谁来定义呢？国外发表在 AER 等期刊上的论文，在话题上真的是最前沿的吗？

答：我个人的观点：Top5 上面的论文完全不必看。凡是别人做了的，我绝对不做。如果某著名人物做了一个结果，我一定要做一个跟他相反的结果。我这三年创立的共和经济学模型把经济学跟政治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完全结合起来了。我慢慢通过《计量经济学圈》跟大家分享。注意：这里的《计量经济学圈》是熊彼特的定义：《计量经济学圈》= ECONOMETRICA。如果你跟着 AER 做，你就是那些论文作者的奴隶。我的哈佛导师之一（伟大的）Richard Caves 说了：Top 5 都做了的论文，你还做干什么？所以我的论文都是创新的或推翻名人结果的东西。你看我五卷英文论文后就知道我是如何发现论文题目的。

7. 邹老师，我们学校的理论经济学全国排名靠前，可是我发现即使是我们学校的经济学研究也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我本觉得经济学的研究是需要深入一线实地考察，然后分析问题。但现在感觉很多研究缺乏实践支撑，找数据做计量发论文而缺乏对一个问题抽茧剥丝的分析。我本人有意愿继续做研究，希望能更多通过现实考察确定研究问题，可是不随大流又不好发论文。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呢？

答：我在世界银行研究部才有了去全世界调查研究的机会啊。我的哈佛导师之一萨克斯天天骂世界银行不积极，而我最积极参加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私有化国有经济的过程。1994 年，我在世界上发表了第一篇私有化国有经济的动态模型（On the dynamics of privatization H Zou, China Economic Review 5 (2), 221-233）。当然，这篇文章 1991 年就写好了。我研究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财政分权，发表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论文。我很快就成了国际上财政分权研究的 Guru（这是印度政府、印度尼西亚政府、苏丹政府对我的称呼）：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tudy

H Davoodi, H Zou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3 (2), 244-257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D Xie, H Zou, H Davoodi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5 (2), 228-239

How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 aggregate,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 size? J Jin, H Zou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 (2), 270-293

The growth impact of intersector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alloc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With applications to China and India T Zhang, H Zou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 (1), 58-81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D Xie, H Zou, H Davoodi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5 (2), 228-23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 Zhang, H Zou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2), 221-240

林毅夫和钱颖一跟着我后面做，还说我的研究不对，天天高喊财政分权。现在他们两个都是集权派了。笑死我的！这两个变色龙。你们让我怎么瞧得起他们这些人格分裂的水货。

8. 邹老师你好，请问国内科研环境怎么样？我感觉身边大部分都特别浮躁，而这主要源于学校希望老师尽快发表论文。现在国内的情况是，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这种模式搞得人都崩溃了。

答：我当然知道这种残酷现实啊。我一辈子都反潮流，对着干。我的研究也一样。我从来不申请基金课题，我从来不开会（包括学术会议），我从来不请官员吃饭。你们可以学我，跟你们的老师决裂。我在世界银行造反世界闻名：第一，世界银行要政府多搞基础设施投资，我主张政府多投资教育、妇女儿童健康、社会保障。这是此主张最有名的论文：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S Devarajan, V Swaroop, H Zou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7 (2), 313-344

此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说明：政府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的投资比



基础设施投资更快地提高经济增长。

第二，我反对世界银行乱贷款：

Foreign aid reduces labor suppl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L Gong,  
H Zou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 (1), 105-118

Foreign aid reduces domestic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reases  
foreign borrow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L Gong, H Zou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1), 147-163

第三，不平等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H Li, H Zou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3), 318-334

这些造反论文让我出名了。世界银行没有办法折腾我。巴罗他们总是问我：世界银行什么时候开除我。张维迎受不了我骂他是不能发表国际论文的九流学术水货，他 2007 年春天主持院长会议把我从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了。过瘾啊！张维迎一直天天喊自由、平等和企业家创新，他不知道如何实践自由，他更不知道如何模型化自由。

10. 邹教授，您好！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可能是基于国情和实践提出有为政府的（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但如何理解“有为政府是没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在我们所接触到的经济学认知里，当市场失灵严重时，需要政府部门的“出手相救”。

林毅夫怎么可能提出来丝毫新思想啊！他 1990 年代的论文都是主张私有化和政府分权，他最近十多年强调政府集 quan（有为政府）。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只看技术变化，没有制度变化，没有自由、法治、和 private property rights。这既不是旧结构经济学，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

我的主张已经在第一次回答你们的十五个问题里回答了。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全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我的观点在一系列文章里：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的制度。<sup>403</sup>

11. 邹老师，请问做经济学理论而非实证，需要有什么准备呢？这也是你极为推崇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答：我注重理论模型，我也做了四十年实证研究，我还写了太多的（没有

<sup>403</sup> 《邹恒甫：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的制度》，爱思想网站，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2798.html>。

模型和统计回归的)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一个人搞经济理论研究,ta 比较爱好数学是必须的,ta 更要爱好西方政治哲学、宪法学、社会学和历史。我们不是经济工程师和金融工程师。学理科出身的人不可能真搞懂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懂数学、政治哲学、宪法学、社会学和历史。

12. 邹教授,您如何评价香港教授丁学良的“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 5 个”一说?

答:那是 2005 年左右的说法。现在,我们连具备人格的经济学家都没有 5 个了,何谈合格。

9. 邹教授,您最自豪的事是什麽?最遗憾的事是什麽?最喜歡自己的哪一篇論文?

答:我最自豪的是我自费办了多年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我最遗憾的是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超过我的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研究水平。中国人完全不适合学数学、哲学和音乐。这三方面的学问真需要“爱智慧”,而我们爱权力。我最喜欢的是我即将完成的《邹恒甫共和经济学》。

13. 邹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经济学的逻辑有说服力吗?基础学科如物理,每个公式都揭示了真理,但是经济学的公式,往往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变量,而有时候部分变量的删改,会极大地影响计量结果。而且有时候,经济学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似乎很难做到严谨,经济学逻辑是否会因此受到怀疑?

答:这是我已经谈了的 SMD 定理的内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心理学等都没有逻辑和规律。请看我后面更多的说明。

14. 想问一下邹教授在学习经济学高级内容时挣扎过吗?能分享一些学习心得吗?另外邹教授是如何看待经济学直觉的呢?我的看法是直觉是用来帮助接受记忆结论的,推理时全靠数学思维,直觉完全用不上,硬要用直觉推理可能反而是负面效果。

答:我在哈佛念博士根本听不懂 Mas-Colell 的西班牙英语。幸亏我懂一些法语,我能听懂 Tirole 的产业经济学。说英语有自己的口音是无比骄傲的,看看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印度人说英语吧。如果你看政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你一定有特别多的直觉。

### 第三封

1. 在这次回信中，我要给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强调几个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

第一个重要点：江平先生和吴敬琏先生一直没有强调 the rule of law 和市场存在的基础是 private property rights。没有 private 产权，就没有真正的 the rule of law 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

(1) Individual Liberty and Autonomy: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often seen as essential for safeguarding individual liberty and autonomy. The idea is that individuals have the right to control and use their property as they see fit, without unwarranted interference.

(2) Rule of Law and Legal Certainty: Property rights contribute to the rule of law by providing a clear and stable legal framework. When property rights are well-defined and protected, it enhances legal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plan and make decisions with confidence.

(3) Incentives for Responsible Use: Property rights create incentives for responsible use and stewardship of resources. When individuals have ownership of property,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invest in its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contributing to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4) Conflict Resolution: Clearly define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help in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Legal systems that recognize and protect these rights provide mechanisms for addressing conflicts over ownership, use, or access to property.

(5) Market Economie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re closely linked to market economies. The ability to own, transfer, and exchange property is foundation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markets. This facilitates economic transac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6) Individual Dignity and Privacy: Private property is often viewed as an extension of individual dignity and privacy. Protecting property rights is seen as respecting individuals' autonomy and personal space, reinforcing the idea that one's home and possessions are inviolable.

第二个重要点：没有 private property rights，就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为什么？

(1) Incentive to Innovat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the incentive to invest time, effort, and resources in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s. Entrepreneurs are motivated by the prospect of owning and profiting from their creations.

(2) Risk-Taking and Investment: Entrepreneurs often take risks by investing their capital in new venture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ensure that individuals have control over the outcomes of their investments, encouraging risk-tak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3) Secure Ownership and Control: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ffer entrepreneurs a secure legal foundation for owning and controlling their businesses. This security is crucial for attracting investment, making long-term plans,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decisions.

(4) Market Transaction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ten involve buying, selling, and exchanging goods and services.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facilitate market transactions by providing clear ownership and transferability of assets.

(5) Collateral for Financing: Private property can serve as collateral for securing financing. Entrepreneurs can use their property as a guarantee for loans, enabling them to access capital for business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6)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encourages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here entrepreneurs can innovate and differentiat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prospect of gaining a competitive edge and reaping the rewards motivat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7)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contribute to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by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market signals and property ownership. Entrepreneurs can allocate resources where they see the highest potential for returns.

第三个重要点：没有 private property right，法治和自由，就没有效用极大化和利润极大化。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里必须有产权、法治和自由。为什么？

(1) Private Property: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control, and transfer their property. This ownership creates incentives for responsi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absence of private property, individuals may lack the motivation to optimize the use of resources, leading to potential inefficiencies.

(2)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that ensures consistency, predictability, and fairness in legal systems. It protects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s, allowing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to engage in transactions with confidence. A well-functioning legal system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stability and facilitates mutually beneficial exchanges.

(3) Liberty: Individual liberty involves the freedom to make choices, including economic decisions. Liberty allows consumers to choose products and services based on their preferences, contributing to utility maximization. For producers, liberty implies the freedom to enter markets, innovate, and pursue profit-maximizing strategies.

(4)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Private property, the rule of law, and liberty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Consumers, with the freedom to make choices based on their preferences, guide resources toward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satisfy demand. Producers, motivated by the potential for profit, allocate resources where they are most valued by consumers.

(5)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provide a secure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 to invest in and protect their innovations. The prospect of earning profits incentivizes producers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enhancing overall consumer welfare.

(6) Market Competition: Liber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support market competitio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ncourages producers to offer better quality products at competitive prices, leading to increased consumer choice and satisfaction.

(7) Wealth Cre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e rule of law, and liberty contributes to overall wealth creation. Producers have the incentive to maximize profits through 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consumers have the freedom to allocate their resources in ways that maximize their utility and well-being.

以上的英文表述比较准确，我想中国青年经济学人都应该看得懂。

2. 我认为《自由的走廊》是对中国进行的一项最出色的分析之一，也是最引人入胜的通俗作品。为什么？

因为 Acemoglu 终于把经济学回归到政治经济学了。离开政治、法治、社会、宗教，市场经济无法存在。《国家为什么失败》要翻译成《国民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 Nation 的重心是民族和人民，而国家主要指 State。中文无法区分英文的 State, Nation, and Country 三者的差别。Acemoglu 用的是 Nation: Why Nations Fail.

我个人认为 Acemoglu 《自由的窄廊》才是他最好的通俗作品，此书也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最好分析之一。此书的副标题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 直接将 States (国家机器) 和 Societies (包含人民) 之间的互相制衡作为自由存在的核心。学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人一看就特明白，但学经济学的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懂 States and Societies 的意思。这是当代经济学工程化之后的天大的遗憾。中国 Taiwan 出版了《自由的窄廊》的正体华语版。不能看英文版的人就看中国 Taiwan 正体版吧。

人类演化的动力来自于 Will to power。这点被霍布斯在《利维坦》里做了比较多的说明，而尼采把权力意志发挥到了极致。跟着迈克尔·曼和 Acemoglu 他们，我把权力意志概括为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地理权力、气候权力、制度权力、科技权力、性别权力、种族权力等。我对权力的罗列大大扩展了 Acemoglu and Robinson 《自由的窄廊》的第四章 “Will to Power”。我这样做是为了把 Acemoglu 的四本书放在权力意志的简单框架之中。自由是让利维坦戴上锁链 (Shacked Leviathan)，而科技权力 (力量) 必须服务于人类的 liberty, democracy and common good. 英文的 power 包含力量和权力，培根的 “知识就是力量” 正好是 “知识就是权力”。

另外，看这三本通俗读物时，大家不要忘了 Acemoglu and Robinson 的第一本更加深刻思考的好书：《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的经济起源》。这本

书才是后来三本书的基础，它也是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战争的主题。

## 附录 4.1<sup>404</sup>

我对这种乱象批判很多年了。

### 葛玉好：经济学研究的乱象

作为一名普通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对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充满忧虑。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毫无帮助，“八股文”式的写作技巧禁锢了思想交流，成功优秀的那些学术榜样潜移默化地毒害了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后来人，事情本不该如此。

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乱象就是因果关系识别方法的滥用。经济学研究一般的逻辑顺序是：理论模型——模型结论——使用数据验证结论。模型结论通常可浓炼为某个 X 对某个 Y 的影响，验证模型结论时可能会遭受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即 X 对 Y 的影响可能包含了各式噪音的影响，为了排除噪音影响、得到 X 对 Y 的纯净影响，我们需要使用因果关系识别方法。概言之，因果关系识别方法是服务于“验证模型结论”的，没有了经济模型，因果关系识别方法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研究，虽然冠之为政策评估研究，实际上就是作者头脑中的某个想法而已，没有任何理论模型。更可气的是，为了使用上因果关系识别方法，还会胡扯一些大饥荒、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之类内容来实现“自然实验”，极其荒唐。关于这个乱象，我还有很多想法，它们在《计量经济学》的视频教程里面也有所体现，感兴趣的朋友可跟我联系，共同讨论。我的想法很简单：没有理论模型的因果关系识别，就是耍流氓。

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乱象就是“基础内容”的简单堆砌。经济学有一些基础内容，很有力量并且也取得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例如：竞争带来高效率、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科斯定理等等。这些内容是经济学教材里面的内容，对经济学专业学生而言，它们就类似于  $1+1=2$ 。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知识普及，上述内容是合适的；对于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研究，不合适。但是，很多经济学研究成果，撇开哪些浮华文字，本质上讲的就是上述基础内容，听起来都对，但毫无价值。我怀疑，上述研究的某些作者，都不一定能真正看懂“竞争带来高效率”的数学证明。我前段时间参加过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论坛，发现很多研究者还在讨论交易费用、专用性资产之类的内容，跟我二十多年前硕士阶段学习到的内容并无区别，一代人过去了，二代人过去了，讲的还是同样的故事。关于这个乱象，我的想法是：“研究”这两个字本身就隐含了一定高度，基础内

<sup>404</sup>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E校挺好”，作者是葛玉好，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容不是“研究”。

经济学研究的第三个乱象就是赶时髦、追热点。最近几年，我经常看到诸如人工智能对\*\*\*的影响、新冠疫情对\*\*\*的影响之类的研究。人工智能有严谨定义，它不同于自动化、高级自动化、机器人等概念，严格来说，我们都还没有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从技术角度而言，如果对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逻辑不理解，如何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我看到的研究，基本上都混淆了“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的区别。新冠疫情还在持续，它对各方面的影响还在“进行时”，目前应该还不是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再者说，新冠疫情所产生的影响，跟国家防疫体制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讨论的到底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是防疫制度的影响？关于这个乱象，我的想法更简单：不做不看，眼不见为净。

上述想法，有些偏执，甚至有些狂妄，但都是真实想法。面对这些乱象，我都有点想采取“非暴力不合作”，即闭嘴、停写，只不过高校的评价体系不允许我这么做。所以，遇到问题还是要解决问题，下一篇推文，我计划从“AlphaGo 对围棋发展影响”的角度，讨论如何解决经济学研究出现的种种乱象。